

杨宪益传

作者：雷 音

简介.....	7
引 子.....	7
第一章天津时期(1915-1934).....	8
1.“白虎星”下凡.....	8
2.家世.....	10
3.至高无上的地位.....	13
4.孤独寂寞的童年.....	15
5.学生“打”老师.....	16
6.魏汝舟老先生.....	16
7.新学书院.....	17
8.杂览群书.....	19
9.《鹰哺记》.....	21
10.罢课领袖.....	21
11.志愿者.....	22
12.少年诗友.....	23
13.池太太.....	24
14.母与子.....	25
15.离家去国.....	26
16.远航.....	27

第二章伦敦时期(1934-1940)	28
17. 初抵伦敦	28
18. 站在牛津大学的门槛上	29
19. 地中海之游	30
20. 浪迹巴黎	31
21. 王礼锡夫妇	33
22. 上层与下层	34
23. 坏学生	34
24. 又保守又自由的牛津	35
25. 打败日本学会	37
26. 《抗日时报》和《复兴》	38
27. 留学生中的“左派”	39
28. 三等生和四等生	40
29. 格莱迪丝·玛格丽特·泰勒	42
30. 两个伤心的妈妈	43
31. 初译《离骚》	44
32. 家境败落	45
33. 去向抉择	47
34. 回国	48
第三章重庆时期(1940-1946)	50
35. 与母亲重逢	50
36. 中央大学柏溪分校	52

3 7, 翻译《阿Q正传》	54
3 8, 婚礼.....	54
3 9. 君子不党.....	55
4 0. 格莱迪丝的国籍问题.....	55
4 1. 贵阳师范学院.....	56
4 2. 太平洋战争爆发.....	58
4 3. 奔波在川黔路上.....	59
4 4. 儿子出生.....	60
4 5. 艰难的日子.....	60
4 6. 北碚国立编译馆.....	61
4 7. 北碚文化村的文化人.....	62
4 8. 诗人梁宗岱.....	64
4 9. 翻译《资治通鉴》	66
5 0. 从《零墨新笺》到《译余偶拾》	67
5 1. 英国大使馆的剑桥人.....	68
5 2. 国民党伤兵萧亦五.....	69
5 3. 转折.....	71
5 4. 下江.....	73
第四章南京时期(1946-1952)	74
5 5. 三人秘密小组.....	74
56. 中英文化协会	76
57. 《和平日报》副刊.....	76

58. 《绛舍》和业余古董字画收藏家.....	77
59. 拜占廷史教授.....	78
60. 艾德里安·伊文思.....	80
61. 民选馆长.....	80
62. 解放.....	82
63. 新政权的忠实拥护者和代言人.....	83
64. 紫石英号事件.....	85
65. 甲骨事件.....	87
67. 选举风波.....	89
68. 华东人民革命大学.....	92
69. 戴乃迭的苦恼.....	93
70. 到北京去.....	94
第五章北京时期（上）（1952-1966）.....	95
71. 新事业的召唤.....	95
72. 宏图初展.....	97
73. 受难者刘尊棋.....	99
74. “内控”的开始.....	101
75. 新认识的左派朋友.....	103
76. 反右（一）：漏网右派.....	104
77. 反右（二）：向达的遭遇.....	107
78. 大门为落魄者而开.....	108
79. 大跃进中的老黄牛.....	110

80. 大跃进中微弱的质疑声	113
81.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115
82. 差一点被逮捕	117
83. 关于“反诗”的惊人之举	118
84. 成了“活靶子”	120
85. “特权阶级”和“贱民”	122
86. 戴乃迭“石破天惊”的一段话	124
87. 山雨欲来风满楼	125
第六章北京时期（中）（1966-1972）	128
88. 当初杨宪益为什么拥护文化大革命	128
89. 一石激起千层浪	129
90. 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精神危机	132
91. 是什么使杨宪益的精神分裂症不治自愈？	134
92. 父与子	136
93. 清洁工和运煤工	140
94. 被捕	142
95. 半步桥边卧醉囚	144
96. 在监狱这个社会大学校中	147
97. 陷身囹圄死生轻	150
98. 戴乃迭在狱中	151
99. 来自英国的请愿书	152
100. 获释：“现在放你是对的，当初关你也是对的”	154

第七章北京时期（下）（1972-1988）	154
101. 回到了残破的家.....	154
102. 劫后重逢.....	155
103. 杨宪益的变化.....	157
104. 满目疮痍外文局.....	159
105. 孩子们回家.....	160
106. 杨焯的遭遇和“发疯”	162
107. 父与子（二）	165
108. 恢复工作--继续翻译《红楼梦》	166
109. 神奇之年--解冻.....	167
110. 噩耗.....	169
111. 思想解放的年代--《中国文学》的繁荣期和《熊猫丛书》	171
112. 地位变化的背后.....	173
1 1 3. 入党.....	175
1 1 4. 新时期的动荡.....	178
第八章晚年的辉煌和凄凉（1989——）	181
1 1 5. 杨宪益为什么不参加“呼吁人权的公开信”的签名?	181
1 1 6. 杨宪益以什么方式支持学生运动?	183
1 1 7. 青年朋友侯德健.....	186
1 1 8. 著名的“BBC六四广播讲话”	187
1 1 9. 避祸出走.....	189
1 2 0. 要求给予纪律处分.....	192

1 2 1. 英若诚“三顾茅庐”	192
1 2 2. 从要求退党到开除党籍.....	194
1 2 3. “小鞋”种种和戴乃迭的病.....	196
1 2 4. 戴乃迭为什么没有写完她的自传?	197
1 2 5. 人生回顾和世纪末思考.....	200
1 2 6. 愤怒出诗人.....	203
1 2 7. 诗人的另一面.....	205
不算尾声.....	207

简介

作者为写本书，从 1994 年到 2001 年，采访杨宪益先生达几十次之多，并陆续采访杨宪益先生的亲友、同事及中外有关人士数十人。书中所引资料，均根据原始资料记录。从动笔写作到完成初稿，前后达三年半之久。但因种种原因本书目前无法公开出版。因此，作者自费印刷少量，以表达对杨老的敬意，并对自己几年来的努力作一个总结。

但愿此书有朝一日能公开面世。

雷音

2004 年 7 月于北京

引子

1989 年 6 月 4 日，驻北京的戒严部队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以后，外电广播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谈话录音：“我谴责戒严部队屠杀北京市民的罪行！中国人民是杀不绝也吓不倒的！他们可以将我也加在杀害的名单之上，但是他们不能够杀光我们所有的人！他们不可能摧毁整个的国家！”这是“六四”屠杀后外电报导的从中国大陆发出的唯一的民间抗议声。在当时，这个声音鼓舞了千千万万的人！人们永远记住了他的名字——杨宪益。

杨宪益为他的“攻击言论”付出了代价。当局对他施加极大的压力，最终，他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

当肖斯塔科维奇逝世时，他的朋友和传记整理者伏尔科夫写道：“他逃脱了，官方的讣告已无从影响他了。”官方的讣告称肖氏“我们时代的伟大作曲家”、“共产党的忠诚儿子”。在官方的葬礼上，主管意识形态部门的高级长官们群集在他

的灵床边，而他们中间许多人多年来是以罗织他的罪状为业的。这是一个多么荒诞的场面！

其实，类似肖斯塔科维奇的遭遇不少中国的大知识分子逝世后也都遇到过。从这个角度来看杨宪益在他的有生之年被开除出党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因为这样尴尬荒诞的场面将来在他的葬礼上可能不再出现了。

杨宪益是当代中国最著名的翻译家（中译英）。他与他的英籍妻子戴乃迭（Gladys Margaret Tayler）联手合作翻译了一千多万字的中国经典文学和现代文学著作，在欧美汉学界有很大影响。作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员，杨宪益的一生，当然与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和历史密切相关，换言之，他的命运与所有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有共同之处。但他独特的个性和家庭背景，他与戴乃迭这两个异国青年之间的爱情以及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中西合璧的特殊婚姻组成的家庭使他的一生又与其他老知识分子有很大的不同，如何在一部传记中既写出这种“同”——自十九世纪以来中国人为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为求生存和发展不断探索、碰壁、理想的破灭而又不懈地追求的共同历史；而又写出它的“不同”——写出“这”一个真实生动、不溢美不夸张不歪曲的杨宪益传记，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笔者自知能力有限，但我愿意不揣浅陋努力一试。

奇士不可杀杀之成天神

奇文不可读读之伤天民

这是黄苗子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引用龚自珍的话来“影射”杨宪益。杨宪益的确有许多“奇”点。他娶了一个英国女人做妻子，这不算稀奇，稀奇的是这场异国婚姻历经了“刨祖坟、查三代、断绝一切海外关系”的阶级斗争的年代居然巍然不动（在那个年代，多少普通中国人的婚姻因政治原因而破裂！）；中国大陆四十岁以上凡是经过“文革”的人都有丰富的政治经验，知道在什么政治气候下说话该说到什么分寸，甚至懂得在什么场合下怎样说些保护自己而不伤害别人的假话。而杨宪益居然到了大军压城，甚至开枪杀人以后还敢对外国记者指名道姓地谴责最高当局（那时大多数普通老百姓在公开场合早已敢怒不敢言甚至噤若寒蝉了），更“奇”的是他“恶毒攻击”以后居然没有被关进监狱（在1989年，一个普通中国人对外国记者直言杀人真相后被判处十年监禁！）；此外他和他的妻子戴乃迭从五十年代起在政治运动不断的三十多年中把一千多万字的中国文学作品（主要是古典文学）翻译成了英文，这也不能不说是一桩“奇事”。杨宪益是著名的“酒仙”，他往往在开怀畅饮之后写出绝妙的“打油诗”，让友人们暗暗称奇。综上所述，构成了杨宪益“传奇”。笔者不才，好奇心促使我“打破砂锅问到底”，从了解杨宪益的家世、禀赋遗传、性格形成和人生经历开始，“顺藤摸瓜”，看看能否找到解开他特立独行的钥匙。

第一章天津时期(1915-1934)

1.“白虎星”下凡

1915年1月10日杨宪益诞生在中国天津日租界花园街一所大宅院。按阴历算是甲寅年（即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廿七，那年是虎年。杨宪益在英文自传中这样提到他的出生：我妈妈说她生我之前做了个梦，梦中见一只老虎跳进了她的肚子。据算命先生说这既是吉兆又是凶兆：这个男孩将孤单地长大，没有兄弟，

他父亲的健康也会因他的诞生而受到危害；但是他在历经许多不幸和危险之后最终会取得事业的成功。（摘自杨宪益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雷音译）

算命先生的预言居然一一应验了！杨宪益的确是他母亲唯一的男孩，他的父亲在他五岁那年得病去世了，而他在历尽无数的困苦和忧患之后成为了当代中国最杰出的翻译大家。

“白虎星”在中国民间被认为是克星，命硬，会克自己的亲人。据杨宪益的大妹妹杨敏如说他们的父亲杨毓璋先生在杨宪益五岁那年得了伤寒病，病本来已经快好了，但小“老虎”（宪益的乳名）偏偏在这时候得了猩红热和白喉，连续高烧，夜里哭啼不停。父亲心疼唯一的爱子，连夜披衣起来抱着老虎转圈圈，结果受了风寒旧病复发，从此一病不起。（杨敏如访谈，1994年6月14日，北京三里河）幼年丧父、孤独的童年、一辈子历尽千辛万苦是杨宪益的宿命，这个宿命伴随和影响了他的一生。但“白虎星”虽是凶星，毕竟是虎仙下凡，不同常人。他的出生在杨家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事隔七、八十年他妹妹杨敏如提起来还是那么耸人听闻：

杨宪益还没生下来就了不得！那天（十一月廿七）刮大风，“云从龙，风从虎”，属虎的孩子刮着风生下来…就是大命！风大到什么程度呢？我父亲要套马车去请日本的助产士，风把马车的灯刮灭了，马车的篷子都刮倒了。我哥哥没出现以前就是这个样子！……结果一生是个男孩，他们就觉得了不得哇！（杨敏如访问谈话，1994年6月14日北京）

杨宪益的母亲对自己唯一的儿子终生都怀着一种谦卑的爱。她甚至是带着某种崇拜来爱自己亲生的儿子。她出身卑微，是河北省南皮县一个穷秀才的女儿，作为妾被买来为杨家传宗接代。儿子虽然是上天给她带来的最大福祇，但他属于门第显赫的杨家，不属于她这个地位低下的人。儿子一出生就从她的怀里被抱走，交给了大太太。由大太太雇奶妈把他养大，睡在大太太的房间里。儿子会说话后管大太太叫“娘”，而叫她“姆妈”。她默默地忍受了这一切，把自己的母爱深藏起来，躲在远处偷偷地注视着自己的爱子。儿子长的酷似他的父亲和祖父：清濯的像貌，皮肤很白，小眼睛，眼角向下耷拉着，眉弓很高，直鼻子，下嘴唇较厚，向外鼓着……随着儿子一天天长，他一举手一投足浑身都是杨家人的气质，这一切使她感到惊讶和欣喜。她十七岁嫁给天津中国银行行长杨毓璋做姨太太，原本是当个传宗接代的工具，为了给杨家的长房长子生个男性继承人。但是她的聪慧和善解人意使杨毓璋渐渐对她产生了真正的感情。他的情感天平渐渐向这个出身贫寒的北方姑娘倾斜。每天下班他都来到她的房间，教她读书写字，写诗，还和她玩一种叫《升官图》的掷“色子”的游戏，和她一起消磨时间。（杨敏如访谈，1994年6月14日，北京三里河）但是，丈夫的爱并没有使她忘乎所以，她深深懂得这个高宅大院里处处都是陷阱，稍不留心就会跌进深渊。就在她进了杨家门后不久，杨毓璋又娶了个二姨太。这是姑奶奶们（杨毓璋的妹妹）向大太太出的主意，让大太太把她的一个丫头再给老爷做二姨太。这是古老中国官场上惯用的权术：有了二姨太就会分散老爷对大姨太的专宠，“正房太太”的绝对权力就可稳保了。

这样，杨宪益就有了两个异母姐姐（大太太所生），两个同母同父的妹妹和一个异母妹妹（二姨太所生）。五个女孩儿托着他这么个“一脉单传”的命根子。

2.家世

杨宪益的家谱从现有的文字资料看可从他的高祖杨殿邦那一代算起。杨殿邦和林则徐是同时代的人。他于嘉庆十九年（1814）中进士，比林则徐晚一届（林则徐是嘉庆十六年（1811）辛未科进士）。《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在嘉庆十九年甲戌科那一栏中载有“杨殿邦，安徽泗州”这几个字。在二甲 100 名进士中他是第 14 名进士。杨宪益说他和林则徐有“同年之谊”，他们是同一年中举的。林则徐于 1841 年 5 月被皇帝发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发配途中经过淮安时杨殿邦曾请他吃晚饭，并留他住了一宿。杨宪益说他曾在《林则徐日记》上看到过上述记载（笔者曾到国家图书馆查询中山大学出版的《林则徐日记》，发现 1841 年的「辛丑日记」截至到阴历五月二十八日为止，一直到次年七月才续上。正好遗漏了林则徐北上途径淮安的部分。不知何故。）。杨殿邦当过山东省科举考试的主考官（典试），后来是清朝的漕运总督，官邸在江苏淮安。

杨宪益的祖父杨士燮，安徽泗州（解放后划为江苏省泗洪县）人。清朝翰林出身。老兄弟八人，他排行老大。父亲早逝，身为长兄的他挑起了照顾弟弟们生活的担子。他娶了徐淮道台吴棠的女儿为妻，这一婚姻使杨家的境况和杨士燮的命运大为改变（杨敏如访谈，1994 年 6 月 14 日，北京三里河），因为吴棠与慈禧太后有一层不平常的关系。吴早年在当清河县令时帮助过刚遭父丧家境凄凉的慈禧，当时慈禧还未被选入宫，只是个普通的旗籍少女。慈禧终生不忘吴棠曾经对她家的帮助。后来吴棠曾屡遭人参奏，非但没丢官反而屡屡升迁，一直做到四川总督（见《梵天庐丛录》卷七，柴萼撰，中华书局出版）。吴棠的女儿成了杨家的长嫂之后决心资助弟弟们读书进学。在杨士燮的带领和吴氏的资助下杨家弟兄八人发奋读书并参加科考，据杨宪益说他爷爷那辈出了四个翰林。杨士燮于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恩科会试中二甲第 62 名进士（同科二甲进士共 132 名）并点了翰林。但他生性恬淡，不喜做官。他一生官做的不高，只是一个淮安知府，由他资助的弟弟们却后来居上，成为晚清重臣和民国初期政界要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四弟杨士骧和五弟杨士琦。

杨士燮性格诙谐，喜自嘲，自号“三湖太守”，“三湖”者，“三壶”也。即烟壶、酒壶和尿壶。杨士燮不愿做官的理由说起来挺有意思：他说“做官就要审案子，审案子就要打板子，这个我受不了。（杨敏如访谈，1994 年 6 月 14 日，北京三里河）”看来这位老爷颇有同情心。旧时有钱人生前请人画像，以供死后晚辈祭祀，叫“影像”。如果这人是做官的，必穿官服。可杨士燮坚持自己死后的遗像不穿官服而穿便服，后人只得依他。结果杨家每年过年供祖时就出现了很不协调的两个画像：祖母是凤冠霞帔一副官太太打扮，而祖父却是一身道袍，完全是布衣百姓的样子。祖父的清濯形象给杨宪益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在中年时也摹仿祖父的样子穿上道袍照了一张像，家人见了均惊呼酷似其祖父。

杨士燮还有一事可记，他与周恩来的祖父周殿魁（字攀龙，浙江绍兴人）是亲密的上下级关系。周殿魁曾是杨士燮当知县时的幕僚，后来杨士燮当了淮安知府，周殿魁则任淮安府山阳县（1914 年改名为淮安县）的知县。两家人的关系延续到了下一代。据杨宪益的大妹杨敏如说，周恩来年轻时还曾与杨士燮的一个侄子拜过把兄弟，解放后也曾问过杨家在北方还有什么后人。但杨宪益对这一层关系持非常谨慎的态度，轻易不向人显露。解放后杨宪益与周恩来多次见面也从未向周提起过他们祖辈的渊源。

杨宪益的四叔祖杨士骧（1860-1909），字萍石，号莲府，光绪十二

年（1886）进士（中二甲第22名），点翰林。早年以道员身份为李鸿章的幕僚。杨宪益讲了一个有关杨士骧早年受李鸿章赏识提拔的故事：庚子年（1900年）闹义和团，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李鸿章临危受命与十一国公使团议和，十一国公使草拟了“和约”大纲，迫使慈禧太后就范。条约内容除“禁运军火、严惩祸首、刻碑谢罪”等外还要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四十年还清欠款。一天夜晚李鸿章睡不着觉，皱着眉头在中庭散步想心思，杨士骧上前询问原因，李鸿章说洋人开了一个赔款的账单和我们算的数目不一样，比我们算的多的多，不知是怎么回事？李鸿章认为多赔些银子还在其次，但为此事在谈判桌上丢脸事大。杨士骧跪下一条腿说“卑职懂得一点洋算。”李大为高兴说那你给我算一算。杨士骧算的结果与洋人的数目相同。他解释说：我们的算法是用加法，利息是一年年加上去的，叫 simple interest，而洋人用的是利滚利的算法，叫 compound interest，所以他们算的比我们的多。李鸿章听后豁然开朗十分高兴，认为杨士骧有真才学，堪以提拔重用（杨宪益访谈，1994年4月18日，北京百万庄）。（按：杨宪益的这个故事可能把他的四爷爷杨士骧和五爷爷杨士琦搞混了。因为史料记载作为李鸿章的幕僚参加签订《辛丑条约》的是杨士琦，而不是杨士骧。杨士骧虽然早年也是幕僚出身，但到1900年时早已脱离幕僚生涯，当上高官了。）

杨士骧在兄弟八人中最先中进士、点翰林（比大哥杨士燮整整早了八年），官也做的最大。他从庶吉士、编修、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一直做到了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

《清史稿》载杨士骧“光绪三十一年（1905）署山东巡抚（继袁世凯之后），光绪三十三年（1907）又代袁世凯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杨士骧这最后两个职务的前任一个是大名鼎鼎的李鸿章，另一个是权倾一时的袁世凯，杨士骧接替他们的位置，可见他当时地位的重要。可惜杨士骧在直隶总督任上没干几年，他死于1909年。死后宣统皇帝赠他“太子少保”称号。

周一良先生在其自传《毕竟是书生》中说陈寅恪把他的曾祖父周馥和杨士骧与奕劻、袁世凯、徐世昌一起列为“浊流”；“清流”则举陈宝琛张之洞等人为例。照周先生的理解，所谓清流是指在文化学术上有造诣和修养，浊流则是“以吏事见长的干吏”。

杨宪益的五叔祖杨士琦（1861-1918），字杏城，他是杨家未中过进士的高官。书载他“生十三岁而孤，从诸兄读，刻苦自励（《梵天庐丛录》卷八，柴萼撰，中华书局出版）”。他在光绪八年（1882）中举，时年21岁。庚子年（1900）闹义和团时他正在天津任津榆路政总办，八国“联军攻津沽急，弹簌簌从屋上过，居人呼号走匿”，他却“独从容据几案为书数千言”，向当时的宰相荣禄“反复陈说利害，请以李文忠公当和议”。…杨士琦一生最重要的职务是他继盛宣怀成为上海招商轮船局和电报局两局的督办（即局长）。同时也接手了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他办学“开布诚意，明约束，煦煦如家人父子”，学生“自是咸奋於学，名高材异等辈出矣（《梵天庐丛录》卷八，柴萼撰，中华书局出版）”。1904年清朝设商部，任命杨士琦为右参议，他在上海创办了商务总会，颇有政绩，一年之中连升三级，由右参议升为侍郎。杨士琦是个实干家，他除了在上海招商局当了十多年督办以外还负责北京至张家口铁路的建设。该路“蜿蜒千余里，隧山通轨，工极艰。所用工师皆国人。路成，西人多叹服。谓中国未尝有也。”1907年杨士琦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赴南洋群岛“宣慰南洋华侨”，“宣布朝廷德意，询所疾苦”。他在南洋“置领事馆，设商会”，为侨民的利益与荷兰、美国殖民当局办交涉，受到华侨热烈欢迎（《梵天庐丛录》卷八，柴萼撰，中华

书局出版)。杨士琦在清朝最后的职务是邮传部大臣。杨士琦与李鸿章、袁世凯的渊源都很深。他被朝廷提拔重用最初得力于李鸿章，继而又受袁世凯的举荐，以后数十年杨士琦与袁世凯保持了密切的联系。

中华民国成立后杨士琦一度是袁世凯内阁班子的重要成员。职务是“政事堂左丞”。1915年1月1日，袁世凯授予杨士琦等十多人“中卿”爵衔。他被“派为代表，代行立法院发表对于变更国体之宣言”。袁世凯恢复帝制失败后，杨士琦仍任参议院参政。1918年杨士琦死于上海。有材料说杨士琦是“遭妾毒死”。

杨士琦去世时杨宪益才三岁，很可能他根本没见过这位五爷爷，但在性格上杨宪益与杨士琦却有许多相似之处。如杨士琦“冥契於庄老为多”，“志气澹定，不为外物回惑。又历世早，更事富，故能洞情伪。言简而要，智周而不穷。”又如他“为诗宗香山放翁，为文宗陆宣公。”但他“不自缀拾，随手散佚（《梵天庐丛录》卷八，柴萼撰，中华书局出版）。”这些特点都酷似杨宪益。

杨宪益的爷爷辈中还有一个杨士晟也上了《明清进士题名碑录》，他是光绪十八年（1892）中的进士，与蔡元培同年。

杨宪益的八爷爷杨士骢（1870-）是清朝候补三、四品京堂。掌过山西盐政。民国初年当选为多届众议院议员，上了《民国人物大词典》。

杨宪益的父亲杨毓璋（1872-1920），字霁川，是原江苏淮安知府杨士燮八个儿子中的长子（杨家父子两代都是弟兄八人，人称“杨家将”）。杨士燮想接近洋务派，崇尚西学，让八个儿子分别到英、美、法、日本各国去留学深造。杨毓璋早年在江苏淮安接受了中国旧式教育以后被派往日本留学数年。但据杨宪益说他父亲不是个用功的学生，在日本没有好好读书，很多时间都化在与日本艺妓的交往上。事隔多年之后杨宪益的母亲还保留着杨毓璋以中国古典格律写的一些爱情诗，是他送给某位日本艺妓的。杨毓璋回国后继续过着浪荡公子的生活，甚至抽上了鸦片（见杨宪益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但是他终于在父亲和叔叔们的劝喻下改邪归正，彻底改变他的生活。他戒了鸦片，开始正经干事了。杨毓璋的父亲设法（通过他当直隶总督的弟弟、杨毓璋的四叔杨士骧）让他当上了沈阳电话局和电报局的督办（即局长）。一个人同时当两个局的督办，拿两份钱。电话局和电报局在当时都是“洋务”，与其他清水衙门不同的是这两个衙门都有直接经济收入，“油水”很多。干了几年后又到天津当上了中国银行行长。从此迈上了成为北方最重要的官商金融家的道路。虽然杨毓璋在三十来岁就身居高位凭的是家族的力量而不是个人的本领，但他却在短短数年内掌握了金融业务的奥秘，变成了一个真正的银行家。他的精明能干使天津中国银行的业务越做越大，他的个人家产也越聚越多，成了天津首屈一指的大户。

杨毓璋的地位使他与许多清末民初的政界要人关系密切。首先是袁世凯。杨宪益说他出生后不久父亲拿回来一件小黄马褂，是袁世凯送的，以庆贺杨毓璋老来得子。在清朝只有皇帝才有权赐臣下穿黄马褂，这是臣下的一种殊荣。袁世凯到了民国还用此举笼络杨毓璋，除了说明他对杨的器重外也暴露了他想当皇帝的野心。除了袁世凯，杨毓璋与黎元洪、徐世昌等都来往密切。徐世昌曾送给杨毓璋一副对联，上联：自非北海孔文举，下联：谁识东莱太史慈。徐世昌用三国志中太史慈义救孔融的故事比喻杨毓璋对他的帮助，意下充满感激。可见徐世昌当总统时杨毓璋主持的天津中国银行给了他很大的资助。这副对联一直在杨家客厅悬挂了许多年。

杨毓璋精通诗词格律，对京剧格外爱好。他与谭鑫培是好朋友，经常在业余

时间帮助谭修改京剧唱词。杨宪益至今还记得儿时谭鑫培在晚上来找他父亲斟酌京剧唱词的事。

由于杨家两代人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地位，袁世凯、唐绍仪、孙家鼐、周馥等北方的大官僚大商人家庭都与他们家有儿女姻亲关系。

杨毓璋是第二代“杨家将”的领袖人物。他是长子，责任大，负担重，上要奉养退休在家的父亲及父亲的姨太太一家，下还要帮助众多弟弟。他的成功使他很好的完成了长子长兄的角色，还挣下了上百万的家私和多处房产。正当他的事业如日中天时却突然被伤寒夺去了生命。他的早逝对于杨家不啻天翻地复、釜底抽薪的大灾难。日后他的弟弟们非但没有继承发展他的事业，反而把他挣下的家产几乎赔光。从此杨家没有象周家孙家那样继续走上工商资产阶级的道路，而是逐渐地衰落下来。

3.至高无上的地位

作为杨家长房长子的唯一继承人，杨宪益从一出生就确定了在杨家至高无上的地位。虽然当初他的出生在杨家形成了“几人欢喜几人愁”的局面（他的出生打破了叔叔们想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长房做继承人的梦想），但自从他一呱呱落地，全家所有的人都围着他一个人转了。连叔叔们也捧他。杨宪益的妹妹杨敏如说：

小时候我哥哥被捧为了不起的人。父亲爱他爱的不得了。叔叔们也捧，因为捧我父亲所以就捧这个儿子。他的玩具都不同平常人。有个玩具我们长大了还玩。就是现在的八音盒。里头丁当丁当响。有几个男的女的在跳舞，都穿着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衣服。那个八音盒可贵了。这就是他的玩意儿。（1994年6月14日口述）

父亲去世后，年仅五岁的杨宪益成了一家之“长”。每逢年节祭祀祖先他这个小人全家第一个。扬家祭祀的次序值得特别提一提：第一个是小杨宪益，其次是“娘”，即大太太；再其次是大太太生的大姐二姐；再其次是三个妹妹；最后才是杨宪益的生母和二姨太（杨宪益生母在杨家地位之低可以从这个次序中反映出来）。这个次序一直延续到杨宪益十二、三岁后，由二姨太“造反”擅自抢先在自己女儿之前祭祀才改，改为杨宪益的生母和二姨太先于三个妹妹祭祀，而大太太和大小姐（二小姐已经死于肺病）仍在其前，杨宪益当然仍是位居第一。祭祖时全家主仆都到场，仆人们站在两边。程序是先点香，作揖插香，然后奠酒，最后是三跪九叩头。每个人都要完成这套程序。（七十多年后当笔者去采访杨宪益时他还表演过这种三跪九叩头的大礼。）

杨宪益说他才七、八岁（杨敏如说是十来岁）就作为银行董事坐着包车去天津中国银行开董事会！他当然不懂什么银行业务，只是照着父亲的老朋友的提示投某某人的票而已，但他的到场却不仅仅是一种象征。“身负重任”、“异于常人”的心态和感觉恐怕从杨宪益很小的时候起就扎根于他的心头了。采访中杨敏如谈到这一点说：“他觉得他是最要紧的，他是老大，在家里是一个头儿，是有责任的。他这种心理一定和我们不一样。”杨毓璋的早逝使家中的女人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小杨宪益身上。他处处受到过分的呵护和照顾，使他失去了许多正常孩子的运动和欢乐。他一辈子没有学会骑自行车，也不会游泳。六十多年后他对同事提起这事时解释说“游泳，我娘怕我淹死；骑车，我娘怕我摔死。所以这两样我都不会。”同事们听了无不哈哈大笑。杨宪益说的“娘”就是杨毓璋的正房夫人——他的嫡母。嫡母姓李，外貌美若天仙，但见识浅薄性格懦弱。她为了怕杨宪

益被人绑架或碰到意外事故甚至不许他上小学，只许他在家读书。嫡母对小宪益的爱有时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杨宪益的妹妹杨敏如说了许多他小时候的笑话：

我哥哥在生活上极笨，连鞋带都是我给他系。扣扣子他都不会。我是一个妹妹，但什么都得给他弄。……早上洗脸，仆人把手巾给他，他就这么一擦，人家把牙刷弄好，他就刷，洗脸水当然也不会倒。都不管，生活上都不会。

他不会跑。有一次他在楼上，忽然来亲戚了。大人叫‘孩子们都下来’，我们都哒哒哒下来了，连比他小五岁的妹妹都下来了，可他只会一只脚一节一节地下，不会用两只脚。我就赶快又上去帮他，让他别着急，慢慢下。他就不会跑，光会跳，象一个蚂蚱一样。如果我跑，他追我，他永远追不上我。我娘就在窗户那儿大叫‘你跑慢点儿，你让他逮着，你让他逮着啊！’

再比如，他坐这儿，我坐在他旁边，这有什么不可以？可我娘说了：‘你别挤着他，你干嘛非挤着他？’如果他病了，睡着了，就叫我来看着他，看他要不要叫人什么的。所以我顶会这个功夫了。我决不吵人。……他睡觉我就得看着他，你说把他惯的！

我哥哥生下来就归我嫡母带。他们住楼下，我们住楼上。有一天——在他五、六岁时——他拿着一根竹竿大叫‘你们楼上的人不准下来！’我们就真不能下来了。你说可气不可气？

我哥哥到书房里练毛笔字，还没写呢，老家人就说‘嗨，这还了得！看我们少爷的字谁比得了！’其实他写的跟狗爬似的。他还说‘咱们不用怎么练，将来自有人给咱们写字，少爷何必自己写字呢？’这个老家人叫潘福，跟了我们一辈子，非常忠心。他一天到晚怀旧，说当年袁公保（世凯）来的时候咱家怎样怎样，那个大总统徐世昌来家的时候又怎么样，他慨叹这个家越来越败落了。（1994年6月14日口述）

杨宪益在家中独一无二的地位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来。比如他出去永远有包车，并专有一个小仆人伺候他，妹妹们就没有这个待遇。就连吃饭也不一样。杨敏如说：

吃饭，他得挨着娘坐，我们都坐在底下，这不一样吧？四个菜一个汤，他自己有两个盆儿，娘和大公主（大姐的绰号）也都各有两个盆儿，我们都没有。我们就是吃这四个公碗里的菜。我母亲分鸡，他永远是吃鸡腿，大公主也吃鸡腿，娘吃鸡翅膀，我吃白肉，母亲自己吃鸡脖子。每天如此，我哥哥是第一份。（1994年6月14日口述）

采访中笔者问杨敏如对杨宪益在家中独一无二的地位嫉妒不嫉妒，她说“我和妹妹从来没有嫉妒过我哥哥，而是崇拜他。”“我从小最佩服的男人就是我哥哥，到现在都佩服他。”“如果没有这个哥哥，我妈妈的地位、我和妹妹的地位就完了，永远抬不起头了。就靠着这个哥哥”。

杨宪益天生不是专横跋扈的人，相反他性情温和大方，从不计较小事。他少时说话木讷，拙于言词，见生人就脸红。到别人家做客都是大妹杨敏如出面应酬，他不说话。小时家里怕他夭折，论排行就把他和女孩子排在一起（旧时认为女孩子命“贱”，好养活），他被排成老三（老大老二是嫡母生的姐姐，下面是三个妹妹），被人戏称“杨三小姐”。人家一叫“杨三小姐”——他的脸就涨的通红。他生气时从来不大声嚷嚷，只是红着脸生闷气。只要他一生气，家里人立刻围着他转，照他的意思办，决不违反他。他在家中说一不二的地位是天生的。

4. 孤独寂寞的童年

一位与杨宪益相熟的朋友在闲谈中把他与钱钟书相比，说杨宪益最嫉妒钱钟书的就是他有钱基博这样一位父亲，而他却没有。这虽是玩笑话，却道出了某种真情。“幼年丧父”不仅使他自小就永远失去了父爱，更使他在人生和求学道路上失去了最主要的老师。杨宪益在自传一开头就把他的诞生和父亲的死联系起来，并把自传取名《白虎星照命》，说明他认为这是他的命运。杨宪益是从不迷信的，这一矛盾揭示了他心灵的隐痛和创伤。

虽然作为杨家长房长子的唯一男性继承人杨宪益在家中享有最高地位，但他的童少年却是相当寂寞乏味的。最了解他的大妹杨敏如曾把他和贾宝玉相比。锦衣玉食的生活解决不了精神上的饥渴。父亲死后他被包围在一大堆女人和仆人中间。除了三个母亲（主要是两个）之外还有姑姑们和女佣人男佣人们，但就是没有一个人能成为他的朋友和精神上的指引者（家庭教师魏汝舟老先生虽是知识传授人，但他担任不了启蒙的任务）。他有众多的叔叔，但是没有一个叔叔在乎他，没有人真正关心过他。杨宪益长大后在众多新文学作家中独独最欣赏鲁迅周作人兄弟二人，除了他们的深刻思想和简洁文风外，共同的家庭境遇（尽管杨家比鲁迅家富裕的多）和共同的人生遭际恐怕也是原因之一。连两个人的童年都有个肥胖的保姆带着睡觉这一点都十分相像。杨宪益常笑着说“我跟鲁迅一样，鲁迅有个长妈妈挤兑他，我有个陈大肚子‘包围’我”。但鲁迅尚有百草园、三味书屋可去，还有闰土这样的乡土朋友，杨宪益却哪儿也不能去，什么玩伴也没有。他唱的第一首歌是大妹杨敏如从学校学来后教他的。

过份的呵护照顾和旧式家庭的繁文缛节渐渐使小宪益感到受拘束。他不喜欢穿马褂，穿上马褂觉得哪儿都不舒服。可是家里三天两头要祭祖，祭祖就非得穿马褂。一听到“少爷穿马褂”他就气鼓鼓的，脸涨的通红。杨敏如讲了一件小宪益“反抗”母亲的事：

我哥哥小时候像是很没脾气的样子，但是他有脾气。他最讨厌我娘在他上学时给他戴的那种帽子，只留两个眼睛，还给他捆很高的围脖，简直要把他绑起来了。他也会发脾气，怎么发？他跑到门房，不说话，把帽子围脖都拿走，都不要。佣人说（他单有一个小佣人伺候他）“少爷这不行啊，你要冻着的”，但他不说话，上车就走。我们都不敢把这事报告母亲。等下课回来，先到门房，把那些帽子围脖叽里咕噜一戴再进门。我娘见了说“你看看，这围脖都没围好，看你冻得这样！”其实他是刚戴的。……他要的是自由。一个人太被人照顾了，百般地让你那样那样，他就要反抗。（1994年6月14日口述）

在杨宪益十三岁那年家里出了一件事，他嫡母生的二姐得了肺病，杨宪益的生母向大太太建议看西医不看中医。西医看了病情后严重警告嫡母（大太太）要将病人和儿子隔离开，否则“儿子被传染就要没命了”。嫡母被迫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将杨宪益“归还”给他的生母，让他与自己的亲生母亲住在一起。大妹杨敏如说：“这下这个儿子就归了我母亲了。”“我们就像多了个哥哥一样，高兴的不得了。”从此，杨宪益回到了亲生母亲身边，与妹妹们靠的近了。

不久，二姐死了。杨宪益很伤心。他在自传中这样描写病中的二姐：

她被单独禁闭起来直到去世。虽然她很喜欢我，但是大人不许我常去看她。她病中只有一个女仆照顾她。她总是很悲哀很孤独，但她从不抱怨。（摘自杨宪益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雷音译）

温柔的二姐在她十六岁那年被病魔夺走了生命，死神再一次显示了他的威

力。

5. 学生打老师

不能上小学，杨宪益只能在家跟家庭教师学。嫡母预先向教师交代规矩：不许打小宪益，不准欺负他，只能听他的。结果在这个世代恪守传统尊师之道的书香门第出现了超前的学生“造反”现象。杨宪益说：

几个教四书五经的老学究都给我打跑了。后来有一个老师投合我的意思教我《西游记》，教我念《三国演义》，我把他也给打跑了。

有一次他给我讲孙猴子，他做出孙猴子的样子，我说做的不像，就拿戒尺——我家的戒尺不是打学生而是打先生的一就拿戒尺要打他，他就跑，还装猴子样子给我看。我还追着他打，追的没路走了他就站到书桌上给我装猴子样儿，结果我们闹的太厉害了——老师也觉得好玩，陪着少爷玩儿——我娘从外面听到嬉嬉哈哈的声音，跑进来一看我正在打老师，把老师弄的很不好意思。老师就跟我娘说这个少爷太厉害，我做不了啦。就辞职了。（1994年4月18日口述）

6. 魏汝舟老先生

终于，有一个人把这个调皮捣蛋的小少爷制服住了。这个人名叫魏汝舟，自号自宽老人，河北省人，前清秀才。他是个中国传统的读书人。中秀才以后他本来可以继续考举人，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可1900年闹义和团，八国联军打进了天津和北京，把他的家烧毁了，他妻子也上吊死了，只剩下他孤苦伶仃一个人。后来清帝逊位，民国建立，魏老先生只能靠给有钱人家子弟教书度日。经人介绍，魏老先生住到杨家，成为杨宪益第一个启蒙老师。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使魏老先生有一种气度，使小宪益不敢小看这位新来的先生。杨宪益在自传中说他“永远严肃并且有尊严”，称他为“Gentleman”。这种不言之威使“无法无天”的小宪益感到震慑。后来与魏先生进一步接触，却发现他“望之俨然，即之温也”，是个非常和善可亲的人。魏先生在杨家一住五、六年，成了对童少年杨宪益思想发展成长很重要的人。是他传授给杨宪益对中国古典文化终生不渝的热爱。魏老先生的思想开通，他不仅教杨宪益读四书五经，使宪益较系统地接触到中国儒家经典，还容忍他读老子，庄子，使他在幼年就对中华民族另一种重要的思想传统——道家思想有所认识 and 了解。（七十年以后杨宪益谈起他这一段早期教育时说儒道这两家他更喜欢读老庄及其他诸子的书，道家的思想比儒家的思想对他的影响更大。）短短几年中小宪益熟读并背诵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还背诵了《书经》《诗经》《左传》和部分《礼记》。

魏老先生教学有方，善用鼓励法。先生的“夸奖”使小宪益读书倍加卖力，背书的速度越来越快。有一次为了检验自己的背书能力，杨宪益居然在一天内把全部《左传》都背完了（杨宪益访谈，1994年4月19日）。

魏汝舟先生不是个冬烘老学究，相反，他是个诗人。他写了很多古典诗词，抒发对人生遭遇的感受。他把这份文学爱好和作诗的技巧也传授给了杨宪益。杨宪益在一篇文章中说：他开始是教我如何辨平仄四声，然后教我对对子‘如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之类。记得我初学对对子时，魏先生叫我写一联描写春天景色的句子，我诌了一联是‘乳燕剪残红杏雨，流莺啼断绿杨烟。’先生大为

赞赏，说我是个神童。我也沾沾自喜。从此我就喜欢尝试作诗。……这大概是我十二三岁时的事。（杨宪益：《银翘集》自序）

魏老先生和这个被关在深宅大院的少爷学生之间建立了一种不寻常的感情。某种程度上他填补了小宪益失去父教的空缺。魏汝舟先生对杨宪益寄予厚望，他常说杨宪益是他教过的最聪明的学生，决心把自己的知识向宪益“倾囊而出”。四书五经基本读完（只有《易经》没读）以后又读了《十三经》中有关部分，还教他读《幼学琼林》、《古文观止》、《古文释义》和《龙文鞭影》。杨宪益熟读《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和《楚辞》，四本线装的《唐诗三百首》他熟读到既能从头背到尾又能从尾背到头。师徒二人每天形影相随，直到杨宪益进了中学，有了知识的新天地，才渐渐疏离了魏汝舟。

看到杨宪益进入了“新学”的天地不再需要他以后，魏汝舟内心很伤感，觉得自己已经没用了。尽管杨家继续挽留他，他还是执拗地离开了。临别以前，魏汝舟把自己的心血之作——诗集手稿送给杨宪益作纪念（这些手稿后来在战争离乱中丢失，未能付印）。回乡不久，年过七十的魏汝舟先生黯然去世。

杨宪益终生都怀念这位穷而不失其志，有着士大夫风范的启蒙老师

7.新学书院

杨宪益十二岁了，妹妹们和堂兄弟都上了小学和中学，他却一个人关在家里读书，非常寂寞和孤独。杨宪益的生母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儿子的大事都是由“娘”作主，她这个母亲反而无权置喙。终于，她想了一个办法，让宪益的堂兄们来做工作，说服嫡母。大家都说学校的好处，并保证会“保护”好宪益不受他人欺负，嫡母终于同意杨宪益走出家门。1927年夏季，杨宪益进了天津新学书院。

当时天津有两所专收男生的教会中学，一所是美国传教士办的汇文中学，一所是英国伦敦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办的的新学书院。另有一所专收女生的教会中学叫中西女校，杨宪益的妹妹们就读那所学校。

新学书院位于天津法租界，英文名字是 TianjinAnglo-ChineseCollege. 这所中学和杨宪益真是有“缘”，因为他未来的岳父约翰·伯纳德·泰勒先生（John. Bernard. Tayler）大学毕业后初来中国时就曾经在这所中学教过书，还代理过校长。当然杨宪益入学时泰勒先生已经到北京燕京大学教书了，二人当年并没见面。

新学书院有英籍和中国籍两部分教师，校长是出身英国剑桥大学的哈特博士。该校师资实力强，人才荟萃。中国教师主要教中国语文和中国历史地理。英籍教师都是真诚虔信的基督徒，都获得过大学学位。他们除了教英文外还教物理、化学、数学、世界地理和历史。用的是英文课本，直接用英语讲授，对学生英文水平要求很高。杨宪益的嫡母怕他一开始英语跟不上，特地让他上了一年预备班，所以他共读了七年中学。

中学大大开阔了杨宪益的眼界和知识领域。他的求知欲强，兴趣广泛，对各部门功课都感到兴趣。他在自传中写道：

我对大多数课程都非常喜欢。我爱学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和历史。我喜欢证明几何原理并在做完题后加上拉丁文“证讫”（缩写为 Q. E. D.）的字样，因为做几何题对逻辑思维是很好的练习。我同样喜欢在化学课上做实验，在硫酸中加入钾磷酸盐和其他化学成份。在十五、六岁以前我对物理相当感兴趣，想成为一个发明家。我曾试图制作一个永动机，那是一种金属球体，可以永远不停地转动。

当然这违反了简单的“磨擦”原理，在浪费了许多时间后我终于放弃了这个发明。上高中之前我对物理的兴趣减退了，又重新回到英国文学和中国文学及古代史上。（摘自杨宪益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雷音译）

在教学方针上新学书院重视传统文化。中国语文课基本上以文言为主，很少选白话文。学生的古文底子比较扎实。由于杨宪益在家跟魏汝舟先生学过四书五经，所以觉得《醉翁亭记》一类的课文很容易对付，他的中文和英文水平远远超出同班同学，其他功课也名列前茅。杨宪益说他是个“不用功的高材生”。全班四、五十个学生，他“不是考第一就是考第二，大部分时间是考第二”，而另一个“死抠书本”的李姓同学总是考第一。杨宪益的特点是他轻而易举就获得了全班高分。但也有走麦城的时候。有一次考三角，他一点准备也没有，结果考了个二十多分（杨宪益访谈，1994年4月19日，北京百万庄）。杨宪益对分数不太在乎，这一特点从中学时代起就表现的很突出。初到学校，班上的几个大个子同学看杨宪益样子很文弱，又不会打球，就想给他来个“下马威”。杨宪益回忆说：

一次，一个大个子上来就把我拽住——小孩打架和大人打架不一样，不是动拳头，而是拽着彼此摔交。结果我摔了一大交，但我抱住那个人不放，把他也摔了一大交。他们看我还是很厉害，以后也不敢欺负我了。后来我总帮他们搞‘夹带’，借给他们书看，给他们糖吃，他们对我都很好了。也很尊重我。（1994年4月19日口述）

何为“夹带”？就是考试时用各种方法把答案告诉同学。这当然是一种作弊，但是少年杨宪益十分乐意这样做，把它当成仗义豪侠之举。他说：

我最得意的就是一次代数考试。同学们都不会做。我就抄了二十七份，有的贴在老师背后，老师走过去他们看了就可以抄；有的我就弄成纸条扔给大家。结果二十多份答卷都跟我完全一样。老师说这一次考试结果那么好，大部分都及格了，后来他看出不对了，答案都一样。有一份答卷里还有句中文评语说这个题对不对我没有把握——这个同学很笨，他把我的评语也抄上去了。老师就找我谈话——这个老师叫 Longman，是学校中地位很高的一个老师——他要我说实话，怎么三十来份答卷都一样，包括错的地方也一样？我就说了实话，说都是我帮助同学们搞的。结果他——因为我们家有钱，我是个少爷，虽然要按规矩办事，但对有钱人家的孩子大概总是有点照顾吧——他没罚我，还夸奖了我一通。说“你能明白的告诉我很好。从前美国有一个人叫华盛顿，后来做了总统。他小时候把院子里的苹果树砍了。他爸爸问是谁砍的？他就承认是自己砍的。这样的诚实是很好的美德。希望你将来长大了也可以当总统。”结果只是把别人的分数减掉了一些，没有罚我。（1994年4月19日口述）

有一次中文老师出了一个题目要大家写篇郊游游记，杨宪益说他“懒的写”，就写了一首诗交差。老师看了这首诗觉得比他作的还好。居然给杨宪益打了一百分。

还在初中一年级，杨宪益在作文课上写了一篇作文《论驳〈文字改良刍议〉》，洋洋洒洒好几百字，批驳胡适的主张。他认为文言文比白话文简捷，优美，层次高的多，白话文绝对替代不了文言文，并把胡适大骂了一顿。语文老师很欣赏这篇作文，给了他一百分。

作为诗人，杨宪益从来不写新诗，只写旧体诗。直到今天他仍然欣赏简洁、要言不烦的文字，不喜罗嗦冗长的文章。

由于是教会学校，每天上午十时都要举行半小时宗教仪式，用英文读圣经，

唱赞美诗。杨宪益说尽管课堂上教的是《新约》，但他更“喜欢读《旧约》中乱伦和谋杀的有趣故事，以及它优美的诗篇”。他把《圣经》当文学书读，把唱赞美诗当作练习肺活量的好机会。一旦老师上台布道，他就在台下偷偷看《以赛亚》和其他的书。七年的教会学校并没有使他成为基督徒（同学中也极少有人信教），相反，他终生都对基督教没有好感。他对一切宗教都持疏远的态度。但是新学书院使他全面系统地接受了高质量的中学基础教育，还使他切身了解了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

新学书院培养了不少人才，也荟萃了一些精英。杨宪益至今还记得一位叫刘茂毅的数学老师，称他为“数学天才”。他有一种“绝活”，能随意在黑板上写出几个五位数数字相乘，数字刚写完，答案就出来了。刘老师课教的很棒，杨宪益非常喜欢他。

有几位文化名人与新学书院有关，一位是著名的中国旅美物理学家吴健雄的丈夫袁家骝博士（旅美资深科学家），他是新学书院1928年的毕业生。另一位是已故中国著名话剧导演黄佐临。他在三十年代初继哈特博士任过新学书院（已改称新学中学）一年多校长，当时已是高中生的杨宪益做过他的学生。

8. 杂览群书

杨宪益多次说他是一个“杂家”。历史学家庞朴先生在二十世纪末看到杨宪益四十年代写的考据中西交通史的文章时非常吃惊，说“没有想到杨先生那么有学问”。杨宪益的“杂学”是他从小杂览群书打的底子。

由于觉得中学功课很容易对付，杨宪益把大量时间用在课外阅读上。自少年时代起他读书就有二大特点，一是数量多，二是速度快。有时快的令人不可思议。他在《自传》中说中学时代每天可以读完一本甚至两本翻译小说或诗集。

十一二岁时杨宪益迷上了中国武侠小说和侦探故事。他说：

当时天津有卖闲书的，跟我们今天看见的书摊意思一样。不过他们不是固定的，而是一家一家兜售，喊‘卖闲书’我们就把门打开让他进来，在院子里挑书。这些人不卖四书五经，不卖正经书，就像我们现在的书摊也不卖正经书一样。那时卖《彭公案》《施公案》《三侠五义》这些书，也有些笔记小说像《聊斋》《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等等。因此我清代的笔记小说——当然更早的也——看了不少。这是我知识的一个来源。（杨宪益访谈，1994年4月18日，北京百万庄）

再长大一些杨宪益就去书店买书。每当星期天只要听到佣人一声高喊“少爷要去买书了…”就见他走在前面，后面跟着两个妹妹，佣人走在最后，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到了书店兄妹三人各看各的书，两个妹妹把她们要的书给杨宪益过目之后就让佣人统一付钱运回家中，他们兄妹三人则又去逛其他地方。杨宪益买书的特点是看见中意的书就买，从来不问书的价钱，买书就像从图书馆搬书一样，一弄就是一大摞。因此家里的书买了一大堆，如：清末康有为的诗文，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黄遵宪、严复的书以及老子《道德经》，《庄子》、《墨子》、《列子》、《淮南子》、《搜神记》《酉阳杂俎》等等。

杨宪益最早接受的西方文学知识来源于林琴南（1852-1924）与人合作翻译的《说部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套书共一百七十余种，一千多万字。他家有二套《丛书》，大人小孩都爱看。从这套书里他第一次读到了莎士比亚的故事集《林边艳语》（根据英国十九世纪作家兰姆写的

TalesfromShakespeare 翻译)、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今译《大卫·科波菲尔》)、斯多夫人的《黑奴吁天录》(今译《汤姆叔叔的小屋》)等世界名著。杨宪益发现与爱情小说相比他更爱看具英雄主义色彩的冒险小说,英国作家 RiderHaggard 写的非洲探险故事使他着迷(林琴南的译名是《龟山狼侠传》和《金兽神女再生缘》等)。后来他又迷上了法国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起先他看的是伍光建先生的中译本《侠隐记》,以后他就直接看英译本的大仲马系列小说。

爱看仗义行侠的英雄故事是杨家的传统。杨宪益的四爷爷杨士骧生前给自己拟的挽联是“平生爱读游侠传,到死不闻绮罗香”(因不娶姨太太故有此语)。这条自挽联对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身份的人来说堪称奇事(他死后不少亲属反对用这条挽联,认为“不合官体”,但他的弟弟杨士琦却坚持按他的意愿办)。《侠隐记》在杨家是几代人都爱看的书。杨宪益的父亲和叔叔们甚至以《侠隐记》中的人物来相互称呼。大仲马作品中散发出来的浪漫主义气息和法国人的奇思异想与杨宪益的诗人天性一拍即合。从此,杨宪益开始注意法国历史(访谈中他说尽管他在英国留学,他的英文水平也远远高于法文,但他对法国历史却比英国历史熟悉的多)。

当时天津法租界有家书店叫《秀鹤图书馆》,店主林秀鹤,福建人。该店专卖外文书(主要是英文),有现货,也可按书单目录从海外订货。买主可付国币,由店主兑换成外币。杨宪益每隔一天去一次《秀鹤图书馆》看书买书订书。几年下来,他买了大量英文书。书买的太多,杨宪益的妈妈特地定做了一个欧洲十九世纪样式的大书橱,专门收藏杨宪益买的英文名著。杨宪益在《自传》中说:

我从中学的英文课本中已经学了一些拉斯基、哥尔德司密斯、艾迪森、司威夫特和其他作家的散文,也学了一些瓦尔特·斯各特、华尔华兹、戈雷、雪莱、拜伦和济慈的诗。但是大部分西方文学的阅读却是在课外时间完成的。

开始我感兴趣的是儿童和青少年书籍,像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集,奥斯卡·王尔德的作品,刘易斯·卡洛尔的《艾丽思奇境漫游记》,《镜中世界》,巴里的《彼得·潘》,斯蒂文森的《金银岛》,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种》等等。我发现拉易得·哈葛德的冒险小说很吸引人。后来我读了许多大仲马的浪漫主义的历史小说《达特安系列》,从《三个火枪手》、《铁面人》一直到《波图斯的儿子》。上高中前我已经能很快地阅读英文书了。我读了大量英文原著和英译的西方文学作品。那时也有不少欧美文学翻译成了中文。通常我每天读完一至两本书。我读的书多的难以列成一个完整的书单,几乎读完了所有的著名欧美小说和诗集。(杨宪益:《白虎星照命》,雷音译)

民国元年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时就颁布了废止在中小学读经的法令。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在全国自上而下掀起了白话文运动。在这个大背景下杨宪益的同龄人都开始接受“新型”教育。杨宪益却因为嫡母的反反对阴错阳差地成了当代中国最后一批系统接受中国古典经学教育的人。而教会中学的高质量教育和他早年大量购买阅读原文或英译的西方最著名的文学作品的积累(这得益于当时社会的开放和他家庭经济的富裕)使他在19岁(中学毕业)以前就已具备很高的英文水平和扎实丰富的西方文化知识。这种“两极兼备”的知识结构使他远超出同辈和后辈,为他成为翻译大家打下了基础。

9. 《鹰哺记》

杨宪益15岁时家里出了一件大事。他的七叔和三叔私自用银行的钱做投机生意赔了本，为了补窟窿，七叔居然挪用了杨宪益父亲存在银行里的二十多万块银元还债，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几乎使杨宪益家破产（杨宪益的父亲杨毓璋临死前把全部财产托付给他的七弟代管，并推荐他接替自己在银行的位置）。七叔为了保住自己的名誉和地位，却使杨毓璋的遗孀遗孤几乎遭到灭顶之灾。七叔的忘恩负义的行为使15岁的杨宪益感到愤愤不平，他把一腔不平之气化作了艺术创作，写下了生平第一部中篇小说《鹰哺记》。故事大意是：石灰爵士生下儿子不久后就去世，留下了一个遗孤。孩子的叔叔很坏，他把孩子扔到了野外。一只老鹰飞来叼走了孩子，并把他哺育成人。孩子在大自然中成长为一个力大无比的人。他在报仇途中行侠仗义，除暴安良。最终，他远离故乡浪迹天涯。《鹰哺记》采用章回小说样式，

每一回开头都有两句对子，共十多回。七十多年后杨宪益尚记得最后一回的对子是：“几度寻仇出生入死，一击不中远走高飞”。大妹杨敏如曾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把哥哥的这篇处女作抄了下来，可惜这部小说丢失在日后的动乱之中。

《鹰哺记》虽然在内容上受到《人猿泰山》的影响，但实际上反映了少年杨宪益对个人身世的感叹。父亲生前死后，家境的盛衰荣枯落差万丈。一些地位显赫的社会关系固然从此断绝，过去对父亲极尽阿谀奉承的人们也远离而去，就连父亲有恩于他们的亲叔叔也对杨宪益和妹妹们不管不顾。更有甚者，身为他们全家监护人的七叔竟然做出如此不仁不义之举，而杨宪益的母亲们除了哭泣之外毫无办法。世态的炎凉和人生的不平深深刺激了少年杨宪益，他笔下这个被亲人抛弃的孩子，正是他自己生活感受的投影。

10. 罢课领袖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人，无论在政治信仰上是左派中间派或者右派，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爱国。自十九世纪中、下叶至二十世纪初，中国与外国列强在历次战争中屡战屡败，外交上更是受人欺负。亡国的危险刺激着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社会上笼罩着强烈的救亡图存的空气。一些日子被定为“国耻日”，每年到这个日子全国上下都要开展纪念活动，表达中国人民反对列强侵略中国的决心。“国耻日”被印上了月份牌，连小学生的墨盒和信封上也写着“勿忘国耻”的字样。5月7日和5月30日就是这样的日子。前者指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下“最后通牒”逼迫袁世凯接受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而后者是1925年5月30日，上海英租界的英国巡捕开枪打死11名打伤20多名中国示威学生和工人的惨案。杨宪益在初三高一时曾带头罢课以纪念“五七”“五卅”，罢课那一天

同学们拒绝上英国老师的课。当时刚任校长不久的黄佐临受学校实际负责人哈特博士委派来和罢课领袖杨宪益交涉，希望学生们不要罢课，他警告杨宪益如果坚持罢课学校将处分有关人员直至开除学籍。杨宪益当面拒绝了他，两人不欢而散，罢课如期进行了。那一天学校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学校当局对罢课非常恼火，但事后并没有开除人，只是扣了一些罢课参加者的分数。对罢课头头杨宪益却什么处分也没有。杨宪益说参加罢课学生中有不少出身于名门，而他家在天津也很

有地位，所以学校终于没有处分他们。值得注意的是，七十多年以后杨宪益回忆起这一事件时说“那些年反帝的情绪很高涨，排外的情绪也很高涨”。他把反帝和排外区分开来，指出由于受到外国人的欺负，中国人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也存在着普遍的排外情绪。当年杨宪益和他的老师黄佐临在罢课问题上的分歧正反映了两人对上述现象的不同看法。罢课事件过后不久杨宪益和他的同学们意识到黄佐临是个正直诚实的好人。后来他和黄佐临在英国重逢，把这次冲突当笑话来回忆。他们师生二人的友谊和交往一直持续到他们的晚年。

还有一件事与黄佐临有关。杨宪益生平演的唯一的话剧恰恰是黄佐临导演的。看禁书就上禁书网。

黄佐临刚从英国回来时在天津排了一个英文话剧《西施》，由黄佐临自编自导，演员从各教会学校中挑选。西施的扮演者是当时的“天津小姐”张美如，杨宪益在戏中扮演一个只有一句台词的士兵。这次的演员生涯对杨宪益的印象太深刻了，以至事隔七十年后他还记得这一句台词：吴王夫差战败后，杨宪益上台对他说“Putdownyoursword, sir. Thereisnoneedforbloodshed.”（大王，放下你的剑！没有必要再流血了。）青少年时的杨宪益很腼腆，一说话就脸红，这次登台演出对他是一次重大经历，他记了一辈子（1939年杨宪益在英国时也以吴王夫差和西施的故事为题材写了一个英文的三幕话剧《夜幕笼罩着紫色的大地》，该剧由英国的专业剧人排演，后因欧战爆发而没有公演）。杨宪益一生都热爱戏剧，对他而言，戏剧艺术的魅力是无穷的。

1.1. 志愿者

杨宪益的家原来在天津日租界花园街，“九·一八”还没爆发以前日租界就变的越来越不安全。日本人在租界开铺子卖“白面”（海洛因），开妓院，日本浪人（日本政府派来的特务）为非作歹，与中国人的冲突时有发生。有一次日本浪人与中国警察在租界内大肆动武，打死了很多人。杨宪益的母亲决定搬家，把原来的一大套房子卖给了三户人家，在邻近的法租界兆丰里另租了一套房子（抗战以后又搬到了英租界耀华里，那时杨宪益已经去英国多年）。

1931年9月18日，驻在东北的日本军队进攻中国东北沈阳驻军，“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接着不到半年的时间日本攻下了东北三省，整个东北沦陷了！“九·一八”事变震动了整个中国，身处中国北方的杨宪益全家更感到亡国的危险迫在眉睫。1931年秋冬之际，不到17岁的高二学生杨宪益和新学书院的其他同学自动组织起来进行军训。他们自己出钱聘请了一位退伍军人做教练，每天早晨上课前在学校操场进行一个小时军训。开始时参加军训的有50多人，后来许多人坚持不住中途退出了。杨宪益一直坚持到最后。他说“到了最后只剩下了几个人，我们每天早上还坚持参加”。军训持续了三个月。

自东北三省沦陷后，杨宪益立志再也不用日本货，也不买洋货。他不再穿皮鞋，改穿布鞋，也不用牙膏，改用国产的嫦娥牌牙粉，甚至和朋友相约不看电影（电影也是“洋货”），不喝洋酒。他在房间里挂了一张中国地图，把东北三省用墨涂成漆黑来警示自己勿忘国耻。

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军舰炮轰上海吴淞炮台，日本陆军进攻驻上海地区的十九路军，十九路军奋起反抗。“1.28”抗战开始了。消息传来全国上下同仇敌忾一片沸腾。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的鼓舞下越战越勇，竟迫使日军三易主帅。胜利的消息传遍全国。杨宪益在英文《自传》中写道：

我们每天都急切地阅读报上的战争报导，看到有利于我方的战事变化就立即奔走相告，告诉朋友和邻居，并为胜利而欢呼。整个中国都捐钱送往上海前线，帮助我们的爱国士兵。

在淞沪抗战期间，杨宪益全家都热心投入了捐钱捐物的活动。他的生母徐燕若夫人在家里开了一个制衣小作坊，带领几个妇女日以继夜地赶制了一批“里面三新”的灰色御寒军棉衣送往前线。十九路军孤军奋战了一个多月，国民党中央政府没有派一兵一卒去支援他们。三月初，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而被迫撤出上海前线。这个消息对杨宪益刺激很大。那时的他只是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对政治不怎么关心，也不了解国共双方的是非恩怨。但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先是把东北三省拱手让给了日本，后来又迫使十九路军放弃了阵地，这一事实使他像许多爱国青年一样开始反感国民党，后来更倾向了宣传抗日的共产党。正如老作家韦君宜所说，是“愚蠢的日本军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她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由民族主义而转向左倾并成为共产党人，这是中国独有的现象。

1.2. 少年诗友

杨宪益有个同班同学叫廉士聪。父亲做生意，开了一个电器行。上高中时他父亲破产，廉士聪无法再继续念书了。杨宪益得知后回家和妈妈徐燕若商量，征得妈妈的同意借给了廉士聪家几千块钱，廉士聪因此而没有失学。为此廉家一直十分感激杨家。廉士聪酷爱中国古诗，爱读诗也爱写诗，杨宪益与他一拍即合，从此两个人一唱一和，在高中三年中把主要精力都花在读诗写诗上。他们两人都喜欢汉魏古体诗，所以都用五言体写诗，很少写七言律诗和绝句。内容上受吴宓的影响，同意他“旧瓶装新酒”的主张。（杨宪益到英国去后廉士聪曾把杨宪益早年的诗寄给吴宓看，很受吴宓的赞赏，为此吴宓特地介绍杨宪益到西南联大教书。此是后话。）三年中杨宪益共创作了一百来首诗，这些诗大部丢失。所幸好友廉士聪保存了其中的两首。四人帮倒台后廉士聪居然找出了杨宪益17岁时的这两首诗并寄还给了他，使这两首少作得以重新发表。一首名为《雪》，另一首名为《死》。《雪》的灵感来自雪莱的《云雀颂》，在诗中他把洁白的雪比作诗人的奇思妙语，比作美妙的音乐，比作不怕赴汤蹈火的战士，又比作先知先觉的革命者。最后他写道：

积雪满空庭，皎皎质何洁？
安得雪为人，安得人似雪？
安得雪长存，终古光不灭？
愿得身化雪，为世掩阴霾。
奇思不可践，夙愿自空怀。
起视人间世，极目满尘埃。

杨宪益晚年说起这首诗：“在诗的结尾我表示愿牺牲自己献身革命，扫清世界的污秽。这当然是一个十多岁孩子的天真幻想。但它表达了我强烈的爱国热情和革命心愿，或许它显示了我以后要走的道路。”（见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

另一首诗《死》传递的信息与《雪》的昂扬基调完全不同。诗人对生死持达观、冷峻的态度，使人不相信这是一个十多岁少年写的诗。他写道：

生死为昼夜，铸毁不知倦。
生时同交欢，死后不相见。

如梦幻泡影，往来如驿传。

儿生人庆幸，老死人吊唁。

实则生与死，无忧无欢忤。

死亦不足惜，生亦不足恋。

特别是以下诗句已经带有典型的“杨氏”的落拓不羁的风格了：

凡人皆有死，谁得保其身。

莫为杞人忧，行乐须及晨。

应知时不再，百岁转毂轮。

常置一壶酒，可以守吾真。

这首诗显示了中国道家思想对青少年杨宪益的影响。

写诗的同时他还大量的读诗。中国诗除了汉魏古诗外喜读中晚唐诗。唐以后的诗基本不读。最喜欢读东晋诗人陶渊明的诗。至于近代人，他读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读康有为梁启超的诗，他被这些诗中洋溢的忧患意识和救亡图存的壮志豪情所吸引。他不承认白话诗，从来不读它。除了中国诗外，杨宪益读了大量的英文诗（原文）和翻译成英文的欧洲各国诗人的诗。最先是美国诗人朗费罗和英国诗人丁尼生，后来读拜伦和雪莱的诗；到了高中三年级他迷上了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瓦列里、兰波、戈蒂耶和马拉美。他在自传中说，当时国内很多的文学青年都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而特别喜欢法国颓废派诗人的诗。这些诗人的惊世骇俗的反叛精神比浪漫派诗人更彻底，而他们对社会底层畸零人的悲悯情怀也使杨宪益感动。波德莱尔等人对社会的愤世嫉俗的情绪与许多中国青年对中国现状的不满十分合拍。杨宪益

读遍了能搜寻到的这些诗人的诗。读诗的同时杨宪益开始了最早的翻译尝试。他译过朗费罗的诗，译过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中的歌词，还译过古希腊女诗人萨福的诗。这些以中国七言律诗形式的早期翻译的片段后来被收入《银翘集》。

杨宪益那时看过胡适的新诗集《尝试集》，他认为那是大白话，不是诗。对郭沫若、艾青的诗也没什么很深印象。奇怪的是，杨宪益对于西方作家的态度是既喜欢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古典派又喜欢文艺复兴后的浪漫派甚至十九世纪中叶后的颓废派，可谓兼收并蓄，多元并举。可他不喜欢“五四”运动后涌现的中国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多次坦言“不佩服”他们（周氏兄弟除外）。他不佩服郭沫若，不佩服茅盾也不佩服巴金（这些作家的作品他都看过）。如果要以京派海派区分作家的话，杨宪益属于“京派”。

1 3.池太太

杨宪益十三、四岁时家里给他请了一位年轻女教师，为他补习英语和数学。她名叫徐剑生。徐剑生中山大学外文系毕业，丈夫姓池，从日本留学回来后在天津当外科医生。杨宪益的家人都叫徐剑生“池太太”。池太太的婚姻生活很不幸，丈夫对她不好，在外面和别的女人胡混。她呆在家里很孤独，就出来找事做。她在杨家做了四五年家庭教师，除了教杨宪益外也教他的妹妹们，一直到杨宪益高中毕业。池太太英语和数学都教的不错，对杨宪益也很好。她喜欢法国文学，通法文，看了大量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除了教书，她还和杨宪益谈文学，谈人生。刚开头，杨宪益仅把池太太当成自己的老师，既尊重她，又和她淘气。他拿新来的女教师的名字开玩笑，用“徐剑生”作上联，下联对了个“快枪毙”。池太太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更喜欢这个聪明的男孩了。几年相处下来，渐渐地两人的

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杨宪益第一次以一个男性的眼光来看池太太，并被她吸引住了。从小到大杨宪益虽然被家中的女人们包围，但她们不是长辈就是目不识丁的女仆，在中学又是清一色的男生，他从来没有如此亲近的接触过池太太这样的年轻知识女性。池太太引起了她最初的对异性的爱恋。池太太比杨宪益年长十岁左右，当时正是青春年华，她的浪漫性格竟使她对自己的学生产生了爱情幻想，把自己的热情投向了杨宪益。两人的过份亲密渐渐被家人发现，杨宪益的妈妈对他们的关系十分忧虑，她想了许多办法疏远他们。有一年夏天杨宪益的妈妈带着他和两个妹妹到北京香山避暑，池太太也去了。他妈妈在分配房间时坚持要和儿子住一个屋，让池太太和两个妹妹住一个屋，防范他们二人太接近（杨敏如访谈，1994年6月14日，北京三里河）。后来，杨宪益的妈妈甚至与池太太拜为干姐妹，把徐剑生的名字改为“徐剑若”（与杨母“徐燕若”只有一字之差），让杨宪益的妹妹认池太太为“干妈”，用“定名分”的办法分隔他们二人。他妈妈为防止儿子“出事”可谓费尽了苦心。杨宪益在《自传》中说：“我妈妈怕出家庭丑闻，这或许是她决定让我出国学习的原因之一。”诚如他所言，这的确是他妈妈忍心让杨宪益中学毕业就出国留学的最重要的原因。

杨宪益出国之后，池太太写了多封长信给他，信中诉说自己爱情的不幸和对杨宪益的思念。但是杨宪益没有回信。几年以后池太太服安眠药自杀。杨宪益在晚年提起这位亦师亦友的故人，依然流露出对她的怀念，对她的不幸遭遇充满同情（杨宪益访谈，1994年4月18日，北京百万庄）。

1 4. 母与子

再回头说说杨宪益的生母徐燕若（1896-1992）夫人。她活了将近一个世纪，她的一生足以写成一部大书。她的婚姻奇特，和丈夫年龄悬殊（结婚时丈夫四十二岁她十七，相差整整二十五岁），门第和地位更是天渊之别。她只是丈夫三个女人中的一个，且二十三岁就守寡，却养育了三个成才的儿女（除了杨宪益外，大女儿杨敏如，燕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已退休。小女儿杨苾，西南联大外语系毕业，作家）。在中国旧式家庭中，嫡为大，庶为小，她在家中永远处于陪衬的地位。即使她生了杨宪益为杨家立了大功，也只能屈居第二，甚至自己的儿子都不能亲自抚养。丈夫去世后她的日子更难过，丈夫的姐妹中甚至有人对她说“你为什么不殉节？”她记住丈夫临死前“忍着，一定要把三个孩子教育成人”的嘱咐，咬着牙活下来（杨敏如访谈，1994年6月14日，北京三里河）。在错综复杂勾心斗角的大家庭中她处处小心行事，恪守传统礼节，坚忍、宽容地处理各项事务。当七叔三叔用了孤儿寡母的钱后，杨毓璋的第三个妻子（二姨太）决定离开杨家。她到法院打官司向嫡夫人要了一笔钱后带着她生的女儿改嫁了，从此与杨家断绝了关系。燕若夫人却想也没有想过要动这种念头。她守着自己的三个儿女，并且一直照顾杨毓璋的嫡夫人，最后她成了嫡夫人离不开的人。嫡夫人去世时是她守护在床头。“十年媳妇熬成婆”，她不仅熬过了民国时期旧式家庭低眉顺眼的日子，也熬过了十年文革被抄家，被打成资本家扫大街的日子。她看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看到了三个儿女都成家、立业、成材，甚至看到了三个儿女度过金婚纪念日。在整个安徽泗洪杨氏家族的后裔中恰恰是她生的这三个所谓“庶出”的儿女脱颖而出。这使那些过去因她出身贫寒和二房太太的身份而瞧不起她的人最后不得不对她刮目相看。在她九十六岁高龄逝世时，书法家启功写下了八个大字“春辉永照，获教长垂”（杨苾：《我的母亲》）。

她的确担的起配的上这八个大字。

三个儿女都是她的亲骨肉，她都爱若掌上明珠。但是仍然有区别。如果说和女儿的关系是普通母女关系的话，她与儿子的关系就复杂的多。儿子不光是她的，更是“杨家”的。正因为杨家需要一个儿子她才成了杨家的人。正因为生了这个儿子她才由“妾”的身份变成了“二太太”。母以子为贵一向是中国的传统，而她更是母“因”子而贵。她的命运和儿子的联系不仅是血缘上的，更是文化上的。正因为此，她忍受了一般母亲无法忍受的痛苦，活生生地让儿子被大太太抱走。在中国传统中，正房太太才是“正宗”，是嫡系，她只是一个替代品。因为儿子是杨家的血脉，是“富贵”种；她自己只是为了延续这一缕血脉而“借”来的“产床”，是卑微的。从杨家祭祖的次序可以看出这对母子在杨家地位的上下高低的悬殊。尽管这种外来的间隔无法阻挠血脉亲情，加之杨宪益天性潇洒大方，等级观念淡漠，但做母亲的总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决不是说她对儿子的地位不满。相反，她认为儿子是杨家最最重要的一个人，儿子的地位是天经地义的。正因为她太看重这个儿子了，她对儿子的爱也超过了所有的人。这爱虽是无条件的，但带有等级意识的印痕。有时这个爱过分沉重，有时又带些盲目性。比如，她判断外貌的美丑是以像不像杨家的人做标准的。认为像杨家的人就好看，而自己“丑极了”。儿子长的像杨家的人这是她最高兴的事。杨敏如讲过一件好笑的事，生动说明了她的这种心态：

我妈总说‘你们谁也比不上哥哥好看’。我说我看不出他多好看，眼睛那么小。妈却说‘眼睛就是这样好，往下耷拉就是好看。’凡是像爸爸的地方都好，好看极了，像她的地方都不好。我们要是反对，她就说‘那公鸡不比母鸡好看？公狮子不比母狮子好看？所有的都是男的比女的好看。’她把杨家的标准当成好看的标准，你有什么办法？（1994年6月14日采访）

杨敏如还说了一件事，也很有意思：

我哥哥出国，我妈妈一直送到上海。池太太夫妻俩也去了。我老头罗沛霖（著名电子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和我堂哥都在上海交大念书，都等着送他。他们一大群人上街，过街时你说大家是不是要搀着老太太？可我妈说“你们扶着他（我哥）走，扶着他！别管我，别管我！”唉！再扶，到了英国可就没人扶了，怎么办哪？（1994年6月14日采访）

燕若夫人曾经劝说大女儿杨敏如也去英国留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竟是“这样你就可以照顾哥哥了”，可见她对儿子格外的牵肠挂肚。自杨宪益13岁那年由于嫡母的亲生女儿（杨宪益的二姐）生肺病嫡母不得不把他“归还”给徐燕若之后，燕若夫人处处对儿子加倍悉心呵护。她对儿子寄托着无限的希望。看到儿子居然和一个比他大十多岁的已婚女子恋爱，她真是忧心如焚，由于儿子从小在家中的地位养成了他说一不二的任性脾气，燕若夫人深知对待这件事必须慎之又慎，决不能伤了儿子的感情。百般无奈之中她只好忍痛让儿子提前出国留学，让时间和空间的间隔来抚平杨宪益心中的激情。机会出现在杨宪益高中毕业的时候。

15. 离家去国

上高中时杨宪益在“秀鹤图书馆”买了一本英文《企鹅丛书》版的书，书名《The Duties of Man》（《人的天职》），作者是十八世纪意大利伟大的爱国者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杨宪益深深地被这本书所打动，它唤醒了杨宪益狂热的爱

国热情。马志尼成了杨宪益心目中的英雄。他特地买了一座意大利大理石狮子，在狮子上写了一首诗，诗中把中国与意大利相比：两国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意大利在她的国父马志尼领导下打败外敌侵略，建立了共和国。中国也会像意大利一样，睡狮甦醒，复兴中华灿烂的古代文明（杨宪益自传《白虎星照命》，第20页）。（可惜这首重要的诗没有保存下来）同一时期，杨宪益读到了拜伦的著名长诗《哀希腊》，诗人对希腊命运的哀叹又引起杨宪益对祖国命运的联想。从《学衡》杂志上杨宪益知道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这两位伟大哲人的憧憬又引起他对古希腊的强烈兴趣。古希腊和古罗马——这两个西方文明的发祥地他一定要了解！他要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他的兴趣一发而不可收。天津没有人教拉丁文，他就买了一本拉丁文语法书自学，又请了一位希腊商人教他希腊文。可希腊商人不懂希腊古典文学，满足不了杨宪益的要求。他萌发了出国学习希腊拉丁文的想法。

1934年春，年满19岁的杨宪益高中毕业了。家里打算让杨宪益在国内读完了大学再出国留学，所以他参加了燕京大学的入学考试（燕京大学与天津新学书院等教会中学有特殊联系，新学书院的优等生可提前参加燕京大学的入学考试，只需考英文、数学和智力测验三门，杨宪益的英文和智力测验分数特别高）。由于考试成绩优秀，燕京大学破例决定他跳一级，入学就从二年级读起（杨宪益自传《白虎星照命》，第23页），可杨宪益更想上的是清华和北大。他正准备报考这两所学校时一件意外的情况改变了他的计划。

前面提过的他的中学老师朗曼先生（C. H. B. Longman）和他的妻子朗曼太太（也是杨宪益的老师）一直很喜欢杨宪益，认为他可以出国深造。朗曼多次鼓励杨宪益，要他中学毕业就出国留学。1934年夏天正好朗曼先生要回英国度假，他主动提出带杨宪益一起去伦敦，并负责为杨宪益找到入大学以前补习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老师。杨宪益动心了。家里人听说这个消息后，觉得这个机会不可轻易放过。当时出国以船运为主，到英国去要在海上飘泊一个月，风险较大。杨宪益的妈妈本来就不放心他独自一人作万里之游，现在有老师亲自护送出国，大大缓解了她的顾虑；最主要的是这次的出国机会可以了结她的一大心病：儿子与池太太的关系问题。于是，事情就这么决定了。杨宪益的妈妈一直把儿子送上了船，送行的还有伤心的池太太和忠实的老仆人潘福。

16. 远航

1934年夏秋之际杨宪益和朗曼夫妇从上海搭乘加拿大的一艘客轮起程了。同行者还有杨宪益的同班同学李亚福和李的未婚妻张美如。李亚福也去英国留学，张美如则去美国留学。航程是从上海出发穿越太平洋，经日本、夏威夷到加拿大的温哥华，然后再穿过美国大陆，从东海岸搭乘另一艘轮船穿越大西洋到英国伦敦。全程共化了两个多月时间。

从小到大杨宪益连天津都很少离开过，这次一下子就绕了大半个地球，真是大大开了眼界。夏威夷土著人的土风舞和美丽的亚热带风光，雄奇的科罗拉多大峡谷和壮丽的尼加拉大瀑布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和自然风光相比，杨宪益似乎更关心人间社会。他在英文自传中写道：

那次访问尼加拉大瀑布我印象最深的是看见那么多印地安人在兜售纪念品或无所事事的闲逛。一看就知道他们是穷人，显得很冷漠，不快活。在天津我也看见过许多穷人，许多人过着更加悲惨的生活。但是印地安人看起来和白人不一

样，特别是皮肤的颜色不同。我猛然想到他们是二等公民。尽管美国吹嘘她的民主如何如何好，我却感到仍然存在着对待少数民族的不平等和社会的不公正。在纽约我也有同感。当我们去访问美国作家 Alexander Woolcott 时发现他有一个黑人仆人。虽然我在天津有许多仆人，但我与他们相处很好，他们和我是一样的中国人。我在天津从来没有感到像这样受刺激。…可能那时我太理想主义了，对美国的民主有过高期望，把它想的过于完美了。（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30 雷音译）

随着旅程的进展，杨宪益和他的老师朗曼先生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未到纽约之前张美如说她的叔叔（中国驻纽约领事）将带他们三人去逛有歌舞表演的酒吧和夜总会。而朗曼先生则以杨宪益和李亚福的保护人的身份坚决反对他们去这些“颓废的地方”，他认为这一路不仅要负责两个学生的人身安全，还要对他们的道德操守负责，不能让他们接触“美国的流氓和妓女”。两个学生与朗曼争论了多次，朗曼的态度毫不动摇。最后意见的分歧变成了激烈的争吵。朗曼先生说如果张美如愿意她可以跟她的叔叔去逛酒吧（因为张不是他的学生），但杨宪益和李亚福必须和他呆在一块儿，哪儿也不能去。张美如被气哭了。李亚福（张的未婚夫）没说什么，杨宪益却认为朗曼对张美如态度粗暴无礼，他“挺身而出”，当面指责老师朗曼是“专制君主”，并公然宣称以后再也不听朗曼的话。争吵持续了旅美的全程，甚至

发展到了不跟朗曼夫妇说话的地步。到了纽约以后杨宪益和李亚福还是跟着张美如的叔叔去逛了有歌舞表演的酒吧和夜总会，朗曼先生只是抱以冷漠回避的态度，并没有干涉他们。到英国后，朗曼先生为杨宪益和李亚福找到了旅馆，还为杨宪益找到了补习希腊文拉丁文的老师，然后与他们分手了。杨宪益仍然对朗曼先生忿忿不满。他从未去看望过朗曼夫妇，也未给他们写过一封表示歉意的信。几十年后当杨宪益自己也是七十多岁老翁时在自传里提起这件事说：

我一定使他们十分伤心，因为他们真的很喜欢我。那时我十分任性，因为在家里我是少爷，我不能忍受任何人的欺负。这事也许和中国人的普遍情绪有关，当时的中国人认为所有的西方帝国主义者都想欺负我们。我当时也有很强烈的反帝情绪。现在我认为自己对朗曼老先生很不公平。这是一件我回想起来感到懊悔的事。（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27 雷音译）

杨宪益与老师闹翻，除了上述原因以外恐怕还有一个比较隐秘的原因，那就是所谓“英雄救美人”的情结。杨宪益与“天津小姐”张美如在船上相处一个多月，不知不觉地被她吸引住了，但她是同学的未婚妻，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当老师对心目中的“美人”粗暴无礼时，深受侠义浪漫精神浸润的杨宪益情不自禁要挺身而出打抱不平。他对张美如的这份情意流露在与她分别后写的英文札记 By Land and Sea 中。他把札记寄给了大妹杨敏如，大妹看完札记的观感是他“似乎爱上了张美如”。当然，这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爱。事实上，那次与张美如的离别就是永别，他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位同台演出过的“西施”。

第二章伦敦时期(1934-1940)

17. 初抵伦敦

1934 年深秋杨宪益经南安普敦到达了伦敦。伦敦给杨宪益的初次印象并不

好。他在《自传》中写道：

初抵伦敦觉得这是个萧条沉闷的地方。也许是因为我们到达时正是天黑。伦敦那时候污染的很厉害，以我的眼光看来也很破旧。火车是老式的，而且不怎么干净。整个城市似乎包裹在一层雾气里，阴湿寒冷。与光彩四射的新大陆相比这当然是使人失望的。（杨宪益：《白虎星照命》，雷音译）

杨宪益住在一个专为外国学生办的私人公寓里，房东是“一对贪婪吝啬的下层中产阶级夫妇”，伙食很糟糕。但是杨宪益没有被这种种的不如意所影响，他立刻投入了紧张的学习之中。朗曼先生为他找了一个很好的希腊文老师，是个牛津毕业生。他有张“红润的圆脸，总是穿一件磨光了绒毛的粗花呢外套”，他“不停地抽烟斗，烟斗看起来不怎么干净，他的指甲也挺脏”（杨宪益：《白虎星照命》38页）。很显然，这是一个穷困潦倒的穷学者。这位老师教书非常负责，杨宪益说他是一个“很好的、很诚实的人”。他又找了一个同事教杨宪益拉丁文。于是每天早上杨宪益乘地铁到老师家上两个小时课，下午和晚上还要做三、四个小时的笔译作业，除了三顿饭和睡觉以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化在学习上了。

第一次和老师见面时杨宪益与他有一段对话：

“你想去牛津还是去剑桥？这是两所最好的大学。”“两个之中哪一个更好？”“嗯——当然是牛津。但是牛津比剑桥更难进。”“那么我就去牛津。”（杨宪益：《白虎星照命》38页）

就这样，杨宪益决定了他的奋斗目标——牛津大学。整整一个冬天和第二年初春杨宪益都在勤奋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几乎什么业余活动也没有——除了读书以外。

刚到伦敦时杨宪益就与他的同学李亚福分道扬镳了。李亚福热衷于打网球和结交戏剧圈人士，而杨宪益则更愿意读书。他认识了一个新朋友保罗·佐塔，是罗马尼亚留学生。保罗也是个“书虫”，他和杨宪益有共同的爱好——读书。杨宪益在英文自传中写道：

我们俩一块儿去旧书店买书，凡是能抓到手的书就抢着读，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叔本华、尼采、柏格森、柏克莱和弗洛伊德的书。还读一些人类学的书包括弗雷泽的《金枝》以及希腊神话和宗教方面的书，还有古希腊的历史和文学书籍。保罗和我对书的趣味大致相同，我们交换书看，常常在做完作业以后看书看的很晚。保罗总是觉得我的脑子比他活，他说我是大仲马《三剑客》里的德·阿特南，而他是波特斯。我们在一起很好的相处了近一年。……至今我仍怀着亲切的感情想起他以及与他共同度过的日子。他是我那时唯一的朋友。（杨宪益：《白虎星照命》雷音译）

杨宪益在伦敦的二手书店看到了他心目中的英雄马志尼(GiuseppeMazzini)的全集（英文版），他毫不犹豫就买了下来，还买了海涅全集（英文版）和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全集（法文版）。他贪婪地阅读马志尼的全部著作和海涅全集，很快就通读了一遍，但凡尔纳的法文书他却啃不动，只好留到以后再啃。杨宪益到了英国还是在国内的老习惯买书从来不计贵贱，往往是成套成套的买，不久他的藏书数量又很可观了。

18. 站在牛津大学的门槛上

经过五个多月的努力用功，1935年春杨宪益参加了牛津大学的入学考试。他居然一举通过了希腊文拉丁文专业的笔试。接下来是面试，墨顿学院的主考官

问杨宪益：

“你学习希腊文拉丁文多长时间了？”

“我学了五个月。是在伦敦向私人教师学的。”

“什么？才五个月？那你一定是侥幸通过的……好吧，杨先生，要知道我们英国学生通常在进大学以前得学七、八年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尽管你通过了考试，但你的希腊文拉丁文不够巩固。我们强烈地建议你推迟一年入学。你最好再多学一些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课程。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每年对亚洲非洲的学生的名额只有一个。今年我们已经有一个广东的学生了。我们将在 1936 年米迦勒节学期（秋季班）接收你。”（摘自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41，雷音译）

主考官的一句话决定了杨宪益的命运！一年只收一个亚非学生，多么残酷的数字！由于英国牛津大学对亚洲和非洲的学生采取严格控制的方针，使已经站在大学门槛上的杨宪益失去了 1935 年入学的机会。他必须再等待整整一年！这无疑对杨宪益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怎么也没想到笔试通过以后竟然还会出现这种意外。不仅五个月的超常劳动的心血全部白费（他在中学时期从来没有这么用功过），更给他的满腔热情和热切希望泼了一大盆冷水。顿时，他发现自己居住的公寓非常令人厌恶，连伦敦也变得不可忍受。他再也不愿意第二年还重复这样紧张枯燥的学习生活。他搬到了伦敦西区另一所公寓，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19. 地中海之游

杨宪益决定大大“酬劳”一下自己，他参加了一个 1935 年夏季的环地中海旅游团，路线是乘船绕地中海游一圈，途经直布罗陀海峡、阿尔及尔、里斯本、西西里、马尔它、希腊、爱琴海、伊斯坦布尔和埃及，全长要化近一个月时间。为了玩儿的舒服他订了个头等舱。这一路他饱览了地中海及其沿岸各国风光和文化古迹。然而和绮丽的自然风光相比杨宪益更感兴趣的仍然是人间万象。在他的记忆里活生生再现的不是一望无际的大海，不是绚丽辉煌的落日也不是峻峭陡削的石崖，而是各地旖旎奇异的风土人情：阿尔及尔丘陵上为游客作表演的猴子和追赶着西方游客要钱的非洲小顽童，在西西里与他共饮一瓶意大利红酒而被别人误认成他父亲的葡萄牙胖商人，埃及巴扎（市场）上兜售赝品古玩的小贩和沙漠夜市上跳肚皮舞的埃及女郎……这一切都使二十岁的杨宪益感到兴味无穷。有几件事情令他印象特别深刻，他多次回忆中都提到过：其一，他乘坐头等舱，第一次接触到西方上流社会的礼仪和习惯，使他感到特别新鲜。他说：

那个时候我年纪轻，不懂得节约——对钱也不重视，我就买了个头等舱。头等舱当然是舒服的多，不过他们有很多规矩，每天晚上要穿晚礼服，还要打那种蝴蝶样的领带。那种领带我还得要学，我自己试验，学会了。每天晚饭算是正餐，到了晚上五六点钟就回到屋子里换晚礼服，打上蝴蝶领带，然后出去吃饭。后来我也习惯了。（杨宪益访谈，1994 年 5 月 10 日，北京百万庄）

看到头等舱的男男女女每天晚上都衣着盛装，一本正经地出席“晚宴”，杨宪益虽然也“入乡随俗”，心里却觉得“所有这一切都很好玩”。

在葡萄牙里斯本的一个有名的赌场里杨宪益碰到另一个“奇遇”。那个赌场叫“Cintra”。他一进去就看见一个很漂亮的女郎迎着他走过来，杨宪益与她用英语交谈，女郎说“你请我喝杯酒，我在这儿看你赌钱好吗？”看见这么漂亮的姑娘主动要和他一起玩，杨宪益当然十分高兴。他请她喝了一杯酒，然后到柜台换了五英镑钱的筹码。在下赌注以前杨宪益问女郎“你最喜欢什么号码？”那女郎说

“17”，杨宪益就把所有的钱都押在了红色的 17 号上。不幸的是，赌盘转了一圈后却停在了另外的号码上，操盘人一下子就把杨宪益所有的赌注都搂走了。这时杨宪益才意识到这女郎是赌场雇用的，专门引诱客人多输钱。但她经验丰富，神态自然随便，手段很高明，不象现在中国的“三陪女郎”那么粗俗。好在杨宪益“悬崖勒马”，没有听从女郎“再赌一会儿”的劝告，他也因此没有丢失更多的钱。

第三件事虽谈不上奇遇，却使杨宪益忘不了。他在埃及的一个“巴扎”上看到一把很漂亮的阿拉伯弯刀，刀的把手是象牙的，上面雕刻着复杂的图案，开价五个英镑。不巧的是他的钱花光了，正等着家里给他寄钱。他就向同去的另一个游客借钱买刀。不料那个平时和杨宪益很熟的商人听说要向他借钱却显出一脸的别扭，偷偷与他太太商量了半天，才勉强借给杨宪益五镑钱。杨宪益脸上非常挂不住，但既已开口也不好改口，很不舒服的拿了那个商人的钱。虽然第二天他就把钱还了，但这件事给他很大教训，使他知道在外面不能随便向别人借钱。富庶的家境和从小在家中百依百顺的待遇使杨宪益不知道“钱”的来之不易，加之他生性慷慨大方，从不知“惜财”，更不会“敛财”。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区区五镑钱（这是杨宪益的感觉，实际上五英镑对穷人来说是数目不小的一笔钱）会使那个商人那么大伤脑筋。

1994 年笔者采访他时，他早已是靠退休工资吃饭的“无产阶级”了，提起这件事他还是不屑地说“…五镑钱算什么事儿？……钱是有什么了不起的？”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杨宪益碰到了另外一件事。别人都下船游玩了，他却被怀疑是用中国假护照的日本人而扣留在船上。土耳其政府当时非常惧怕在世界各地游荡的日本人，因为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专搞间谍活动的。土耳其当局不相信一个中国学生会专门到伊斯坦布尔来旅游。众所周知的是，当时的中国学生都很穷。杨宪益作为一个例外受到了理所当然的严格审查。

最奇妙的是一天夜里在开罗近郊沙漠上的冒险经历。杨宪益在自传中写道：

那天出发时是夜里九点多钟，我骑着一匹高大的阿拉伯马，当地一个向导跟在后面。我们信步向前走着，经过了沙漠中的金字塔。朦胧的月光使一切都像是幻境。这时那个埃及向导说他会算命，如果我放一个银币在他的手心，他能通过银币变魔术给我占卜未来。于是我给了他半克朗的银币，银币在他手中变没了，当然是到了他的口袋里。然后他说他能看穿眼前的大海，说在大西洋对面有一个美丽的金发英国姑娘为我而憔悴。我们还没有见过面，但不久的将来就会相会。无限美好的未来在等待着我们，我们还将有许多异乎寻常的经历。他不停地说着，要我给他更多的银币。我被他的这些小伎俩逗乐了，但没有给他另一半银币。……那个月光朦胧的沙漠之夜！那晚的经历使我永不忘怀。（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46, 雷音译）

这个故事真是太离奇了！因为杨宪益后来在英国真的遇到了一个美丽的金发姑娘，这个姑娘真的爱上了他，他们俩真的度过了无数美好的日子，也遭遇了不少异乎寻常的苦难。莫非那个不相识的埃及向导真有神奇的预测功能？

20. 浪迹巴黎

1935 年杨宪益第一次去巴黎。巴黎，是杨宪益心仪已久的城市，他早已通过雨果、大仲马的小说和波德莱尔的诗歌熟悉了巴黎。他一到巴黎就爱上了她。巴黎，在这里卢孚宫、巴黎圣母院和巴士底狱相共存，香榭丽舍大街、艾菲尔铁塔与巴黎公社墙相映照。这里有世界上最高贵豪华的宫殿和商厦，也有最平民化

的旅店和咖啡馆。一个多世纪前这里上演过惊天动地的大革命活剧，七十多年前公社社员的鲜血又一次让世界为巴黎而歌哭。这个英雄的城市吸引着全世界的文化人，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在这里获得了创作的灵感。杨宪益来到这样的地方当然会去游历她的名胜古迹，除了卢孚宫和艾菲尔铁塔以外他还参观过凡尔赛夏宫，他去过两次拉雪兹神父公墓（PereLachaise），以寻访奥斯卡·王尔德和其他法国作家的墓地。他去踏访过巴黎公社社员墙，凭吊他为之深深感动的英雄的遗迹。

巴黎一作为有着光荣历史和大量文化遗迹的古城固然可使杨宪益徜徉其间发思古之幽情，但真正使杨宪益着迷的却是波德莱尔式的巴黎，一个世俗的巴黎。充满活力，人欲横流，华丽的橱窗内闪烁着琳琅满目的商品，大街上永远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商品的诱惑和“集商品和售货员为一身”的性诱惑使人魂不守舍。在这个巴黎流浪汉与诗人并存，酒鬼和妓女共在。全世界的流亡者都聚集在这里，不管他是被废黜的俄罗斯王公还是被驱逐的革命者，巴黎都张开双臂欢迎他，一视同仁地对待他。在巴黎的任何一个酒吧你都可能遇到一个“俄国公主”或一个“埃及王子”。你到露天咖啡馆去喝咖啡，一抬头可能发现坐在你对面的正是某位世界著名作家。豪富大款固然可以在巴黎享受到世界一流的美味佳肴，一个穷工人也同样可以在街边咖啡馆花上 10 法郎喝一杯上好的咖啡。战前的巴黎弥漫着一股自由奔放的空气。当时在巴黎生活很便宜，一英镑可兑换四百多法郎。一个清洁的小旅馆一宿只需四法郎，还带一顿早餐，廉价的不可思议。全世界的穷艺术家都往巴黎跑，各色人等都能在巴黎得其所哉，如鱼得水。20 岁的杨宪益被这个巴黎迷住了。他像波德莱尔一样走在大街上，迷失在“巨大的人群”中。可能是出于对英国牛津大学歧视亚非学生的逆反心理，也可能是受强大的“巴黎气息”的诱惑，更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1935 年游历巴黎时的杨宪益像波德莱尔一样当上了“游手好闲者”，成了一个“浪荡子”。除了短期听听法语讲座以外他基本上无所事事，也不再读任何严肃的书籍。他白天逛画廊、博物馆或者逛大街，下午睡大觉，睡到晚上九、十点钟起来后开始过夜生活。巴黎人的时间表是从晚上九、十点钟开始计算的，往往在夜里二、三点钟还有大量人群在闹市区游荡，各种娱乐场所和酒店咖啡店都灯火通明。

远在上个世纪中叶第二帝国的鼎盛时期，巴黎就已经进入一个“夜游症泛滥的伟大时代”了（本雅明语）。二十年代海明威和加拿大作家卡拉汉在巴黎时也夜夜都在小酒馆里度过，尽兴时会喝的酩酊大醉躺倒在大街上。采访中杨宪益说他“每天都要过夜生活”。夜生活的内容主要是到酒吧喝酒喝咖啡，与法国人聊天，观察酒吧的各色人等。法国人热情活跃，在酒吧里素不相识的人可以随意聊天，自由自在，就像老相识一样。杨宪益经常应一些穷学生的要求请他们喝酒，然后一起闲聊；也经常碰到一些穷艺术家主动给他画像，不要钱，只需请他喝一杯酒；还有流亡的白俄少女，自称是俄国公主，谁都知道她在说谎，但没人戳穿她，大家相安无事。杨宪益就是这样每天晚上在酒吧享受着波德莱尔所说的“在人群中的快感”，感到其乐无穷。杨宪益这一点很像德国作家霍夫曼，他“从未特别喜欢过自然，他重视的是人——与他们交谈，观察他们，仅仅瞧着他们——这比一切都重要”。与人交往，谈天说地，是杨宪益一生的爱好，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

夜生活的另一个内容就是逛妓院。杨宪益在巴黎妓院的经历可谓是他一生中特殊的生活体验，也是理解他性格的一个重要侧面。在那一年杨宪益逛了很多家妓院，与妓院老板娘混的很熟。甚至后来还给李亚福和其他中国留学生当游逛妓

院的“向导”。他创造过一天晚上连逛二十多个妓院的“记录”，把“腿都走直了”。当然其中很多家他都只是去“找着喝一杯酒，闲聊一会儿就走”（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0日，北京百万庄）。周作人在一篇文章中说他身体内同时隐藏着“绅士鬼”和“流氓鬼”，他们双方“你方唱罢我登场”，轮流执政，故而一夜之间可以从一个“绅士”变为一个“流氓”；而杨宪益也一夜之间从一个见人说话就脸红的腼腆青年变为了经常出入巴黎上等妓院的花花公子。波德莱尔有一个重要的观点，他说“纨绔子弟像是某个伟大祖先的后裔”，纨绔主义是“堕落时代的英雄主义的最后闪光”（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三联书店出版）。这一段话可以作为深入理解杨宪益精神世界的一把钥匙。如果说杨宪益与别的中国普通读书人有区别的话，就是他身上时不时会冒出这样的“纨绔主义”的作风，这也是他在思想深处与波德莱尔契合的地方。而作家舒湮的一段话可以作为理解杨宪益这一段生活的“中国因子”。他说：“从来名士风流，不以狎妓为耻。青莲（李白）、工部（杜甫）诗中均咏此等事，东坡更不讳言携妓徜徉山水之间。”出生于士大夫世家的杨宪益，每一个细胞都浸染了这种风流倜傥，落拓不羁的名士气息，自然不讳言青年时代的这一段“荒唐”行为。到了晚年，笔者与他议论这一段生活时，他说“去妓院总不是什么高尚行为”。看来他也跟波德莱尔一样，晚年改变了早年的一些看法。

21. 王礼锡夫妇

在欧洲大陆游逛了几个月后杨宪益回到了伦敦（除了巴黎以外杨宪益还游历了瑞士日内瓦和阿尔卑斯山区等地）。他接触了伦敦的中国留学生圈子，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当时的中国留学生按其留学途径不同分成三类：自费学生、靠奖学金留学英国者和国民党政府派遣的留学生。杨宪益在自传中写道：

自费学生多是富家子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好好读书，宁愿寻欢作乐；第二部分人是由庚子赔款基金会资助的，该基金是外国列强在“义和拳叛乱”后从中国强夺去而又“返还中国”的钱。这笔基金用来遣送优秀学生到海外学习。这些学生通常都非常用功，各自在学术领域取得成就；而国民党遣送的学生大部分是派来监视其他中国学生的，学术上基本不合格。优秀学生们很瞧不起这些人。我们常常叫他们“蓝衣党”。……我在自费学生和“奖学金学生”中有许多朋友，但我远离那些伦敦的“蓝衣党”。（杨宪益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P48，雷音译）

在这些新朋友中有一对中年夫妇成了中心人物，他们就是王礼锡和陆晶清。王礼锡（1901-1939），江西人，出身士大夫家庭，其曾祖父王邦玺是清同治四年进士，祖父王仁煦是清光绪十七年举人。王礼锡本人是诗人、教授兼文史学家，还是活跃在三十年代初的著名报人。王尚在童年就以一首“菊花开，隐者来，一枝香，揣入怀”的即兴诗展示了他奇异的诗才。三十年代初王礼锡主编的《读书杂志》开辟了《中国社会史论战》专栏并出版了四辑论战专刊，当时五十余家期刊起而响应，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王礼锡在论战专栏前言中“全线出击”，指名道姓地向论战左中右三方知名人士陈独秀、郭沫若、陶希圣、顾孟余挑战，显示了他“胆大妄为”的性格。王因参加李济深陈铭枢在福建成立的“人民革命政府”并任“文化委员会秘书长”而被迫流亡英国（顾一群等：《王礼锡传》）。这样一位既有诗才文才又极有现实关怀敢作敢当的文化人对杨宪益有很大的吸引力。其夫人陆晶清（1907-1992）北京师范大学语文系毕业生，在校时与刘和珍、许广平等一道参加爱国运动，在“三·一八”惨案中负过伤，也是一位热情奔放的人物。

王礼锡在伦敦的家还有两个房客，一个是教授、作家熊式一，另一位是画家兼作家蒋彝，这几个人聚在一起自然成了旅居伦敦的中国文化人的中心。在王礼锡家杨宪益认识了以后成为他终生朋友兼师长的向达（1900-1966，湖南溆浦人，著名中西交通史学家，中国敦煌学的创始人之一，当时在大不列颠博物馆研究敦煌卷子），还认识了吕叔湘（1904-1998，江苏丹阳人，著名语言学家，当时在牛津大学听课）和杨人梗（1903-1973，湖南醴陵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当时在牛津大学学习）。

王礼锡熟悉国内政治情况，他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在国共两党斗争中同情共产党。杨宪益第一次从王家详细了解了国民党围剿江西“苏区”，红军被迫长征的故事。在政治上王礼锡既信仰个人的思想自由又坚持民族主义，反对一切独裁统治和帝国主义。这种自由主义加民族主义的政治态度对 20 岁的杨宪益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 1935 年起一直到 1938 年 10 月王礼锡回国，杨宪益只要一到伦敦就去西区汉普思顿高地花园路 50 号王礼锡的家，成了他家的常客。

22. 上层与下层

1936 年春杨宪益搬到牛津去住了。先是住在牛津大学校外，呆到秋天学期开始再搬进学校。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个年青的人类学者汤姆·哈里森（Tom Harrison），汤姆正在进行一项社会调查，杨宪益主动报名参加了他的实验活动。他们在威尔士（Wales）、科沃尔（Cornwall）等地访问了许多家庭，被访问者多半是些穷人和孤独的老人。老人们叙述了当地的民间传说和有关女巫及龙的迷信故事。通过这项活动杨宪益较深入地了解了不少英国底层社会情况（杨宪益：《白虎星照命》第 50 页）。

同时杨宪益与英国上层人士也保持来往。1935 年夏天的地中海之游使他结识了不少上层人物，其中一位叫欧内斯特·皮特曼的老绅士邀请杨宪益到他所属的“皇家汽车俱乐部”吃晚饭。丰盛的晚餐、幽雅的环境和出入俱乐部的绅士们的风度给杨宪益留下深刻印象，他看到伦敦也有如此高贵雅致的好去处，使他改变了“灰蒙蒙的伦敦”的看法。

1936 年夏另一位地中海的“游友”、贵族出身的瑞典青年律师彼得森（Peterson）邀请杨宪益访问斯德哥尔摩和另外几个城市。彼得森热情地招待了杨宪益，请他吃精美的晚餐，带他参观考古博物馆，参观 18 世纪一位瑞典国王建造的他心目中的“中国宫”和“中国花园”，还看了歌剧。这次的瑞典之行使杨宪益领略了北欧国家的风光和文化。在斯德哥尔摩杨宪益意外地认识了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教授兼学者的杨周翰。杨周翰那时也很年轻，正在帮助瑞典著名的美术史家奥斯瓦尔德·斯林（Oswald Siren）编辑一本中国美术史的书。他吃、住在斯林家，由后者发给工资。在杨周翰眼里，杨宪益是个阔绰的大少爷，而自己则是给人打工的穷书生，他们俩不是一路人。谁能想到几十年后他们被打入同一个“反动阵营”之中，都成为专政对象了呢？

23. 坏学生

1936 年秋天 21 岁的杨宪益终于进了牛津大学的墨顿学院（Merton College），

这时的杨宪益已经不是两年前从来没有出过天津城的“土”少爷，而是独自在伦敦和欧洲游历过两年的经验丰富的“浪子”了。在新结识的同学中他年龄稍长，资格又老（他是去年就考上大学的“大哥大”），见识也广，很快就成为一群捣蛋鬼的头头。

牛津大学对新生管的很严，超过规定时间不得在校舍内接待女生，如果外出晚上十点钟以前必须返校，否则会被关在校门之外。学校严禁学生在规定时间之外去酒馆喝酒并派“学监”到酒馆去“逮”犯规的学生。杨宪益藐视这些规定，并以犯规为乐。他很快学会了对付这些规定的办法。他在自传中写：

我成功地尝试过很多次超过规定时间返校而从没有被逮住；我不得不爬墙进来或者从煤道里滑进来。墨顿学院在墨顿街有一条这样的煤道，只要揭开人行道上的盖子，钻进洞里滑进校园内的储煤室就行。青年学生们总是喜欢打破规则，我很容易地向别人学会了这种小把戏。（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56，雷音译）

杨宪益和他的一帮捣蛋鬼经常喝了酒后在校内外装神弄鬼，吓唬那些较文雅的男孩。有一次他们的恶作剧闹的太凶，差一点儿出事。杨宪益有一把气手枪，他和他的朋友们经常在他的房间里轮流射靶子玩，一天晚上他们把窗户打开向校园的路灯射击，好多次都击中了路灯，但灯罩的玻璃太厚，怎么也打不破。正当他们一鼓作气再接再厉之时，查夜的教导主任闻声而来，想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砰砰作响。当他走过来时，一颗子弹正擦着他的高鼻尖呼啸而过，他大吃一惊，寻声而望，发现杨宪益和他的哥儿们正趴在地上“战犹酣”呢。第二天，杨宪益被叫到办公室，教导主任问他“是谁干的”，杨宪益说手枪是我的，是我干的。教导主任又找了其他几个顽皮鬼“审讯”，所有的人都说是我干的，拒绝出卖别人。教导主任看到这帮淘气包人人都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拉，倒有几分可爱，最后罚了杨宪益二十个

英镑，没收了他的手枪了结，事情就算过去了（杨宪益访谈，1994年4月23日，北京百万庄）。

24. 又保守又自由的牛津

杨宪益念的是希腊和拉丁专业的荣誉学位，需要四年时间才能毕业（其他专业的文学士学位只需三年）。头两年专门攻读古典希腊和拉丁文学，两年结束时举行第一次荣誉文学士考试，称作 Honour Moderations。这次考试通过以后需再学习两年哲学、历史或者英国或其他欧洲国家的文学，最后再终考一次，通过考试者就可取得荣誉文学士学位。获得荣誉文学士学位的名单将按所得分数的名次分别登载在英国最有影响的报纸《泰晤士报》上以作永久的纪念。杨宪益是学完了两年的希腊拉丁文学以后又选学了两年英国文学才拿到荣誉学位的（杨宪益：《白虎星照命》第57页）。

牛津大学成立于1214年，是英国最古老的大学。杨宪益所在的墨顿学院创立于1264年，它与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1249年创立）和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1263年创立）同为牛津最早建院的三个学院。墨顿学院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仍保留了很多中世纪的传统。比如“导师和学生们一起用餐”：在一个大餐厅里，导师们坐在一张大高桌四周（通常有二十人左右）；学生们则分坐在几条矮一些的长桌旁（有一、二百人之多），每餐饭前必有一位导师代表所有的人用拉丁文作祷告，然后全体才开始用餐。如有个别学生被邀请到导师们的高桌上用餐则被视为一种荣誉。又如学生上课和集体用餐时

必须穿黑色袍子，平时穿短袍（类似一种坎肩），到了特殊场合得穿长袍。又如每个学生都有一个佣人，称为“Scout”，照料学生的日常生活，除了洗烫衣服供应热水以外还帮学生预订早中晚餐（如果学生不愿意在大餐厅用餐的话），这也是多年沿袭的传统；又如男女不同校的规矩：过去大学不收女生，杨宪益在牛津时虽然已接收女学生但男女不在一个学院，女生们单在一个学院读书。牛津的几十个学院中女生学院只有三、四个（杨宪益访谈，2001年5月11日，北京小金丝胡同）。

在课程安排上牛津大学更是重视传统学问。杨宪益选读的专业古希腊文和拉丁文自不待说，即使后来选读英国文学也必须从古文读起，采访中杨宪益说：

读英国文学首先得要读一点公元三、四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学，那个文字和现在的英文写的不一样。后来诺曼第人征服了英国，丹麦人也征服过英国，后来才有了今天英国的文化。读完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后读中古英文，从伊丽莎白一世起到浪漫主义文学，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念下去，一直到十九世纪中末。当代文学他们不读，文学系读到1850年为止。拿我国比就等于是非要从春秋战国先秦的四书五经读起，一直到梁启超康有为，或者读到鲁迅，以后的就不读了。这个传统他们保持到今天。（1994年4月22日采访）

在制度和学术内容上牛津大学重视保护传统，但在教学方法上却又很自由。学生以自学为主，教授讲课为辅；用功的学生每天都泡在全欧洲第一流的牛津图书馆里。尽管每天上下午牛津大学都有几十门甚至上百门课程由不同的教授在大课堂讲课（不同学院的学生可以在同一个教室听同一门专业课），但听不听课却由学生们自由选择。学校采取导师制，每个学生都有一个导师。每个星期导师与学生起码见一次面，了解学生的研究方向和学习程度，学生向导师汇报近来读过的书籍，或者就某个课题写一篇文章让导师过目，由导师提出应注意之处。导师权力很大，如果他认为学生程度太差，可以通知学校取消这个学生的考试资格。拥有如此权力的导师对待学生的态度竟十分民主。杨宪益在自传中说起他第一次去他的希腊拉丁文导师罗伯特列文斯（Robert Levens）处上辅导课的情况：

导师要求我写一篇有关古希腊或拉丁文作家的文章作为测验我对上述两门功课的知识和理解程度。我写了一篇关于古希腊诗人阿尔凯奥斯（Alcaeus）和女诗人萨福（Sappho）的文章，把他们说成是反对专制统治、争取民主的爱国斗士。我想罗伯特列文斯被我的年青人的热情和相当稚气的阐释逗乐了。（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59，雷音译）

如此阐释古希腊诗人无疑是幼稚可笑的。但导师却感到很“有趣”，发出的是宽容的微笑而不是严厉的申斥或居高临下的“教导”。至于杨宪益的第二位导师、诗人爱得蒙德布伦顿（Edmund Blunden）与他的学生简直就是平等的好朋友。杨宪益说：

我很幸运有诗人爱得蒙德布伦顿做我的英文导师。他的学生们都很喜欢他，我们都叫他泰迪布伦顿。他是个很有教养、见解开明而温和的老师，喜欢带他的学生上小酒馆边喝酒边上课。……我一向不是个严肃认真的学生，只对自己喜欢的领域投注精力。我喜欢诗，特别是前期中世纪诗歌。布伦顿对我的这一癖性十分宽容。……他是那么温和、谦虚，从不把我当作一个“学生”，我们只是象聊天似的随意交谈书籍和其他事物，他经常带我上附近的小酒馆边喝啤酒边继续我们的谈话。（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76，雷音译）

在这种看似漫不经心的宽松心态下自由切磋得来的“学问”必不是那种“大路货”和人云亦云的陈腐观点，每有所得一定是自己的真知灼见，而这样的真“学问”

“也不太会随政治风向改变而一变再变。”

尽管杨宪益在入学第二年就爆发了抗日战争，使他的学业受到很大影响，但四年的牛津生涯在他的一生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重视古典的牛津教学传统使他的英文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希腊拉丁文同样如此），而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不仅使他得到了若干“学问”，重要的是使他懂得了自由地思考是一条“原则”。如果过去杨宪益能够较自由的思考是出于“五四”后思想解放的大环境和他自由自在的天性，那么牛津四年的锻炼更使他明白了思考的“前提”是“有没有自由”。与别人不同的是，杨宪益不是从理论上明白这个道理的（杨宪益对理论问题历来不大感兴趣），而是生活本身教会了他。在他人生关键时刻（19岁至25岁是思想成长最重要的时期）渡过的六年英伦生涯（其中包括四年的负笈牛津）使他把“自由地思考”化为了他的生活方式。只要他活着，他就得这么思考，他就得这么做，借用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树欲静而风不止”，他就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他一生中多次因言“闯祸”证明了这一点。

25. 打败日本学会

牛津大学各种社会组织琳琅满目，保守党、社会党、工党、共产党的学生都有他们的学会，在牛津的中国学生也有一个中国学会（当时牛津的中国学生不多，一共才二十来人。除了杨人榭、吕叔湘外，还有钱钟书杨绛夫妇和俞大缜俞大綱等学者）。该学会的创建者是曾在中国传教的休斯牧师（Reverend E·R·Hughes，牛津毕业生，早年也在牛津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他认为中国的儒家文化和古希腊文化有相通之处），目的是为了沟通东西方文化。活力四射的杨宪益一到牛津就参加了中国学会并被选为学会的秘书，从1937年起他被选为学会主席。这个职位他保持到1940年离开牛津时为止。通常牛津的中国学会有会员一百来人，每人每年缴纳固定的会费，每一、两个星期举行一次集会，邀请一些学者对大家关心的问题演讲，然后大家提问讨论。当时，牛津还有一个日本学会，是日本留学生办的。日本学会由于有日本大使馆资助，经费多，可以举办带晚餐的Party，会员比中国学会多。杨宪益决心展开一个战役，打败日本学会。一位名叫弗兰克斯托克思（Frank Stocks）的英国同学很热心的帮助杨宪益，做他的助手。当时正逢抗日战争爆发，大多数英国人都同情被侵略的中国，杨宪益和他的英国朋友们借着这个形势开展了大规模的活动，举行了多次会议，就战争的前途进行讨论和辩论。很多英国的汉学家都参加了会议。会上一些英、美学者认为中国太弱，斗不过强大的日本战争机器，获胜的可能几乎等于零。杨宪益与他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他引用英国女作家弗莱达·阿特蕾（Freda Utley）《日本的泥足》一书中的话说“尽管中日两国力量悬殊，但中国最终会胜利，因为全世界大多数人民都支持中国。”这些普普通通的话出自一个普普通通中国留学生的口却在彼时彼地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杨宪益几乎是怀着一种宗教信仰坚信“中国必胜”的。除了讨论中日战争，中国学会还召开了很多有趣的关于“中国古老文明”的演讲会，吸引了不少听众。在他和同伴们的努力下牛津的中国学会的影响越来越大，许多日本学会的会员转而参加中国学会的活动，中国学会的会员人数猛增，极盛时竟有一千多人参加中国学会的活动。大大超过了日本学会。杨宪益在自传中说“我对自己辉煌的成就感到很满意”。翻墙和禁书下载。

与日本学会的竞争就像一场小型的竞选，运作的方式完全按西方式的民主原则。两个学会都发挥自己最大的力量，用最有力的办法争取自己的“选民”，最终

得人心者获得了最后的胜利。杨宪益积极参与牛津大学这个“小社会”中的社团组织活动，使他熟悉和了解了民主政治的法则和运作方式。几十年后他把这种法则和运作方式运用到民主党派的选举中，却受到了意外的打击，此是后话且按下不表。

26. 《抗日时报》和《复兴》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爆发的抗日战争在杨宪益看来是早晚要来的事件。生于中国北方的他早就盼着全面抗日的这一天了。消息传来后他处于高度兴奋和紧张状态之中，忙的像个陀螺似地一天24小时转个不停。以王礼锡为中心的伦敦中国留学生和知识分子们立刻行动起来，开展了形形色色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杨宪益在英文《自传》中说：

那段时期我也记不清自己作过多少次公开讲演了。这些集会通常是由同情中国人民的英国人帮助组织的。许多英国朋友都愿意支援我们。会议或由当地工会或由一些人道主义组织负责张罗，我作了充满热情的演说，听众们高声欢呼并发誓支持中国。许多上了年纪的好心的女士端给我一杯又一杯的牛奶。这种兄弟般的友爱非常令人感动。（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67，雷音译）

杨宪益在回忆中还讲到一件事，生动体现了普通英国工人对中国的同情和他们的豪爽真诚的性格。1937年夏，杨宪益到英国同学弗雷德·威博斯特（Fred Webster）位于约克郡的家中去玩。他在当地的小酒馆与一帮英国工人比赛投掷靶子的游戏。杨宪益“技压众人”，数次投中了靶心。工人们欢呼着把杨宪益抬上了桌子，高叫着“你做我们的司令吧！你什么时候回去打日本鬼子，我们就做你的兵。我们英国人也讨厌日本鬼子。你一号召，我们就从英国来！”（杨宪益访谈，1994年4月23日，北京百万庄）英国人的豪情壮志和他们对中国的友好感情使年轻的杨宪益激动不已。

有两件事值得特别提一提，其一是《抗日时报》。办一张油印的中文报纸的点子是杨宪益出的，得到王礼锡夫妇和其他人赞同后他和另一位中国留学生李贛鹏（民国初年军政界名人李烈钧之子）共同出钱买了一部油印机。杨宪益和向达担任编辑，杨把当天英国报纸上的中国战事情况搜集起来并翻译成中文，向达给文章润色，吕叔湘和向达负责刻蜡板（吕写的一手好字），然后大家一起动手油印。每天傍晚报纸印出来后由王礼锡夫人陆晶清到伦敦东区华侨居住点分发（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0日，北京百万庄）。华侨们非常欢迎这份油印的中文报纸，每天都有许多华侨在伦敦唐人街中国餐馆“顺车楼”等候着当天的报纸，八百份报纸很快就发光了。除了上课以外，杨宪益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这张小小的抗日报纸上了。报纸的编辑和发行一直延续到1938年冬（杨宪益去牛津上课后报纸由别的旅英中国学者继续办下去，由王礼锡担任主编，执行编辑是陆晶清、陈广一，参加这项工作的除上述学人之外还有潘家洵、朱坚白、钱歌川等人）（顾一群等：《王礼锡传》）。

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形成使全国上下同仇敌忾，斗志昂扬。1937年9月的平型关大捷和1938年3月的台儿庄战斗的胜利使远在英国杨宪益及朋友们欢欣鼓舞（杨宪益甚至以平型关大捷为题材写了一个英文剧本）。他们日以继夜地集会宣传、搞募捐、印报纸、讨论战争形势，不知疲倦地为抗战作后援工作。杨宪益回忆了一件事，可以说明那段时期他们的干劲和生活状态：

记得有一次我连续两天两夜没上床睡觉，白天到处奔波，工作一整天，晚上

和朋友们聊一整宿：第三天我完全累垮了，眼睛也挣不开。我决定休息一下午。午饭后我喝了好几杯浓咖啡，然后到蕾斯特广场的一家电影院去看一场好莱坞电影。那是一部愚蠢的惊险片，电影一开始我就睡着了。我睡的那么香直到下午四点钟左右电影结束时才醒过来。睡过那一觉后我感到精神焕发，又开始了我的工作。（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69，雷音译）

抗日战争的爆发的确使杨宪益的精神为之一振，他这个“公子哥儿”变成了一个平民宣传员和斗士。杨宪益在《自传》中写的一件事很有意思，说明了这一变化：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我和其他中国留学生在伦敦组织了一个大会，在会上发表演说谴责日本的侵略并为中国的抗战募捐。我给他（雷注：即欧内斯特皮特曼，曾请杨宪益在高级俱乐部吃晚餐的那位英国富绅）送了一张请柬，他来了。当他听过讲演要走时，看见我和其他中国留学生一起站在门口，手里拿着帽子接受捐款。他向我打招呼，显得很窘迫，偷偷地在我帽子里塞了一张十英镑的票子。我向他致谢。他看见自己年青而富有的中国朋友像个乞丐一样行事，一定很吃惊。（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51，雷音译）

杨宪益在牛津大学还办了一份杂志，起名叫《复兴》(Resurgence)。这份英文杂志完全由他一个人独自操作，从写稿，油印到邮局寄发都是他一个人做。每期十页到二十页不等，有社论和几篇文章，内容是谴责日本侵略和分析战争形势。结论只有一个：日本必败，中国必胜。杂志每期印三、四十份。杨宪益自费把这几十份杂志寄给英国的友好组织和中国的国民党政府，还寄给天津市政府，最绝的是他竟然把杂志寄给天津的日本驻军总部，每期都寄。在采访中他说这样做是为了“骂骂他们”。而两年多后，当杨宪益回国时，他却差点为自己的莽撞付出代价（详情且看后文）。把抗日杂志寄给家乡的日本驻军总部这件事很反映杨宪益的性格，有时即使面对极为重大的事情他也会产生某种“戏谑”心态，做出意料不到的“惊人之举”。这样率性而为的结果往往给他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甚至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有时又使他显得很“不严肃”。日后他与“党组织”之间产生不少摩擦与矛盾都多多少少源于这个改不了的老脾气。

27. 留学生中的左派

把杨宪益这个“大少爷”和“左派”这个词儿联系起来似乎有些滑稽，但他却自认是留学生中的左派。采访中杨宪益介绍说，在伦敦的中国留学生按政治态度可分成红色、粉红色和蓝色这三派，蓝色派大多是与国民党蓝衣社有关系的人，以监视别的留学生为主业，粉红色是中间派，而他属于红色派，尽管他根本不是共产党员。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严重的经济危机在西方各国蔓延，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暴露无遗；法西斯主义乘机在德国、意大利崛起，而西欧各国的民主政体对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挑战反应软弱，此时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提出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口号，这一举动大得人心，大大提高了苏联的国际声望。苏联——这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了欧洲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理想国，欧洲的知识分子普遍转向左倾，社会主义思潮在欧洲乃至全世界成为一种主流，人称“红色的三十年代”。在这个大背景下来到英国的杨宪益很自然地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潮并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杨宪益在《自传》中说：

上牛津大学以前我读过一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在牛津时我又读了一些，

但从没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我更喜欢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普列汉诺夫的一些哲学随笔。那些日子我还读过托洛斯基的《俄国革命史》。一个中国青年人转向马克思主义并非偶然，我那一代的大多数人都走了同一条路。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向。对我个人来说，可能早期阅读的诸如意大利的爱国者和政治思想家马志尼的《人的职责》，中国第一个共和国的缔造者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其他中国的和西方的前马克思主义及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家的著作也帮助塑造了我的未来。（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82，雷音译）

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杨宪益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同等看待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精华和一些前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的思想成果。杨宪益就是这样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作为东方被西方欺负的民族的一个成员，杨宪益接受马克思主义与他的民族主义立场是并行不悖的。甚至可以进一步说，他之所以对中国共产党有好感，正因为共产党一开始就高举抗日的旗帜，而国民党却不。当时国民党政府驻伦敦的大使馆官员对抗日没有热情。杨宪益说“他们只热衷于打麻将”。因此杨宪益与官方的大使馆保持距离。在英国，杨宪益的爱国情绪有时甚至呈现出狂热状态。1935年他从英国给大妹的未婚夫罗沛霖寄了一本照相本，在照相本扉页上他用“古风”体写了一首好几百字的长诗，第一句是“呜呼，我生不逢……之盛世！”，诗中他想象自己像唐代小说中的义士虬髯公那样在海外建立了一个复兴中华的强国。信末署的日期不是用公元纪年，也不用民国纪年，而是用了章太炎推算的“黄帝纪元四千几百几十年”，以显示中国历史的悠久。这一特殊的纪年法给罗沛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而这个有纪念意义的照相本及古风长诗都毁于文化大革命中。（罗沛霖访谈，1994年6月20日，北京三里河）奇怪的是，在政治信仰的问题上杨宪益对自己的看法与别人对他的看法有较大的距离。他对待人与事的惯常态度和做法使许多人（包括他多年的朋友）把他看成一个自由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左派马列主义者（特别是在出现了斯大林这样的“马列主义者”之后又出现了自称“毛主义分子”的“左派”“波尔布特”之后）。但他却坚定地说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左派。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左派”这个词早已经不那么吃香了，谈起三十年代他在留英学生中是一个“左派”时语气仍然很自豪。在理论上他至今也不反对用激烈的手段实现革命的目的。他的性格温和，但观点却往往很激进，这些矛盾之处让人感到困惑。可能他在根本上只是一个诗人，不是政治家，更不是思想家。他像波德莱尔一样，对“革命”的看法带有很大的浪漫主义色彩。

毋庸置疑的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决没有实用主义的色彩。作为一个富家子弟他不是为改变自身的经济地位、为了“翻身得解放”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更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你下台我上台”的“工具”和“武器”。他对人间的苦难和不平等现象永远不能无动于衷，在他眼中，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中国古人“天下大同”的理想永远是崇高的。

28. 三等生和四等生

从幼年起杨宪益就不是一个用功读书的人。他读书一是凭天分，二是凭兴趣。天分高使他读书从不感觉累，别人费半天劲儿啃不下来的书他玩儿着就读下来了；他感兴趣的可以废寝忘食地读，没兴趣的书就丢在一边看都不看。他之所以能在儿时背出枯燥的“四书五经”主要是靠超凡的记忆力和魏汝舟老先生的教

书有方。魏老先生善用鼓励法，启发杨宪益读书的兴趣。老师的“夸奖”使杨宪益产生了一种遇到“知己”的感觉，这种感觉对杨宪益很重要，使他的精神得到了滋润和营养（杨宪益一生都渴望和寻找着这种“知己感”，但很少寻求到）。来到英国以后，尽管牛津大学有许多优良的传统使杨宪益获益匪浅，但他对“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斋生活却不感兴趣。他虽然不象陈寅恪、梁宗岱那样只重学问而不攻读学位（梁宗岱在法国留学时听从大诗人瓦雷里“求学要重实学，要注意吸

取西方文化的精华，而不要图虚名，不要钻某一门科学的牛角尖”的劝告，没有攻读任何学位）（甘少苏：《宗岱与我》，重庆出版社）。但他对学分的高低却抱一种洒脱的态度。他在自传中说：

来到牛津时，虽然我的希腊文拉丁文的程度很差，但我感到有足够的智力去应付考试，从没有为通过考试而苦读过。我从不为毕业考试能否得到高分而发愁。对英国学生来说得高分是相当重要的，考一个头等可以使你在政府部门得到一个好工作。可我知道，即使考一个头等对于我也毫无意义。我是要回中国的，无论得什么学位和分数总是能在大学找到一份工作。（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58，雷音译）

话虽这么说，但为了通过希腊拉丁荣誉学位的第一次考试（Honour Moderations）杨宪益还是作了一些努力。他在1937年暑假摒弃一切社交活动，躲到康沃尔一个叫拉莫纳的偏僻小渔村攻读了一个月。可是这次的努力却以失败而告终。失败的原因说起来很可笑，竟然是太寂寞了，无人和他说话！他在自传中说：

……女房东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妇女。她照顾我的一日三餐并提供其他的服 务，但是任何时候都不打扰我，也从不试图与我交谈。拉莫纳有个小酒店，每次我去到那儿，常去酒店的当地渔民们只是友好地向我点点头，却羞涩地与我保持着距离。他们好奇地看着我，但从从不问我任何问题。我也不能参加他们的任何谈话，因为他们都有很重的地方口音，是一种陌生的很难懂的方言。他们互相之间谈的都是当地的一些事情，我对此一无所知。所以我和他们任何人都没交上朋友。就连草场上的牛都很害羞，并对我存有戒心。我想，在那个偏僻的地方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过像我这样的陌生人。读了几天埃斯库勒斯和色诺芬以后，我感到非常的厌烦。（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63，雷音译）

最后的结果是在那一个月里杨宪益看的鬼故事和惊险小说反倒比应该读的正经书还要多！

波德莱尔晚年去布鲁塞尔时，因为那里的街道“没有橱窗”而感到“气愤”；狄更斯在外出旅游时也常常抱怨没有“热闹的街道”。如果和他们相比，杨宪益因为在拉莫纳隐居的一个月中找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而感到“厌烦”就毫不奇怪了。

杨宪益的英文导师爱得蒙德·布伦顿可谓是他的知音，布伦顿在与杨接触过几次以后对他说：“你不大用功，如果你用功的话，可以得二等。一等你得不了，因为你的基础不如英国学生。如果不用功，那就得三等四等，但不至于不及格。”（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0日，北京百万庄）杨宪益走了一条“不用功”的路。抗日宣传、编杂志、组织中国学会的活动、搞翻译、写剧本（除了剧本《平型关》外杨宪益还以吴王夫差和西施的故事为题材写了名为《夜色笼罩着紫色的大地》的三幕英文历史剧，该剧由他的昔日同学李亚福担任出品人，聘请了伦敦著名女演员迪安娜温妮德（Diana Wynyard）扮演女主角，后因欧战爆发而没有公演）……还有一谈恋爱，这一切占去了他的大部分时间。结果，他的希腊拉丁文考的是三

等，而英文更惨，考了个四等！杨宪益自嘲地称自己是“稀有动物”，因为每年考四等的学生

只有一两个，比一等生还要少。尽管如此，他还是在 1940 年得到了牛津大学的荣誉学士学位，他的名字登上了当年的《泰晤士报》。在英国，名字能以荣誉学士的资格登上全国最大的报纸《泰晤士报》是一种殊荣。

29. 格莱迪丝·玛格丽特·泰勒

在牛津的中国学会的活动中杨宪益注意到一个漂亮的英国姑娘：高挑的个子，一头美丽的金发和一双碧兰的大眼睛，杨宪益的同班好友伯纳德梅勒（Bernard Mellor）介绍他们认识了。后来杨宪益在上法国文学课时又与这个姑娘相遇，他们在同一间教室里听课。她叫格莱迪丝·玛格丽特·泰勒（Gladys Margaret Tayler），1937 年入学，是牛津大学希拉里学院（Hilary）的新生（该学院专收女生）。格莱迪丝和别的英国女孩不太一样，她对中国特别感兴趣，热心地参加一切中国学会的活动，对日本侵略中国这件事她显得额外愤怒和不能容忍，接触后杨宪益才了解到原来这位美丽的英国姑娘是在中国出生的！她就是后来成为杨宪益的终生伴侣和事业上最亲密的同道的戴乃迭。戴乃迭（格莱迪丝·泰勒的中文名字）1919 年 1 月 19 日出生在北京，她的部分童年是在北京度过的，尽管七岁以后她回到了英国，但童年的记忆永远留在了心坎上，遥远的北京成了她的一个美丽的梦。这一点在戴乃迭晚年写的未完成的《自传》中强烈地反映了出来。她写道：“在我记忆中，那时候的北京城绚丽多彩，令人眼花缭乱的店铺招牌；富丽堂皇的婚丧队伍；正月十五的花灯；清明节的风筝；还有厂甸活色生香的春节庙会，在那儿花上几个铜子就能买到绝妙的玩具……”在戴乃迭笔下，北京真是一座世界上最美丽最吸引人的古城，相比之下，她对伦敦的初次印象却很糟，认为伦敦“灰暗、阴沉”，和北京的“五颜六色、鲜活生动”根本没法比（戴乃迭：《我觉得我有两个祖国》，李晶译，上海文汇读书周报 2002 年 6 月 7 日）。1937 年秋戴乃迭进牛津大学时，正值日本大肆侵略中国，战火蔓延到了中国的大部分土地上。英国人的正义感加上她的中国情愫使格莱迪丝成了一个坚定的抗日派。她帮助杨宪益组织中国学会的会议并担任他的秘书，记录下每次会议的重要内容。这些活动使杨宪益有机会和这位可爱的姑娘进一步接触。杨宪益感到格莱迪丝身上有一种东西吸引着他，他惊讶地发现在她高贵的外貌下却潜藏着一颗质朴的心。她清新脱俗，完全没有上流社会中女孩常见的虚荣心和凡事考虑利害得失的世俗气习。在杨宪益看来这样的素质“在中国上层的小姐们之中很少见”。格莱迪丝出身在一个有献身精神的传教士家庭，她父亲约翰·伯纳德·泰勒（中文名字叫戴乐仁）先生和母亲塞林娜为了传播基督教文化年纪轻轻就双双来到了遥远的中国，在天津的英国教会学校新学书院和北京的燕京大学教了十几年书后泰勒先生居然放弃了大学教授的丰厚待遇和舒适的生活条件，和几个年青的理想主义同道一起跑到中国最贫穷落后的甘肃省山丹县去帮助那里的穷人。他们发起了一个被称为“工合运动”的社会主义改良运动，收容了许多无家可归的孤儿，免费对他们进行初步的教育，然后再教给他们各种谋生的技艺和本领。老泰勒在那里一呆就是十年（后来几年他在兰州从事工合运动并在大学教书），住着土窑洞，吃着窝窝头，有时一整天都没有饭吃，只抓一把花生来果腹。后来又有一些志愿者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如印度的青年医生柯棣华和新西兰人路易·艾黎（艾黎后来因“工合运动”成了中国的知名人物，而那些更早的工合运动的发起人

却被人们忘记了)。老泰勒的社会主义理想、他对中国的一往情深以及他身体力行的献身精神都对格莱迪丝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可能正是这一切促使她终于决定放弃了法国文学专业,选择了中国文学作为她终生的事业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她是牛津大学第一个取得中国文学荣誉学位的毕业生)。而杨宪益也在导师的建议下放弃了法国文学专业改学英国文学。自此这一对异国青年的学业选择为他们日后中西合璧的翻译合作奠定了基础。他们之间的爱情是逐渐产生的。那时,杨宪益、梅勒和格莱迪丝经常在一起玩,伯纳德·梅勒正热烈地追求着格莱迪丝。他发现,当他邀请格莱迪丝出去游玩时,如果也邀请“尊敬的杨”一块儿参加,格莱迪丝就会乐意接受他的邀请。于是,牛津的小河和附近的小酒馆常有他们“三人行”的影子。杨宪益也悄悄地爱着她。而周围所有的人都认为格莱迪丝是梅勒的女友。然而大大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格莱迪丝竟喜欢“那个中国人”!当笔者在1994年4月采访已是满头白发的戴乃迭时曾问到她为什么不选择梅勒却选择了杨宪益,她简短而直截地说“我不喜欢那个人”,“我觉得宪益聪明,有意思,是一个靠得住的人。”过了一会儿她又补充说“并没有什么深刻的理由,(觉得他)聪明,就这些。”(戴乃迭访谈,,1994年4月23日,北京百万庄)。在另外一次谈话中,戴乃迭谈到当年两个追求者的对比时,她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宪益要好玩的多”!(“好玩”这个词在杨宪益家是使用率很高且含义很丰富的一个词,这个词在本书以后各节还可能多次出现)戴乃迭此处的“好玩”包含了吸引力、幽默感、有意思、活力、魅力等多种含义。作为一个西方文化背景的姑娘,格莱迪丝真是独具慧眼,她发现了这个中国青年人精神气质中最不同凡响之处并且深深欣赏这一点。渐渐地她被这个又聪明又淘气小事不计较但办起大事却举重若轻的中国小伙子深深吸引住了,她愿意跟着这个人走到天涯海角。梅勒得知格莱迪丝的决定后非常伤心,一个人偷偷地哭了许多次。作为杨宪益在牛津大学最好的朋友之一,梅勒从此回避与他们见面。1940年杨宪益在牛津大学宿舍中开了一个早餐 Party 宣布与格莱迪丝订婚的消息,许多英国同学都来了,他给梅勒也发了邀请,但梅勒没有到场。他们之间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才恢复联系。1983年和1984年杨宪益和戴乃迭回到牛津访问时在伦敦见到了阔别四十多年的伯纳德·梅勒,这时他们都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

30. 两个伤心的妈妈

杨宪益和格莱迪丝恋爱并准备结婚的消息对他们的妈妈来说真是晴天霹雳!远在天津的徐燕若夫人立即病倒了。杨宪益在1939年底写了一封长信给大妹杨敏如,让她做做妈妈的工作。信中介绍了格莱迪丝的许多优点,事隔五十多年后杨敏如还记得他在信上说格莱迪丝“朴素”,“不虚荣”,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她有中国的小姐们没有的美德”。在北京燕京大学念书的杨敏如立即赶回天津安慰母亲。母亲则哭成了一团。徐燕若夫人感到天都要塌下来了!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女儿要嫁给外姓人,儿子才是自己的。一个女人年青时要随着丈夫,老了就跟儿子过,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今自己唯一的儿子要娶一个外国女人做媳妇,她这个婆婆可怎么当啊!作为母亲,她更为爱子担心:那个外国媳妇会一辈子对儿子好吗?但她知道,任性的儿子决定了的事情是无可挽回的。思来想去,她最后忍痛作了一个决定:跟大女儿杨敏如过一辈子(她真的这么做了。尽管后来她对乃迭非常好,但仍然一直住在大女儿家)。

格莱迪丝的母亲塞林娜得知女儿在和杨宪益谈恋爱,心中非常忧虑。她明确

表示反对他们俩来往。杨宪益在自传中说：

格莱迪丝的母亲塞林娜起先不愿意她在假期花太多时间和我在一起。当得知我也去了巴黎时，她甚至要格莱迪丝中断在巴黎的假期，立即回到伦敦。当她知道格莱迪丝决定跟我一块儿回到中国并跟我结婚时，曾悲观地预言这场婚姻决不会超过四年。（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79-80, 雷音译）

阻力越大，爱情越坚固。这似乎是一条规律。当笔者于五十多年以后（1994年）采访杨宪益时曾问过他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下这么大的决心选择一个外国姑娘为终身伴侣，“格莱迪丝那么吸引你吗？”杨宪益说：

一个年青的男人喜欢一个年青的女人，大概都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面貌吸引我，从男人的角度这是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性情，彼此谈得来。那个时候我总觉得跟中国女孩子谈话的内容比较幼稚。西方人看的东西多，谈话的内容比较合适。谈政治也好，谈文化也好，合拍的地方更多一点。……另外，一个中国人在英国当然接触的英国女人比中国女人要多的多，也就更习惯一点。（1994年4月23日谈话）

杨宪益有两句诗描写自己的生存状况：“卅载辛苦真译匠，半生漂泊假洋人”。“假洋人”在这里有多层含意，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指他的西方文化背景。“半生的漂泊”使他这个黑发黄肤的东方人浸染上了西方的人文精神，所以他与一个西方姑娘在精神上非但没有距离，反而十分投合。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但为了安慰妈妈，也为了表示对双方父母的尊重，杨宪益和戴乃迭决定先在英国订婚，待回到中国以后（戴乃迭的父亲一直在中国，母亲塞林娜回英国一段时间后又到了中国）得到父母的同意再结婚。

31. 初译《离骚》

杨宪益这个“译匠”的翻译生涯是从牛津开始的（中学期间他试译过古希腊女诗人萨福的诗和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诗，但都是英译中而不是中译英）。这个24岁的“初生牛犊”的胆子真是大，他的处女译作竟然是难度极高的楚辞名作《离骚》！

南朝人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说：

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诗人之后，奋飞词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中说：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正如上述两位大学者所述，楚辞《离骚》是中国古典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首诗长达三百七十四行，其雄奇瑰丽的意象和沉郁愤激的思绪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遭到小人陷害被楚王疏远报国之志无法实现之后，诗人屈原的悲愤竟爆发出那么大的能量，化为了这首千古流传的“奇文”。诗中的“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和“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句子成了当代中国老幼皆知的名言。

杨宪益在少年时代就接触了这首诗。12岁时他的老师魏汝舟先生带他去天津大罗天（“大罗天”是天津的游园地，清朝逊帝溥仪被冯玉祥从故宫赶出来后曾住在天津大罗天）买了一些线装旧书，其中有一本《楚辞》。回家后杨宪益就捧着这本书不放，很快他就熟读并背下了书中最重要的长诗—《离骚》。随着年龄的

增长，杨宪益对《离骚》的理解和喜爱也越来越深。上中学后他买到了一本由福建人林文庆翻译的中英文对照本《离骚》，仔细念完这个英译本后他发现诗译的比较死板，还有许多错译的地方，从那时起他就动过自己也来翻译《离骚》的念头。（杨宪益访谈，2001年6月26日，北京小金丝胡同）。2001年6月下旬笔者专门为《离骚》的翻译访问了杨宪益，杨宪益说他在牛津翻译《离骚》纯粹是为了“好玩”（又是一个“好玩”！），是出于兴趣所至。当时他读了很多英国十八世纪诗人的诗，特别

是Dryden和Pope的诗，他感到屈原的《离骚》和英国十八世纪的这种英雄偶句体诗的形式有相像之处，于是他就模仿Dryden和Pope的风格一口气把《离骚》翻译出来了。访谈中杨宪益说他之所以翻译《离骚》是为了向牛津的老师、诗人布伦顿表示中国也有悠久的文学传统，还说他当时年纪轻，想向老师“显摆”一下自己。

尽管杨宪益谈起这个问题时显得轻描淡写，实际上他对自己的处女译作是很在乎的。24岁的杨宪益第一次翻译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就选择了这首连本国人都难于理解的古诗巨著《离骚》，显示了他的起点之高和胆略之大。他成功了！他的译作大气磅礴而又流畅，略带夸张和嘲弄的口气。这是因为他同意胡适的意见，认为这首诗不是战国末期屈原的作品，而是数世纪后西汉淮南王刘安借屈原之名写的伪作。他在自传中说：

这首诗据说是由中国的第一位著名诗人、公元前四世纪战国时期的传奇人物屈原写的，我却一直认为它是一首伪作。它的真正作者是几世纪后汉代的淮南王刘安。这种情形就象莪相的诗，按照推测是一位古代盖尔人诗人所写，实际上却是18世纪的诗人麦克佛菝冒充的。我用英文的英雄偶句体来翻译《离骚》，为了好玩我模仿了Dryden的风格，对此我很得意。……后来，在解放后的50年代初我把这首译诗交给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了。当著名的汉学家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看到这首诗时大吃一惊，他发表了如下幽默的评论：这首《离骚》的诗体翻译与原作在精神上的相似程度就象一个巧克力的复活节彩蛋和一个煎蛋饼的相似程度一样。大卫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俩都认为他的评论很有趣。但不管怎么说我至今仍认为著名诗歌《离骚》是一首伪作，我用略带嘲弄地模仿英雄风格的文体来翻译它是恰当的。（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77，雷音译）

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尽管这个观点和主流的学术观点有很大的分歧，尽管大多数欧洲汉学家对他用英国十八世纪的诗体来翻译中国战国时期（杨宪益认为是西汉时期）的古典诗歌感到不以为然。问题不在于你同不同意他的观点，也不在于这种观点的对与错，而在于观点背后自由的学术空气以及一个“初生牛犊”敢于表达自己独特观点的虎虎生气。

正如杨宪益所说，《离骚》的翻译是他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翻译的“第一次”尝试和努力，这次尝试证明了他的实力。不仅如此，他感到自己大有潜力可挖。因为翻译这首难度极高的古诗他虽然用了一些心力，但并没有吃力之感。相反，他甚至是在一种胜任愉快的心情中完成这一在别人看来是“非常艰巨”的工作的。如今，这首译诗作为他青春时代的一个永久的纪念品屹立在欧洲各大学的图书馆书架上。

32. 家境败落

自杨宪益1934年出国以来，六年中家里源源不断地给他寄钱，除学费和日

常的生活费以外每逢圣诞节和过年（春节）母亲还另寄过节费用。因此，杨宪益在国外除自己过着较高水准的生活外，还时时接济别的留学生（如翻译家曹未风从英伦回国时就是杨宪益借给他路费），抗战后他为办报还自己出钱买油印机，并向驻巴黎的共产党办的抗日报纸捐过钱。每逢假期杨宪益都有足够的钱到欧洲各地去旅游（除到过西欧大部分国家外，1939年暑假他还决定去苏联旅游，后因局势紧张而放弃）。可是这样的日子到1940年就结束了。那一年杨宪益收到母亲的一封信，信中告诉他家里的经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后家中无法再寄钱给他了。杨宪益花钱一向大手大脚，他早已经花完了存在银行里的几百镑英镑，正等着家里给他寄回国的路费呢！可现在他却一下子断了经济来源！其实，自从杨宪益五岁那年他父亲去世时起他们家就处在“坐吃山空”的境地中。尽管父亲杨毓璋留下了上百万的家产和好几处不动产，但是杨毓璋的遗孀们（太太和杨宪益的生母）都不懂得银行业务，却继续过着高水准的生活，家中还养着一大堆仆人。而杨家的财产托管人、杨宪益的七叔竟然背地里偷偷地拿他家的钱作投机生意，赔掉了二十多万。杨宪益出国六年用掉了家中十多万块钱（由于国币不断贬值，兑换英镑的比率不断上涨，最后涨到20多元国币换一英镑，连“娘”也抱怨杨宪益花掉了家里太多的钱，她说杨宪益留学花的钱“打个金人都够了”）。他的大姐“公主”的两次婚姻也用掉家里十多万块钱。最后的打击来自日本人。1937年日本占领天津后，所有银行的存款都得兑换成伪币，每兑换一元钱都要贬值二三成甚至更多，而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时这些伪币几乎全部成了一堆废纸！这样一来，杨宪益的家彻底败落了。

但是在1940年杨宪益回国时“娘”在天津银行还存有相当数量的存款，如果杨宪益不是直接从英国到了重庆（他原来是想到更偏远的云南昆明的）而是回到天津老家的话，他还能得到一笔属于他的遗产和家中的其他财物。但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实行这一方案。他要回到的是仍在我们自己手中的国土，尽管那是他根本没有去过的贫穷落后的内地；他坚决不回已经沦陷的天津，尽管那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老家。

1940年的最后几个月杨宪益是靠卖书过日子的。英国书店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卖出去的书如果顾客不需要了，还可以半价甚至三分之二的价钱收回来。杨宪益就把很多书都卖了。他靠卖书的钱居然能维持最后这半年的生活，回国时还带回来七八箱子的书，可见他买书数量之大。

回国的路费是向格莱迪丝的母亲借的。采访中杨宪益说：

以前我帮助过好几个同学，那个时候别人比我穷的多的多，都是我借钱给别人，后来我自己落到借钱的日子了。我回来的路费都没有了，结果她（格莱迪丝）妈妈很不错，借给我们路费。到了重庆以后还是我妈妈把借的路费还给她妈妈了。

（1994年4月23日采访）

杨宪益在英文自传中说起当时自己的处境：突然之间我发现自己陷入了经济窘困之中，年青的纨绔子一夜之间变成了贫民。（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90，雷音译）

尽管格莱迪丝的妈妈借给他们钱，解决了回国的路费问题，但是从此杨宪益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挥霍浪费过日子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从此，他真的过起了穷教书匠的日子（在内地最穷的时候他只能靠酱油拌面条过日子）。他是怎么跨过这一巨大变化的呢？家庭经济的巨变固然使他的日常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对他的心理状态有什么影响？他是否感到个人命运的剧变呢（他这个杨家的唯一继承人从没有拿到过家里一分钱的遗产，反倒是他的几个妹

妹由于他父亲的第三任太太和“娘”打官司每人得到过一万块大洋的嫁妆)?当笔者问起他这些问题时,杨宪益居然回答说“没有,没什么”。有人说杨宪益生来就是大少爷,他当然从不知道钱财的来之不易,所以失去钱财也不会感到痛苦。这种说法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是纵观杨宪益的一生,他在许多重要关头对个人的得失所抱的态度却是一般人所不能及的(关于这一点笔者以后还会论及)。当然,从1940年的国内外大形势来看,欧战已经爆发,全世界都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动荡之中。在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国家的一切。国土沦丧,千百万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在这个巨大的变化面前,个人和家庭经济生活的变化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33. 去向抉择

面临毕业的杨宪益去向何处?他有几个选择,其中最主要的是两个:一个是去美国继续深造古典希腊文和拉丁文,另一个是去西南联大教书。

1940年春,一位哈佛大学的美国学者巴列特(Barlett)突然给杨宪益写了一封信(巴列特曾在牛津大学当过研究生,认识杨宪益),信中说如果杨宪益想继续学习古典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话,哈佛大学可以邀请他担任中文助教,他可以一面深造希腊拉丁文,一面工作,生活费学费都不用发愁,将来毕业以后就留在哈佛大学教书(杨宪益访谈,1994年4月23日,北京百万庄)。这可真是一个天外的“福音”!对于所有的中国留学生来说到美国第一流的哈佛大学去深造自己的专业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何况对方提出了如此优惠的条件!可是杨宪益回信谢绝了巴列特的好意。杨宪益在英文自传中说:

尽管我在英国已经呆了六年而且很少给国内的妈妈和妹妹们写信,但我始终知道牛津毕业后我会回到中国。我从没有怀疑过这一点,即使中日战争使一切都变了样儿。我知道我回不了天津的老家了,因为它已经被日本占领。但我还是必须回到中国——那就意味着我必须到内地去,到我从未去过的地方,直到中国从她的侵略者手中获得自由的那一天。(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88,雷音译)

这是杨宪益给自己选定的路,他的确从没有怀疑过这一点。在收到巴列特信的同时杨宪益又收到了来自中国西南边陲昆明的一封信,那是西南联大给他的聘书,聘请杨宪益担任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教授。原来,是两个从未谋面的著名学者兼教授向西南联大校方推荐了杨宪益。一位是作家沈从文,当时他在中文系教书,是杨宪益小妹妹杨苡的老师。他从杨苡口中知道了杨宪益其人其事,对他很感兴趣。另一位就是吴宓。吴宓和杨宪益的渊源是杨宪益的同窗好友兼诗友廉士聪搭的桥(《吴宓日记》(36-38年)中记有廉士聪与吴宓的往来)。廉士聪特地向吴宓推荐杨宪益并把杨在高中时期写的五言古体诗拿给吴宓看,吴宓看过这位年仅十七、八岁的高中生的诗后大为欣赏,他对杨宪益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西南联大正准备开一门教授古希腊和拉丁文语言和文学的课,想聘请这方面的人材,沈从文和吴宓教授就热心地向校方推荐了杨宪益。杨宪益接到聘书后立刻决定:接受邀请,到西南联大去(后来杨宪益没能去成西南联大,他与沈、吴这两位好心的前辈学者也未见面。直到几十年后杨宪益与沈从文在北京政协会议上才互相认识,而与吴宓先生却最终缘铿一面!)

作出到中国内地去的决定以后,对自己的爱人格莱迪丝能否吃得了那里的苦杨宪益心中并不是没有怀疑。采访中杨宪益说:我们那个时候也有难的选择。我觉得中国那个时候的情况是很艰苦的,什么也没有。尤其是我们不是回到天津或

者上海那样的环境里去，也不是回到北京那样的环境里去。我们是到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内地去。听说那都是很糟糕很落后的地方。我就怀疑乃迭（格莱迪丝的中文名字）受不受得了这个物质的苦。我是预备回国去受苦的。我就是怀疑她受受不了了。所以我跟她谈过好几次。我说你看怎么样？跟我订婚结婚，我们不是一块儿到美国去，而是到中国去，而且是到中国的内地去，这个你能不能？后来她说我还是坚决地跟你一块儿到中国去。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决定一块儿走。（杨宪益访问谈话，1994年4月23日，北京）

格莱迪丝的抉择的确比杨宪益要困难得多。杨宪益毕竟是回到自己的祖国去。内地再苦，也是自己的国土，还有千千万万的同胞与自己同甘共苦；而格莱迪丝却不同，她是要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贫穷落后的地方，与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和民族融合在一起，何况那个国家还正在打仗！她周围的人对她的抉择都大为惊奇，她的母亲更是明确表示对她的订婚持保留态度。唯有她的父亲——老泰勒先生祝福她，愿他们两人永远相爱。但是泰勒先生仍然告诫自己的女儿：先别忙着结婚。一定要在中国的内地住上几年。如果觉得可以受得了那个苦，再结婚（杨敏如访谈，1994年6月11日，北京三里河）。

在格莱迪丝申请去中国的护照签证时，有一段签证官员与她的对话，这段对话说明了格莱迪丝当时的举动在一般人心目中是多么“出格”：官员问：为什么一个年仅21岁芳龄的年青姑娘要在那个时候（战争时期）去中国？

“我要去中国一所大学任教，我有合约”。

“您不能相信中国人的合约。我们将不得不由政府出钱将您带回。”“我跟一个中国人订了婚，我们将一起去。”“您要是发现他早已有两位太太了呢？那我们将不得不由政府出钱将您带回。”“我父亲在中国，为工业合作组织工作。”“那就另当别论了。”那个官员听说了这个情况才算放下心来，给她签了证。（戴乃迭：《我觉得我有两个祖国》，李晶译，《上海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6月7日）

格莱迪丝决定和杨宪益一起回到战火纷飞的中国不仅显示了她对杨宪益的坚如铁石的爱情，也显示了她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一片赤诚之心。杨宪益内心感到极大的安慰，大大缓解了他离别牛津的惆怅。他在自传中说：

战争的气氛已笼罩了天空，英国完全变了，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安静、和平的地方。……那时牛津大学已经变的认不出来了。我所有的大学的老朋友都走了。许多人参军当了少尉，从此断了音讯，成了战争的第一批伤亡者。……我结束了最后的考试，该离别了。我离开牛津没有任何的遗憾，因为有格莱迪丝陪我一起回去。（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87, 91, 雷音译）

四十多年之后，对于当年的抉择，戴乃迭用精辟简洁的语言概括说：“不同于过去许多的外国友人，我来中国不是为了革命，也不是为了学习中国的经验，而是出于我对宪益的爱，我自己儿时在北京的美好回忆，以及我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仰慕之情。”（戴乃迭：《我觉得我有两个祖国》，李晶译，上海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6月7日）

34. 回国

经过匆忙的行李收拾终于踏上了回国的路。由于德国潜艇控制了地中海，杨宪益不得不改变原先经由地中海、红海回国的打算。回国的路线仍是穿越大西洋抵达加拿大，再从加拿大境内横穿北美大陆，最后从加拿大西海岸城市温哥华上船穿越太平洋抵达香港。这条路线与杨宪益去英国的路线基本相同。然而岁月流

逝，毕竟经过了整整六年的时间，世界的形势与个人的心情都已大变了。1934年出国时欧洲还在一片“莺歌燕舞”之中，如今，巴黎已被德军占领，英国也不再是世外桃源，就在回国的船上，杨宪益听到了德军轰炸伦敦的消息。由于战时物资紧张，英国政府限制出国人员携带的货币。每人最多只能带 25 个英镑。因此杨宪益与格莱迪丝两人只带着 50 英镑作穿越地球的旅行。一路上他们只吃最简单的食物，从不敢买任何纪念品，也无心观赏加拿大美丽的风光，一心只想快一些回“家”。为了省钱，杨宪益在穿越太平洋时买了个三等舱，舱位靠近轮机室，四、五个人住一间，又热又闷，这种待遇与他六年前去英国留学时大为不同，与他 1935 年环绕地中海旅游时住一等舱的条件更是天渊之别了。格莱迪丝买了二等舱，因为（在当时）一位英国女士是不能坐三等舱旅行的。轮船公司不会把三等舱位的船票售给一个白种人。（杨宪益：《白虎星照命》）这次旅行充满了潜在的危险。第一个险关是渡横大西洋，德国潜艇随时随地都可能击沉杨宪益乘坐的客轮。第二个险关在渡过太平洋时发生：日本海军拦截了杨宪益乘坐的加拿大客轮，并上船审问、逮捕了客轮上的中国旅客。杨宪益在自传中叙述了这一遭遇：

当船靠近日本时出了一件事。我们被一艘日本海军船拦截了。那个时候尽管太平洋战争还没爆发，但日本似乎已经在西太平洋称霸了。一些日本海军官员和一些卫兵登上了船。所有三等舱的中国旅客都被叫到甲板上受审。一位中国旅客——我记不起他的姓名，他戴着厚厚的眼镜，看起来象一个教授——显得特别紧张害怕，日本官员吼叫着向他提问，他结结巴巴地回答。接着他被那些卫兵带走了，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他。那时我很为他的命运担心。轮到我被提审时，日本官员冷冷地问我的职业是什么，我回答说“学生”，然后他问我的目的地，我说“香港”，他又问我的地址是什么，我答“中国银行”。他似乎满意于我的回答并让我通过了。如果他再问的详细些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因为当时我们在香港没有真实地址和任何保证人。（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95，雷音译）

前面已经叙述过杨宪益曾在牛津给日军驻天津总部寄过他编的抗日杂志，所以这一场敌对双方面对面的遭遇就格外惊险。手无寸铁随时都有可能束手就擒的杨宪益到这时才感到自己当时的举动是多么莽撞愚蠢。采访中杨宪益说“我心里想他要是看到这个杂志就完蛋了”。好在日本人没怎么在意杨宪益两年前的举动，盘查他的日军似乎也没看过这份抗日的英文杂志，一场虚惊就这么过去了。

船在上海靠岸时旅客们被允许上岸住宿。杨宪益刚上岸就意外地见到了他家的老仆人和管家潘福。他在自传中写道：

我们上岸时天已经黑了。突然一个高大粗壮的汉子出现在旅客出口处。他以封建的礼节向我行屈膝礼并喊道：“少爷！”我认出他是家里的老仆人及管家潘福。格莱迪丝大吃一惊，这一突然出现的神奇现象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95，雷音译）

忠实的潘福是受“娘”的派遣来迎接杨宪益的。尽管杨宪益的生母徐燕若和他的大妹杨敏如已经去重庆等候他了，“娘”却幻想能把杨宪益接回天津老家。这是她为争夺“儿子”所做的最后一次努力。但是她失败了。愚昧无知的“娘”不懂得杨宪益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回到“沦陷区”去的。从此，杨宪益与“娘”再也没见过面。1952 年杨宪益和格莱迪丝调到北京时曾专门绕道去天津老家，那是他自 1934 年离家去国后第一次回天津，“娘”已经去世两年了。

这次旅行的最后一个难关是经济危机。抵达香港以后他们住在九龙一家英国人经营的清洁的小旅馆里，那时他们已经是囊空如洗，无法再进行下一步的旅程了。两人分别给天津、重庆和兰州的家发电报要钱，但等了半个多月却一无回音。

杨宪益在自传中说：

我们处在窘境之中。但我们告诉旅店老板说我们走时再结总账，所以我们每天吃、喝都在旅馆里，只签账单不付现款。当我们外出逛街时从不去商店买东西也不去饭馆、咖啡馆和电影院。所以没有人知道我们有多穷。在香港我们没有任何朋友，也没有亲戚可借钱给我们。我们想如果情况越来越坏，我们可以卖掉所有的行李来付旅馆的账。（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96，雷音译）

当时，日本已经占领了越南的海防，切断了从越南到中国昆明的铁路线，杨宪益原先从海防坐火车去昆明的计划落空了。如果从小路步行或骑马进入中国内地则会遇到土匪抢劫，很不安全，且费日旷久。最后一条路是乘飞机到重庆，再从重庆去昆明。尽管这条路线也有危险，飞机可能会受到日本战机的拦截甚至被击中（就在杨宪益抵达重庆后不几天，中国航空公司的“重庆号”民航班机在由重庆飞往昆明途中即被日机击落，美籍驾驶员和6名乘客均遇难），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路了。可是买机票的钱哪儿来呢？正当他们走头无路时，格莱迪丝突然想起她父亲信中曾提到过一个老朋友，说如果需要时他们可以找这个香港的老朋友帮忙。幸运的是格莱迪丝的小本上记着这个老朋友的姓名和地址，他就是在宋庆龄驻香港办事处工作的陈翰笙先生。他们俩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找到了陈翰笙先生，没想到陈先生一下子解决了他们所有的困难。杨宪益在采访中说：

陈翰笙老先生很好，他看到这两个年轻人稀里糊涂，想到重庆去，可是不知道重庆（家里）的地址，也没有钱了，主要的是没有钱了。陈翰笙说不要紧，我这儿暂时先借给你吧。他帮我们付了旅馆的钱，又给我们买了飞机票，我给他开了一个借条。这样算是救了我们命了！（杨宪益谈话，1994年4月23日，北京）

最难能可贵的是，陈翰笙先生帮了杨宪益和格莱迪丝那么大忙，事后他却毫不在意。五十年代杨宪益在北京一次会议上与陈翰笙先生重逢时提起这件往事，并再次向他表示谢意时，陈翰笙先生竟把这件事忘的一干二净。他帮助过的人太多了！文革后期耄耋之年的陈翰笙先生曾在家中教过上百个学生学习英语，分文不收。就是这样一个高风亮节的老人，文革中当他的妻子去世时，他正在“隔离审查”，押送他来与妻子诀别的人（此人是陈翰笙单位的司机，还是个党员）竟然当着他的面从他妻子遗体的手上拔下了她的戒指，这个人不顾陈翰笙的抗议，公然把戒指放进了自己的口袋中（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人性的善与恶竟有那么大的差别！

杨宪益和格莱迪丝终于在一个月夜乘上了晃悠悠的小飞机，几经颠簸和周折，最后飞抵了重庆，回到了饱经战火摧残的祖国。时间是1940年中秋节前夕。

第三章重庆时期(1940-1946)

35. 与母亲重逢

终于到家了！尽管是在战时，尽管是在相对落后的内地，但毕竟回到了自己的国土，回到了母亲身边。一切都那么新奇：大江环绕的山城，山上节次鳞比的房屋，粗大茂密的竹林以及用竹子制成的交通工具滑竿……

在重庆中国银行同人的帮助下杨宪益很快找到了母亲的住处——市郊小龙坎的一栋别墅，那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的别墅，罗全家住在二楼，杨宪益的母亲

租下了一楼。当时他的母亲徐燕若正望眼欲穿地等着儿子的到来呢。见到了阔别六年的儿子，徐燕若真是喜不自禁；她拉着杨宪益的手问长问短，她看不够自己的爱子，也有说不完的家常话，看到儿子平平安安地回到了自己身边，她觉得真是老天有眼，保佑了自己的爱子。本来，对于将要到来的与未来洋儿媳的见面，徐燕若怀着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复杂心情，直到这次真的见到了格莱迪丝，她才放下了心。尽管儿媳“是个洋人”这一点她感到不称心，但既然是儿子喜欢的人，她也接受了这个儿媳妇。现在她只想一家人拢在一起，再也不要分离了。杨宪益在自传中说：“后来她（母亲）对格莱迪丝非常好。”格莱迪丝在半个多世纪之后谈起她的婆婆时则说：“她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非常愿意帮助别人。”一家人终于团圆了。可是杨宪益不能在重庆久留，他和格莱迪丝要立即启程去昆明，西南联大正等着他去上课呢。徐燕若一听杨宪益要走，而且是去更遥远更落后也更危险的边疆城市昆明，她的心就扑腾扑腾直跳：好不容易才与儿子见面，他又要走，而且是去十分危险的昆明，万一他被日本飞机炸死了她可怎么活呀？

当时，正是日本飞机肆意横行轰炸中国后方城市的时候，仅仅1940年5、6两个月日本就轰炸过重庆19次之多（见《中华民国实录》2452页，吉林人民出版社）。单单5月27日那一天日军就出动了160余架飞机轰炸重庆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和复旦大学，当时的复旦大学教务长孙寒冰和许多学生、职员均当场遇难（见《中华民国实录》2452页，吉林人民出版社）。昆明也是日本轰炸的重点目标之一。由于昆明地处边疆，又没有任何空中防卫系统，一旦日本飞机来袭更是无处躲藏，只有白白等着挨炸。就在杨宪益回到重庆前后，日本飞机在1940年9月30日、10月7日和10月26日不到两个月中三次轰炸昆明，炸毁无数民房，死伤了无数平民（见《20世纪中国全纪录》，北岳文艺出版社）。想来想去，徐燕若坚决不让杨宪益去昆明。杨宪益一提到走，她就哭了，哭的很伤心。采访中杨宪益说：“我妈妈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我就心软了。”罗家伦也从楼上走下来说“中大有书，中大的书都没有丢，联大没有书哇”，劝说杨宪益不要去西南联大，而留在重庆的中央大学英语系。杨宪益在自传中说：

尽管我相信中央大学在学术圈的名誉不会太好，它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太密切，但是那儿也有一些很不错的教授。而且考虑到在那个战争年代中省与省之间的通讯联络很不方便，昆明的确显得十分遥远。在与母亲分别多年以后又要很快离开她，我心里有些过意不去。所以我被说服了，接受了中央大学的工作。（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101，雷音译）

这个决定是一个大转折，杨宪益因此痛失结识一批中国第一流学者的机会。如果说杨宪益一生有什么可后悔的事情，没有去西南联大可能算是其中之一。杨宪益在晚年谈起这件事时说：

这个（决定）对以后的生活都有影响。因为我要是去那儿（西南联大），我就搞希腊文拉丁文了。而且那个学校前身就是清华北大这么几个学校，我要是跟他们在一起，日本投降以后我就会到北京来了，就不会隔了很长时间才到北京来，也不会到国立编译馆，也许就不做翻译工作了。就是要做翻译工作情况可能也不同一些。（杨宪益访问谈话，1994年4月23日，北京）

2001年5月份在一次聊天中，杨宪益又谈起没去西南联大的事。他说“我要是去了西南联大，可能会和闻一多最要好。因为我和他性格相近，也喜欢诗。他去搞民主运动，我也会参加。说不定和他一样，给国民党特务打死了。”总之，杨宪益对于失约于西南联大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多次表示了遗憾和抱歉之情。以后数年，杨宪益辗转于川、黔两省各个大学之中，却从未提出回到西南联大去。

尽管他十分想去西南联大，但他的自尊心不允许他这样做。而西南联大外文系却诚心诚意地开了希腊拉丁文的课，等了杨宪益整整一年。杨宪益终于与西南联大失之交臂，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阴错阳差！

36. 中央大学柏溪分校

罗家伦让杨宪益去的不是位于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主校，而是位于嘉陵江上游方向一个村庄的分校，村庄名叫“柏溪”，离开重庆市七、八英里远。杨宪益被聘为英语系副教授，戴乃迭（格莱迪丝的中文名字）因为没有大学英国文学的学位（她得的是中文荣誉学位）只被聘为英语系讲师，尽管在实际上她的英文水平比英语系的教授都要高。

他们的新生活开始了！尽管柏溪完全是农村，尽管那里的条件很差，走的是泥泞的小路，住着草顶、泥墙的房子，但只要与心爱的人在一起，再苦的环境也是天堂。他们正年青，一切艰苦都不在话下。柏溪和重庆之间没有公路交通，每个周末他们都沿着嘉陵江畔步行四、五个小时回重庆小龙坎母亲的家，星期天下午再步行一、二十里路回学校，他们非但不觉得累，相反感到沿途风景充满野趣，行走起来兴致勃勃（杨宪益和戴乃迭热恋前后曾多次去英国北方湖区长途徒步旅行，他很喜欢这种运动）。戴乃迭在自传中提到了当时那种“空气里满是豆花和稻花的香气”的徒步旅行。作为一个外国人，戴乃迭对普通中国农民的观察有她特殊的角度。她说：“当地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尊严，又有幽默感。在我看来，中国农村的农民即使贫困、没文化，也总是一种古文明的后嗣。”（戴乃迭：《我觉得我有两个祖国》，李晶译，《上海读书周报》2002年6月7日）。戴乃迭的这种看法，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屡遭摧残破坏的今天，显得格外的深刻和沉痛。

他们是学校最年轻的教师（杨宪益那年25岁半，戴乃迭还不到22周岁），二人的行事风格也与中央大学其他老教师不一样，他们言语随便，对国内外大事都敢于直率表态，令同事们侧目。学生们非常喜欢这两个与他们年龄差不多的老师，他们经常在晚上到杨宪益和戴乃迭住的小屋里去拜访他们，请教问题、了解英国的情况，有时干脆就去聊天。然而，好景不长，很快杨宪益戴乃迭就和学校当局发生了矛盾。杨宪益在自传中说：

由于我们刚从英国回来，经常毫无禁忌地对学生谈论任何问题，因此被学校当局视为危险的自由主义分子。当时中国共产党在重庆有正式代表，还有一张共产党的报纸叫《新华日报》。由于官方的《中央日报》只发表官方的评论和消息，我决定再订阅一份共产党的报纸。我想从两方面来观察事物。这被学校当局视为异端行为，尽管他们公开并不说我做错了什么事。（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103，雷音译）

从英国回来的杨宪益不懂得为什么订阅一张公开发行的报纸会是过失行为。然而事情远没有结束，不久又发生了一件更严重的事：有些学生问戴乃迭对三青团是怎么看的？乃迭直率地说她从来都不喜欢这一类组织，因为他们使她想起了纳粹的盖世太保。她的话立即传到了学校当局的耳中。事态变的严重起来，这些话居然被认为是反对国民党政府！不久学校里传出了谣言，说戴乃迭可能是英国共产党的特务。因为除非有特殊的政治目的，否则一个英国的年轻女郎是决不会嫁给一个中国的穷知识分子的。这个谣言的风源来自于他们的顶头上司——英语系主任张沅长。张沅长留学美国，是罗家伦的内弟，他是坚定的国民党派，视共产党为洪水猛兽。如果仅仅是政治观点的不同，事态还不会发展的那么坏，但张沅

长却有个嗜好：偷窥和监视别人的行动。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发展了几个同“好”的学生盟友，指使他们专门侦查和告发别人。张沅长的长相“像只鼯鼠”，他的尖鼻子时时都在嗅着杨宪益和戴乃迭的一言一行，企图从中嗅出“共党”的气味。最后，他甚至乘着杨宪益和戴乃迭去上课的机会偷偷地跑去搜查他们的房间和抽屉！采访中杨宪益说：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是糊里糊涂的自由主义者，那个时候我觉得国民党当然是正统，是我们的政府，但是我们是在一个国共合作的时代，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我们对他们两方面都没有偏见。可是结果在罗家伦他们看起来这就大逆不道了，就监视我们，还搜查我们的东西，这种事情发生过好几次。（杨宪益访问谈话，1994年4月24日，北京）

这种异乎寻常的行为令这两个“口无遮拦却心无恶意”的年青人大大地愤怒了！的确，身在英伦六年的杨宪益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本来都没有什么成见。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主张“穷人翻身得解放”，国民党也主张“民族、民生、民权”这三民主义，二者有共同之处。何况现在两党正在合作抗日，共产党早已是公开合法的政党了，国民党当局怎么还如此防范、排挤和压迫其他党派呢？正是这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专制和独裁的做法把杨宪益进一步推到了共产党那一边。正好杨宪益的大妹夫罗沛霖主动提出带他去重庆新华日报办事处（罗在上海交大毕业后曾去过延安），他去了。在那里他见到了解放后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徐冰，徐冰对杨宪益鼓励了一番，希望他多做中西文化交流的工作，还建议杨翻译一点狄更斯的东西，说狄更斯是“有点进步思想”的作家。听说杨宪益有志于历史学，徐冰还为他写了两封推荐信，分别向左派历史学家邓初民和吕振羽推荐杨宪益。采访中笔者问杨宪益当时去新华日报办事处的动机是什么，他说：

一方面是好奇，另一方面是因为学校里的国共磨擦的压迫，就感觉到比较倾向共产党这一边。被他们逼的，逼的向左的方面靠拢了。当然共产党方面的宣传作的也比国民党好，好像年轻人都相信共产党是抗日的，国民党是不抗日的。当然在政治上蒋介石的确是更多的向日本人让步，共产党作为一个在野党就可以更号召群众起来抗日。两个党地位不一样。……那一年就是这样子给这些政治的东西搞的乌七八糟的。（杨宪益访问谈话，1994年4月24日，北京）

徐冰的两封推荐信又被“鼯鼠”偷看过了。“鼯鼠”找杨宪益谈话，装出一副老大哥的样子告诫杨宪益交友要“慎重”，但他的话里隐含着许多威胁的暗示（杨宪益：《白虎星照命》105页）。第二年夏天，尽管学校当局仍然给杨宪益发了聘书，却没有发给戴乃迭聘书，这意味着他们不能再在这里呆下去了。

就这样，杨宪益回国的第一年就遭遇到国内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空气，并且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的法西斯作风发生了正面的冲突。在杨宪益看来，各个政党都有平等的权力，公开竞争，人民才是裁判官，人民有权对他们作出自由的批评和取舍。但是，这种政治观点不仅独裁的国民党不容忍其存在，后来执政的共产党也不容许其存在，两个政党尽管互相打的你死我活，但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却是高度一致的。对这一点，晚年的杨宪益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在英文自传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文字：

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是按照苏联或者德国的模式组建的，他们都把自己挑选出的青年人组建成青年团，这些青年团员将来就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尽管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相互之间是敌人，但他们遵循的却是同一个模式。如果那些学生问格莱迪丝对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看法，她的回答也可能是同样的。她反对一切极权主义的强制纪律。（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 103，雷音译）

在极权主义统治下，一切持自由主义政治态度的人都没有容身之地。杨宪益和戴乃迭的一生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在四十年代被国民党当局怀疑为“共产党间谍”，被排挤出中央大学；到了六、七十年代又被共产党当局指控为“帝国主义间谍”，双双投入监狱四年之久。杨宪益在他的晚年大声疾呼地为人民争取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是积他一生的经验和政治智慧而行事的。

37, 翻译《阿Q正传》

鲁迅，是杨宪益最喜爱的当代中国作家。而《阿Q正传》和散文诗集《野草》在鲁迅作品中又是他的偏爱。于是他首先选择翻译这两部作品。在柏溪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杨宪益和戴乃迭在教书之余，开始了他们“合作翻译”的里程。尽管柏溪没有电，晚上只能点煤油灯，尽管有“鼯鼠”和少数学生特务的干扰，他们仍然干的很起劲。除了鲁迅，杨宪益也没忘记他的老朋友——晋代诗人陶渊明，同时他还尝试翻译艾青和田间的新诗。采访中杨宪益说：

头一年在重庆，我跟乃迭商量的，翻过一点东西。《阿Q正传》就是那一年翻译的，《野草》翻过几篇。陶渊明的诗也开始翻过一些，这个是跟乃迭合作的。当然，别的诗乃迭也有加工润色的地方。还有艾青的诗，我们是试验着翻的玩儿的。新诗我是不大欣赏不大相信，可我也试验着翻过艾青的《大堰河》，还翻过艾青的抗日诗，翻的比较多，有几十首。另外一个人就是田间。田间后来不行了，解放后他没写过什么像样的东西。不过在抗日的时候闻一多也称赞过他，说是像战鼓的声音。那个时候田间的那些标语口号式的诗对年青人感染力还是挺大的。

(1994年4月24日口述)

杨宪益一如既往，以游戏和审美的心态进行翻译工作，他同时涉猎几位时代不同、风格迥异的作家和诗人的作品，非但没有费力之感，反而游刃有余，轻松自如。《阿Q正传》、《野草》和《陶渊明诗选》在五十年代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可惜的是，他翻译的艾青和田间的新诗都没有保存下来，解放后没有出版。

38, 婚礼

原来，格莱迪丝的父亲主张她先不忙和杨宪益结婚，而是先在中国内地生活几年，如果她真能吃的了内地的苦，如果到那时她还爱着杨宪益，再和他结婚。老泰勒先生认为这样他们的婚姻才会长久维持下去。可事实上在柏溪那个小地方，条件那么差，不结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这个方案行不通。于是杨宪益的母亲开始为他们俩操办婚事。而杨宪益的大妹妹杨敏如和她的未婚夫罗沛霖也决定和哥嫂在同一日结婚，这一下可忙坏了徐燕若。她亲自为儿媳和女儿定做了两件绣满了龙凤图案的缎子旗袍，杨宪益和罗沛霖则穿中式长袍。尽管徐燕若想把儿女的婚事尽量办的像样一点，无奈家境早已今非昔比，加上正在战乱时期，只能一切从简。杨敏如讲了一个细节：结婚那天戴乃迭的头发居然是杨宪益给剪的，“剪的像狗啃的一样……可笑极了”，可见杨宪益和戴乃迭对衣着仪表的马虎态度。婚礼的日子是1941年2月16日，之所以选择这个日子是因为在冬天日本飞机来的不多，安全一些(杨敏如访谈，1994年6月11日，北京三里河)。格莱迪丝的父母也分别从兰州和成都来到重庆参加女儿的婚礼。证婚人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和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那时杨宪益和罗家伦的关系还没

有破裂)。各方面的亲戚朋友来了一百多人。宾客中值得一提的是一位英国人、牛津毕业生詹姆斯·贝特兰 (James Bertram)，他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作为记者深入到中国各个政党和阶层中。1937年他还到延安采访过毛泽东，至今毛泽东选集中还留下了一篇《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西安事变前后他正在张学良的东北军里，和张学良手下的少壮派军官是好朋友，因此他详细地了解这些少壮派军官是如何影响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他把这些材料写成了一本书《西安事变》，用的是大仲马写《三剑客》的笔法，十分引人入胜。杨宪益在英国时看过他写的这本书和另一本《人民战争》，这两本书是杨宪益看过的有关中国的报道中最喜欢的，使他了解了很多国内的情况。贝特兰在杨宪益的婚礼宴席上高声地唱起中国抗日歌曲《在松花江上》，事隔五十多年后杨宪益还清楚地记得他那“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的高亢的歌声(杨宪益访谈，1994年4月23日，北京百万庄)。

39. 君子不党

在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婚礼上有一个宾客叫杭立武，他当时是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副部长。杭立武之所以被邀请参加婚礼是戴乃迭父亲老泰勒先生的关系。老泰勒和杭立武都是英国庚子赔款基金会的理事，常在一起开会。杭立武二十年代末或三十年代初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留学，成为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拉斯基的学生，而泰勒先生恰好是拉斯基的老朋友，因为这双重的关系杭立武和泰勒先生很友好。在婚礼上认识了杨宪益和戴乃迭后，他格外关注和器重这两个年轻人，特别是杨宪益。他认为杨宪益出身名门世家，又在牛津受教育，是培养重用的苗子。他不只一次请杨宪益和戴乃迭吃饭，希望建立起留英学生的情谊。杨宪益印象最深的一次宴请在他婚礼后不久，同席的客人都是国民党高官：财政部长孔祥熙和夫人宋蔼龄，国防部长何应钦，还请了美国驻华大使和大使馆一秘。杨宪益在自传中说：我们俩是席中唯

一的没有官方身份的人。据杨敏如回忆，在杭立武另一次的宴请中他向杨宪益提到加入国民党的话题，杨宪益以“君子不党”这四个字回答了他。杨敏如说：

到重庆以后杭立武、初大告一些人请他们(杨宪益和戴乃迭)吃饭，吃饭时说加入国民党吧，他说“我不加入国民党”。这我都是知道的。回来后我问他那你怎么办？怎么说呢？“就说‘君子不党’，这是孔子的话，所以我不加入。”(1994年6月11日访谈)

40. 格莱迪丝的国籍问题

1941年暑假，格莱迪丝收到英国驻华大使馆的一份通知，通知说“鉴于欧战爆发，日本加入了轴心国，中国和西方大国成了盟国。…在这一新情况之下，如果格莱迪丝与一个‘敌国公民’结婚，她可以保留她的英国护照，但她嫁给了一个‘友邦公民’，所以她必须放弃她的英国护照，而代之以中国护照。”(杨宪益：《白虎星照命》112页，雷音译)

于是戴乃迭的护照被英国驻华使馆收回，同时她向中国国民党政府有关部门申请加入中国籍，可是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杨宪益在采访中回忆说：

那个时候她(戴乃迭)是想入中国籍的，我们也提出了申请。但是国民党的

机关也是官僚主义的，和现在一样。拖拖拖，没有发下来。……后来我们又研究，我说作为一个英国人也不一定要入中国籍，英国人总是英国人，你就是入了中国籍也是英国人，何必呢，那就还是做英国人算了。英国护照又比中国（护照）什么东西都好办一些。后来我们就决定她不入中国籍了。在那一年决定的。（1994年4月24日谈话，北京）

正如杨宪益所说，即使戴乃迭入了中国籍，在中国当局（无论是国民党当局还是共产党当局）的眼里她还是一个外国人，她的蓝眼睛高鼻子金头发永远不能变为黑眼睛平鼻子黑头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是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想法，这是千年历史沉淀下来的集体潜意识，即使开明善良如杨宪益的母亲徐燕若夫人也不能不受其影响。在中国，戴乃迭永远是一个“外人”。这种种族的偏见一旦与极权政治结合起来就产生了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压迫力。21岁的英国姑娘格莱迪丝没有想到她一旦决定与杨宪益结婚，决定嫁到中国来，就注定了她的宿命：她一辈子都要承受这一巨大的压力，她未来的孩子也将受到这个宿命阴影的笼罩，无论她持哪一国的护照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然而这个英国姑娘和这个中国年青人一起勇敢地踏上了这条充满了荆棘的人生路。

4.1. 贵阳师范学院

1941年上半年结束时中央大学没有给戴乃迭发下一学年的聘书，杨宪益也决定不干了。他们在柏溪的同事和邻居、年近七十的英语系老教授张士一先生好心地介绍杨宪益和戴乃迭到贵阳师范学院去教书。这是一所新成立的学院，不满27岁的杨宪益被聘为贵阳师院英语系系主任，22岁的戴乃迭被聘为英语系教授。

在那个年代，从重庆到贵阳没有任何公共交通，老百姓出门只能凭关系搭乘公家的运输工具，这种搭顺风车的人被称为“黄鱼”。杨宪益和戴乃迭就是当“黄鱼”搭乘了一辆邮局的大卡车，戴乃迭坐在司机旁边的“高级”座位上，杨宪益则坐在卡车后面，和货物、邮包们混在一起（在内地的几年，他们一直用这种方法穿梭于西南各省市之间），于1941年秋抵达贵阳。

杨宪益刚到师范学院的头一天就出事儿了：他们遭窃了。杨宪益说：

头一天早上到了，人家说到饭厅吃饭去，把屋子里头的东西一放，有打字机毯子行李一大堆，就放那儿。吃完中饭回来以后——因为我们门儿没锁，他们说出去得锁门，事前也没告诉我——回来以后打字机也不见了，毛毯也不见了，好多西装也不见了，从伦敦带回来的，都偷了。……后来人家说那个时候学生们都穷，大概是穷学生们偷的。偷了就偷了吧。这是头一个对贵阳师范学院的印象。（1994年4月24日谈话）

尽管到贵阳的第一天就碰到不愉快的事，但是总体来说杨宪益在贵阳师院的经历比在柏溪中央大学分校要愉快的多。在这里他们没有受到流言蜚语的干扰，也没有受到暗中监视和威胁。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里结识了一些学者，感受到了某种学术空气。在杨宪益看来，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比一个熟练的教书匠要强的多。在这些新同事中，给他印象最深、来往最密切的是中文系主任，扬州人尹石公教授。杨宪益和这个典型的中国学者的交往经过颇有些戏剧性：

中文系有两个老师，学问都不错。一个年轻的助教叫李稚甫，他父亲是清末知名学者李审言。年纪老的叫尹石公，已经六、七十岁了。他对四库全书的版本很在行，古文底子很不错。……一开头尹石公对我有一点戒备之心，觉得你们都

是留洋回来的，大概都是满口A B C D什么的。他好像总有点瞧不起我的样子。我知道他喜欢中国的古诗词，我就写了一篇《远游》，按照《离骚》的体裁，写怎么样子出国，怎么样子跑了很多地方，怎么样又回到故国。反正是摹仿《离骚》写了一首。我故意地拿给他看，他一看大为欣赏，他说没想到你洋学生还会作诗词，后来就变得跟我非常要好了。（杨宪益1994年4月24日谈话）

从此，尹石公对杨宪益刮目相看了。他经常把杨宪益和他的另一位老相识梁实秋相比，认为他们俩虽然都留学外洋，但中文底子都非常好，而且还会写古诗，他喜欢这样的年轻人，称赞杨和梁都是“绝顶聪明的年青人”（尽管梁实秋比杨宪益大十多岁）。尹石公老先生生性幽默，很爱说笑话，常常发一些大家想不到的妙论。杨宪益至今记得他拿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开玩笑的事：

有一次尹石公说，你们都谈什么莎士比亚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不过是万历年间的人。我们喜欢的诗词不是汉魏诗就是唐诗，宋以后的就不行。莎士比亚是汤显祖时代万历年间的人，怎么比的上汉唐诗人呢？（1994年4月24日口述）

对于尹石公这种维护祖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戴乃迭十分敬重。她在自传中写道：“在这样一个许多中国人都佩服西方的时期，我发现他对中国古文化的维护却是令人仰慕的。”（戴乃迭：《我觉得我有两个祖国》，李晶译，《上海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6月7日）尹石公带杨宪益进入了当地诗人的圈子，诗人有老有少，他们定期集会，边喝酒边作诗。由一个人起头，其他人合他的韵接着作，每个人轮一遍。杨宪益很快融入这个圈子中，他才思敏捷，诗来的快，很受诗人们赞赏。就是在这个圈子中他认识了另一个日后对他的生活起过作用的人——诗人兼学者卢前。杨宪益回忆说：

有一次从重庆来了一个贵客卢参政，卢前，他的号叫卢冀野。人也挺好玩儿的。从前是吴梅老先生的弟子，所以对于写词写散曲很内行。他是个江南才子，喜欢给人写字，也喜欢作诗，笔底也很快，所以他也参加进来。他是国民党的一个参政员，国民党有一个参政会，就跟今天的政协意思一样，没有实权。一个参政员跑到贵阳来跟这些老先生玩儿，大家觉得他是个人物，挺尊重他。在那个里头卢冀野就认识我了。他对我评价很高，因为我的诗比那些老先生来得快。那时我还不认识梁实秋，卢冀野常提到他，说他在北碚国立编译馆。……（1994年4月24日口述）

戴乃迭也参加了这些诗人的聚会。她敏感地注意到这些聚会是清一色男人的天下，“妻子们”被“严格地排除在外”，她成了参与其中的惟一的女性。她在自传中谈到了她的感受，并直率地批评“这些美食家们的文学夜会”“充满了浓厚的封建气息”。她认为在抗日战争中，这“完全是一种遁世行为”（戴乃迭英文自传：《我觉得我有两个祖国》，李晶译，上海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6月7日）。

尹石公在《贵阳日报》编了个文学副刊，起名《小雅》，借用《诗经·小雅》来影射和抒发诗人对“戎狄交侵，暴虐中国”的忧世之情。他邀请杨宪益和李稚甫共同参加编辑。杨宪益说“在那个《小雅》上我也发表了一些打油诗”。这是他自中学时代以来重续与诗歌姻缘的开端。国家不幸诗人幸。抗战期间杨宪益在贵阳诗情勃发，他的诗风也从少年时代的充满浪漫理想的五言诗向忧时讽世的七言打油诗转变。可惜的是这些诗像他的大多数古诗作品一样，都没有保留下来。

在贵阳这个偏远省城，国民党的统治不像在重庆那么恐怖，尽管师范学院院长王某每天上午十点钟都要召集全校师生唱一遍“国歌”，然后用他浓重的贵州口音念一遍“总理遗嘱”，整个仪式耗时15分钟，但是王某从不干涉教师和学生

的教学和日常生活。杨宪益在这种宽松自由的空气下，身心都得到了很好的滋养。他在自传中说：

从重庆到贵阳我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和另一个时代。再也没有政治阴谋和诬陷，只有中国古典文学，只有诗。我感到很轻松。（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 117，雷音译）

贵州的民风纯朴而好客，生活也很便宜。杨宪益和戴乃迭每人每月工资二百多块大洋，足够他们每月数次到饭馆去“打牙祭”。至今杨宪益还记得那个小饭馆鲜美的鸡汤，幽默的主人给他的饭馆起了一个不同凡响的名字——“培养正气”。杨宪益戴乃迭和他们的朋友在那里度过不少时光。在贵阳，杨宪益还充分领略了贵州有名的茅台酒，他多次提到他们的一次豪饮：尹石公、李稚甫和他们夫妇到花溪一个士绅朋友家作客，好客的主人捧出一罈藏了十多年的茅台酒。醇厚浓烈的美酒使他们一发而不可收，几个人居然把整整一大罈酒喝个精光！李稚甫因此醉倒在主人家中，第二天才回学院。

除了结识一些中国学者以外，他们还发现贵阳有许多西方人，这令戴乃迭又高兴又惊异。这些西方人都是志愿到中国来帮助抗日的年轻人，属于一个叫“支持者救护队”（Friends Ambulance Unit）的国际组织，专门向中国抗日前线运送医疗器械和药品。他们住在城外图云观，有美国人，英国人，还有瑞典人。杨宪益戴乃迭与其中的两对夫妇最要好，一对是青年人类学者、美国人约翰·文森特和他的妻子艾林·文森特（John and Irene Vincent），另一对是剑桥大学毕业生、英国人迈克尔·苏里文（Michael Sullivan，后来成为著名的中国美术史专家）和他的中国未婚妻陈宝环。这一批富于献身精神的青年人和杨宪益戴乃迭志趣相投，十分契合。他们在那时建立起来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他们的晚年。

在贵阳度过的短暂日子似乎是杨宪益戴乃迭的“新婚蜜月”。那时戴乃迭正值青春年华，她白里透红的俊俏的脸，她的金发碧眼和颀长的身姿，站在讲台上就像“一株临风而立的玉树”（渔歌子：《杨宪益老师和他的英国夫人》），引起无数人的赞美。她为什么要嫁给一个其貌不扬，毫无“洋气”，永远穿一身蓝布长袍的中国留学生，这个问题常常引起人们的议论。在同事和学生们眼中他们俩是捉摸不透而奇特的一对儿，总是引起别人的注目和猜测。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过的很愉快。

然而好景不长，1942年初戴乃迭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妈妈塞林娜从成都写信来，建议她去成都生产，那里的医院条件好一些，还建议他们两人到成都华西坝齐鲁大学去工作，塞林娜认识齐鲁大学校长，校长愿意聘请他们二人到齐鲁大学教书。他们接受了妈妈的意见。戴乃迭学期未完就先去成都待产，杨宪益把戴乃迭的课兼下来，一个人上两个人的课，每天工作五六个小时。1942年夏季学期结束时，他谢绝了学校的挽留，告别了那里的朋友，辞职离开了贵阳师范学院。

4.2. 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听到这个消息后，杨宪益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心情十分兴奋。他的直觉告诉他：这一下中国的胜利更快了。在过去四年的中日战争中，尽管英国人民真诚地同情支持中国，但英国政府却未动过一根毫毛来帮助中国。相反，他们在中日战争期间继续卖废铁给日本，使日本可以源源不断地制造武器。杨宪益对此感到愤愤不平。在天津

租界长大的杨宪益，从小目睹日、英、法等外国列强在中国的土地上享受特权，作威作福，他对所有侵略中国的大国都没有好感。现在，这些争夺利益的大国互相打起来了，杨宪益产生了一丝幸灾乐祸的心情：

秋冬之间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对英美宣战了。偷袭了珍珠港，然后在香港又把两个英国战斗主力舰打沉了。（日本）很威风。国民党官方就希望太平洋战争爆发，一爆发他们（美英）就可以帮我们打日本了。……我呢，从我的角度对英美没有什么同情心，我每天看报纸看的挺热闹的。一会儿打沉了这个军舰，一会儿打沉了那个军舰，又偷袭了珍珠港，在太平洋上闹的一塌糊涂，我看的挺高兴的，她（乃迭）是挺着急的，因为她哥哥那个时候先在香港，后来到新加坡。我当时看到日本一会儿占领这个地方一会儿又占领那个地方，把新加坡（英殖民地）的名字改成叫昭南，我说这个名字不错，比新加坡更像中国名字……反正那个时候日本不是打我们了，是打英美了，所以我看报纸看的挺过瘾。（1994年4月24日谈话）

这段谈话真实地反映了杨宪益当时的心情。正如一位香港记者对杨宪益的评价：他的一颗心，只为中国跳动。

4.3. 奔波在川黔路上

杨宪益在自传中说：“在战争年代，来往穿梭于中国西南各个城市当然不是我们计划中的事。但是，好像我们命该如此似的。”从1941年到1943年，杨宪益和戴乃迭当“黄鱼”搭乘着各种各样的卡车先后七、八次来往于西南各省市，历尽了风险。其中最受罪的一次是他离开贵阳去成都的路上。第一段路（贵阳-重庆）他搭乘“支持者救护队”的卡车，由于已经有两位乘客坐在司机旁边，杨宪益只好站在卡车上，一路上他饱受大雨的浇淋，他在自传中写道：

年轻的外国司机开车十分莽撞，路上又突然下了暴风雨。滂沱大雨猛浇到我头上像子弹打在身上一样。我被浇得浑身湿透，幸好还没被甩出车外。当我们到了下一个路边小店时雨停了，我灌下了一满碗中国烈性白酒，才使我的身子暖和一点儿。（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 122，雷音译）

第二段路（重庆-成都）杨宪益的运气仍然不佳，他搭乘的邮车司机座旁的位子也有人坐了，他不得不又爬上了后面的车厢，高据于邮包之上。为了避免在车子开动时从车上摔下来，杨宪益干脆用绳子把自己和邮包绑在一起。这一次他吸取前面的教训，背对行驶的方向，以免风吹雨打。但是更坏的事情发生了。醉醺醺的司机在晨雾朦胧中开快车压死了一个国民党士兵。在一片“停车！不停车就开枪了！”的叫喊声中，肇事司机非但不停车反而更疯狂地向前行驶，一些士兵举起步枪，瞄准了脸向后方高坐在卡车顶上的杨宪益，那真是千钧一发之间！杨宪益在自传中说：

因为我坐在邮包的最上面，而且面朝着他们，很自然成了他们的靶子。他们也许无法使卡车停下来，却完全能打中我。好在卡车司机终于明白他跑不掉了，赶在开枪以前停下了车。（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 123，雷音译）

为了解决矛盾，杨宪益被当作人质扣在当地五、六个小时，直到司机拿了钱赔偿，事情才了结。

回忆这些冒险故事，杨宪益显得很轻松，还经常用幽默的笔法嘲笑自己的狼狈相，使读者油然而生会心的微笑。笔者曾问过杨宪益和戴乃迭：抗战期间他们从英国牛津那样的环境一下子到了柏溪贵阳这些地方，感觉过困难吗？杨宪益的

回答是“一点困难也没有”，“很自然地又回来了”。戴乃迭的回答是“我感到不困难，（因为）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工作”。想了一会儿，戴乃迭又补充说：“我有时候想英国菜，想吃沙拉什么的，在重庆很难……没有……”说着她笑了。（杨宪益、戴乃迭访谈，1994年4月26日，北京百万庄）实际上，他们何尝不深深感到牛津和中国后方的差距？戴乃迭曾经用“一脚踏回到中世纪”来形容她初到四川的感受。

4.4. 儿子出生

1942年8月初，杨宪益和戴乃迭的第一个孩子在成都出生了。是个男孩。杨宪益给他起名“焯”。在《词源》中，“焯”与“晔”同，是光辉灿烂和明盛美茂的意思。杨宪益给儿子起这个名字，可以想见他对儿子的前程抱怎样的希冀。那时，杨宪益和戴乃迭初为人父母，毫无带孩子的经验，塞林娜又去印度教书了，没有亲人帮助他们；加上齐鲁大学换了新校长，原来的聘约作废，他们不得不去另一个较偏远的大学——光华大学去教书。这一切意外使他们应接不暇，日子过的十分凌乱而狼狈：

孩子刚生下来，她（乃迭）妈妈又离开成都了，小孩子我们自己带。我们没有带孩子的经验，头一个孩子，又是个男孩子，挺爱哭，挺爱闹，带起来挺费劲，总得抱。结果生活搞的挺狼狈。…在光华大学请了一个男佣人帮忙，因为那个地方比较偏，找不到一个女的，结果就找了一个男佣人对付事儿。他有一个条件，他说小孩儿尿布挺脏，不洗尿布，结果我每天还得自己洗尿布。…加上光华教师的工资又比华西坝低，奶粉又贵——那时中国还没有奶粉，有美国奶粉，她的奶不够——我们又用一个佣人，生活就比较紧一点，不像前一年在贵阳悠哉游哉了。（1994年4月26日谈话）

尽管学校当局对他们挺好，但是在同事中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生活就变得更加乏味。于是，他们决定再回到重庆去，那儿有杨宪益的妈妈在，可以帮助照顾一下孩子。

4.5. 艰难的日子

1943年初，杨宪益和戴乃迭带着几个月的儿子杨焯一路颠簸回到了重庆。杨宪益应一位牛津时的同学朱延丰的邀请，去刚成立的“中印学会”当研究员，戴乃迭则在中央图书馆当研究编辑。这是他们回国后第一次不在一个单位工作。由于两个单位都没有房子，他们暂时住在南开中学宿舍，和杨宪益的母亲、妹妹住在一起。

由于中国和印度同是世界上两大文明古国，佛教又把两国的文化联系在一起，杨宪益很乐意从事中印文化的研究工作。但是，当他到了“中印学会”以后，却发现那儿的情形不尽如意，他的顶头上司朱延丰十分无能：

朱延丰虽然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是陈寅恪教出来的学生，按道理应该是很了不起的，其实朱延丰这个人不行，他作为庚款留学生到牛津大学去读一个B.Litt学位，就是跟钱钟书一样两年毕业的学位，他吭哧吭哧搞了三年，学位都没有拿到，这么一个笨人。我到中印学会去以后，朱延丰忙着盖房子，又忙着找戴传贤（季陶）要钱，就忙这些事儿。……我一个星期去两天，给他们翻一本

印度音乐的书。我去了以后就发现这个朱延丰除了无能、没有主见也没有学问以外，还有一样不好，就是有个老婆非常凶。两个人整天打架。不但是文打文骂，而且还武打。他是挨打的。我正在那儿翻译印度音乐的书或者正看一本书的时候——我的名义是研究员——乒乒乓乓那边就打起来了。有一两次是一个盘子飞过来了，“咣当”从我头顶上就飞过去了。他那位夫人还喜欢砸东西，盘子碗乱扔。所以我说这不是个地方，得离开了。（杨宪益访问谈话，1994年4月26日，北京）

杨宪益的情形如此，戴乃迭就更差了。自从生了儿子杨焯以后，她的身体就没有复原。带孩子那么辛苦，还要上班。她与杨宪益行事风格不同，无论干什么都极其认真。杨宪益坦承他教书从未备过课，想到哪儿讲到哪儿，十分轻松。而戴乃迭则每课必备，费时超过杨宪益几倍。到重庆后她又患了疟疾，连续发烧腹泻，吃了大量奎宁，身体很受损害。更使她苦恼的是，与婆婆住在一起她感到不自由。徐燕若夫人有一整套带孩子的经验，她看不惯儿媳的“自由哺乳法”，老少两代人本来就有代沟，加上东西文化间的差异，更使乃迭经常感到无所措手足。杨敏如回忆说：

她（乃迭）像她母亲一样，不会管孩子，就让他自己活着，不懂。她不会抱孩子，就老把孩子这么夹着，嘴里叼个烟卷，可怜哪，那小孩像一个小狗一样，是趴着睡觉的。（1994年6月20日谈话）

看到自己头一个孙子被这么带，徐燕若心疼的不得了。但对儿媳又不好直说，婆媳之间总有点嘀咕。杨敏如举了个例子：

在重庆时，生活很苦，乃迭天天到图书馆工作，回来还要做小衣服，小衣服是给她儿子的。等她去上班了，我母亲就会说：“你看看，这叫什么活儿？”我说“别动，别动，你不能动。”“我不动，不动，我就给你看看。”但是一会儿，她就把它都拆了。“乃迭呀，不是这么做的，这么做不对，我给你缝好了。”（可）人家不愿意，我母亲叫人没办法，她都是好心。要是你自己的妈，你就都懂了，一个儿媳妇，她受不了这个。……（杨敏如访谈，1994年6月21日）

1943年上半年就这样过去了。那半年是戴乃迭到中国后艰难的日子。经过这一段婆媳的共同生活，老少两代人都明白，她们之间只有保持一段距离，才可以永远相处的好。

4.6. 北碚国立编译馆

1943年秋，杨宪益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他就是杨宪益在贵阳认识的参政员、胖诗人卢冀野。卢冀野的拜访改变了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后半生。

卢前，字冀野，南京人。南京国立东南大学高材生。吴梅（癯安）先生的得意弟子，是大名鼎鼎的《新月社》主将梁实秋的朋友。卢冀野这个人，不仅心肠热，而且眼光准。自从在贵阳认识杨宪益以后，他认定杨宪益是个人才，多次向他的朋友梁实秋推荐杨宪益，这次他又多方打听找到了杨宪益的住处。当时，梁实秋是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负责人。过去翻译委员会主要从事英译中的工作，梁实秋想开辟一个新领域，把中国的经典著作翻译成英文介绍到西方，而杨宪益夫妇正是实现这一计划的理想人才。于是，一项历史性的决定作出了：聘请杨宪益和戴乃迭到位于重庆北碚的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开辟中译英的领域。对于这项决定，胖诗人卢冀野功不可没。当时的杨宪益正在为到何处去发愁呢。采访中他说：

中印学会那个地方不是真正做学问的，没有人，也没有书。朱廷丰那个人也没什么本事，我就想离开了，就想回大学去了。我那个时候回大学最顺理成章的是应该回到西南联大去，可是我有点不大好意思。人家聘了我，给我留了一年的课，结果我没去，有点对不起，不大好意思到西南联大去。我母亲是不愿意我到昆明去的，希望我留在重庆，可是的确没什么地方好去，正在那个时候忽然在贵阳认识的卢前，卢冀野跑来了。胖子，年轻胖子，挺好玩的人……（杨宪益访问谈话，1994年4月26日，北京）

卢冀野向杨宪益传达了梁实秋的诚意和邀请，这个消息来的正好，使杨宪益和戴乃迭摆脱了困境，杨宪益在自传中说：

我们从来都不喜欢重庆的氛围，对乃迭来说，一直在婆婆屋檐底下过活也不太舒服。……我们听说这个叫北碚的郊区小镇就在重庆附近，嘉陵江北岸，那儿附近有温泉，空气又新鲜，不象雾蒙蒙的重庆。北碚还是一个靠山的风景区，有一座庙，树林很多。镇上有电灯自来水，相当先进，不象我们从前教书的村庄柏溪。在所有这一切优点之上的是，我们喜欢这个胖诗人卢前，对他的朋友、知名学者梁实秋我们也听到过许多好评。我们觉得和这些人做伴会很愉快。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 129，雷音译）

卢冀野带杨宪益去见了梁实秋，两人谈得很好。在初步了解杨宪益的情况和学术兴趣（历史）以后，梁实秋建议杨宪益翻译一本“大书”。他说《史记》有一部分外国已经翻译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还没人翻过，就翻《资治通鉴》吧。杨宪益接受了这个建议，决定集数年时间攻《通鉴》。梁实秋给杨宪益最高的学术职位——编纂，相当于大学教授或研究员，工资待遇则与梁实秋一样。戴乃迭被聘为特约编审，相当于副教授，但享受与编纂同样的工资。她的工作是协助杨宪益翻译《通鉴》。

一个人事业上的成功要靠天时、地利、人和。杨宪益戴乃迭进国立编译馆，开辟把中国经典著作翻译成英文的事业就应了这六个字。尽管是在抗战时期，但是梁实秋却在后方利用国立编译馆这块阵地，集中一批优秀人才，进行长远的中西文化双向交流的工作，堪称具有战略的眼光。在梁实秋、卢冀野这样的有识之士的策划和识拔之下，杨宪益和戴乃迭找到了他们终生从事的事业（解放后他们在外文局的工作是编译馆开创的事业的继续）。从此他们安心地在国立编译馆一直呆到解放以后，直到共产党政府宣布撤消这个机构为止。杨宪益至今仍怀念国立编译馆时期的工作与生活，特别怀念它藏书丰富的图书馆。编译馆被撤消后大量人才流失，珍贵的图书也流散了。一提起这些杨宪益总是止不住他的惋惜之情。

4.7. 北碚文化村的文化人

世界上的事情有时很奇怪，按理说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华民族灾难最深重的时期，文化教育事业必然受到严重摧残。但也有例外，如抗战时的西南联大，就是中国现代教育少有的繁荣之地。杨宪益也是如此。他一生中生活安定，精神舒畅，作品也最多的时期之一，恰恰是在抗战中的北碚时期，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那时的北碚真是一个繁华的文化村。许多文化机构都疏散到那里。许多文化界名人聚集在一起。除了陈可忠先生领导的国立编译馆以外（陈是编译馆馆长），还有一个国立礼乐馆，胖诗人卢前就在那儿任编纂（他还是编译馆的兼任编纂）。还有余上沅先生任校长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还有一个中山文化教育馆，翦伯赞

先生当时在那儿工作。还有叶浅予戴爱莲所在的歌剧学校；还有培养电影专业人员的“电化教育训练班”，著名导演史东山、郑君里，音乐家盛家伦、摄影家冯四知都在那儿当教师。在嘉陵江对岸还有从上海迁来的复旦大学。……一时真是风云际会，人才荟萃。

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下、与一些真正的文化人和艺术家为伴，杨宪益感到愉悦和舒畅。梁实秋和卢冀野把杨宪益一家安排在毗邻编译馆的国立礼乐馆的宿舍。这是一栋二层的木头小楼，样子颇像电视剧《围城》中的木楼。楼下是礼乐馆的办公室，楼上是宿舍。老舍就住在这栋小楼附近的一栋洋房里。杨宪益与另外两个杨姓的老音乐家为邻。他们是杨荫浏先生和杨仲子先生。杨宪益一家搬进去以后，杨仲子先生给小楼起了个名字叫“三杨楼”，取“三羊开泰”之意。几十年后梁实秋还在一篇纪念卢冀野的散文中专门提到过这个“三杨楼”。而杨宪益在半个世纪以后仍能栩栩如生的描绘他在北碚时期的朋友，使后人领略到前辈文化人的风采：

杨仲子和杨荫浏都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抗战的时候到北碚的。我跟杨荫浏最熟，跟杨仲子也不错。杨仲子资格很老，那个时候六十多岁。他有一个瑞士夫人，也是老太太了。杨仲子人很温和，很有修养，人很好，他对中国音乐和西洋音乐两方面都懂一些。

杨荫浏比他（杨仲子）在音乐方面更好一些。他是基督教会一个老太太把他带大的，五十多岁。杨荫浏是无锡人，跟钱钟书一样。很多名人都是无锡人。杨荫浏年轻的时候在无锡就认识瞎子阿炳，阿炳教过他吹笛子拉二胡，还学过琵琶。阿炳后来被人知道是杨荫浏把他提出来的。后来教会又送杨荫浏出国留学，学了西洋音乐。所以他中国音乐西洋音乐两方面都不错。

杨荫浏黑黑的，干巴巴的，像个印度人，但是身体很好，年轻时踢过足球，据说踢的很不错，参加过比赛。平常不穿西装，只穿一个旧式的背心长袍子，像从前的师爷，他的西装也是很蹩脚的，邋里邋塌的一个人。电视剧《瞎子阿炳》里的杨荫浏一点也不像他。他喜欢下围棋，有时候从早到晚都下，中饭也不吃，晚饭也不吃。我家里头用了一个保姆，做点饭就给他送去，他一边下围棋一边端着个饭碗在那儿凑合着吃面，或者吃蛋炒饭，就稀里糊涂的乱吃，还在那儿下。有时候他从早上九十点钟开始一直下到晚上九十点钟。他还养了一只猫。很好玩的一个人。（1994年4月26日谈话）

那时候，这个像印度人模样的杨荫浏先生是杨宪益最好的朋友和师长。杨荫浏那时正在写《中国音乐史》，他希望杨宪益日后能把这本书翻译成英文。在杨荫浏的影响下，杨宪益居然在工作之余研究起中国音乐史来，他写了多篇关于隋唐音乐的考据文章，受到杨荫浏的热情鼓励和赞扬。这些文章后来收在《零墨新笺》中，可惜，那本《中国音乐史》杨宪益一直没有抽出时间翻译成英文。

至于胖诗人卢冀野，梁实秋在散文《记卢冀野》中对他有唯妙唯肖的描写：“他体肥，臃肿膨亨，走不了几步路就气咻咻然，年纪轻轻就蓄了稀疏可数的几根短须。人皆称之为胖子，他不以为忤，总是哼哼两声作鹭鸶笑。

“他性诙谐，一肚皮笑话，荤素皆备，关于他下巴颏上的几根骚羊胡子就有十个八个，不知他是怎么搜集来的。他爱吐痰，关于吐痰的又有十个八个。

“他的衣履从来是不整齐的。平日是一袭皱褶的长袍，项下钮扣忘记扣起乃是常事。破鞋破袜上面蒙着一层灰土。看他那样子，活像是江湖上卖卜看相一流的人士。”（梁实秋：《梁实秋散文》第三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有着这样一个外貌的人，却是个江南才子，写的一手漂亮的诗词和曲子。卢冀野为人热心而爽

直，城府不深。他对杨宪益的帮助，不仅是介绍他进了国立编译馆，使杨宪益和戴乃迭在生活无虞之中安心进行中译英的工作；而且他还在其他方面提携鼓励杨宪益。杨宪益写的中西交通史方面的考据文章，就是卢冀野帮助联系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连书名《零墨新笺》都是卢起的。

对于卢冀野喜欢做官的个性特点，梁实秋和杨宪益都谈起过。但两人的评论区别很大。梁实秋在说到卢冀野连“保长”这样的小官都当的很起劲时评论说“他就是这样的天真”。杨宪益虽然承认卢冀野为人天真，但却明言卢有“官迷”的“毛病”，他说：

卢冀野这个人有一些毛病，想做官。所以那个时候做了国民党的参政员。解放以后也想在南京当官，没有成功。他的关系挺多，又去找过周恩来，希望周恩来推荐他，又找过董必武，他过去在汪精卫做汉奸以前还跟汪精卫拉过关系。反正这个人很活跃，愿意到处拉关系，这一点不大好。他除了有点官迷以外是很好的人。我跟他很要好。（1994年4月26日谈话）

杨宪益还举了个例子说明卢冀野的天真和糊涂二者兼有的性格：解放初期他不辨风向，居然约请一个在当地“民愤很大”的保长和杨宪益一起去饭馆吃饭。饭后不久那个保长就在“镇反”运动中给“镇压”了。（杨宪益访谈，2001年9月6日，北京小金丝胡同）

对于他在编译馆最亲密的同事兼上级的梁实秋，杨宪益在自传中写道：

他才华横溢，文思敏捷，然而对学术工作有点漫不经心。他在十天之内翻完一部莎士比亚的剧本后，就把手稿丢在一边，再不去读它。认识他的时候，我们之间从来不谈文学。他也不喜欢谈政治和时事。原因是过去他与著名作家鲁迅有过争论，鲁迅对他的放任主义的生活态度批评的很激烈。他把许多时间都浪费在与国民党官员的周旋上，大多数晚上都在打麻将，或者是请客喝酒。尽管他屋子里总是高朋满座，我却很少去那儿。我不喜欢他的某些朋友。而且，你永远无法和他进行任何严肃的谈话。（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 132，雷音译）

杨宪益和梁实秋共事三年多，住的又很近，但始终没有成为朋友，原因在杨宪益一方。

在采访中他回忆说：

梁实秋有一点洋派的大少爷的味道，人不刻薄，稀里糊涂挺大方的一个人。可是他那个人政治上也有点稀里糊涂。我虽然和梁实秋相处的也很好，他对我也很好，可是我对他有一点偏见。一个是政治方面的，就是我小的时候很佩服鲁迅的东西，鲁迅骂梁实秋的文章我都看过，所以我对梁实秋有点偏见。另外一方面他总是跟什么正中书店的老板那些人来往，我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讨厌国民党了，对国民党政客都很讨厌，梁实秋来往的人中有很多这方面的人。这也是我跟梁实秋不怎么太密切的原因。（1994年4月26日谈话）

由于以上的原因，杨宪益跟梁实秋的关系，始终没有超出同事的范围。但是梁实秋的确对杨宪益很厚待，他不仅给他最高的工资待遇，在工作中也从干预杨宪益。他在抗战胜利后离开编译馆翻译委员会时，还推荐杨宪益接替他任翻译委员会主任。

48. 诗人梁宗岱

杨宪益和戴乃迭到北培以后，复旦大学校长章益先生邀请他们到复旦作兼职教授，由此杨宪益认识了正在复旦教书的梁宗岱（1903-1983）教授。

杨宪益在中学时代就看到过当时年仅24岁的梁宗岱翻译的《水仙辞》，非常欣赏它。这是法国后期象征派诗歌大师保罗·瓦雷里（Paul Valéry）的代表作，这首长诗以希腊神话那希瑟斯（Narcissus，希腊美少年，因爱恋自己水中的影子憔悴而死，死后化为水仙）的故事为题材。由于与瓦雷里的亲密友谊，梁宗岱得以亲聆瓦雷里对《水仙辞》的讲解，对这首诗有特殊深刻的理解。他的译诗深刻准确，文采斐然，一时轰动文坛。梁宗岱是杨宪益心仪已久的学者和诗人，他们二人一见如故，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梁宗岱长杨宪益十一岁，但他的经历却与杨宪益相似。他在21岁至28岁（1924-1931）留学法国和德国达七年之久。他是学文学的。与

那些只为学位而奋斗的留学生相反，梁宗岱专注于理解和吸取法德文学的精髓，并不在乎有没有学位（这一点与史学大师陈寅恪相似）。不少正钻牛角尖的中国留学生惊讶的发现，什么学位也没有的梁宗岱居然在法国的一流文学刊物《欧洲》、《欧洲评论》中发表了不少法文诗！无独有偶，梁宗岱也把陶渊明介绍给了法国人，他译成法文的《陶潜诗选》得到大文豪罗曼·罗兰的高度赞赏。（甘少苏：《宗岱和我》，重庆出版社）。共同的留学经历，共同的文学爱好，更重要的是二人精神深处的相契使杨宪益和梁宗岱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杨宪益在自传中说：

平时，他每隔一天晚饭后总是到我们的宿舍来，我们谈起在牛津和巴黎留学的日子，一边喝着烈性白酒，一边谈论法国诗歌和文学。（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133，雷音译）

杨宪益在自传和口述回忆中都提到过他错把煤油当成白酒给梁宗岱喝的故事。壮年时期的梁宗岱（1943年他刚好40岁）在喝了一大碗煤油以后，居然安然无恙，真是奇迹！其实梁宗岱在喝第一口“酒”时就感到味道不对，可朋友的盛情难却（杨宪益说特地给他喝自酿的“桂元酒”），他毫不犹豫一口气地喝完了它。从这件小事看出梁宗岱为人的可爱及对朋友的真诚。杨宪益饶有兴趣地回忆起他的一些轶事，使生龙活虎的梁宗岱跃然纸上：

梁宗岱这位朋友是个非常好玩的一个人。他身体很好，很做了一些别人不做的事情。大概有点诗人性格。跟同事也是，有的人他看的起的，就很要好，有的人就打架，甚至于动手。他养了一只山羊，自己挤羊奶。有一天他跟人打架，打完架以后那只山羊不知跑哪儿去了。他爬过了一座山，把山羊背到肩膀上抬回来了。几十斤的山羊，活的，就抬回来了。一个教授做这种事大家都觉得很奇怪的。

他还有许多浪漫蒂克的故事。他跟他那个教务主任——复旦当时的一位教务主任，也是一个教授，他跟那个教授的夫人发生恋爱了，结果就跟教务主任打起来了。就像京戏《狮子楼》那样，从桌子上头打到桌子底下，把那个教务主任狠揍了一顿。因为他的学问的确是好，很多人也很喜欢他，所以虽然他有这些事儿，结果复旦也没有对他怎么样……（1994年5月6日口述）

杨宪益看人有个不成文的法则，只要他说这个人“好玩”，就说明他喜欢这个人。他不喜欢古板不苟言笑的“君子”，宁愿与鲁莽而天真的“流氓”交朋友。在自传的另一处杨宪益曾总结性的评论曹操说：“我喜欢他的个性，因为他爱好诗歌、女人和酒。”这句话可看作他知人论世的又一个“标竿”。因此，他特别喜欢梁宗岱就毫不奇怪了。

梁宗岱在后半生遭遇坎坷，受尽苦难。刚解放时他被人诬告成恶霸地主，判了无期徒刑，关进监狱近三年。文化大革命中他曾屡遭毒打，一次头部被打穿一个大洞，浑身成了血人；另一次批斗他的人手段更加毒辣。他们把装满石头的抽

雇用铁丝吊在他的头颈上，让他双手反举，腰弯成九十度，然后用脚踢那个沉重的装满了石头的抽屉。铁丝深深地坎进了梁宗岱的脖颈，割破了他的颈部主动脉，血流不止。批斗后他足足躺了两天两夜，鼻孔里只有一丝微弱的呼吸。用这样残酷手段迫害批斗他的居然是他的“同事”、英文系的一些青年教师。（甘少苏：《宗岱和我》，重庆出版社）

1979年外国文学学会在广州开会，经过劫难的杨宪益和梁宗岱在会上重逢。梁宗岱已经变了一个人。再也看不见那个浑身豪气身强体壮的梁宗岱了！朋友相见时他第一次听见吴宓去世的消息（吴辞世于1978年），这个硬汉子哭了。他一个人走到墙边，大声地呜呜哭起来，声音很响，哭的很厉害，所有的人都听的见。哭完了以后，他重新回到朋友们谈话的圈子中。这是杨宪益最后一次见到他。（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6日，北京百万庄）

49. 翻译《资治通鉴》

从1944年到1946年之间，杨宪益在国立编译馆的主要工作是翻译宋朝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这部史书长达二百九十四卷，从战国到五代（公元前403-公元959），跨度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历经十六个朝代的编年史，可谓煌煌巨著。由于小时候的古文底子，翻译这部史书对杨宪益来说并不显得非常困难。相反，他仍然轻松自如地干着这件在旁人看来难度极高的工作。但是，对于这部“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於后世”的史书，杨宪益的热情远不如《离骚》。他仅仅把这项工作当成一件必须完成的“差事儿”。馆里每个月给他的工作定量他往往三天就能完成，余下的时间他就干别的去了。三年下来，他译完了从战国到西汉的约三十五卷。遗憾的是，以后时局变化，杨宪益的注意力转向实际政治和其他方面。解放以后，杨宪益忙于译鲁迅，译史记，译《红楼梦》，忙于各种各样的运动和会议，无暇顾及其它。再也没有一个领导有梁实秋那样的眼光，没有人提起这部《资治通鉴》。于是，这份一尺高的手稿静静地躺在杨宪益的书柜里整整三十多年。八十年代，一位澳大利亚友人对手稿有兴趣，杨宪益索性把全部手稿送给了那位友人！以下是笔者采访时听说他把自己数年的劳动心血无偿送给别人后与杨宪益的对话：问：那你几年的劳动就白费了。

杨：这种事很多。

问：那么大的一件事你翻了一半就……

杨：无所谓。

问：《资治通鉴》可是了不起的！

杨：也有这么高一摞呢（用手比划，大概有一尺高）。

问：可不！你现在把手稿也给人家了？杨先生是个慷慨大方的人，是不是？自己的劳动……

杨：堪培拉大学有一个教授，他翻了东汉王莽的两卷，所以我说我前面的一段你拿去参考好了。

问：杨先生你……

杨：无所谓。

问：“无所谓”！？

杨：如果要真正搞也不是太困难的。我们是43年到编译馆，从44年开始吧，44、45、46，47年以后几乎就没有动了。如果一直搞到解放也差不多了。

问：就是，你就能完成了！

杨：不行，一辈子的生活就是这样子，一下子给这个打断了，一下子给那个打断了。（1994年4月26日采访）

梁实秋在八年抗战中只翻译了一部莎士比亚的戏剧。可是，在后来的三十多年中，他在胡适和家人的督促鼓励之下，在台北师范大学英文系相对稳定的学术环境里终于完成了全部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而杨宪益却没有完成这一件他完全有能力做完的工作。

50. 从《零墨新笺》到《译余偶拾》

前面谈过，北碚国立编译馆时期是杨宪益一生中的“高产”期之一。短短三年，除了在复旦大学和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兼职教书以外，他翻译了几十卷《资治通鉴》和一部《中国戏剧简史》，翻译了晚清小说《老残游记》；翻译了陶渊明、温庭筠和李贺的诗；翻译了唐代的变文《燕子赋》、《维摩诘经唱文》和南北朝“神不灭”的论文；翻译了苗族的创世诗《苗本事谣》；翻译了郭沫若和阳翰笙的剧本各一部……除此以外，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历史研究中。大部分时间他都埋头于编译馆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中，作了大量的笔记。他写了二百多篇历史考据论文。这些论文涉猎学科范围之广令人惊讶。试举例说明：1. 考证中国古代音乐史的文章：「《柘枝舞》的来源」、「秦王《破阵舞》的来源」；2. 考证宗教史的文章「萨宝新考」、「桓谭《新论》里的佛教思想」；3. 考据文学史的文章「李白与《菩萨蛮》」、「《水浒传》古本演变」、「《庄子》的原来篇目」；4. 中西交通史的文章「唐代东罗马遣使中国考」、「宋代东罗马遣使中国考」、「汉武帝与拂林」；5. 考证欧亚史地的文章「大秦道里考」、「大月氏王都考」等等。初读这些短小精悍的论文，即被它学问的深广和所向披靡的气度所摄服。杨宪益就像拿着金箍棒的孙悟空，专找“王母娘娘”这样的大人物比一比高低。他不畏惧伯希和、沙畹、白鸟库吉、藤田丰八这样的汉学“权威”，经常发表与他们不同的观点。他广泛涉猎到历史宗教文学民族地理音乐戏剧民俗……等不同的学术领域，真是学问无禁区，这个虎虎生气的青年人象古代武士一样拿着长枪短棒出入千年历史，横跨欧亚大陆，在时间和空间的领域自由穿梭，如入无人之境。（近有天津南开大学教授王敦叔先生在所著《贻书堂文集》中专辟一章论述杨宪益在《译余偶拾》中的有关中国和拜占廷帝国（即东罗马帝国）关系史的研究。认为杨“根据对原始文献的研究和对语言学、历史学、地理学的掌握，对照中外各家学者的看法，提出自己的见解，得出独立的结论，成一家之言，启人深思，推动了学术讨论和研究。”）他的这些论文受到向达、杨荫浏、卢冀野这些朋友和师长的热情称赞和鼓励，卢冀野更是积极为他联系出版事宜。1947年上海中华书局以《零墨新笺》为题集结出版了其中的几十篇论文，书名是卢冀野起的。抗战胜利后杨宪益在南京从事“地下反蒋”活动外的业余时间又写了几十篇论文，49年解放后他把这些论文集结起来，自费印了一百本分送朋友。书名为《零墨续笺》。以后几十年，杨宪益在“党的安排”和“革命需要”下老老实实地做了一个“翻译匠”，再也没有时间和条件从事他心爱的学术研究了。杨宪益在《自传》中说：

那些年我是个多产作家，写了不少文章，翻译了不少作品。如果我生命的那一段时期延长一些，我可能会成为一个历史学家，成为一个通晓多种领域的中国史权威。但是，以后事态的发展使我离开了这样的学术研究。（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137，雷音译）

历史没有给杨宪益这样的机会。

“四人帮”垮台后，独具慧眼的三联书店在八十年代初再版了此书（把《零墨新笺》和《零墨续笺》合成一册），杨宪益将书名改为《译余偶拾》。历史学家庞朴先生看到这些文章后惊叹“没想到杨先生这么有学问”。解放后大陆历史学界长期以来只准一家独鸣，不许百花齐放。偌大的史学界只有划地为牢的被称为“五朵金花”的五个学术课题，搞了几十年还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分期、“清官、让步政策”和“农民起义”这几个问题中转来转去，怪不得庞朴先生在“解冻”后看到青年杨宪益那些在多种领域全面开花的尖锐犀利、百无禁忌的文章要大声惊叹了。

笔者在采访时曾提问：你学的是英国文学和古希腊文、拉丁文，怎么一下子就能钻到历史考据里了？杨宪益用一句话回答了我：“中国学问历来是文史不分家的。”是呀，非但“文”与“史”不分家，“史”与“地”也是不分家的。正是从小受了这种“中国学问”传统的熏陶并具备深厚的古文底子，杨宪益才能在文学和史学之间游刃有余，毫无吃力之感。又由于他通多门外文，使他一下子就能达到与外国汉学权威对话甚至问难辩驳的高度。

5.1. 英国大使馆的剑桥人

重庆是战时首都，有不少外国人。主要是各使馆成员，也有一些来访的学者和游客。一些老外到风景胜地北碚游览，专程访问了牛津出身的杨宪益和他的英国妻子戴乃迭。其中有著名英国摄影家西瑟尔·比顿爵士（Sir Cecil Beaton）和印度首任驻华大使梅农先生（K. P. S. Menon）。比顿爵士给杨宪益留下了他那个时期唯一的一张肖像照，梅农先生则把他的私人藏书借给杨宪益，对他的中亚古代史和中印关系史研究很有帮助。杨宪益虽然从这些交往中获益，但他从来不屑为功利目的而交朋友。他19岁出国，在国外很快与欧洲各国的青年打成一片“就像个英国孩子了”。这种特殊经历使他在与外国人交往中有一种超越种族和国家界线的“人”的眼光，尽管他从来没有忘记他是一个中国人。在重庆，他认识了英国大使馆的几个剑桥毕业的年轻人，他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杨宪益在自传中分别介绍他们说：

二等秘书约翰布罗费尔德（John Blofeld，中文名字叫蒲乐道）出身剑桥大学。他是个古怪的家伙，一个热心的佛教徒。年轻时他到过五台山，在那儿当了一阵子和尚。我在重庆渡周末与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告诉我各种各样超自然的神秘故事，有关于吸食鸦片的，关于越南妓女的，关于瑜伽师的，关于他早期当佛教徒的体验和其他一些难以置信的故事。我们经常在一起喝很多中国白酒。当他喝醉时就躺倒在地板上，唱起忧伤的俄罗斯民歌，边唱边哭。我想因为他母亲是俄罗斯人，他也有些俄罗斯人的性格。我渐渐与他十分要好，彼此很愿意聚在一起。……

我们通过约翰·布罗费尔德和重庆英国大使馆的其他人也成了朋友。其中我最喜欢的是亨利·麦克艾里维（Henry MacAleavy，中文名字叫马德良），也是一个剑桥人。他起先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然后学习一些欧洲各国的语言，包括俄文。然后到巴黎师从伯希和，成了一个出色的汉学家。那些日子里他经常和我及约翰·布罗费尔德在一起喝大量白酒。……他回英国后成为伦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的教授，讲授中国历史和文学。他写了几本关于清代末年和慈禧太后的书。不幸他年纪很轻就去世了，大约是在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他是个出色的学者，他

的生命被他自己挥霍掉了。(杨宪益:《白虎星照命》, P 1 4 5-1 4 6, 雷音译)

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仍在进行,“文明”的欧洲变得满目疮痍,这些英国青年精神苦闷,沉溺在烈性白酒中以麻痹自己的神经。杨宪益深切理解他们的痛苦。他们在一起谈论的话题总离不了宗教、存在的荒诞和人生的痛苦。这些话题的深度往往超过杨宪益与本国朋友之间的交流。而他们的“放浪形骸”正是杨宪益另一个“自己”的写照。当时的杨宪益虽然在几经颠簸流离之后得以在北碚国立编译馆这个“宽松”的环境中安家,并从事他喜爱的学术研究。但在内心深处他却有一种幻灭感。他在自传中写道:

当我1940年回国时,我满腔热情地希望在抗日救国的战争中尽自己一份力量。但在国民党中国我很快就感到灰心和幻灭。我顺从命运的安排,在内地过着毫无意义的生活,仅仅是苟活而已。我躲在北碚的图书馆里,埋头在书籍之中,或和我的朋友们一起谈笑喝酒。战争似乎离得很远。(杨宪益:《白虎星照命》, P 1 3 9, 雷音译)

在杨宪益的生命中,修齐治平的儒家大传统总是与离经叛道的名士“小传统”相随相伴。时而表现为带浪漫情怀的理想主义,时而表现为愤世疾俗的拍案而起,时而又化为烈酒与诗歌,呈现出半佯半狂半醉半醒之态。与他的英国剑桥朋友们相比,儒道互补的文化传统和汉民族平和的“理性”使他在“醉”与“醒”之中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没有走向极端。但是,他与这些英国年轻人在精神深处有某种契合。此外,杨宪益喜欢他们心灵的真诚,也佩服他们的见多识广和卓越的才华。他愿意和这些坦率的英国人交往。

当然,杨宪益做梦也想不到他与这些外国友人的友好交往会给他带来灾难。几十年之后,杨宪益在监狱中不得不把他所有的外国朋友都“竹筒倒豆子”地“交待”了出来。此是后话,且按下不表。

5 2. 国民党伤兵萧亦五

法国作家加缪曾经说过一句朴素的至理名言:“人生要比人一生的业绩更加重要”。书斋生涯与现实关怀这两条线索互相扭缠着,交替显现着贯穿了杨宪益的一生。

笔者在采访中曾问过杨宪益一个问题:您在英国时对祖国的命运关心到那种程度,回国后有没有过从军抗日这个念头?杨宪益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谈到了另一个对他有过影响的人——昔日的国民党大兵,残废军人萧亦五。

那是在1944年,相持了几年的中国抗日战场又燃起了熊熊战火。自44年4月始,侵华日军为了打通从中国到印度支那的铁路运输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6月16日,河南洛阳失陷;6月18日长沙失陷;8月8日衡阳又落入日军之手;到了11月11日,号称后方“文化中心”的桂林也在驻桂国军的英勇抵抗后被日军占领。紧接着日军又进犯贵州省,于12月2日占领了黔南重镇独山,矛头直指当时的陪都重庆。(《中华民国实录》3043页,吉林人民出版社)。云贵川三省震动了!国民党政府甚至有西迁西昌的打算。杨宪益也从古书堆中震醒过来。他回忆说:

卢冀野跟我讲过,要是日本打下贵阳那重庆就危险了。他说我预备去找我的老关系,我还认识汪精卫他们,可以到南京政权那边去。我当时就觉得有点……怎么说呢,我觉得很不以为然吧,到汉奸那边去,那不以为然嘛。我当时跟卢冀野说,我这里也有准备,反正要是一那时我刚结了婚,有了孩子,要动一动都是

很困难的，但一定要逃难的话我也不怕。那个时候身体也好，能够走路。我皮鞋都预备好了。带几双皮鞋，坏了就扔。只要皮鞋不烂的话总可以走到延安去。（1994年4月26日采访）

当时，蒋介石提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号召组建青年军。凡18岁以上，35岁以下“具中等知识水平”的青年，均可报名参军。那一年杨宪益刚好30岁，年龄合格。他萌发了参军上前线的念头。但这个念头立刻被他的一个新朋友，昔日的国民党伤兵萧亦五打消了。采访中他回忆说：

有一次我打过念头到抗日前线去。蒋介石在那个时候号召要成立一个青年军到前线去。号召的题目是百万青年百万军（雷注：此处恐怕杨的记忆有误，不是“百万”是十万），我说我也想参加，到前线去。萧亦五瞪了我一眼：什么？你到蒋介石的军队去？到那儿就去打共产党了，他才不会让你去打日本呢！后来我想一对，不能相信蒋介石组织的青年军，所以结果也没去。（杨宪益谈话，1994年4月26日采访）

萧亦五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的一生可以编成故事。他与杨宪益同岁，但在完全不同的境遇中成长。他出身于河南一个农民家庭，只有小学文化。年轻时家里强迫他跟一个不喜欢的姑娘成婚，他在结婚那天逃跑，从此浪迹天涯。为了糊口他去当兵，各种军阀的兵他都当过，最后成了国民党的兵。他在军队中摸爬滚打，从最下层的兵一直当到了连级“干部”。抗战军兴他上过抗日前线，跟日本人交过火。在淞沪保卫战中他负了伤，腿部中弹，被丢弃在水沟中整整嘶喊了两天两夜。最后终于被送进医院，经过抢救、截肢、九死一生养好了伤，可是他只剩下了一条腿，成了“残废军人”！他原来的团队说他残废了不能再带他，不要他了。他被迫流落在街头，拄着拐拖着仅剩的一条腿沿街乞讨。就是在讨饭时他遇见了老舍。从此这个抗日荣誉军人和著名作家之间产生了动人的故事：老舍发现这个可怜的残废军人

是个讲故事的天才！他对自己不幸遭遇的讲述深深地打动了老舍，老舍决定帮助他。在“抗敌文协”从武汉撤退时，老舍设法把萧亦五也带上，一直带到了重庆。到了重庆后，老舍让肖亦五住在他家，帮助肖提高文化，鼓励他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文章投稿，还热心向抗敌文协的刊物《抗到底》推荐萧亦五的稿子，还介绍他参加了抗敌文协。后来，老舍又介绍萧亦五到国立编译馆民间文艺组工作，在那儿编唱词搞民间文艺，发挥他的特长。从此，萧亦五由一个“大兵”变成了一个“文化人”，终身从事发掘民间文化的工作。（杨宪益访谈，1994年4月26日，邵恒秋访谈，1999年2月24日，）。杨宪益到国立编译馆后认识了这个前国民党兵，萧亦五成了杨宪益的“中国社会学”的老师。杨宪益回忆说：

萧亦五这个人很有讲故事的天才。他虽然没有什么文学基础，（但）很会讲故事。他常常跟我讲他军队的故事，讲他这一辈子，家里头要给他娶老婆他不干，跑了，然后怎么样子当兵，国民党军队里头怎么样腐败，讲的很热闹。他恨透了国民党军队。……那时候我对政治的看法比较幼稚，萧亦五对我这个问题上影响很大。他帮我补了中国社会的一堂课。是我这方面的一个老师。教我很多事。（杨宪益访问谈话，1994年4月26日，北京）

后来，萧亦五和杨宪益成了反蒋地下斗争的亲密战友。他们一起参加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同甘共苦地渡过了解放前的日日夜夜。萧亦五曾冒着生命危险到国民党军队中搞策反。解放后，萧亦五想参加共产党，不愿意再当“民主人士”了。结果，他党员没当上，却在1957年被划成了右派。从此他精神身体都垮了。文化大革命中萧亦五听说老舍自杀的消息，他痛不欲生。四人帮垮台

后，他总是念叨“老舍要是坚持活到这时候多好”。（杨苡：《记萧亦五与老舍的友谊》）。他在1977年去世，这是他一生不幸中的幸运，因为他活着看到了四人帮的垮台。但是，他没有看到右派“改正”的那一天。

53. 转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延续了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结束！杨宪益内心充满了欢欣。他在自传中说：

尽管连日来阅读过报纸，我们都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了。但这个消息仍然是极大的惊喜。经过八年漫长的、精疲力竭的战争以后，生活的新篇章似乎开始了。顷刻间战争已经远去，我们都兴奋地谈论着未来。另外两位杨先生（杨荫浏和杨仲子）谈到要回到下江老家和学院去。乃迭和我对未来没什么计划。我们不想回天津老家，觉得还是跟着编译馆回南京好。（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 140-141，雷音译）

由于所有的人都要沿着长江回老家，运输成了大问题。一些与官方有关系的人可以捷足先登。梁实秋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有专机送他们到南京，接着他从南京回到北京老家了。卢冀野也走了。杨荫浏和杨仲子先生也先后各自回到他们的学院。“三杨楼”里只剩下了杨宪益一家。他只能和国立编译馆的大多数人一起耐心地等待下去。英国大使馆的朋友曾提出带他们全家跟大使馆的汽车到南京，杨宪益谢绝了。

抗战结束，国内的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国共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在这个大形势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活动和打算。杨宪益在回忆中谈到了他这一时期的思想活动和变化：

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已经开始上涨了。老百姓对国民党统治的怨言也越来越多了。那个时候我的经济情况也是感到几百块钱越来越不够用了。虽然我们是两个教授的工资，可是添了个大儿子，头一个儿子花钱多一点，所以那个时候觉得生活一年不如一年。……

我对国民党那个社会越来越觉得腻味，又有传说日本投降了以后又要搞内战，又要打。我们那个时候很腻味，对国民党方面越来越不喜欢。（1994年4月26日采访）

那时，发生了一件事，对杨宪益刺激很大。这件事竟成为杨宪益决定参加反对国民党地下活动的一个导火线。1946年春天，杨宪益收到好友向达一封充满悲愤感情的信，信中告诉杨宪益，著名中西交通史学者冯承钧（1887-1946）先生因贫病交加不幸去世。死后家里穷的连棺材也无钱购置。忠于友谊的向达不得不四方求援募捐。杨宪益说：

我对冯承钧一直是很佩服。向达又是很要好的朋友，也是我很佩服的人。向达的信里发牢骚，说现在的知识分子越来越穷，越来越倒霉了。说他（冯承钧）的儿子那时候很穷——他儿子就是文艺界很有名的冯牧——说他的丧事没有人帮忙。向达跟我募捐，我手头大概有个二百块钱，我就给他寄去了。我那时也非常愤怒。我那个时候就决定了，看起来国民党不行了，非得要共产党过来也可能好一点。（1994年5月6日访问谈话）

杨宪益还谈到促成他思想转变的几件事：

重庆还有一个大隧道惨案。有一次日本人轰炸，好几百人躲在一个防空洞里。那个洞是有人看管的，有个铁门。看门的人去打麻将去了，两天没回来。结果回

来以后里头的人全给憋死了。惨的不得了，憋死了好几百人。拿铁钩子往外钩，一大卡车一大卡车地运走。外电也报导这个事情，说我们这儿把人不当人。有的人还没有断气，结果也扔到卡车上就死了。

还有，我在马路上看到一个伤兵，打摆子，躺在地上。结果衣服全给人家偷走了。满脸的苍蝇，人还没有死，可是谁也不敢去帮忙。因为那个时候在重庆谁要是做一点善事，帮助穷人什么的，就有共产党的嫌疑，就有特务来钉梢。这种气氛非常压抑。（1994年5月6日谈话）

当时，一位叫赵超构的记者去延安访问后回来写了一本书《延安一月》。尽管作者对“丁玲艾青他们讲话都是一个调子”的现象表示了怀疑，但是他还是热情地赞扬了延安的“廉洁”和纪律。这本书对杨宪益的选择起了一定作用。他说：

他（赵超构）到延安去观察了一个月，谈到那里比较廉洁，比较有纪律。当然他也说了一些批评。他说丁玲艾青他们讲话都是一个调子，都一样。他说社会上人讲话怎么会都是一个调子呢？有点怀疑。不过，除此之外，他觉得延安那方面的管理要比重庆的污七八糟要好得多。（1994年5月6日谈话）

杨宪益对延安的好感有一个“远因”，那就是共产党坚决抗日的态度。当蒋介石一心想“攘外必先安内”时，共产党却高举“捐弃前嫌，一致抗日”的旗帜，并且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杨宪益在英国看到贝特兰写的《西安事变》一书使他对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感到钦佩，那时他就“心仪”延安了（按：这是中共一贯的宣传，直到百岁老人张学良临死前的《口述历史》才揭开了历史真相：中共主张“杀蒋抗日”，而张学良才是主张“拥蒋抗日”的）。1937年杨宪益在给朋友和未来的妹夫罗沛霖的一封信中说“我们都要到麦加去”。罗沛霖一直以为杨宪益信上的“麦加”是指莫斯科，几十年后他当面问杨宪益，才知道当时杨宪益心目中的“麦加”不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莫斯科，而是延安。（罗沛霖访谈，1994年6月11日，北京三里河）。抗战中期杨宪益从英伦回国后，他多次动念去延安。抗战后期他在北培时甚至给重庆新华日报社写过一封信询问是否可以坐新华日报的汽车到延安去。郭沫若代表新华日报给他回了信。信中婉言劝解杨宪益打消去延安的念头。说他家累重，去延安一路上风险又大，不要去了，“在蒋管区也一样做革命工作”。（杨宪益访谈，1994年4月26日，北京百万庄）尽管延安没有去成，但杨宪益却记住了“在蒋管区也一样做革命工作”这句话。杨宪益回忆说：

我看到的这些事情使我感到越来越气愤。我觉得自己在这儿埋头搞点翻译教点英文实在没意思，还得参加一些政治活动。我回来就预备参加抗日战争的，现在抗日战争都结束了。可是又碰到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矛盾，看起来是共产党那面好，我应该改。可是我拉家带口的没法子跑到延安那边去，我就想找一个地下党，跟他们取得联系，搞点政治活动。我给向达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因为我比较相信的就是在乐山的向达。（1994年5月6日谈话）

在给向达的信中杨宪益明确表达了要参与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政治活动。（杨宪益：《白虎星照命》）。杨宪益做出了这个决定，并毅然决然投身到实际行动中去。在此后几年中，他在国民党的“首都”——南京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冒着很大风险从事反抗运动，成了一个没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地下工作者”。他的这一个决定以及他那几年的实际行动，显示出杨宪益的性格与一般中国持自由主义态度的知识分子相比有他的“特殊性”。在杨宪益留学的二十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式社会主义思潮盛行于欧洲，杨宪益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这无疑是他日后倾向共产党的思想基础，使他走上了与一般持“在合法秩序下的渐进变革”立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同的道路。但是，当时留学于欧洲的中国学生不乏其人，受”

红色思潮”影响的大有人在。可在他们之中唯有杨宪益成了一个“地下工作者”，这不能不令人在思考“社会思潮”的因素之外，再深思其“个性”的根源。他小时候最钟爱的人物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这个在铁扇公主肚子里大闹天宫的捣蛋鬼似乎与杨宪益有某种不解之缘。在青少年时代，杨宪益最喜欢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书中剑客们的豪爽幽默的性格，行侠仗义的行为和他的浪漫主义性情十分相投。表面上看来，杨宪益似乎仅是落拓不羁，不拘小节，什么都不在乎，内心却充满“激昂慷慨”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在平时，这种情怀淹没在“嘻嘻哈哈、饮酒做诗”的外表之下。到了关键时刻却往往会“一发而不可收”，做出“出格”的举动。“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就是他在某些时刻做出的选择。他的这一个性使他对“革命”比对“改良”更容易接受。不管是好还是不好，他的这一个性一直保持到晚年，可称的上是“老而弥坚”。

5 4. 下江

1946年8月，经过长达一年的等待，杨宪益和戴乃迭带着他们4岁的儿子杨焯，怀里抱着10个月的女儿杨荧，和国立编译馆的同事们一起乘船下江了。他在自传中说：

作为一个学术机构，我们单位在国民党政府中根本排不上号。所以我们得不到更好的交通工具。所有那些更适宜的轮船、飞机和卡车都被用来运载国民党官员以及与官方有联系的人了。而我们单位经过整整一年的争取却只能租到这两三只平底木船。（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148）

这是一次艰苦而危险的旅行：二百多人只租了二、三条平底机帆木船，前面的木船载人，后面的木船载行李。由于人多船少，非常拥挤，每个人只有一身之地，连翻身都困难。时值夏季，木船上没有洗漱设备没有厕所，恶劣的条件使杨宪益初生的女儿杨荧生了一身的疥疮。杨宪益在自传中说：

经过三峡时，人们议论说那些日子晚上经常会有土匪从山上下来抢劫过路的船只。幸运的是我们没有遇上这样的灾祸。有一次当我们过三峡时，船上发出警告说这条船可能要翻，大家一片惊慌。最后，人人都平躺在船上，什么事也没发生。我们就这样驶过了那些美丽的长江峡谷，平安抵达我们的目的地南京。（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148，雷音译）

这场“梦魇般的旅程”延续了足足17天！虽然最终有惊无险平安抵达，但是杨宪益的损失却很大。他的全部家当都没了。这些行李以及七、八木箱书籍装在后面的一艘船上，那条船着了火，全部物品烧个干干净净。最让他心疼的是那些书籍和家庭老照片。那七、八箱书是他在英国六年积累下来的，1940年回国时从伦敦海运到了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批书被扣留在香港。细心的日本人在每本书上都盖上“杨藏书”的戳子。日本投降后，任职于香港大学的老同学梅勒发现了这批书。他设法把这一大批书运到了重庆。这个当初曾热烈追求戴乃迭的老朋友已经从失恋的痛苦中解脱了出来，又与杨宪益和戴乃迭恢复了联系。丢失这一批凝结着杨宪益青年时代的回忆和友谊的书籍，使杨宪益很长时间不能释怀。然而，他们仍然感到幸运，因为他们毕竟平安地到达了南京。时间是1946年8月下旬。

生活的新篇章开始了。

第四章南京时期(1946-1952)

5.5. 三人秘密小组

到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找一个栖身之地。从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一批批的国民党接收大员们纷纷“复员”回到南京，抢房子，占地盘，等到杨宪益们在一年以后到南京时，几乎所有可用的房子都被占光了。战后的南京又成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人口激增，房荒问题严重。杨宪益为了安家大伤脑筋。从46年秋到解放短短两年半时间中，他被迫搬了四次家。最后和别人合伙买了一小块地盖了三间简易平房，才算暂时解决了住房问题。紧接着，通货膨胀日趋严重，为了养家糊口，杨宪益不得不同时兼四、五份差事。乃迭也同时干两份活儿，除了编译馆翻译委员会以外，她还在美国救济总署工作。每月工资二百美元。这笔钱使他们这个四口之家比一般知识分子的景况好的多。

尽管有住房和生计问题的困扰，但那两年多杨宪益在南京最主要的活动无疑是他的地下反蒋活动。他的朋友萧亦五介绍他认识了编译馆另一位年轻同事邵恒秋。三个人对政治形势的看法一致，决定在一块儿干。到南京后，邵恒秋介绍他们认识了地下党员孙祥麟。孙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农林部职员，实际上他是中共中央社会调查部的成员（邵恒秋访谈，1999年2月24日，北京）。孙成了他们的没有领导名义的“领导”。杨宪益回忆说：

孙祥麟有一天来说我带你去看一些朋友，我们就去了。他介绍我认识了一个国民党的伪立法委员叫于振瀛。于振瀛实际上跟共产党地下党关系很密切的。是个左派人物。于振瀛那天晚上大概是46年11月的样子，是一个晚上就跟我们商量，说我们在国民党里面一些革新派想要成立一个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已经以陈铭枢为首成立了一个，协助共产党来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我们这里想成立一个组织叫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叫民联。……你们参加我们这个好了。我们也是做同样的工作，主要的就是策反，推翻蒋介石的统治。邵恒秋、萧亦五跟我，我们三个人就同意了。于振瀛就派我们三个人成立这个组织，我们三个人就算是南京民联的创始人。（杨宪益访问谈话，1994年5月6日，北京）

这个三人小组的活动内容是过一段时间碰一次面，通常是在晚上。地点在南京的中英文化协会（当时杨宪益任中英文化协会的主任秘书）大楼办公室和他们在上海路开的一个古董铺子楼上。聚会时他们传阅从解放区来的小册子和文件，然后讨论当前的政治形势和任务。杨宪益记得他们读过《新民主主义论》和《七届二中全会报告》等文章。

他们三个人的分工很明确。杨宪益在自传中说：

邵的任务是组织起南京的地下政治力量；萧的任务是与他过去国民党军队的战友取得联系，策反一部分队伍到共产党这方面来；我的任务是通过我跟外国使馆及国民党上层——包括大学教授——的联系，获得对北方的中国共产党有用的政治和军事情报。这是1946年冬天的事，在我们刚到南京不久。（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157，雷音译）

杨宪益完成任务的积极性很高。他除了继续和在重庆就认识的英国驻华大使馆官员联系以外，还积极接触了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印度大使馆的官员，通过他们获得一些外国政府对中国内战双方的态度和政策的资料。有趣的是，与他的初衷相反，杨宪益原本是为了获得情报而积极与各大使馆官员接触的，结果

他反而因此交了许多外国朋友。这一反差使杨宪益对“政治”产生了一种“荒谬”感。杨宪益说：

那一段主要是搞政治。搞政治里头需要说的是做过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比如说要想办法给他们（地下党）收集情报，就跟外国使馆有许多联系。开始的原因是为了通过外国人收集一些资料，外国人对我们国共的问题怎么个看法。结果这样子跟他们交了许多朋友，认识了许多不错的英国人、澳大利亚朋友、印度朋友。（杨宪益访问谈话，1994年5月9日）

杨宪益也获取过重要的情报。他回忆说，他的朋友，英国驻华使馆武官伊文思（AdrianConwayEvans）给他看过一份国民党的江北军事布防图。当时他把重点偷偷记在火柴盒上，回去后根据记忆复写在纸上转交给地下党了（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2001年11月14日，北京）。

杨宪益获得的最重要的情报恐怕要算国民党撤退时潜伏在大陆的秘密电台计划了。笔者在采访昔日三人小组之一的邵恒秋时，他提供了这个事例。他说“杨宪益最大的贡献是他在48年8、9月份搞到的国民党撤退前布置的地下电台（主要是华北地区）的情报。”“这些情报对50年代初有关部门侦破这些电台起了很大作用（邵恒秋访谈，1999年2月24日，北京）。”值得注意的是，杨宪益本人对他提供的这一重要情报及其价值竟毫不在意，在口述历史时他甚至从没提过这件事。如果不是邵恒秋这个活着的见证人一再提起，这个重要史实可能就被淹没在历史的汪洋大海里了。杨宪益立下的这一件“侦察员的功勋”在解放后从未受到过有关方面正式的承认和表彰（相反，他的后半生竟然为“与外国使馆的联系”而遭难）。

杨宪益干地下工作带有独特的“杨氏”风格。他广交朋友，左中右朋友都频频来往。他处事风格落拓不羁，一副满不在乎样子，却往往在不经意之间获得了重要的情报，似乎天生就是干谍报工作的料。在危急关头，杨宪益往往能够大胆出奇招，举重若轻的化解危险。杨宪益和邵恒秋在回忆中都提到了发生在1948年的一件事。当时国民党政府破获了南京的一个地下民革组织，该组织的两个负责人被押解到上海枪毙了。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在报纸上大肆宣传这个“伟大胜利”，一方面开始了大搜捕。一时风声骤紧。为了以防万一，邵恒秋准备烧毁和埋藏家中的文件及书籍。杨宪益说：

那个时候邵恒秋非常紧张。他家里边有一些从延安那边转过来的材料，他不知道（该）怎么弄。后来看着情况越来越紧张，他又怕国民党来搜查家里的东西。他很害怕，问我怎么办。我说你交给我吧，我有办法。你只要封好了，没事儿！他就给了我一个大箱子。我就问美国人 JoeBennett（中文名卞承休，美国使馆新闻处处长），我说我有一个箱子，是比较宝贵的书，存你这儿好不好？存在你们美国使馆比较保险一点。我想，虽然美国明明是跟国民党站在一边的，可我们是朋友关系，我封着箱子，他不会启封也不会动的。他说好，你拿过来吧。结果我就藏到那儿去了。果然是没事儿。解放以后我又从美国大使馆拿回来了。箱子还是封的好好的。（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9日，北京）

事隔四十多年，杨宪益谈起当初自己出的这一“奇招”，脸上仍有自得之意。

但是，杨宪益虽然说的轻巧，当时的空气却十分恐怖。国民党在倒台前对破获的一切反抗行动都是“格杀勿论”的。杨宪益干的事一旦败露，脑袋就要搬家。为了不连累家人，他对妻子戴乃迭守口如瓶。一直到南京解放，戴乃迭完全不知道丈夫那几年从事着危险性极高的地下工作。

56. 中英文化协会

杨宪益到南京后不久，他岳父泰勒先生在庚款委员会的同事、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博士找到了他，向他提出是否愿意担任中英文化协会的主任秘书。这个职务原来是杭立武兼任的，但他的事太忙，无法分身。杭立武一向看好同是留英学生的杨宪益，把他当成“小师弟”，愿意让杨宪益替代他担当此职。当时杨宪益正为安家之事发愁，他私忖接任了主任秘书一职可以在中英文化协会大楼里找几间房子安家，就接受了这项工作。后来尽管他的这一愿望没有实现（杭立武不希望杨宪益把家安在大楼里），但中英文化协会主任秘书一职杨宪益却一直干到了解放。他在自传中回忆说：

我的工作很简单。我只须为中国的教授和会说英语的官员们以及外国友人——主要是外国使馆人员——组织各种讲演和鸡尾酒会，大约每月一次。……在 1947 年到 1948 年间我组织了几次演讲会。一次是我自己作的关于中国在唐朝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的演讲；另一次是叶公超教授作的——他后来成了国民党在台湾的外交部长——关于中国战国时期知识分子的作用的演讲。（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151-152, 雷音译）

杨宪益在向笔者口述历史时对这一段的活动说的更加详细：

我还请过一些外国的汉学家，比如说澳大利亚的 Fitzgerald，他谈过两次关于唐代的历史。一次讲唐太宗，还有一次讲武则天。还请过一次——那个时候在苏联大使馆做文化参赞叫费德林，后来也是一个很著名的汉学家，讲过一次苏联对汉学的研究这一类的事情。（杨宪益访谈，1994 年 5 月 6 日，北京）

1947 年到 1948 年，正是国共双方“生死决战”的严重关头。像杭立武这样的知识分子型的政府官员仍然勉力进行一些学术交流活动。杨宪益虽然不负杭立武的信任，以他向来的潇洒随和的作风组织安排了这些活动。但是，杨宪益当时的兴趣和精力已经放在“地下反蒋运动”上了，他把这些学术交流活动仅仅当成“表面的工作”，进而借这些活动之便广交朋友，获取对共产党有用的信息和资料。更有甚者，杨宪益竟然把中英文化协会的大楼当作地下民联小组秘密活动的场所，这些当然是杭立武所万万想不到的。

57. 《和平日报》副刊

还有一件事与昔日留英同学有关，那就是主编《和平日报》学术副刊。46 年秋杨宪益刚到南京不久，牛津大学时期的好友杨人榘教授就找到他，把他拉到另一个留英学生黄少谷那儿去了。黄少谷与杨人榘是湖南老乡，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时期他们就是北伐军的战友，后来又分别到英国留学。杨人榘在牛津大学学法国历史，黄少谷在伦敦大学学政治经济。黄留学前在国内受到冯玉祥的器重，是冯玉祥资助他去英国留学的。杨宪益与黄少谷在诗人王礼锡家相识，以后也多次见面。起先他对黄的印象不错，后来就有了些变化。他在访谈中说：

黄少谷原来是挺好的一个人。也是很主张抗日的。后来就越来越有点变了。那时候有的（留学生）是蓝衣党那一派的，有的是亲共一方面的，属于红的。红、蓝的界线很清楚。那时候向达跟我开玩笑说我们这个朋友黄少谷看起来不是红的，现在越来越变得粉红了。就是他有点想做官了。（1994 年 5 月 6 日谈话，北京）

黄少谷回国后成了孔祥熙、宋美龄一系的人。抗战胜利后他已经当上了国防部副部长。他掌管着一份军方报纸《扫荡报》，该报因其坚决反共的倾向而名声不好。黄少谷给报纸改了好听的名《和平日报》，想找些文化人编副刊，使报纸的面貌有些变化。他找老朋友杨人榭帮忙，杨人榭则找到了杨宪益和吕叔湘。杨人榭认为“小杨”和吕叔湘在英国编过《抗日时报》，干这件事比他胜任。那时，杨宪益与黄少谷虽然已经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了，但见面时互相还是友好的。碍于杨人榭的面子，杨宪益和吕叔湘都同意了。两个人分别选择自己有兴趣的领域，吕叔湘编文学副刊，杨宪益则编史学副刊。

说干就干，杨宪益大刀阔斧地编起了报纸。他给自己的副刊题名“人文”，有整整一个版面。从1946年9月21日第一期《人文》开始，至1947年10月25日第四十六期《人文》结束，一年多的时间内几乎每周一期，从不间断。副刊的学术性很强。除了少数外国文学翻译以外，几乎全是史学考据文章。其中大部分是杨宪益自己写的。笔者查询了北京图书馆藏的《和平日报》资料，发现杨宪益一个人在四十多期副刊中发表了七十二篇文章！仅举46年10月5日第三期《人文》为例，该期除了两篇翻译文章以外还登载了六篇短论文，这六篇文章全是杨宪益写的！六篇文章署了五个名字，除了《大宛王都考》这一篇署名“杨宪益”以外，其余五篇分别署：维武（《盘越与车离》和《十八世纪关于英国的中国记载》）、縣翳（《蕃薯传入中国的记载》）、益之（《大宛为塞种所建考》）和宪民（《汉书上的罽宾王阴末赴》）。另外，两篇文学翻译中有一篇是古希腊荷马史诗《伊离恩记》，翻译者也是杨宪益，署名是：鲁退。

毫不夸张地说，这个《人文》副刊是杨宪益一个人干起来的！他既是主编，又是主要撰稿人。杨宪益干事能力之强、效率之高，在《人文》副刊中充分体现了出来。别的人顷全力不一定干得了的事，他可以轻松自如地拿下来。何况，编副刊只是他众多事务中的一件。当时他主要是忙地下民联的事，还要忙生计，忙于找住房、忙中英文化协会，还要忙编译馆的杂事。在所有这一切之外，他还有时间玩古董字画，去各地旅游！他干任何事情都是既认真又不认真，心态随和，不汲汲然，不做声嘶力竭状。

杨宪益和黄少谷还打过一次交道。1947年五·四前夕，黄少谷曾请杨宪益为《和平日报》写一篇纪念五四的社论，杨答应了。结果是可以预料的：杨宪益那篇“民主自由”基调的社论完全不合黄少谷的胃口。黄少谷决定不登那篇社论。到了1947年底，国内战事愈趋激烈，杨宪益无暇再写学术文章了。他主动离开了副刊。

58. 《绛舍》和业余古董字画收藏家

1948年，杨宪益在中英文化协会大楼举行过一次为期两天的中国文物和书画拍卖会。拍卖的艺术品有徐悲鸿、齐白石等名家的国画和历代文人的书画，还有各种古董（其中大部分是假古董）。这是他为了帮助一个叫孙培良的昔日编译馆同事解决回川路费而举行的。拍卖会开的十分成功，两天下来居然卖了两千美元，为孙培良筹措了足够的路费和生活费。这件事启发了杨宪益。他觉得可以与朋友合伙开一个古董铺子以贴补家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通货膨胀越演越烈，钱非常不值钱，杨宪益的教授工资只相当于八元美金或两袋面粉，他不得不同同时干好几份工作来增加收入。杨宪益的主意得到朋友萧亦五和老同学廉士聪（廉当时也到了编译馆翻译委员会）的赞同，穷朋友们纷纷凑钱入股，在上海路找了一

个铺面，买进一些真真假假的古董、仿古瓷器和文人字画，正儿八经地开起铺子来。廉士聪的父亲从天津来投靠儿子，他有开店的经验，就让他做“老板”。铺子分上下两层，楼下是店面，楼上是“办公室”。杨宪益给铺子起了个名《红房子》，这个名字的灵感来源于他天津老家法租界的一个《紫房子》的店铺。但朋友们认为“红房子”这个名太露骨，怕惹来麻烦，于是杨宪益将店名改成了《绛舍》，仍然是“红房子”的意思，只不过变成了文言文。过后他笑嘻嘻地对妹妹杨苡说“你知道吗？‘绛’者，红也。”《绛舍》生意清淡，几乎没有顾客。当时南京的老百姓都快要饿饭了，谁还会来买古董？只有几个外国使馆的三等秘书和他们的太太小姐来过一两次，买了几个小玩意儿。生意虽然没有做成，但《绛舍》担负起另一种职责：它成了地下民联的一个聚会点。杨宪益、邵恒秋和萧亦五有时就在《绛舍》楼上碰头，交换情况和布置任务。不到一年，国民党败局已定，《绛舍》也关了门。

《绛舍》虽然寿命不长，但杨宪益对中国古代文物和字画的爱好的确没有停止。他对古董字画的喜爱来自家庭的影响和他本人的性情所致。在重庆时他曾在一家旧货店看到标价 10 元的林则徐写的对子，他立刻买了下来。他说：“如果不买的话，也许别人当废纸扔了。”到南京后他的兴趣有增无减。日本人投降时在南京留下了一批文物，后来国民党撤退又留下一批。受天时地利之便，杨宪益那几年在南京收集了不少文物。除了字画以外，还有出土的瓷器、陶器、玉器、铜器，文房四宝乃至古代兵器，他都收藏。几年下来，到南京解放时他已经有了不少古董。他的鉴赏水平也逐渐提高。他说自己能识别真假龙泉瓷，是宋朝龙泉还是明朝龙泉。能识别端砚的真假。他自承水平只是中不溜儿，比启功他们差。值得一提的是，杨宪益收藏文物决不是为了保值，更不是投资行为。他接触文物的整个过程完全是审美和消遣，还是他那句老话：好玩！他往往花钱买一件文物，把玩欣赏之后就送给别人。例如他曾化十块美金买过一本雷峰塔的小佛经，是唐朝末年印刷的，后来送了人。他的文物大都是这样的“过手”收藏。最大的两次“过手”是解放初期和文革中向南京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的无偿捐献。

杨宪益回忆说，在 1950 年代初，他曾建议南京博物馆来他家里“看看我的这些字画有没有他们可以保留的精品”，南京博物馆先后派人来挑过两次。第一次挑走了几十幅字画，连个收条都没有给他留下。第二次又挑走了五十多件各种文物，这一次南京博物馆给杨宪益写了一个捐赠证书，该证书后来也不知给他扔到哪儿去了。到了 1973 年，杨宪益和戴乃迭从监狱出来不久，他决定把家中劫后仅存的几十件文物捐给故宫博物院。笔者看到了故宫博物院开的一张“捐字第 187 号”的捐赠文物凭证。凭证上写：兹承杨宪益先生捐赠下列文物特此致谢。落款是“故宫博物院革命委员会”，盖了图章。时间是“一九七三年一月廿七日”。列出的捐赠文物共五十八件，有明清书画册十件（其中有他五爷爷杨士琦的一册书札），还有四十八件文物。经专家鉴定，除了五件是赝品外，其余都是历代出土的陶器、青铜器和历代瓷器。内有新石器时期的彩陶，战国时期的铜器，魏晋南北朝和唐宋的青釉、白釉、绿釉、黄釉，还有元明两朝的龙泉瓷器和均窑瓷。

自那以后，他家基本上没有任何古董了。

59. 拜占廷史教授

1948 年初，一所新成立的大学——建国法商学院希望杨宪益兼职教英语，学院允诺提供住房，这一条件对杨宪益很有诱惑，他答应了。杨宪益一家搬进了校

园内“一所带游廊的平房”。接着，昔日工作过的中央大学也希望杨宪益去教书，杨宪益提出不教英语而是到历史系教拜占廷史，中央大学居然同意了。杨宪益在自传中说：

我决定开一门拜占廷史是因为我正在进行拜占廷史和中国历史的比较研究。东罗马帝国的衰落和灭亡使我想起了中国正面临的形势：封建官僚政治，裙带关系和腐败，还有，军事独裁专制。来听我讲课的学生很多。一些理解力强的学生希望我做更多的比较，揭露垂死的国民党政权。（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153，雷音译）

1948年，全国的大学校园早已是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自从1947年的“五·二〇”运动（1947年5月20日，宁、沪、苏、杭学生在南京举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以来，全国各大城市的学潮风起云涌，毛泽东曾称蒋管区的学潮为反蒋“第二战线”。到了1948年，这条“第二战线”又上演了声势浩大的活剧。4月6日北平各院校同时实行“六罢”（罢教、罢职、罢研、罢诊、罢工和罢课），拉开了“反迫害、反饥饿”的“四月风暴”的序幕。自5月初始，上海、北平各高校又爆发了反对美国推行的“资本美国、工业日本、原料中国”的殖民政策的“反美扶日”运动，全国十多个城市的大、中学校的学生、教职员和市民都纷纷响应支持，相继举行游行示威（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山东教育出版社）。杨宪益所在的南京中央大学学生在这些运动中扮演了活跃的角色，他们纷纷走上街头，高呼“反美扶日”和“反迫害”的口号并向市民散发传单。从4月到6月，一浪高过一浪的学潮席卷校园，“偌大个中国”又“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到了48年底和49年初，中央大学的学生举行了总罢课，杨宪益短暂的历史学教授的生涯就此结束。

正如钱理群先生在《1948：天地玄黄》中的分析：“学生运动提出“反饥饿，反迫害”，其正义性是无可怀疑的；但其对现存秩序与社会稳定的破坏也是无可回避的事实。对与中国共产党持相同态度，根本不承认国民党政权及其法律的合法性的激进知识分子，学生运动的这两个方面是统一的，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站在学生一边。但在承认现有秩序的合法性的前提下要求进行不断改革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却因此而面临着两难选择。”当时，大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选择和学生站在一起，只有胡适、朱光潜等少数人选择了后者，因而“很快就被大多数青年学生所抛弃”。杨宪益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所持的激进自由主义和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立场使他一开始就与学生站在一起。杨宪益在自传中说：

乃迭和我支持这些爱国游行示威，我们帮助学生把游行的口号和声明翻译成了英语。（《白虎星照命》，P153）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在新年文告中向共产党“求和”，并提出保存“国体”、“法统”和“军队”的和谈条件。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作为对蒋介石的回答，声明中提出“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的和平谈判八项条件。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任“代总统”。4月1日，以张治中为团长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飞北京与中共举行和谈。南京6000多学生在机场为代表团送行。接着，学生们举行了游行示威，要求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和平条件。示威游行的学生被国民党南京卫戍司令张耀明下令镇压，当场打死两人，打伤十多人，更有多人失踪。史称“四·一惨案”。

惨案发生后，一部分受伤学生住在南京中央医院。杨宪益和邵恒秋发起了向受伤学生募捐的活动。邵恒秋回忆说，“杨宪益是第一个出钱的人”，而且，“他

出钱最多”(邵恒秋访谈, 1999年2月24日, 北京)。(向“四·一惨案”受伤学生募捐的事, 是邵恒秋向笔者谈起的, 杨宪益在回忆中从未提起过。)

60. 艾德里安·伊文思

之所以要专门提起这个在英国驻华使馆任武官的年轻人是因为他对杨宪益及其家庭几十年的命运有非同一般的关系。

杨宪益与艾德里安·康伟·伊文思(Adrian Conway Evans)是在重庆由他们共同的朋友、英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蒲乐道介绍认识的。他们渐渐熟悉起来。杨宪益在自传中说他“是个天真的、讨人喜欢的小伙子。”日本投降后, 伊文思特地到北碚去看望杨宪益和戴乃迭, 曾主动提出让他们全家乘坐他的吉普车去南京。杨宪益到南京后不久伊文思就找到了他们。当时, 杨宪益的朋友蒲乐道和另一位剑桥人马德良都先后离开了英国大使馆, 只剩下了伊文思。伊文思时常去拜访杨宪益及戴乃迭, 他们成了好朋友。杨宪益在自传中说:

他(伊文思)是个年青的单身汉, 喜欢驾驶一辆德国大众牌汽车去各地旅游。乃迭和我都十分喜欢他。我们到南京后, 他经常到我们家来, 我们和他一起坐他的汽车沿着长江流域去过南京附近的一些城市——扬州、苏州、宜兴、无锡、镇江和其他一些地方。有他做伴我们总是很愉快。艾德里安是个天真的、讨人喜欢的小伙子, 但是对他干的工作不太胜任。他总是对每月的工作报告感到头疼, 我们经常为此取笑他。通过他我设法得到了一些国共内战的信息, 有一次他甚至给我看过一张国民党军队在江北的布防图, 并告诉我他与国民党将军们的联系情况。

(杨宪益《白虎星照命》, P160, 雷音译)

杨宪益回忆说, 那张军事地图上“哪儿有多少部队”、“哪儿是第几师的军队”他都牢记在心, 过后默写在纸上“送到党那方面去了”。诚如他所言, 他跟伊文思这个驻华武官的联系除了在重庆结下的友谊以外, 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想通过他收集一些资料”, 是要“为推翻蒋家王朝, 建设一个新中国出一份力”(杨宪益访谈, 1994年5月16日, 北京百万庄)。当然, 杨宪益这个目的是隐秘的, 连戴乃迭都毫不知情。但“组织上”是知道这一切的。杨宪益做梦也没有想到, 恰恰是“知道这一切”的党组织中的某些当权者会反过来怀疑他, 把他当成了“特嫌”, 使他背上了几十年沉重的包袱; 使他和妻子双双蹲了四年的监狱; 并使他的家庭和子女受到深重的牵连和磨难。

艾德里安·伊文思在南京解放时被英国政府调往驻台湾领事馆, 几年后在一次登山中遇难。他没有蒲乐道那么幸运, 能够在“尘埃落定”的80年代与杨宪益和戴乃迭在北京重逢。

61. 民选馆长

1949年初, 南京国立编译馆馆长赵士卿博士(原来的馆长陈可忠博士当时离开了编译馆。49年以后, 陈可忠担任了台湾编译馆馆长)突然不告而别, 跑到上海大学里教书去了。赵博士留学德国, 是个化学家, 与著名诗人冯至是好朋友。赵是国民党员, 还是本单位国民党的书记(在国民党统治下许多大单位的“第一把手”必须是国民党党员, 这一点和日后共产党的做法相似)。他对共产党即将渡江感到恐惧。杨宪益在自传中说: 他知道国民党政府即将垮台, 不愿意在共

产党到来时面对自己馆内这批贫穷而愤怒的人。这样一来，编译馆陷于“群龙无首”的处境。当时的编译馆“员工福利会”（“员工福利会”是编译馆全体员工为保护自身利益而自发组织的，杨宪益是福利会主席）出面主持了一个全馆职工大会，决定选出一个临时馆长以维持局面。那天到会的有二百多人，实行公开的民主选举。监票人把每个人的选票集中起来后由唱票人把得票者写在黑板上，最后统计。结果是杨宪益得票最多。这是有史以来编译馆的第一次民主选举，意义重大。一个同事曾画了一幅漫画，记录这次“民选”实况。杨宪益在自传中说：

国立编译馆的馆长历来都是由国民党政府指派的，并且必须是国民党党员。我成了唯一不是政府指派、也不是国民党党员的馆长。（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164）

既然当了馆长，就得对这二百多号人负责。这时，南京城已经一片混乱，政府机关瘫痪，国民党的高官们陆陆续续都离开南京，逃往台湾了。国立编译馆的上级部门教育部的部长杭立武也准备飞台湾。编译馆的同事得知这一消息，建议杨宪益在杭立武临走之前去见他一面，请他留些钱给大家渡过难关。杨宪益去了。他以编译馆的民选馆长的名义去见了这位多年来都十分善待他的“学长”。杨宪益回忆说：

我对杭立武说，我们的馆长跑了，群众要我做代理馆长。虽然上面没有批下来，可是我得暂时对这些人负责。你们要走了，下个月工资不发的话，大家都要饿饭，怎么办？他说那我给你开一些钱吧。杭立武很大方，开了两百多人的两个月的工资给我。交给我拿回去给了编译馆。这样子安定了一下人心。那时候南京非常紧张，物价膨胀的厉害。早上发的金元卷，到了下午只等于这钱的一半，两三天以后只等于十分之一了。所以大家拿了工资都跑到马路上去买大头，换银元，换美金。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做，到街上去换钱。那时候已经紧张到那个程度了。大家都是怕要饿饭。（杨宪益口述，1994年5月9日，北京）

杭立武虽然对杨宪益这个民选馆长的合法性没有表态，但却在最后关头支持了他。这笔钱使编译馆的多数员工留了下来，安心等待到解放的那一天。杭立武与杨宪益见面那天，恰是他留在南京的最后一天。他与杨宪益作了最后一次交心的谈话。杨宪益回忆说：

杭立武跟我说，看起来共产党要渡江。我们还是躲一躲好。他跟我说的很坦率。他说我已经听说北大哲学系的教授已经挨斗了。共产党来了我们知识分子一定没有好日子过。还是走吧，跟我们一块儿走。杭立武倒是很够朋友，临走头一天还跟我说：“第二天早上我就有飞机，我就要走了。你跟乃迭两个人加上孩子，跟我一块儿来罢。你不要带多的东西，只带一个箱子，别的东西就扔了。一块儿坐飞机走罢。”我谢了他。我那个时候很坦然，因为我已经跟地下共产党有了联系，我不害怕。这个话当然不能明白的跟他说。我就跟他说我还是再呆几个月看一看，再观望观望，我想一下子对我们不至于会怎么样，要不行话我再走。我就谢绝他了。（杨宪益口述，1994年5月9日，北京）

杭立武走了，从此与杨宪益永别。今天，当内战的烽烟平息五十多年之后，对国共两党用武装斗争的方式来争夺和交接权力的“玄黄之变”，后人们可以看的更清醒更超脱。对于国共两党的争端，作家李锐说了一段话：“由于国共两党在内外交迫的历史限定下，都各自坚持了以武装斗争夺取国家政权的道路，所以在一场反复的、你死我活的军事较量中，已经预先排除了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已经预先排除了相互间合法生存的可能；没有对国家合法地位的承认，也就没有任何“宪政”的可能。所谓的民主和自由就变成消灭对手之后的“理想”假设。

“当年，由于政权更替导致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一场“走”与“留”的抉择，李锐称之为“新文化的生死劫”。正如李锐所说，“面对着城外隆隆的炮声，所有对于主义的探讨、设想，所有对于思想的追问、争论，所有写在纸上的判断、推理，全都变得无足轻

重，全都简化成一个迫在眉睫的生死抉择——走，还是留下？”（李锐：《新文化的生死劫》，载《读书》1999年第6期）从此，同是诞生于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下的两种主义——中国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式的共产主义以及代表他们的两个政党及其知识分子分流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从此浪迹天涯，至死也无法回到自己的父母之邦。而留在大陆的另一部分人则经历了“脱胎换骨”的生死磨难。

1949年的3月底，南京似乎隐约听到了长江对岸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但是，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他们不存在“走”与“留”的选择问题。因为他们没有“选择”的资本，没有任何可供选择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条件”；他们唯有一条路——接受“现实”。而杨宪益不同，他在最后一刻仍然有“选择”的条件和可能，但他选择了“留下”。日后的历史将证明杨宪益为自己的选择承担了“当时难以预计的后果”。（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山东教育出版社）

62. 解放

1949年4月21日凌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三野百万大军发起渡江战役。国民党的千里江防全线崩溃。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杨宪益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怀着“欢欣鼓舞”的心情迎接了南京的解放。他在自传中说：

在4月22日，南京解放前夕，中共兵临长江北岸，面对着南岸的南京和其他城市，准备作最后的攻击。而在南京，所有国民党的主要官员和将军们都已逃跑，只留下很少部队守城。全城一片死寂，大多数商店都很早关门，生怕盗窃和抢劫。不过那晚什么事都没发生。大多数人晚上都呆在家里。我们也不到八点就早早地关了门。夜深时可以听到对岸浦口发出的单调而沉重的隆隆炮声。我睡的很香，对即将到来的事感到欢欣鼓舞。尽管我不知道未来的共产党政府到底会怎么样，但我对在国民党统治下看到和经历的一切感到深恶痛绝，我认为，生活在任何别的政权之下也会比国民党政权好。（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166, 雷音译）

第二天，杨宪益夹在人群中欢迎解放军入城：

第二天早上起来挺安稳。到了八点来钟，听说共产党已经从浦口那边开过来了。我就跟许多人跑到马路上看。大学的学生组织里头有共产党，也有普通群众，（他们）在街道上准备的开水、饼干欢迎，我们在那儿看，看到解放军过去，纪律非常之好，我们就拍手，有的人拿着开水给他们喝，他们说谢谢，也不停，就一直开过去。

军队向中山陵方向开去，路上经过了总统府，他们就进去把总统府占了。国民党呢一枪也没放，都跑光了。南京等于是和平解放了。听说国民党军队跑的太快了，解放军追都追不及。（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9日，北京）

南京一解放，城里的地下组织都活跃起来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民盟、民联、九三学社等组织一下子都冒了出来。他们成立了临时的“治安委员会”，开会讨论如何为新政权出力。大家积极性空前高涨，纷纷为新政权出谋划策。有人说“先把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的地方拿过来，改办《新华日报》”，不少人到报社去帮

忙，杨宪益的战友萧亦五就去了报社。而杨宪益，因为是编译馆的负责人，他的任务是“保护编译馆”。他很积极地完成这个任务，并且亲自“手提棍棒”值夜班巡逻编译馆大院。几十年后他回忆起当时的一幕，不知怎么又产生了一种“荒诞”的感觉：

我的责任是保护编译馆，不要损失。结果很滑稽，我跟萧亦五两个人组织大家，说是夜里头怕不完全，有人抢东西偷东西，共产党开进来以前我们得轮流守夜。守夜是从晚上九、十点钟以后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一个人拿一个木头棍子，我也拿一个木头棍子，满院子巡逻。（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9日，北京）

院子里阒无人迹，值了几夜一个小偷也没抓着，守夜就这么不了了之地结束了。当时，杨宪益和他的战友们的确怀着诚挚的愿望要把“国立编译馆”这个经营了几十年、有着相当雄厚学术力量的学术机构完好无缺地交到共产党手里。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编译馆最后的结局是被“取消”。从此，一大批训练有素的知识分子和专业管理人员星散各地，学非所用；编译馆的那个令杨宪益怀念不已的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也“书毁馆亡”了。

在那个阶段，杨宪益和编译馆的同人把原馆长赵士卿从上海叫了回来，开了一个“斗争会”。杨宪益回忆说：

我们把原来的馆长赵士卿——他本来想跟国民党跑台湾的，没有跑掉，没有船、飞机——他在上海，我们把他又叫回来了，回来了就开了一次斗争会，没有打他，就骂他。把他骂的灰溜溜的走了。（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9日，北京）

同是知识分子的杨宪益和他的战友们，开批判会“斗争”了政治信仰不同的另一位知识分子。在当时那个“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的年代里，向一个失败的政治对手投掷石块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更有甚者，那一段时期，一大批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在报纸上写文章批判自己的“改良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从此，“批判别人”和“批判自己”不再只是昔日“解放区”的特产，而成了全中国的社会风气。知识分子们自己开了这样的头，以后的日子就可想而知了。

63. 新政权的忠实拥护者和代言人

一解放没几天，“上面”派了一个叫赵卓的军代表来领导他们。赵卓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杨宪益和南京图书馆、博物馆及其他高等院校的负责人召集起来“训话”。杨宪益回忆起这个人的“风采”：

他来了，穿草鞋，肥大的布裤子，一个不像样子的样子。来了就向我们训话。很凶哇。因为那个时候觉得我们这边是国管区的人，虽然都算是投降了，还是觉得你们这些人很不可靠的。他光着腿，还把草鞋脱下来，一边抠着脚丫子，一边训话。后来我才听说赵卓原来还是大学生，是个知识分子呢。不过他那时候要时髦，土的很。那时候新参加共产党的要装土八路要比真正的老土八路还要土的多。（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9日，北京）

所幸赵卓很快就从“上面”得知杨宪益是“地下工作者”，改变了对他的粗暴态度。“上面”对杨宪益十分信任，委任他当编译馆“接管工作组组长”。他这个组长的“权利”就是一切服从上级的“指示”。上级派了一个年轻人曾宪洛（曾国藩的曾孙）做传达指示的联络员。赵卓一声令下，让全馆上下清理旧档案，把“没用”的档案全部扔掉，全体员工忙碌了整整一个星期（此举后来受到中央政府指责而停止）。后来，上级暂时把编译馆划归出版总署，实际学术工作处于完全停顿状

态。半年多之后，中央宣布“撤消”编译馆，全体人员另行分配工作，编译馆的办公楼后来也当成了工厂厂房。杨宪益尽管对编译馆被撤十分心疼，但他无条件地服从了这一命令。那时的杨宪益全心全意地拥护共产党新政权做的一切决定。

解放初期，共产党在老百姓中的威望如日中天。而杨宪益的观察视角则另有重点：他看到一些共产党高级干部在取得胜利之后仍然保持谦虚俭朴的作风，从而加深了对他们的钦佩。在自传中杨宪益谈到了对共产党第一任南京市市长柯庆施的印象：

解放后没几天，南京来了个共产党的新市长。他是个中年老革命，叫柯庆施。他几次请我去他那儿，吃顿饭，聊聊天。那些日子里共产党的官员非常俭朴，从不象今天这样把时间和金钱花费在豪华宴会上。我们每次只吃四小碟普通菜和一碗汤。柯市长非常和气，我们相处得很好，不拘礼节。他是安徽人，我祖籍也在安徽，所以他认我为老乡。这个新市长没有汽车。来往或骑车或步行，像其他干部一样。这些事给我非常好的印象。（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170，雷音译）

后来，杨宪益又接触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董必武和陈毅，这些人的丰功伟绩和他们的朴实无华恰成正比。杨宪益对他们充满了崇敬，他在自传中说：

我喜欢和尊敬他们每一个人。这些共产主义老战士从不摆官架子，就像普通老百姓一样。很遗憾，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官员没有保持这个好传统。（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170-171，雷音译）

杨宪益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为新政权服务中去了。他参加了南京市政协和南京市民革的组建工作。他怀着真诚的愿望，认为新生的政权会建成一个真正民主的、各党通力合作的“联合政府”。他在自传中说：

我所在的地下组织合并到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它是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被称为“民主党派”的几个组织之一。当时的思想是建立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党派的统一战线，通力合作组成一个中国的新政体。这个政体有一个人民代表大会，一个包括所有政党的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和一个政务院。政务院是这个政体及各个政府部门的执行机构。（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171，雷音译）

杨宪益完全抛开了自己喜爱的学术研究和文学翻译，成了一名“政治活动家”和“开会专业户”。他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发言，以“民主党派”的名义表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和措施，他代表南京市民革草拟了“所有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和讲话”，发表在中共南京市委机关报《新华日报》上。他还写了一系列文章，宣传和“解释”中共的经济政策、土地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文艺政策乃至宗教政策。《新华日报》全部登载了他这些文章。在那些日子里，杨宪益简直成了中共的“代言人”。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却早已把自己当成“党的一员”。远在1948年底，杨宪益就向地下工作时的朋友孙祥麟正式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这个愿望虽然没实现（孙在南京刚解放就被调离南京），他仍一如既往努力工作。在那段“军事共产主义”时期，他与共产党人一起没白天没夜晚没星期日地进行草创新政权的工作，他疏忽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连乃迭生他们的老三、小女儿杨焜他都不在身边。那时他有一大堆头衔，除了编译馆“接管工作组组长”以外，他还是南京市民革筹委会负责人，中苏友好协会理事，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理事，最后他被任命为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尽管忙的昏天黑地，杨宪益的心情却很愉快。他回忆说：

我们那时候气氛非常好啦，我也很积极，跟他们（共产党人）打成一片。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非常拥护共产党。到了五一节一块儿唱国际歌。……我尤其更顺，整天忙，等于统战部的一员。早上也忙晚上也忙，那个时候也不讲究钟点。

（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4日，北京）

杨宪益多次说过一句话：在南京我跟党的关系是很好的。然而，就是在解放初期短暂的“蜜月”期中，杨宪益还是经历了几件他终生难忘的不愉快的事。

64. 紫石英号事件

1949年4月21日，正准备发起渡江战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与行驶在长江上的英国军舰发生冲突，英舰《黑天鹅号》和《紫石英号》中弹受伤，解放军也有伤亡。事件发生后，新华社发表消息抗议“英帝国主义的挑衅行为”，因为英国的军舰竟然在人民解放军渡江时“首先向解放军开炮，打死打伤人民解放军252人”。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与此同时，英国“泰晤士报”则说是解放军先开炮射击，英军舰开炮是“自卫还击”。英前首相邱吉尔在议会上发言指责中共炮击的“暴行”，要求英国政府派航空母舰“实行武力报复”。英首相艾德礼则在议会中宣称“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在长江行驶，执行和平使命”，因为它们“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许可”。中英双方各执己言，一时舆论大哗，英美报纸均以头版发表消息，《紫石英号》事件成了国际瞩目的大事件。

杨宪益在《新华日报》上看到了《紫石英号》事件的报道后的第一反应与他的共产党同事们大相径庭。他在自传中说：

我当时觉得英国军舰做出这种挑衅行为真是太古怪了。因为英国政府对中国的政策和美国人不一样。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而英国知道国民党政府行将崩溃，不想步美国后尘。几天后我看到一张英国报纸，报上说是中国军队先开火，他们才还击的。我觉得这个说法更令人信服。（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175-176，雷音译）

凭着对英国外交政策的熟悉和了解，凭着对当时形势的判断，杨宪益得出“英国报纸的说法更可靠”的结论。他向统战部的同事说出了他的想法，却受到了“立场错误”的批评。他回忆说：

我跟统战部的同志们聊天，我说这个事情恐怕“泰晤士报”说的是真的。它的战舰开过正好碰到我们的船只，它不会无缘无故先开炮的。它也不敢。可能是我们先开的炮，“紫石英号”是被迫还击。恐怕新华社是弄错了。他们（同志们）说你怎么不相信新华社反而相信英国报纸呢？恐怕你这还是个立场问题呀。我只好认错。这个问题就搁下了。当然，他们事后还是对我记了一笔账吧。（杨宪益访问谈话，1994年5月9日，北京）

使杨宪益感到又惊又喜的是，他在四十年后看到了“自己人”披露的《紫石英号事件》的真相。他在《自传》中说：

去年（1989年）《人民日报》上有一篇中国海军官员写的文章，是关于四十多年前那次《事件》的。他说，他正是那艘中国战船的船长，是他下令首先向《紫石英号》开炮的。事件发生后他不敢向记者说出真相。所以，一切指责都落到《紫石英号》头上了。我感到，过去了这么多年，终于证实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176，雷音译）

遗憾的是杨宪益记不起文章作者的名字。笔者特地到《人民日报》社去查询了八十年代所有的《人民日报》光盘，奇怪的是没有找到这篇文章，却意外地查到发表于1989年2月1日《每周文摘》的叶飞（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回忆录《征战记事》的文摘，较全面地披露了《紫石英号》事件的真相。文章不长，

摘要如下：

4月20日上午，英国军舰紫石英号、黑天鹅号、伴侣号、伦敦号与国民党军舰相伴，由东向西驶进我二十三军防区下面游弋。当晚，我中路军突破安庆芜湖线，渡江至繁昌、铜陵、荻港地区。21日下午，在我东路军渡江前，紫石英号等军舰竟然再次从长江上游向我战区驶来。

大约下午4点半钟，离渡江时间只有一个小时了。二十三军军长陶勇同志来电话报告，就在我渡江地段对面江上两公里处，有两三艘军舰游弋不走，请示是否将其驱逐。

我接到电话后，开始以为是将要起义的国民党舰队，因为军委和总前委通报过，林遵将率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起义，并规定了联络信号。我便打电话问：“这些军舰是不是挂的规定起义的联络信号旗？”陶勇同志说“挂的是花花绿绿的旗，大概是洋鬼子的。这些军舰老是在我们正面长江上不走，妨碍我们渡江，有点不怀好意，是否把它打掉？”我考虑只有半个小时我十兵团就要启渡，事不宜迟，于是我下令前沿观察所升起信号，警告这些军舰迅速离开我军防区，如果不听，就开炮赶走它！

命令发出后，我前沿就升起信号，发出警告。这几艘英国军舰看到我军信号后没有任何反应，反而将炮口转向我军阵地，这时，渡江时间已近，不能再等待了。

“开炮！”榴弹六团和部署在沿岸阵地上的炮兵都投入了炮战。长江上水柱突起，烟卷波涛。黑天鹅号带着浓烟溜了，紫石英号也被击中，在江上颠簸着……

正在这时，野司来电话查询：“你们怎么同英国军舰打起来，谁先开的炮？”我立即回答：“英国军舰先开的炮。”电话搁下后，我马上摇通了陶勇同志的电话。我说“江面上的军舰是英国军舰，我们把英国军舰打了，上面来查情况哩。”陶勇同志怒气冲冲地说：“有什么好查的！我最好的团长邓若波都给他们打死了！文武双全的人哪……”他说不下去了。

于是，我和陶勇订好了“攻守同盟”，不论谁问，都说是英国人先开的炮。

第二天上午，英国远东舰队司令布朗特率领英国军舰开来报复，搅乱了我军正在渡江的后勤和民工船只，造成了一些损失，我军又以猛烈炮火将其击退。接着，英国皇家海军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他们“受到敌对部队的攻击”，舰上人员亡42人，伤66人，其中有舰长卡格列。远东舰队第二指挥官、皇家海军中将马登也受了伤。

……

后来，紫石英号趁江陵解放号客轮经过镇江下驶时，强行靠近该轮与之并行，靠客轮掩护才逃出了长江。举世瞩目的“紫石英号事件”再没有引出更大争端，就这样不了了之。

这篇出自第一当事人（叶飞时任三野第十兵团司令员，负责指挥长江江阴段渡江战役）的回忆文章揭开了被人为地隐蔽了整整四十年的事实真相。作为争端的挑起者，叶飞和陶勇（解放后担任东海舰队司令员的陶勇于文化大革命中自杀）居然能用攻守同盟的方式掩盖事实真相达四十年之久，决不是偶然的。这个事例的典型性在于，当功利性的“革命目的”大于一切之时，任何超越性的价值都可以被弃置不顾，甚至连基本的伦理“底线”（不撒谎不欺骗）都保不住。当时参加渡江战役的人有成千上万，知道事实真相的大有人在。可是，在强大的压力和狂热的“反帝”情绪笼罩之下，居然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出真相。谁也不敢（不愿？）冒天下之大不韪站在“反革命”和“帝国主义”一边。在“革命利益”和“民族利益”

高于一切之时，“站稳立场”是第一位的。只要“站稳”了“革命立场”，撒个谎算什么？而叶飞在去世之前亲自向自己的同胞说出了事实真相，最终证明他是个诚实的人。

65. 甲骨事件

“甲骨事件”发生在1951年1、2月份，是由当时的加拿大大使馆临时代办切斯特·朗宁（Chester Ronning）引起的。事件本身并不复杂：朗宁先生在奉命回国之前，将已故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收藏的满满一箱价值连城的商朝甲骨片通过杨宪益转交给了南京市博物馆，使这批稀世珍宝失而复得。这明明是一件大好事，可杨宪益和朗宁先生却为做了这件好事而受到了牵连。杨宪益在自传中说：

我和朗宁很熟，他常请我吃饭，一起鉴赏他的中国古玩。这些古玩是从当地古董商那儿买来的，多数是赝品。由于中国政府不承认仍然留在南京的加拿大大使馆，所以切斯特·朗宁只被当作普通外国公民。一天晚上，朗宁邀请乃迭和我去吃晚饭。饭后他说，由于加拿大政府决定跟美国站在一起，他很快就要离开中国了。在清点使馆财产和打包储藏时，他发现一个旧柜子里有许多骨头碎片，是一个叫明义士（Menzie's）的传教士留下的。明义士早已去世。因为物主已经不在，他可以随意处置这些东西。他觉得这些东西像是商朝的用作占卜的甲骨碎片，上面有甲骨文。他请我鉴别这些古董，看看古董商们是否愿意收购。我经过仔细鉴别后，告诉他这些无疑是商朝甲骨，至于它们是真是假，我不敢肯定。我说，如果是真的，它们应该送往博物馆。让古董商得到它们则太可惜了。他说他非常愿意把它们送往南京博物馆，但是他与地方政府没有联系。他提议如果我真认为这些东西有价值，他想把这些东西给我，让我来处置。我答应了。第二天，这些东西连同那个柜子一块儿送到了我家，是一个年轻人力车夫送来的。一共有四千多块甲骨。我立刻给南京博物馆打电话。博物馆的女馆长曾昭燏（雷注：曾昭燏，字子雍，湖南湘乡人，曾国藩的曾孙女）是我的老朋友，也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她在伦敦大学主修埃及学。她立即把甲骨运到博物馆。经过鉴定，她打电话给我，激动地说这些就是著名的“明义士商朝甲骨收藏”。外界以为这批甲骨早已被运往国外了。这批甲骨大部分是真品，只有少数赝品。这批收藏的发现对于古代商朝历史和语言的研究是个重大贡献。她马上报告北京，中央政府一定会为这一贡献而感谢我。（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177-178, 雷音译）

那一次，向来孤傲矜持的曾昭燏一反常态，兴奋地在电话中说“这是了不起的一笔宝贝。我们以为明义士的东西早就丢了，你居然又给他收回来了。”她还说要让中央给杨宪益发“奖状”（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4日，北京百万庄）。当然，杨宪益没有得到中央的“奖状”，相反，他还挨了一顿批。一位听到电话的同事当即批评杨宪益对这事“处理不当”。杨宪益在回忆中说：

南京统战部的同志跑来跟我说：“副委员长，你这样做不妥当。我们跟外国现在没有联系，你手头的这批东西不应该通过你私下收授交给博物馆，应该通过官方，说加拿大使馆里有这么一批东西，我们就可以给他们判罪，说他们私藏了我们的东西。”我说人家明明是愿意把这个东西交出来，没法子交，托给我，让我转给博物馆的。我就是转一下手。他说那也不对。原则上不对。我们跟外国使馆没有这个关系。（杨宪益访问谈话，1994年5月5月14日）

对人对事从来不设防的杨宪益是公开在统战部的办公室给曾昭燏打电话的。尽管郎宁曾叮嘱过他不要说出自己的名字，大大列列的杨宪益仍然把郎宁全盘托

出。听到电话的那个同事立刻向统战部领导汇报了这件事，领导当即批评杨宪益“不懂政治”，让“外国帝国主义间谍钻了空子”，“离间了共产党政府和民主党派的关系”。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甲骨事件”和“紫石英号事件”一起，成了杨宪益“丧失阶级立场”和“丧失民族立场”的两个典型事例。

而此事的另一位“肇事者”朗宁先生的遭遇更险。为这事，他受到了南京市公安局的反复盘查。离境时他又受到种种非难。非但他的行李受到彻底检查，还在深圳罗湖桥被边防警察搜身，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搜了个遍。作为外交官，他受到了不应有的侮辱。他的所有私人照片的底片都被没收，还差一点不让他出境(刘广太：《郎宁传》，河北教育出版社)。

需要说明的是，郎宁先生之所以要把这箱珍贵文物委托杨宪益转交给中国南京博物馆而不是由他自己出面，有他的苦衷。当时，毛泽东宣布在外交上“重起炉灶”，一律不承认原有的外国使馆。郎宁和南京其他国家的外交人员的地位都很尴尬（他们之所以留在南京而没有跟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就是有意承认共产党新政府）。中国在解放初期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对西方集团持敌对态度。特别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社会上弥漫着强烈的反美英及其西方盟国的空气。在这种时候归还一个西方传教士收藏的国家特级文物无异于“引火烧身”。如何处理这一箱烫手的宝物——这个棘手的难题使郎宁彻夜难眠。当时一些尚滞留在南京的西方国家的外交人员甚至建议他干脆毁掉这箱“老古董”，以免惹祸。郎宁经反复思考才决定求助于时任南京市政协副主席的老朋友杨宪益。结果，他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挪威裔加拿大人郎宁的父母是美国籍来华传教士。他本人于 1894 年出生在中国樊城，能说一口地道的襄樊方言。郎宁 13 岁（1907 年）才离开中国，他的母亲在中国去世，安葬在樊城。他的早期经历和中国底层背景使他较深地了解中国的穷苦人，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一直抱同情的态度。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郎宁曾积极敦促本国政府早日承认共产党新政府，他向加拿大外交部发回的《每月报告》往往大量反映新中国的各项成就，以至当时加拿大的外交部长怀疑他报告的“真实性”。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郎宁甚至以“诗一般的语言”描绘敢于向美国挑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刘广太：《郎宁传》，河北教育出版社)。1954 年他作为加拿大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的主要代表兼代理团长对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持友好态度，成了周恩来的朋友。1970 年 10 月中加建交后，郎宁作为周恩来亲自邀请的客人于 1971 年 5 月访问了中国。周恩来的邀请算是给郎宁“平了反”。从此，朗宁由一个“帝国主义间谍”变成了“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此后，郎宁于 1973、1975 和 1983 年三次回樊城“探亲扫墓”并到各地参观访问，分别受到周恩来、黄华和王炳南的接待和礼遇。郎宁最后一次来华（1983）时已 89 岁。次年冬（1984 年），90 高龄的郎宁在加拿大去世。

而曾昭燏，那位深知这批“明义士甲骨收藏”文化价值的南京博物馆馆长却于 1964 年 12 月 22 日自杀身亡。她从南京灵谷寺塔顶上一跃而下，结束了年仅 55 岁的生命。曾昭燏终身未婚，友人程千帆说她“位高心寂，鲜友朋之乐，无室家之好，幽憂憔悴”，终至自戕。而据杨宪益说，她是被斗而死。在 64 年城市四清运动中，“上面”把 49 年国民党运送故宫文物到台湾去的账算在她头上，她选择了死(杨宪益访谈，1994 年 5 月 14 日，北京百万庄)。66. “代言人”受挫

前面已经说过，南京时期的杨宪益写过很多宣传共产党各项政策的文章，登载在市委党报《新华日报》上。党组织非常欢迎他的文章，几乎是“有文必登”。可是，1951 年初发生的一件事却使杨宪益的“义务宣传员”的生涯宣告结束。

当时（从1950年7月底起），中国基督教界发起了“自治、自传、自养”的三自运动，该运动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为了配合宣传党的宗教政策，杨宪益写了一篇论中国人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文章，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这篇文章竟给退了回来。他回忆说：

那个宗教界的三自运动开始了。要我写（文章），我就又写了一篇。我说这个西方的基督教过去对我们也做过些好事情的。比如说利玛窦和汤若望这一大批传教士在明清两代的时候帮助我们一些新的知识，也做了一些好事。写了这么一篇文章又送了去。当时负责新华日报的是石西民，石西民过去跟我很好，这次见了面有点不好意思。说这篇文章我给你画了些红杠子，希望你不要见怪。我们正在开会，他（把文章）还给我了。我一看，用红笔画的“杠杠杠杠”，删掉了一大部分，然后还有惊叹号。就是认为我的话说过头了。我看了以后笑了笑，也没说什么，就把那篇稿子收回了。我说那就算了吧，这篇稿子不要登了，我也没有改，就完了。以后新华日报我也不写文章了。（杨宪益访问谈话，1994年5月14日）

当时的大背景是这样的：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政务院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该决定旨在切断大陆所有文化教育医疗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一切联系（主要是经济联系），“肃清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文化侵略的影响”。为了配合宣传这一政策，报纸上登载的全是一面倒的控诉揭露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及传教士的罪恶（充当帝国主义间谍）的文章。在这个时候，杨宪益居然说基督教传教士在历史上对中国文化发展起了“好作用”，当然是非常“不合时宜的”。

事情虽然不大，但对杨宪益的思想却有不小的影响。他在自传中说：

我意识到并不是我所有的想法都符合党的路线。所以，我停止给报纸写文章。在南京期间，我跟当地共产党政府的关系十分好。柯市长和其他官员对我态度很热诚，很尊重我。从没有发生过争端。但是偶然间——例如上述事件——使我意识到我必须对自己的看法有所保留。这是我之所以在解放后最初几年中没有再次申请入党的唯一原因。我选择留在党外，做一个“同路人”。（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172, 雷音译）

仅仅三十五年之后，1986年大陆出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有关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的词条上，对这些明末清初到中国传教的天主教耶稣会士们“传播西方科学知识，沟通中西文化”的贡献做出了肯定，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67. 选举风波

上述事件过去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的性质比前几件都要严重，对杨宪益的影响更大。这场风波使杨宪益决心放弃“从政”生涯，回到了自己的本行，也使他最终离开了居住过五年的南京城。

杨宪益参加的组织全称叫“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任全国主任委员）。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建议它与另外两个组织（李济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蔡廷楷任主席的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合并，统称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叫“民革”。三个山头合并为一个山头，每一个“老人”都要有一个合适的“位置”，各路人马都要照顾到，这颇使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费了一番心机。而在南京解放前夕，一些原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和军政官员见大势已去，

纷纷倒戈起义，参加“革命”了。共产党安排这些头面人物都进了“民革”。但是，党没有让这些原国民党人担任民革的重要职务，而是让杨宪益和邵恒秋这两个连国民党员都不是的年轻人当了南京市民革筹委会的负责人。这种安排引起一些“老民革”的议论和不满。党组织似乎也意识到杨宪益和邵恒秋的“资历浅”，“代表性”不够。柯庆施曾不只一次当面说邵恒秋“什么都好，就是两点不好：一个是太年轻，没有胡子，不像一个民革负责人。二，他连国民党员都不是”（邵恒秋访谈，1999年2月14日，北京）。党领导觉得应该找个更具“代表性”、资历更“老”的人来支撑南京市民革的“门面”。（邵恒秋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当时“他们（中共党领导）认为南京民革不像国民党”。党说“‘民革’嘛总应该像个国民党嘛。”）于是在筹委会变为正式委员会之际，统战部找到了一个老国民党员、原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李世军，安排他通过“选举”进入“领导班子”，并进而担任第一把手。深谙领导意图的邵恒秋完全顺从党的安排，而不明就理的杨宪益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原本对国民党旧官僚政客就十分厌恶，现在看到一个“老国民党政客”居然想进“领导班子”当第一把手，他觉得不能等闲视之。临选举前，一些民联的青年同志找杨宪益商量应付办法，杨宪益公开说出了他的观点：应该由邵恒秋担任南京市民革的第一把手，至于他自己，当第二第三把手都无所谓，但前几名都应该是“老民联”的人。而那个李世军呢，他的票数不应太多，让他的名次往后放。有人当场记下了杨宪益的话，事后却向领导上汇报了。

选举的那一天，一个原国民党立法委员在投票以前忽然“跳出来”公开“揭发”杨宪益操纵选举，“玩弄选票”。证据就是写有杨宪益上述话语的那张纸条。这一下，舆论大哗。杨宪益的威信大跌。当场他的票数就锐减了三十多票，李世军的票数却上升到第二位。

选举后，在柯庆施参加的一次小型会议上，新任统战部部长刘述周（原统战部长由市长柯庆施兼任）当面不点名地严厉批评了杨宪益，说他“挑拨离间，破坏团结，是何居心（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4日，北京百万庄）？”第二天，在民革的会议上也有人向杨宪益提出批评，杨宪益做了检讨。

这是解放以后杨宪益受到的第一次大打击。这次打击标志着他“从政生涯”的失败，结束了他短暂的“春风得意”的日子。这次事件影响深远，杨宪益在访谈中谈到这个事件时说：

既然共产党决定让李世军来领导我们，主要的原因大概是觉得杨宪益太幼稚，邵恒秋也比较差。所以觉得国民党（民革）还得有一个有经验的老人、在国民党里头有点声望的人做领导比较合适。我后来估计党是这样的意思。可是那个时候我没有觉得。我觉得我和邵恒秋、肖亦五搞民革搞的挺热闹，挺好。还认识了许多其他的朋友。结果介绍进来一个李世军，是个老国民党。我不大喜欢这些老国民党政客。李世军也不是什么很坏的人，不过我总对他们有偏见。我总觉得要真正作为一个忠实于共产党的民主党派应该还是邵恒秋比较可靠。（杨宪益访问谈话，2002年1月31日）

尽管杨宪益的本意是一心为共产党着想，但是他在行动上“没有和党保持高度统一”，而是坚持按照他自己的认识和意愿行事。他反对李世军当第一把手似乎是“左”的观点，但他的行事方式却沁润着自由主义之风，这和党的组织路线与纪律必然会发生冲突。

他的朋友邵恒秋说：杨宪益在这方面没有政治经验。这句话一语道破了玄机。杨宪益事后对比他与邵恒秋的区别时也说：（在政治上）“他懂，我不懂”。这一字之差决定了两人今后不同的道路（邵恒秋在从政的道路上一帆风顺。后来成为

民革中央组织部长)。

选举事件的影响深远。杨宪益到北京以后，南京市委统战部将他在民革选举中的“错误”反映给了外文局党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笔账又被提了出来。有关人员还专门找邵恒秋等人“外调”，作为杨宪益在 1951 年就有“反党言行”的“罪证”。(邵恒秋访谈，1999 年 2 月 14 日，北京)

关于这次选举还有值得一说的话题：这场充满了戏剧性的选举风波使一对朋友站到了敌对的双方，成了对头。原来，选举那天公开跳出来发难反对杨宪益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老朋友、胖诗人卢冀野。卢冀野在国民党当政时是个名人。他是立法委员，社会贤达，身兼各种头衔和职务，与国民党高层和共产党领袖人物都有广泛来往；杨宪益却是个没什么名气的后生小子。解放后杨宪益的社会地位正好与卢冀野掉了个个儿：他是新政协的副秘书长，市政府的“领导成员”，经常出席各种活动，报上也时时见到他的大名，而卢冀野却成了什么也不是的“闲人”。卢冀野在解放后找过杨宪益，请他吃饭，希望他提携一下老朋友。杨宪益也不忘旧情，他介绍卢冀野进了南京市民革筹委会。但是，他们两人毕竟政治观点不同，在民革选举中，这种不同的观点表现为公开的对立。前面说过，由于一些“起义”过来的老

国民党人士对共产党让杨宪益和邵恒秋这两个非国民党员担任南京市“民革”的负责人不服气，党组织挑选了一个安分守己的老国民党左派人士李世军来撑门面，并且决定举行一次“公开选举”。这一下使那些原国民党人大为鼓舞，他们接受了错误的信息，以为得到了“民主选举”的权利。这些人本来就有丰富的“竞选经验”，这次更是全力以赴，希望通过李世军当选打开一个“缺口”。当他们获知杨宪益的“纸条”时，都很气愤。卢冀野的“诗人”脾气发作了。他拿出了当年大闹国民党参政会的干劲和勇气，站出来为李世军打抱不平了。他的“当场揭发”获得了成功。李世军以高票当选，而杨宪益的票数被拉下去了许多。卢冀野的行为让杨宪益很伤心，从此他们两人断绝了往来。当他们再见面时，已经是隔着“阴、阳”两界了。那是在卢冀野的追悼会上。死亡把他们永远分开了。

奇怪的是，卢冀野的死居然与这次选举有密切的关系。那次卢冀野大闹选举会，是为李世军打抱不平，与党的意见并不矛盾。为什么反而引起党的不满呢？杨宪益回忆说：

卢冀野那么一闹，虽然统战部没有批评他，可是就开始了解卢冀野这个人老实不老实了。一调查，查到了一个叫易君左的写了一首“反诗”。易君左也是个才子，是卢冀野的老朋友。他在解放前用毛泽东“北国风光”的原调写了一首词骂毛泽东。那个时候毛主席在重庆写了一首“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那首词，不是报纸上都夸奖了嘛。那个时候我在重庆，一天，卢冀野把我拉去，认识了易君左。我们三个人晚上喝酒，易君左也写了一首词，骂毛泽东的。那天晚上卢冀野笑着拿来给我看，他（易君左）把毛泽东说成是“自己是培塿（小土堆）”，“还与天公试比高”。我听了很不高兴，但没有表示意见。卢冀野很欣赏这首词。这首词有人揭发出来交给柯庆施了。……当时统战部、柯庆施对卢冀野有意见，主要是这两件事，一个是他选举跳出来讲了一些话，另外，他跟易君左是老朋友，易君左写了反诗。统战部对卢冀野就很不客气了。原来他（卢冀野）希望到南京大学去教书，继续做教授的，已经交涉的差不多了，后来忽然说不请他了。（上面）发话了，不请他了。就是因为这个，卢冀野就一落千丈，觉得完了。他在南京没有出路，结果就病死了。很快就死了。（杨宪益访问谈话，2001 年 11 月 14 日，2002 年 1 月 31 日）

原来，所谓的“民主选举”，就是让大家安分守己地按照党的意愿选出党所提名的“候选人”。中间不能“横生枝节”，更不能有反对意见。杨宪益固然由于坚持己见而受到了党的严厉批评，但是党更不能容忍卢冀野这种肆无忌惮的作风。党十分清楚这种作风及隐藏在此作风背后的思想观点对一党专政的政权的威胁性。果然一调查，查出了他的问题。尽管“反诗”并不出自卢冀野之手，但是他同意并欣赏的态度就足以定他的性。

卢冀野在抗战期间担任立法委员时，与周恩来和董必武都有来往。解放后他特地到北京去看望周、董。董必武见了，并请他吃饭。而周恩来太忙，没有立刻见他。他一直耐心等待。忽然在两三天后的一天半夜里，周恩来办公室通知卢冀野说，总理现在有时间，请他立刻去。睡梦中被叫醒的卢冀野一看正是深更半夜，怎么选在这时候见他？他的诗人脾气又发了，居然拒绝了周恩来的邀请。就这样，卢冀野错过了这惟一的机会。回南京后他向杨宪益谈起这次北京之行，还为周恩来的“怠慢”而气愤不已（杨宪益访谈，2002年1月31日，北京小金丝胡同）。怪不得卢冀野的“右派朋友”梁实秋和他的“左派朋友”杨宪益在多年之后回忆起这位老友，对他的评价却相当一致：卢冀野这个人“天真，太天真”。

杨宪益参加了卢冀野的追悼会。在追悼会上，一向很少流泪的杨宪益哭了。无声的眼泪倾诉了他无法说出的一切。

关于李世军也可以说几句。他担任了南京市民革的负责人以后，一直小心谨慎，从不“乱说乱动”，可是反右时仍然被划了右派。邵恒秋说他在57年鸣放时什么“言行”也没有，仅仅因为他是南京市民革的头儿，和民革系统的右派名人陈铭枢、谭惕吾、龙云、黄绍雄等相识或相熟，就把他打成了右派。可以想见，他晚年的日子也很悲惨。

68. 华东人民革命大学

选举风波这么一闹，杨宪益对他的从政生涯突然产生了一种厌烦感。他觉得，自己在南京有些呆不下去了。他想换一个环境，他想重新回到大学里去。乃迭十分高兴他有这种想法。因为自从杨宪益热心投身政治以来，已经大大地疏忽了她及孩子们。他一天到晚开那些“毫无意思的会议”，经常在晚上不回家睡觉。他出席各种会议和宴会，做报告，发文章；他会见共产党高层人物和国际友人，与社会各阶层人士结识交往，恰恰冷落了自己的妻子和家庭。这段时期是自杨宪益和戴乃迭结婚以来他们两人在观点和感情上第一次出现分歧和疏离。现在好了，宪益终于要脱离“骯髒的政治”，要回到她的身边了。南京市委统战部得知杨宪益的想法后并没有挽留他。他们早已经察觉到杨宪益并不是他们想要的人，他不合他们的心意。统战部把杨宪益介绍给上海复旦大学，复旦大学外语系同意接受杨宪益和他的妻子。就在这个时候，杨宪益主动要求到位于苏州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了三个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呢？他回忆说：

他们认为没有改造好的旧知识分子要经过类似党校的政治学校，叫什么政治大学的训练。像复旦大学的校长章友三和许多大学的校长都派到政治大学去了。我们民主党派是党比较信任的。民主党派的领导成员不一定要参加政治大学。（但）如果自己愿意参加的可以参加。参加了那个（学习）以后就等于是经过一次运动，然后再重新分配工作。我因为要他们重新分配我到大学去，就主动要求参加。地点在苏州。

进去了以后我才发现，那一套学习是什么学习呢，就是先读文件，教条，把

教条都看熟了以后，马列主义懂了一点了，然后就结合自己讲。等于是作“交待”。交待历史。然后大家批评。自己最后做一个检讨，总结大家的意见。目的是一方面整知识分子，另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党对这些蒋管区的旧知识分子的背景不大很清楚，通过这么几个月的自我交待呢，可以掌握一些情况，知道的更多一些。（然后）控制使用。…那一段时间我正是崇拜共产党嘛，也就跟着搞了那么一段。（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4日，北京百万庄）

杨宪益没有想到的是，正是他在苏州政治大学的“老实交待”种下了日后挨整的根子。他说：

（在苏州）有一样不大愉快，就是后来交待问题。他都是给你安排好了的，就是别人拼命要究根刨底问这些细节，总是往坏处想。这样子，有很多东西交待来交待去总是不够清楚，总是到最后很难弄的大家完完全全都满意。这个让人不愉快。我呢历史上本来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有一样，我跟外国使馆的关系很多，又买过古董，又搞过地下民革，这里头有许多东西他们总是刨根问底的问，总好像这里头有点事似的。我对这个不大愉快。后来也证明了，在那儿交待的东西他们都是存档的。都是作为你的档案。所以后来几次运动我总是感到党对我越来越不信任了。（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4日，北京百万庄）

夺取了全国政权以后的共产党，把在苏区根据地的那一套肃反和整风审干的办法推广到了党外以致全国的范围。解放初期遍布全国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学校”、“革命大学”是他们审干的第一步，这是一次范围非常广的“普查”，并由此对每个人都建立了“政治档案”。对共产党忠心耿耿的杨宪益正是在那次“革命大学”通过他的“老实交待”被建立起了他的档案。这份档案后来跟着他到了北京，并在历次运动中不断地增添“材料”，最后变成了一份沉甸甸的“黑材料”。日后证明，杨宪益后半辈子的命运和这份“档案”有着非同小可的关系。

69. 戴乃迭的苦恼

前面说过，在杨宪益热情高涨地为新政权工作的日日夜夜里，他冷落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解放后，乃迭（Gladys 的中文名）非但独自一人担起了照料三个孩子的重担，也独自一人品尝着“来自敌国的异乡人”的落寞心情。这是乃迭来华十年后首次遇到的新问题。二次大战时（在中国则是抗日战争），英国是中国的盟国，戴乃迭义无反顾地跟着爱人来到这万里之遥的“他乡”，非但没有落寞荒凉的心情，相反，她时时感受到中国老百姓的善意和热情。但是，时过境迁，接踵而至的内战撕裂了中国人盼望和平的心，也把过去的盟国分裂成“东”“西”两大阵营。内战的结果是外交上的“一面倒”，苏联变成了惟一的盟国和“老大哥”，而昔日的西方盟友美国和英国却成了“敌人”。这种政治上“冷暖”的变化影响到每一个大陆上的英美籍人士。对戴乃迭来说，她感受最深的是朝鲜战争。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联合国军出兵朝鲜。紧接着毛泽东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美国成了中国大陆不共戴天的仇敌。当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震天响，社会上弥漫着浓烈的反美仇美的情绪。而滞留在中国大陆的少数英美籍人士就成了发泄这股情绪的对象和出气筒。当时，乃迭在南京大学（前身是中央大学）外文系教书。她发现，学生们对她的态度变了，见了她就远远地躲开，再也没有同学上门请教问题和谈天说笑了。同事们对她也冷，走在校园里她往往是孤身一人，人们像避瘟疫一样回避她。更有些激进的学生故意当她的面大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或者刷写反美反英的标

语(杨宪益访谈, 2001年11月14日, 北京小金丝胡同), 似乎眼前这个金发碧眼的年轻女子一下子成了英美帝国主义魔鬼的化身(当时不只戴乃迭一人有此困境。北京大学美籍教授温德就曾受到学生的“罢课”反对)。

就在戴乃迭为人文环境的恶化感到苦恼之时, 杨宪益却混然不觉。他继续夜以继日地出席各种各样的活动和会议, 一夜一夜地不回家, 让乃迭独自忍受一个“异乡人”四周的敌意。那段时期, 戴乃迭受到的歧视、压力和冷落与杨宪益受到的信任和重用似乎恰成鲜明的对比。南京市委统战部把杨宪益当作一个“头面人物”, 重大活动都把他推到前面。杨宪益经常提到的一个例子是他多次代表南京市人民政府到火车上去慰问回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伤病员, 这是很高的“政治待遇”。正如杨宪益自己说的, 那时他“太忙, 太热闹了”, “乃迭在家里很闷”, “她好像被排到一边去了”。

然而戴乃迭没有埋怨, 没有哭, 甚至没有向杨宪益倾诉过什么。她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显示出内向和坚忍的性格。而终日忙碌又粗心大意的杨宪益没有给妻子应有的关怀和呵护。接着发生的一件事使杨宪益大为感动, 他在回忆中多次提到了这件事: 当时政府号召人民捐献钱买飞机大炮, 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南京市政协也动员到了杨宪益头上。杨宪益决心响应号召, 捐献一架飞机。当时捐一架飞机要四万元, 可杨宪益倾其所有也凑不够这笔钱。戴乃迭就把丈夫在英国给她买的钻石订婚戒指和来中国后婆婆给她的“见面礼”——金银翡翠首饰和各种各样的蓝宝石绿宝石全部卖掉, 凑够了这四万块钱, 捐献了一架飞机。这件事使杨宪益又一次看到了戴乃迭的过人之处。戴乃迭对钱财、物质利益的轻视和她默默真诚的奉献使杨宪益想起了她的父亲——虔诚的基督徒戴乐仁老先生。1999年当戴乃迭去世后, 她女儿杨荧清理母亲的遗物, 惊奇地发现母亲没有一件“祖传饰物”, 竟然连一枚戒指都没有。这才使戴乃迭半个世纪前的奉献又一次浮出水面, 为后人所知。

70. 到北京去

1951年春(在选举风波之前), 北京曾经来过一纸调令, 要调杨宪益和戴乃迭到毛选翻译委员会去工作。这是他的老朋友向达向钱钟书建议的, 钱当时是毛选翻译委员会的负责人。翻译毛主席的著作, 这在当时是一项人人称羡的事, 可是杨宪益却拒绝了老友的好意。他在自传中说:

在当时, 翻译毛主席的著作对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最受尊崇的工作, 而且我们将会得到中国大学教授的最高薪水。当正式邀请信到达南京市委统战部时, 他们对我说他们高度评价我在南京的工作, 不愿意我到北京去。但这是中央政府的决定, 所以他们无法阻止。但是, 选择权在我。如果我自己想继续留在南京的话, 可以留下来。在干了近两年的统战工作以后, 我很愿意回到学术工作上。但是我不想翻译毛主席的政治哲学著作, 而更愿意翻译中国古典文学著作。所以那件事就搁下了。我也不愿意离开南京, 我刚买了一所很好的小平房, 院子里的两棵木兰花正含苞待放。若干年以后, 在中国的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中, 我拒绝参加英译毛主席著作的事被提出来, 作为我不尊敬毛主席的证据。我不得不为自己这一件不可原谅的“罪行”进行大批判。(杨宪益:《白虎星照命》, P180-181, 雷音译)

当时“组织上”居然能允许杨宪益按照自己的意愿办事, 拒绝参加翻译“伟大领袖”的“红宝书”, 这说明刚解放时党内的个人崇拜还没有发展到文化大革命那

么疯狂的地步。但是党没有忘记这件事，到了六十年代，这笔旧账就翻了出来，作为杨宪益“反对伟大领袖”的“铁证”。

1952年夏，正在杨宪益准备到复旦大学去报到时，北京又来了一纸调令——调杨宪益和戴乃迭二人到北京参加“亚太和平会议”的翻译工作。这次不是“商调”，而是“政治任务”，非去不可。“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是建国之后由新政府组织召开的头一次大型国际会议，将有37个国家的代表近400人参加，需要大量一流的翻译人才。这次的临时调动又一次改变了杨宪益的人生轨迹。从此，杨宪益和戴乃迭成了半个多世纪的北京居民。在北京，他们接续了重庆中央大学时期和编译馆时期就开始的翻译生涯，并为此劳动了整整的后半生。

第五章北京时期（上）（1952-1966）

71. 新事业的召唤

1952年10月的北京，天空湛蓝，古木参天。浓荫婆娑之中绿瓦红墙的古建筑时隐时现，高大的古城墙在落日之中显得格外壮丽，宁静的小胡同纵横阡陌，遍布全城，与庄严辉煌的皇家紫禁城相映成趣。这座美丽的古都是戴乃迭的诞生地，旧地重游，引起她多少童年的回忆和遐想！杨宪益和戴乃迭一下子就爱上了北京。杨宪益在自传中说：

解放后的北京给我们的印象非常好。尽管我的出生地天津离北京不远，但我在童少年时代只去过北京两三次。我喜欢旧北京，但是它满是灰尘，不太干净。但是这座古城一解放就马上变得清洁起来。而且，它基本上保存着旧时的美丽：有许多称作“胡同”的静谧的小街和古董铺和旧书店，那时古城墙也没有被毁掉。1952年这里开展了一场爱国卫生运动，整个城市一尘不染。人民对新政权很满意。年轻人对未来更是充满了热情。（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186，雷音译）

杨宪益和戴乃迭一到北京马上就投入到亚太和平会议（会议日期是10月2日至10月13日）的工作中。可刚报到没两天，领导又把他们俩从会议抽调出来，专门为宋庆龄编辑她的英文版文集《为新中国而奋斗》。杨宪益和戴乃迭很快就完成了任务。赶在会议结束之前把这本文集发给了每一位与会代表（宋庆龄也送给杨宪益和戴乃迭两本由她亲自签名的文集以表示感谢他们的工作）。

短暂的北京逗留期间，他们与许多学术界的老朋友见了面。朋友们力劝他们到北京来。北大历史系的向达动员他们到北大工作，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主任初大告教授（也是留英时认识的朋友）劝他们到外国语学院教书。其中动员他们最积极、要求最迫切的却是一个新认识的朋友——刘尊棋。

刘尊棋刚解放时也在南京，他在军管会新闻处当副处长。但杨宪益并不认识他。后来他调任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副局长。在亚太和平会议工作期间他是杨宪益的顶头上司。但他毫无“官架子”，为人谦和，办事能干。他虽然是副局长，但却是国际新闻局的实际当家人（局长乔冠华另有任务）。为了搭好对外宣传机构的班子，刘尊棋从全国各地拉来了许多外语人才。著名作家萧乾、诗人徐迟、冯亦代、李荒芜等都是他的“部下”。当时，国际新闻局刚刚改组为“外文出版社”。刘尊棋任副社长兼《人民中国》的总编辑。刚满41岁正当壮年的刘尊棋对新中国的对外文化出版事业有一个宏伟的计划。正是这个宏伟的计划吸引了杨宪益。他回忆说：

刘尊棋是个很能干的人。他很会用人，也很会拉人。他在上海、北京拉了很多不错的编辑人才和翻译人才。他拼命地要拉我们参加这个外文出版社。（刘尊棋）说是要搞一个像商务印书馆那样子的，不过都是外文的，对外的，有系统的介绍中国的文化。我说这个我倒有兴趣。刘尊棋跟我商量，他说你到这儿来，主要由你们负责，我再安排一两个年轻编辑跟你合作。我们初步想把古典文学名著从《诗经》《楚辞》那个时候开始吧，一直到清末，古典文学我们想选一百五十种。当代文学从鲁迅起到现在再选一百种。我觉得这个计划我倒是很有兴趣。所以我就同意了。（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这是一个庞大而宏伟的计划！这个计划足以使杨宪益为之怦然心动，它的制定渊于一个伟大的理想：把中国的独有的文化介绍到西方，促使东西方文化的真正交流和融合。杨宪益愿意为实现这一理想付出毕生的精力！三十年代在英国牛津时，作为学生的杨宪益就翻译了楚辞《离骚》，他的直接动机是想让老师布伦顿知道“我们中国也有伟大的文化传统”。回国后，他在重庆中央大学分校教书时又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儒林外史》和《阿Q正传》。后来他到国立编译馆又开始了更为雄伟的工作：翻译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现在，刘尊棋向他描画的事业上的前景正合乎他二十多年来时断时续但从未放弃过的理想。这一次，刘尊棋向他提出了实现理想的道路。正是刘尊棋的建议促成了戴乃迭和杨宪益这一对中西合璧的最佳翻译拍档的正式形成。从此，戴乃迭和杨宪益几十年如一日的亲密合作，推出了质、量双高的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作品的译作。

戴乃迭和杨宪益一样兴奋：她可以和丈夫在一起合作，从事他们心爱的事业了！当初，她之所以义无反顾地抛弃一切来到中国，除了对杨宪益的爱以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她对中国文化的仰慕之情（她对中国文化终生不渝的热爱和呵护足以使许多中国人感到相形见绌，这一点后文还要谈到）。他们果断地谢绝了复旦大学的邀请，辞去了南京市政协副主席的职务和南京大学的工作，折价卖掉了刚刚买来不久的房子，全家搬到北京来了。

搬家到北京，有一件曲折事值得说一说：当时的上级领导有一个奇怪的规定：杨宪益一家只许从南京直达北京，中途不能在别的地方停留。杨宪益在回忆中特地说起了这件事：

那时候调工作，从一个地方到北京，只能直接到北京来，不能路上到别的地方。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大概刚解放不久，警惕性比较高。我说我们的老家在天津，我母亲我妹妹都在天津，我总得到天津去看一下子。多少年没见面了，他们一直也没看到我们的小孩儿。结果柯庆施还特别作了照顾，说是你可以特许，特别允许我从南京先到天津住个几天，然后再到北京来。（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4日）

事隔几十年，杨宪益还是不明白到底是哪一级“组织”不允许他们一家顺路去天津老家，不允许的理由又是什么？他的一个朋友、当时在南京军管会文艺处任“总干事”的邹霆说出了事实真相：原来这个规定是南京市公安局做出的（邹霆：《永远的求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戴乃迭作为一个“外籍公民”，她的行动一直受到公安局的严格限制，几十年来她一直是被当作“准间谍”对待的（当时几乎所有外籍人都是如此待遇）。戴乃迭在南京时，她的行动就受到限制。有一次她为了去一下玄武门，还得特别向公安局“报告”（邹霆：《永远的求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而杨宪益在这个问题上却显得非常糊涂。公安机关的某些人对他们早已经“另眼看待”了，他却浑然不知。几十年之后说起这个问题来，他仍然是那么语焉不详。

1999年11月，当戴乃迭去世以后，一位与她共事几十年的外文局同事说了这么一段话，代表了国内许多人的共同心情：“现在看来，戴乃迭除了是个翻译家以外，就是个普通的母亲和妻子，她就是“家庭妇女”，可我们却一直虎视眈眈地盯着她，以为她肩负着外国的某种‘特殊使命’，真是天大的笑话！”这番“盖棺论定”的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戴乃迭在中国的处境。

72. 宏图初展

从1949年解放到1953年年初，全国已经连续开展了“政治学习运动”，镇反运动，土地改革运动，批判电影“武训传”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运动。这一系列运动中，除了土地改革运动是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以外，其他的运动都属于“上层建筑”范围。实际上从49年一解放，执政党就已经开始通过对大大小小的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和知识分子的或主动或被迫的自我批判来实行对上层建筑领域的“全面占领”和“全面专政”了。由刘尊棋主持工作的外文出版社虽然不是世外桃源，但政治空气却相对宽松一些。刘本人是知识分子出身，又是业务内行，十分尊重学有专长的人。他邀请杨宪益到外文出版社来，不是要他当一个普通翻译匠，而是让他来挑重担的。刘尊棋要杨宪益以“专家”的身份“主持”实施他们共同制定的这个宏伟计划。杨宪益既是计划的负责人，又可以选择部分作品自己翻译。而戴乃迭和其他年轻的编辑和翻译都是杨宪益的助手，帮助杨宪益共同完成这个计划。

初到北京，刘尊棋把杨宪益一家安排在南河沿一座不错的“洋房”内，杨宪益和戴乃迭住两大间房，他们的邻居是法国专家戴尼丝和她的中国丈夫李风白以及另一对日本夫妇。他们在那所房子里住了近两年，直到1954年外文出版社盖起了自己的宿舍才搬家。

刘尊棋给杨宪益最优厚的工作条件：他和乃迭不用每天去办公室上班，可以在家里搞翻译；还给他找了一个出色的合作者——中文编辑李荒芜（1914—1994）。李荒芜与杨宪益同岁，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他也是个翻译家，是惠特曼《草叶集》的中文译者。李荒芜对美国文学尤其是对黑人文学有深入研究，建国前后已经出版了十多本译作。杨宪益说他“中文英文都很不错”。共同的眼光和识见以及对事业的热诚使他们的合作很和谐。他们俩很快就排出了一张表，列出了一百五十种中国古典文学和一百种中国现代文学的名单。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他们把杨宪益已经译好的《离骚》、《儒林外史》及鲁迅的《阿Q正传》出版了。杨宪益还翻译出版了郭沫若的剧本《屈原》。这些书的出版正好配合当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搞的每年一度的“纪念世界文化名人”的活动（鲁迅、屈原、吴敬梓都列名在内）。看到自己的劳动出了成果，杨宪益很高兴。

在翻译出版古典文学的同时，杨宪益和戴乃迭还共同翻译出版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和《白毛女》。之所以选择这几部作品，是因为它们获得了苏联颁发的《斯大林文学奖》。另一部获奖作品《李有才板话》的译者是美国人沙博里。

在这一段时间里，杨宪益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大概要算四卷本《鲁迅选集》的翻译了。采访中杨宪益说：

李荒芜介绍我认识了许多朋友，冯雪峰就是李荒芜介绍的。冯雪峰正好在北京，对翻译鲁迅的东西很有兴趣。我跟冯雪峰两个人商量，拟选题，出四卷本的《鲁迅选集》。第一卷都是早期作品，包括《野草》、《呐喊》、《彷徨》、《朝花夕

拾》，还有短篇小说。后三本都是杂文。因为他（冯雪峰）认为鲁迅的杂文更有价值。我们两个人同意了后三本都用杂文。选哪一篇去掉哪一篇都是由冯雪峰跟我每天下午一块儿商量，定了全部。因为有一部分过去已经翻译过了，所以就很快，大概两年以内《鲁迅选集》四卷本就出版了。（1994年5月16日访谈）

四卷本的《鲁迅选集》以它精练的选题和准确的译笔成为欧美各大学中文学生至今沿用不衰的教科书。尽管这个本子的选题从今天的眼光看可能有过分强调鲁迅后期杂文忽略前期作品的缺陷，但是在杨宪益的翻译中却是他亲自参加编辑的少有的特例（改革开放以后，外文出版社出版了杨宪益戴乃迭翻译的未经删节的《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故事新编》和《鲁迅小说选》）。以后，随着“阶级斗争”之风越刮越烈，杨宪益非但被剥夺了参与编辑的权力，而且还被迫翻译了大量与文学毫无关系的“政策讲话”和“政治宣言”，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翻译匠”，此是后话。

除了《鲁迅选集》以外，杨宪益和戴乃迭还翻译了白族民间长诗《阿诗玛》。这部优美的翻译作品的成功有编辑李荒芜不小的功劳：

李荒芜说少数民族的东西也应该介绍一些，他介绍一部云南白族的叙事长诗《阿诗玛》，我们也就翻了，翻的很快。李荒芜又建议最好找一个人画插图，就介绍了一个年轻人叫黄永玉来画木刻的插图。插图画的很好看。我就是通过给《阿诗玛》配插图和黄永玉熟悉起来了。他那时候很穷很倒霉，住在北京车站旁边一条胡同里边，只有一间半房子，是一个很穷的中央美术学院的青年教授。他的木刻很不错，画画也很好，我跟他很谈的来。（杨宪益谈话，1994年5月16日）

初到外文出版社的那两年是杨宪益心情最舒畅的两年。在社长刘尊棋的充分尊重与信任之下，他和戴乃迭大踏步地开始了他们合作翻译的事业。在生活上，杨宪益享受专家待遇，每年夏天可以和戴乃迭一块儿去北戴河度假；他当选为中国文联委员和中国作协委员，后来又成为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常委。他在1953年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大会”。就是在那一段日子里，杨宪益作为全国最著名的二十多位专家之一受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接见。这在当时是一件足以“光宗耀祖”的事情。杨宪益一直把它当作自己一生中的大事来记忆。直到九十年代，杨宪益提到这件事时仍然有一种荣誉感，尽管他对“领袖”的“皇帝气派”已经开始了反思：

可以说从50年一直到55年我的生活都是挺愉快的。对我比较重视，算是外文出版社的专家。刘尊棋对我特别好，还推荐我到中南海去过几次。是一一1954年吧，毛主席还召见过我。当然不是我一个人，大概全北京一共有二十来个人吧，里头有老画家，还有科学家。毛主席慢慢地走过来，我们都站在一排，跟他握手。他跟我们每个人讲一讲话。我当时感觉到好像一一虽然没有三跪九叩首吧，我们也没有鞠躬也没有磕头，可是感觉有点像皇帝召见的那个劲儿。共产党当然都很好，都很民主，我在南京的时候跟柯庆施在一起，我们叫他“老柯”，他也不坐汽车，就骑了一个自行车，我们一块儿一一那个时候也分了等级，吃饭要分小灶中灶大灶一一柯庆施跟我一块儿吃小灶，我们随便聊天，我觉得共产党挺民主的。可是到了北京来以后，到了怀仁堂一看见毛主席还是有点见皇帝的样子，封建的东西很厉害。那个时候毛主

席已经是一般的人不大容易见到面了，除非是在天安门上老远的挥手看一看以外，平常都很难见到了。（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尽管杨宪益感到了毛泽东的帝王威风，但他对领袖的爱戴仍然有增无减。在另一次领袖请一些知识分子吃饭的场合里，杨宪益的戏谑好动的性格使他在几杯

茅台下肚以后，竟然越过了好几个桌子去向伟大领袖“敬酒”。这个举动在西方国家或者在毛泽东的窑洞时期不算稀奇，可是到了 1954 年，毛泽东的自我感觉早已经改变，杨宪益的这个“冒失”的举动曾使毛泽东吃惊不小，最后还是周恩来给毛主席解了围。杨宪益在九十年代回忆往事时也谈起了这件事：

毛主席虽然不容易见到了，我还是见到过两三回。还有一次晚上在怀仁堂吃饭，大家一块儿吃饭，一个一个小桌吃饭。毛主席周总理还有几位坐在一个小桌上，我跟一喔，跟《保卫延安》的杜鹏程坐在一起。杜鹏程那个时候年纪也不大，那时候他胆子也大，跟我一样。结果我跟杜鹏程两个人就说我们去敬毛主席一杯酒，我们就捧了一杯酒去了。杜鹏程胆子小，躲在我后面，我满不在乎。我说敬毛主席一杯酒，结果周恩来还站起来，周恩来说主席不喝酒，我替他喝吧。他替毛主席喝了一杯酒。我们都是比较冒失的。那时候气氛还是挺融洽的。（杨宪益访谈，1994 年 5 月 16 日）

杨宪益这个人，对很多事都不在乎，连他的三个孩子是哪一年生的，他都糊里糊涂，语焉不详，却对与毛泽东仅有的几次会见记忆犹新。他在回忆往事时不厌其烦的讲述他与毛泽东的每一次见面，连同毛泽东一起看京剧听相声也津津乐道。对领袖毛泽东的无限爱戴和崇拜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共同的心理状态，杨宪益也未能“免俗”。

杨宪益之所以重视与毛泽东的会面，除了他对毛泽东作为一个革命领袖和天才诗人的双重崇拜以外，还有一个原因，他把这些会见看作是他与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的接触。作为在伦敦青年时代就接受社会主义思潮，回国后由于对蒋介石独裁统治不满而积极投向中国共产党并与中共共过患难的杨宪益，非常珍惜他的信仰和选择。在他心目中，早已经认为自己与中国共产党是“一家人”了。在南京时期，他虽与中共干部亲密共事，但毕竟只是与一些“地方干部”打交道，现在他到了北京，直接与“党中央”最高领导接触，听到了“中央”的声音，他感到格外的兴奋和激动，从心眼里油然而生出一种“被信任”的畅快感。

可惜的是，这一段“蜜月”时期非常短暂。1955 年肃反运动开始，外文出版社的出色领导人刘尊棋被诬为“叛徒”和“军统特务”，党撤销了他的职务，随着他的下台，紧接着一场又一场打击知识分子的运动，杨宪益也从一个党的“亲密合作者”、党信赖的“专家”沦为一个“控制使用对象”了。

73. 受难者刘尊棋

刘尊棋的一生极具典型性，他是中共党员中的“受难基督”。他对杨宪益的一生影响很大，值得特别写一写。

刘尊棋（1911-1993）出身贫寒，父亲是厨子，母亲是纱厂女工。他没念过大学，但他天资高，学习刻苦。1928 年他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于北平基督教青年会财政商业专门学校，然后在燕京大学政治系半工半读，旁听了三年燕京大学的课程，自学英语获得很高水平。他与当时大多数中国青年一样，思想左倾，向往社会主义苏联，曾为苏联塔斯社驻北平分社工作并积极参加组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平分盟。1931 年，刚刚二十岁的刘尊棋由他未来的妻子郑倚虹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就在同年 5 月被捕入狱，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与中共的高级干部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孔祥祜等人同狱，与他们是同一个监狱党支部的战友。两年之后，刘尊棋被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出狱。没有料到的是，正是这次的出狱使刘尊棋的后半辈子整整受难了 25 年！

1933年他在狱中以一个抗日青年的名义用英语写了一封长信给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呼吁改善狱中条件并呼吁释放政治犯。宋庆龄接信后派同盟的干事长杨杏佛专程到北平找到了胡适（胡适是民权保障大同盟北平分部的负责人），杨、胡二人找到当时南京政府在北方的最高军政长官张学良。张学良见是宋庆龄讲情，当场答应派他的英文秘书兼东北大学秘书长王卓然先生负责办理。王卓然立即陪同杨杏佛和胡适去草岚子监狱探视，找到了刘尊棋。在监狱中刘尊棋用英语与他们三人对话，回答了他们的问题，给杨胡王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事后，王卓然催促张学良在被蒋介石撤职出洋“考察”以前签署了“准保释放”的文件。不久，刘尊棋被释放。不料，国民党当局在报上捏造了一份“十四人退出共党启事”，里面有刘质文（即刘尊棋）的名字。监狱党支部见到这份“启事”后不经任何调查就开除了刘的党籍。从此，“被捕后有变节行为”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刘尊棋，尽管刘尊棋在1949年由中央组织部直接批准重新入党，但他的所谓“历史问题”并没有搞清楚。

1955年开始，先是批俞平伯批胡适，接着批胡风，紧接着就“挖”出了一个震惊全国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在这个基础上全中国范围的“肃反运动”开始了。刘尊棋被停职审查。在这个“审查”中，刘尊棋非但没有洗清自己“变节投降”的罪名，反而又加上了一个“军统特务”的罪名。事情经过大概如下：原来，刘尊棋为了对党“忠诚老实”，在“交代”历史问题时，他搜肠刮肚，想起了1942年为躲避国民党的迫害，在逃往新加坡前为了搞到出境证曾和戴笠吃过一次饭。他向审查他的干部交代了这件事。这一句交代可惹下了大祸，他立即成为“特嫌分子”，而且是十恶不赦的“军统特嫌”！刘尊棋被撤消外文出版社副社长和《人民中国》总编辑职务，“降职使用”，成了一名普通翻译。

到了1957年，党号召全体人民给党“提意见”，大鸣大放。刘尊棋又一次说了老实话。他正确地提出“在肃反运动结束以前的几年中间，被怀疑的干部名单，不是逐年缩小，而是逐年扩大”。“几年来，对非党干部猜疑、打击过重，团结帮助太少”。“对非党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估计过低，忽视他们对革命事业的热忱，蔑视他们可以贡献力量。”（谷斯范：《漫记刘尊棋》）。1958年“组织上”根据这些话把他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除行政职务，送往北大荒劳改。在政治压力下，他的家庭破裂，第二任妻子（第一任妻子郑倚虹已病逝）与他离婚。

1961年他被“下放”到湖南汨罗县农垦局干训班当了一名“敲钟工”和图书管理员。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又一场滑稽戏开演了：曾几何时，那些在三十年代和刘尊棋一起蹲过国民党监狱并把他开除出党的老革命们自己也成了“大叛徒”，这就是文革中有名的“六十一个叛徒”案件。鬼使神差的是刘尊棋又卷入到这个案件里面，并为此被关到共产党监狱里整整8年！原来在1935-1936年，刘尊棋帮助过昔日的难友孔祥祯，让地下党员孔祥祯以家庭教师的名义住在自己北京的家中一年多。那一段时间正是刘少奇经党中央批准以特殊方法——假自首——来营救狱中同志的时候，而孔祥祯正是中共北方局党组织与狱中难友的联络人。刘尊棋的家成了孔祥祯和地下党上级领导徐冰的“碰头地点”之一。“中央文革小组”把这一已经定案的事件重新翻出来，定为刘少奇的头一条“罪状”。“六十一个叛徒案”成了“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的“要案”。

1968年刘尊棋莫名其妙地被汨罗县公安局戴上手铐逮捕、关押了半个月，进行夜以继日疲劳轰炸式的轮番审问，然后又把他押到北京半步桥监狱单独监禁。一年后，专案组没有查出刘尊棋任何新问题，建议把他送回湖南“释放”。但

是一个党中央的“大人物”（此大人物在打倒四人帮后仍然是红人）却在刘尊棋的案卷上批示：“此人不能放回社会”。这一句话使刘尊棋在湖南洞庭湖赤山岛的死刑监狱里又坐了六年牢。

所幸的是，当年营救刘尊棋出狱的王卓然老先生文革时依然活着。他在 1975 年年初听说刘尊棋竟然为 1933 年之事蒙不白之冤，至今仍关在湖南监狱时，拖着病躯为刘尊棋写了一份 11 页纸的详细证明，说明刘当年“无条件释放”的真相。82 岁的王卓然老先生在为刘尊棋写完证明 20 天后逝世。这份宝贵的证明日后成为为刘洗冤的“铁证”。

1975 年 7 月，刘尊棋被“无罪释放”，1977 年刘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1978 年调回北京。1979 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对刘尊棋的“叛徒”和“右派”问题平反，恢复刘尊棋 1931 年入党的党籍。至此，这场历时四十五年的冤假错案得以改正。

刘尊棋于 1993 年去世。在他生命的最后 15 年里，他做了两件大事：一．主编了中美合作出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他是中方主编）；二．担任英文报纸《中国日报》（ChinaDaily）的总编辑。

刘尊棋是杨宪益的“伯乐”，又是杨宪益心目中的“英雄”。他那“把千万种屈辱吞到肚里，最终挺起腰杆做人”的一生被杨宪益奉为楷模。中国人有句谚语：谁笑到最后，谁笑的最好。刘尊棋终于“笑到了最后”。

但是，刘尊棋在 1955 年的噩运不仅对杨宪益的个人命运有很大影响，对中国的对外出版事业也是个无法弥补的损失。随着刘尊棋的下台，外文出版社失去了一位真正眼光远大的领导人。他制定的“要把外文出版社办成另一个商务印书馆”的宏伟计划随之付诸东流。杨宪益和李荒芜一起拟出的“一百五十种古典名著”和“一百种现代作品”的计划也从此无人问津。随着“阶级斗争”的狂风越刮越烈，外文出版社完全成了宣传中共党的各项政策的“传声筒”和对内对外阶级斗争的“工具”。

74. “内控”的开始

“内控”是 1949 年后的中国大陆特有的名词。这是指一些在政治历史或者“现行行为”上有重大嫌疑的人，但是尚未“抓住”他（她）的确凿证据或者是“时机”未到，所以有关部门对他（她）进行长期的监控。凡是受到内控的人，表面上仍然在本单位继续干他本来的工作，实际上已经与“革命群众”完全不同了。非但“组织”上永远不会信任他，而且，他会无时无刻不受到一张无形之网的监控。杨宪益从 1955 年开始，就逐渐成为了这样的人。

1955 年的先是批判胡风，后来发展成一场运动的“肃反”，牵涉到了杨宪益。原来，他在南京从事“地下工作”时为了搜集国民党的军事情报有意接触的英美使馆和国民党有关人士的关系现在成了杨宪益历史上的“可疑点”。他回忆说：

55 年那个时候反胡风开始，后来成了肃反运动。当时表面上对我还没有什么。不过后来就有一点问题了。好像对我解放前那段跟外国使馆那方面一跟英美的关系总是有些一他们有些纳闷，弄不清楚，好像有点怀疑。54 年到 55 年中间（南京）统战部就派一个同志来，很客气的问我当时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解放前我因为为地下民革收集关于英美使馆的情报又认识了一些卖古董字画的商人。有一个古董商人叫李超凡，这个李超凡在解放前跟我说过一句话，说他认识一些军统的特务，他过去也当过军统特务。所以在南京解放前夕我就跟

李超凡说过，我说你有没有办法把军统保密局里头的名单搞一份给我。李超凡说我想想办法，大概要花点钱，你花个两百美金我可以想办法给你买一份。结果后来他也没有给我办到。解放了他也不跟我提这事了。这些事我都跟党汇报过。（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这些事，杨宪益还在苏州“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受训时，就全部“竹筒倒豆子”向党组织汇报过。这一次南京市委统战部的人来到北京，他又交代了一遍。哪想到，“不汇报不知道，一汇报吓一跳”。跟刘尊棋交代了“和戴笠吃了一顿饭”的情况一样，杨宪益的“忠诚老实”也给他带来了灾难。杨宪益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流露出一种“上当”的感觉。他说：

……我觉得跟共产党都是一家人，这些事情我都跟他们交代过，可是越交代的详细他们就越觉得杨宪益这个人不简单，太复杂了。你要光是大学教授啊什么的这个人还简单一点，结果又是什么外国使馆，英国的军事参赞又是你的好朋友，你们又常出去玩儿。那时我们一边喝酒一边玩儿，同时我想收集一些材料。这些情况我都跟共产党说过，哪知道越说他们越觉得这个人不简单，会不会是一——事后我感觉到，他们怀疑我是不是脚踏两只船，双面间谍。……所以那个时候，54年到55年期间好像对我总不大放心的样子，总问我这件事后来到底怎么样，那件事怎么样，有的事情我也说不了更多，所以结果就有点不大痛快，虽然表面上对我非常客气。（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那时，杨宪益在南京“地下民联”的一位战友，解放后曾任南京市军管会文艺处副处长的青年杂文家郑造在“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被诬为“胡风分子”，郑造不堪迫害，投长江自杀了。这也牵连到杨宪益。他回忆说：

反胡风运动开始了就问我跟胡风有什么关系？这是在单位里头，在外文出版社的运动里头。那个时候刘尊棋已经倒霉了。我说我跟胡风一点关系也没有。后来大家还是一再追问我跟胡风认识的人有什么关系，跟胡风分子有什么关系。正好我听说在南京我认识的一些老朋友，比如说有一个文艺处的副处长叫郑造的被污蔑为胡风分子，后来投江自杀了，还有别的人也有胡风分子的嫌疑。他们把我也一追问我，说你们在一块儿聊天，谈文艺界的思想，是不是有胡风的东西？后来把我问急了，我说你问我，别的人——有的人跟胡风有关系的多了，比我多的多。结果后来他们也不问我了。（1994年5月16日访谈）

政治上被怀疑，立刻待遇也不同了。杨宪益说：

前几年每年暑假都让我到北戴河去度假，在北戴河我还碰到过胡耀邦，冯雪峰介绍我跟胡耀邦聊过天。到了肃反的时候忽然通知我说“这次我们请专家们到北戴河去休假，乃迭可以去，你暂时不要去了。”那个时候正是肃反运动的时候，我很不痛快，我说那好吧。可过了几天又对我说，上面说你也可以去，还是让我去了。可是我到了北戴河，冯雪峰就倒霉了，给斗了。（1994年5月16日访谈）

55年的反胡风和肃反运动是中共进一步整肃“持不同意见者”的信号标。正是从这次运动开始，杨宪益的“历史问题”成了一个“悬案”。他在“地下民联”时期为帮助共产党夺取政权做的“情报工作”在解放后反而被掌握了政权的共产党当作整肃他的理由。由于“时机”未到，所以先对杨宪益采取“内控”。所谓内控，就是只有上级领导和“保卫部门”掌握他的“疑点”，一般“群众”并不知道。表面上，杨宪益照样在外文出版社工作，但他的“政治地位”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由一个党的“亲密战友”和“合作伙伴”变成一个“政治历史有问题”的“可疑人物”了。

75. 新认识的左派朋友

到了北京，杨宪益认识了一批中外新朋友。这批朋友与他在解放前交往的朋友大有不同。他们都是“左派”，相当多数是老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或者西方的共产党）。他们大都经过千锤百炼的考验，有的人打过仗，还坐过牢。他们是一些“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与杨宪益过去交往的“自由主义派”知识分子完全不同。杨宪益对这些人充满了由衷的敬意。这些人有个共同的特点，除了身经百“战”以外，都是各自专业的内行知识分子。以下就是几个典型人物：刘尊棋，前文已述，略下不表。

冯雪峰（1903-1976），诗人，文学翻译家和文艺理论家。他是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曾担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参加者。解放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和党组成员，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杨宪益在自传中是这样描写冯雪峰的：

冯是个共产主义老战士，解放前在国民党的集中营里被关了好多年。我非常喜欢他。他性格和善，内心情感丰富，道德高尚。他在许多方面很像他的朋友、1980年代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胡耀邦。1954年夏天我们在北戴河时，冯雪峰介绍我跟胡认识了。（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187，雷音译）

1954年间，肃反运动还没开始，杨宪益即受到南京统战部来人的反复盘查。这是自解放以来他第一次被他全心全意拥护的“党组织”所怀疑，生性豁达的杨宪益经历了从未有过的精神折磨和痛苦，可他无法对家人倾诉，孩子还小，乃迭又是“外国人”，无法理解这里的“奥妙”。在一次作协的谈心会上，杨宪益谈到了他的苦恼，当时身为作协领导的冯雪峰给与了他极宝贵的同情和温暖。他回忆说：

那个时候对我的历史已经开始有所怀疑了，总要问我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有一次人民文学出版社召集一些老同志在一块儿聊天，我就在会上发了一下牢骚。我说党对知识分子那么不信任，那么怀疑。结果冯雪峰非常同情我。那天还特别安慰我，派了一个汽车送我回来。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冯雪峰这位老党员跟许多党员不一样，我对他的印象非常好。可是后来把他划了右派，那是毛泽东的意见。（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30日）

杨宪益确实想不到，那次作协会议不久以后冯雪峰自己即遭“整肃”，历经“批判文艺报的资产阶级方向事件”，“肃反”、“反右”、“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定要把他当年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遭贬黜时期一块儿喝酒发牢骚的老战友冯雪峰打入十八层地狱。冯雪峰遭遇到二十多年的折磨和迫害。他没有刘尊棋幸运，没有看到四人帮倒台，更没有看到自己“平反”的那一天。他逝世于1976年1月，终年73岁。

与中国朋友相比，那一段时期，杨宪益交的朋友更多是些外国人。他在自传中说：

在五十年代初，由于朝鲜战争，中国受到西方国家的孤立。结果导致我们和外国使馆失去了联系，我们过去的朋友几乎都离开了中国。但是这个时期我们结识了一批新朋友，他们是西方共产党派来的或者是中国政府雇用的外国“专家”。他们中有些人是战争时期就来中国的医生和记者，但绝大多数是解放后来的。他们中许多人没有受过专门的学术训练，但是也有例外。有的人人品又好，又聪明。渐渐地，我十分尊敬他们，喜欢起他们了。（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194，雷音译）

在这些人中，杨宪益提到了英国共产党老党员阿兰·魏灵顿

(Alan Willington)、南·格林(Nan Green)、泰德·布雷克(Ted Brake)、史珍妮(Janet Springhall)和托尼·德瑞尔(Tony Durrell)这些名字,以及奥地利来的记者哈里·斯科洛夫斯基(Harry Sikrovky)和东德来的哈里·德克(Harry Thurk)。在五十年代初,杨宪益和这些外国友人一起渡过很多美好的夜晚。他在自传中说:

我们晚上经常在一起见面,北京东城的几个咖啡馆是我们常去的地方。我们在那儿喝啤酒和白酒,在一块儿高唱西班牙内战时国际支队的《四个将军之歌》。尽管那时我还没有入党,但我感到,我对我的这些共产党员朋友们怀有十分强烈的同志之情。我至今都怀念那个年代和这些朋友们。(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195,雷音译)

自1949年后,中国实行“一面倒”的外交政策,基本上与西方国家失去了来往。老百姓们也纷纷断绝了与海外亲人的联系,以免“海外关系”惹来的麻烦。中国真正成了一个“国门紧闭、舆论一律”的铁幕国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杨宪益与这些国内仅有的西方国家左派朋友的来往就非常重要,这使他的视野比一般大陆的知识分子要开阔的多(由于戴乃迭是“外籍”,他们能够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国外报纸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当苏共二十大召开后,这批英共老党员们支持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为“肃反扩大化”中受冤屈而死的几百万人“平反昭雪”的路线。后来当中苏分裂,中共开始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以后,这些在朝鲜战争中曾经支持过中国的英共老党员却站在了苏联一边。为了维护自己观点的纯洁,他们不惜与中共决裂,“砸掉了自己的饭碗”(当时中共给他们很高的生活待遇),纷纷辞职回国。

这些英国人是杨宪益心目中真正的共产党员,他们的光明磊落、不屑隐瞒自己观点的胸襟和大无畏的战士风范,与杨宪益内心深处的英雄主义情愫不谋而合,他把他们引为知己。杨宪益在自传中以景仰而感伤的笔调写道:

这些朋友们大都已经去世。他们中的多数人后来对苏联入侵匈牙利和捷克感到幻灭,但是他们坚持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195,雷音译)

杨宪益与他们站在一起,并为此付出了代价。此是后话。

76. 反右(一):漏网右派

反右这个大题目,无数活着的当事人都作了回忆、描写、分析和评论。这个运动“腰斩”了中国大陆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群体,为日后的文革大疯狂铺平了道路。虽然“反右”不过是解放后一系列运动中又一次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但是它的规模之大,对全社会的破坏伤害之深,是解放以后空前未有的。这个运动与思想改造运动的区别在于,“思改”运动仅仅是对知识分子精神上的“阉割”,而“反右”运动则明目张胆地对几十万爱国(绝大多数人在当时也爱党)知识分子进行了人身迫害。从此,入了“另册”的右派分子们只有妻离子散,开除公职,流放劳改,逮捕入狱和死亡这一条路。反右运动最引人注目、人们至今仍感到不寒而栗的是,正是执政党自己反复“动员”,诚恳“号召”,毛泽东亲自出马,大会演讲小会呼吁,“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唱对台戏”。岂知对台戏唱了仅仅半个月,毛泽东却翻了脸,把他动员出来的几十万人,包括允诺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民主党派的一大批领导人打成了“右派”。从此,这个臭名昭著的“引蛇出洞”的“阴谋”使中共在道义上失信于天下之人(朱正著的《1957年的夏季:

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十分详尽地回顾了“阳谋”的始末。)。正如前文所说，中国人在1949年的“新文化的生死劫”中做出了选择，现在，除了流亡到海外的少数人以外，那些留在大陆热烈欢迎新政权的人们要来饱尝他们自己当年选择的“后果”了。以下简单回顾一下反右以前的“大事记”：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报告，报告说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应该给他们应得的信任和支持”。

1956年4月，为了回应苏共二十大，毛泽东提出了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和文学艺术问题上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1956年5月26日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向两千多科学界及文学艺术界人士发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严厉批评反对“鸣放”方针的马寒冰、陈其通等四人。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旨在进一步消除人们顾虑，号召“鸣放”。

1957年4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第七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贯彻双百方针，会议提出“鼓励党外人士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请他们“帮助党整风”。

1957年5月8日至5月1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各民主党派座谈会，“帮助党整风”。此会共开了七次。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文章提出“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方针，部署了“引蛇出洞”的“阳谋”。这篇文章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动员民主党派负责人“鸣放”仅相隔15天。

1957年5月21至6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又开了四次“整风”座谈会。这次会议的目的已经从“帮助党整风”变为“钓大鱼”了。不知内情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依然满怀热情地发言，岂不知，这时的大多数发言已经变成他们自己的“罪证”了。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吹响了“反右”号角。

杨宪益是“反右”运动的“幸免者”。但是，作为见证人，他在回忆中谈到了这场运动：

反右开始以前先有一段鸣放，鸣放时好几次邀请我参加中央召集的会。开始的时候我也弄不懂，我说怎么会弄得那么严重呢？有一次开会毛主席在台上说到《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毛主席还在开玩笑的说“大家都觉得（小说）有问题，我看有点过头吧？《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其实没有什么很大问题。”这些话当然后来都没有发表过。

鸣放的时候开头完全是党在鼓励鸣放。有一次人民文学出版社找我们来，要大家畅所欲言，鼓励我们多讲关于党的意见。徐迟说了一段他的地主家庭，他的书解放后都给烧了，都给毁了，谈的很厉害，结果徐迟倒没划右派，不知道徐迟的背景，我闹不大清楚。我记得冯亦代说过几句话说的也不厉害。李荒芜没说话，我也没说话。

开头大家都不讲话，我呢，作为民革的代表人，他们就鼓励我讲话，我也没有（讲）。后来我写过好几首打油诗，我自己写的玩儿的。我记得有两句是：“

有意催花花不发，解铃还待系铃人”。我当时已经感到是给共产党吓的，吓的知识分子全不敢讲话了。要你们大家讲话，帮助党整风，为什么不敢讲话？我还写过一首诗，那个时候是三月，那一阵子天忽然又很冷，下了一场雪。我又写过一句诗发感慨：入春三月尚冬寒，早雾弥漫雪里看，应是东风吹未透，鸟鸣花放总艰难。

我说毛泽东的风——那时候我对毛泽东还很佩服——毛泽东的风大概还没吹过来。原来第三句我写的是“应是人间阴气重”，后来人家说这句话不大好，说我们阴气重，不大好听。我就改成“应是东风吹未透”，毛泽东的风没吹到这儿。事后我才听到别人说，党内他们的秘密报告中有一句话：“我们现在是引蛇出洞”。还说我们共产党员只搞阳谋不搞阴谋，这大概是毛主席说过的话。实际上还是有阴谋，毛主席说翻脸就翻脸了。（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北京）

杨宪益特地谈到了他的朋友萧乾和老舍，他的回忆可以使后人一瞥这些知识分子精英在当时的“精神状态”：

鸣放的时候，有一次是周总理召集我们开会，文艺界的一些人，里头有我有老舍有萧乾还有杜近芳，很多人。我呢，没事。杜近芳在那儿也嘻嘻哈哈的，也没事。我看萧乾那个时候怎么那么紧张，我也不知道萧乾那个时候在文艺报里头早就不舒服了。大概是讲话有问题了。萧乾坐在那儿害怕的不得了，在那儿哆嗦。老舍是一直胆小的。老舍也非常紧张。周总理其实也没有说什么，但事后想起来他那个话里头当然有意思。他说一个人走哪条路还是自己选择的。他谈他自己家里头，他的哥哥们怎么样，同他走的都是不同的道路。他们都划清了界限。意思就是给你们文艺界一个暗示吧，你们走哪条路？那次会开完了不久就是萧乾划右派，这个人划右派那个人划右派（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此处杨宪益的回忆可能有误。周恩来这个讲话是在反右之后，不在反右之前。）

杨宪益在“鸣放”中很少发言，在访谈中他说“那个时候对共产党实在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实在是非常热情的拥护”，所以他没有任何“反党言论”。但是杨宪益的那几首诗却有影射现实之嫌，他为什么会在“反右”运动中幸免，现在还是个谜。他的妹妹杨敏如在回忆那个惊心动魄的年代时谈到了这个问题：

57年我一天到晚害怕，因为揪出来的右派太多了！我都不敢看报纸，每天一看都是老同学老朋友，都是右派。那简直不敢看！看见报上的漫画有点像我哥哥，我都吓一跳。……我觉着他没当右派，不知道是谁保了他。到现在我都感到奇怪。我觉得因为他的妻子是个外国专家的缘故，有所顾忌。这是我的推测。（杨敏如访谈，1994年6月21日）

但他的朋友冯亦代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解释：

当时没有碰到他，是没有办法。因为没有他，这个外文出版社要关门了。你英文谁搞？当然有人可以翻译，但是要定稿，要修饰稿子不能够靠外国专家，外国专家他中国的东西莫名其妙。因为要用他，所以有人为他讲了话。（冯亦代访谈，1996年4月22日，北京）

而杨宪益这样说：

据说党内有人想要划我右派，有的人保我，我就算是没有划为右派。后来到了文革的时候还算了这么一句旧账，说他在57年就是一个漏网右派。所以我有一个漏网右派的名称。（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所谓“漏网右派”，并不是空穴来风，笔者在采访当年杨宪益的“小组长”唐笙先生时得到了证实：

组织上本来对他（杨宪益）政治上就不怎么信任，在反右以后始终对杨宪益

都是有看法的。有时候我反映说杨宪益有这么一个建议，可不可以采纳？我们英文组的大组长说：“他呀？你怎么净听他的？他就是个漏网右派！是我们保护过关的。”他（英文组大组长）说完这句话后我吓了一跳，就没敢再往下说下去。但这句话始终在我脑子里记得。（唐笙访谈，1999年11月29日）

77. 反右（二）：向达的遭遇

杨宪益的很多好朋友在反右运动中成了右派分子，使他很震惊。但对他震动最大的却是，他一向敬佩的老大哥，历史学家，北大历史系教授向达被打成了右派！向达的悲剧对杨宪益的思想“转变”起了大作用，值得专门介绍一下这位已经故去近四十年的出色学者。

向达（1900-1966），字觉明，湖南溆浦人，土家族。南京东南高师毕业生。1930年开始任北京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1935年，向达受北京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委派到英国进行学术考察。从1935年到1938年，向达在牛津大学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抄录了大量被英国人斯坦因掳去的敦煌卷子，写出开拓性著作《记伦敦的敦煌俗文学》和《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奠定了向达在敦煌研究上的权威地位。回国后，向达于1941年、1943年两次赴敦煌实地考察莫高窟，在没有经费没有物资的情况下，在零下20多度、“连火都生不起”的房间里写出了《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批评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的行为，并呼吁将敦煌千佛洞收归国有。文章在重庆《大公报》连载三天，举国轰动。在他的呼吁下，1943年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从此敦煌莫高窟开始了新的历程。

当杨宪益与向达在伦敦相识时，他刚刚20岁，而向达已是35岁的壮年人了。两人的家庭背景，生活经历有天壤之别，一个是娇生惯养的大少爷，一个却是刻苦奋斗的贫家子弟。奇怪的是，这两人却特别“投缘”，向达身上有一种气质使杨宪益一见面就信任他。几十年以后，杨宪益说起向达时拿他与钱钟书作比较：

向达是一个湖南人，像一墩木头似的挺扎实的一个人。看起来很老实，可是实际上很幽默也很热情，跟他表面上看起来不一样。他很纯朴，很用功。他在历史系的同事跟学生对他的印象都很好。

向达跟钱钟书是好朋友，向达很器重钱钟书。通过向达我才跟钱钟书熟起来的。钱钟书不大好交友，他光看书，书呆子，不大关心政治。钱钟书这个人在英国的时候我们就常常笑他，他书呆子脾气很重可是又非常聪明，谁都瞧不起。他在牛津的时候就是著名的看不起人的、说挖苦话的一个人，就是《围城》里头描写的方鸿渐那个意思，差不多。钱钟书就看得起两个人，一个是向达，一个是我。他叫我小杨。虽然我比他年轻，可是对我还比较看得起。

钱钟书那个时候还少年气盛，而向达吕叔湘已经做过几年教员编辑了。（杨宪益访谈，1994年4月26日）

几十年来，向达——这个像木头墩一样的土家族人是杨宪益最信任的人。当初，像“反蒋”、寻找“地下党”这样的机密大事，杨宪益只跟向达一个人商量。在学术上，因为向达的影响，杨宪益一度研究起中西交通史并写出了许多短小精悍的文章，差一点走上研究历史的道路。杨宪益非常了解向达对国家的赤胆忠心，也了解他对共产党的真心拥护。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向达把他最小的儿子送上了朝鲜前线。这样的人，怎么会“反党”？

关于向达在反右运动中的悲剧，杨宪益透露了一个细节：向达因为与他的领

头上司，北大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关系不好”而遭厄运。杨宪益说：

向达，我觉得是非常正直非常简单的一个老头子，绝对是好人一个，一直是非常爱国的，结果那时候也给划了右派。他因为跟翦伯赞关系不大好就划了右派，可是后来翦伯赞弄的比他还惨。向达自从那回被划了右派以后，虽然一年就摘帽了，可是就背上了一个包袱，他就从历史系教授改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去工作了。先做图书馆馆长，到了文革时又算旧账，图书馆馆长也不让他当了，斗他，把他斗死了。翦伯赞也给斗死了，他服毒了。（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作为历史的知情人，杨宪益的揭露使我想起了下面这一段话：“政治帽子从来都是报私仇、泄私愤的最好工具。地位与学术的竞争、各种名利地位造成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使得知识界永远四分五裂。极左政治整人的实际机制，就是通过调动某人周围的对立面、对立力量、被威胁到的人或者学术上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来进行的”（王学典、孙延杰：《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山东画报出版社）。中国大陆上一场又一场的运动，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的倒下，无不证实上述论断的正确。往往这一次运动的“左派”，到了下一次运动又成了新的“右派”，命运比他们整过的老“右派”还要惨。可悲的是，身处这个“斗兽场”中的角斗士——中国的知识分子们竟毫无自知之明，他们总要“乐此不疲”地把这场闹剧循环往复地演下去。

到了尘埃落定的今天，当年的“劫后幸存者”们痛定思痛，写出了像《思痛录》那样的大彻大悟的书。而翦伯赞和吴晗没有周扬韦君宜那么幸运，没有能够活到这一天。

关于向达的死，历史学家邓广铭（他是向达在北京大学的同事）向笔者透露了某些细节。他说：

向达是文革中第一个去世的。66年9月27日，国庆节快到了。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我们这些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雷注：这是文革中使用最多的一条毛语录）。学校命令我们立即下乡，向达也去。下乡以后，分为两组。一组是严重的牛鬼蛇神，二组的罪行较轻。我在二组，向达在一组。那时他有尿毒症，腿肿，走路疼痛。他去跟监管的医生说，医生只给他消炎片，也不让他看病。哪知他这病不能吃消炎片，越吃越坏。我们是10月14日回北京的，向达他们不能回家，因为“问题严重”。他10月底就去世了。（邓广铭访谈，1996年12月25日）

据记载，向达去世的确切日子是1966年11月20日。

78. 大门为落魄者而开

1957年的反右运动进一步毒化了社会空气。被当权者鼓励的“背叛和告密”、“落井下石”之风盛行于世。组织上提倡妻子、丈夫和子女与“有问题”的亲人“划清界限”。多年的朋友断绝了联系。社会空气一片肃杀。杨宪益回忆说：

反右在文化界是个很大的震动。以后很多朋友就见不到面了。萧乾这些人多少年都没有来往。一会儿听说这个人怎么死的，那个人是怎么死的，这个影响弄了好多年。（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在这种严峻的空气下，一般懂得一点“人情世故”的人，对事物总会作出“趋利避害”的选择；但是，“不谙世事”的杨宪益，却经常做出使别人吃惊的举动。冯亦代曾向笔者说起，当他被划为“极右分子”后，在单位里一下子变得“不是人”了。而杨宪益好像没事一样，照样跟他一起“打乒乓”。更有甚者，杨宪益还在小组会上公开为右派分子“鸣冤叫屈”。杨宪益回忆说：

在反右的时候（上面）问我你对反右运动怎么看法，我说有很多人我都不认识，罗隆基我见过面，跟他来往过一两次，其他的我对他不够了解。原来觉得他也是一个到过国外的知识分子，也很谈的来。可是后来大家都说罗隆基这个人怎么坏怎么坏，我说我对他不够了解，也不能给他辩护了。可是有的人跟罗隆基不一样。像向达，像冯亦代。冯亦代做极右分子恐怕也还不够吧。顶多有的时候有一点右。但是你不能说是极右分子。太过头了吧。还有像向达，我认为绝对是好人一个，爱国的，一直是爱国的。就是跟翦伯赞关系不太好。这个人划右派我想不通。这话我明白的在小组会上说了。（上面）对我也没有说什么，不过反正觉得你这个人总是立场有问题。（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杨宪益在那种寒冰似铁的日子里依然保持着一片古道热肠，突出的例子是他对“反党分子”邹霆长达二十多年的友谊和帮助。邹霆（1927-），山东济南人，解放前参加革命，解放初在南京军管会文艺处当干事，与杨宪益相熟。他在1953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柯庆施打成“反党集团头子”，被开除公职，1955年又因与路翎的友谊被打成“胡风分子”，关押在监狱三年。就是这样一个穷途末路的“双料反革命”，当他1953年秋冬踏进杨宪益在南河沿的家门后，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善待。杨宪益拿出五粮液和巧克力款待他，给了他人间最宝贵的温暖。他对笔者说：

有一天晚上我去看他，他已经听说我失踪过好几回了。我说不是失踪，是政治审查。我说你要是觉得不方便我就不来。你是专家，又有这么多外籍专家在一起。他说没关系，你要来就来，没事。我们两个人喝酒聊。他说你就是锋芒毕露，年少气盛，太狂了一点，得罪了一些人。其实我知道你有什么呢，至于说你有海外关系等等，那都是欲加之罪。他就这样给我平了个反。我很感动。我说难得啊，因为他还在位啊！是周总理把他们调到北京，要重用的。我心里很感动。还不光是物质上的帮助。别的朋友根本就（把我）拒之门外了。（邹霆访谈，1995年12月28日）

以后的几十年，邹霆每一次到杨家，都得到始终如一的“老朋友”的对待。杨宪益多次在钱物上帮助邹霆，以救他断炊之急。

只有经过五、六十年代严酷政治环境的人，才能体会到杨宪益这样对待一个“被管制分子”的难能可贵之处。杨宪益的确因此受到了政治上的牵连。除了文革中的大字报“揭发”以外，杨宪益的顶头上司何路就当面说他“你这个人就是爱招苍蝇”。

杨宪益家的大门，不仅为本国的政治失意者而开，还为很多外籍“流浪者”敞开。杨宪益的女儿杨焯在谈起这个问题时，认为她的父母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几十年里起了一个“中国政府意识不到的”的“民间对外交流的桥梁作用”。她说：

那些年，中国的外国人很少，如果来了一些外国专家、学者、汉学家或者学汉语的学生，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去，没有能够放松的地方，没有一个文化上没有隔阂的地方来交谈，所以我们家提供了一个场所。那时候的一些年轻的汉学家，包括来工作的一些外国专家，非常喜欢到我们家来。他们（杨宪益戴乃迭）那时候交了很多朋友。那些人是真的朋友。（杨焯访谈，1999年6月25日）

杨焯谈到了杨宪益为一些彷徨而茫然的年轻人提供庇护的情况，她提到了《西游记》的译者、英国人詹纳尔和他当时的妻子狄丽亚的名字：

詹纳尔和狄丽亚他们来的时候都很年轻。狄丽亚大概二十岁都不到，跟我们的岁数差不多。他们几乎每天晚上都在我们家过。要是没有我妈妈爸爸在这儿，这些外国年轻人真是很难过的。我们家好像收容站似的。（他们）跟中国人交谈，

你外语不够，他汉语也不行，再说文化上有很大的差距，很多事情都没法理解。狄丽亚刚来时很小，她知道中国是专制的国家，很怕说错了话。到了夏天她听见知了叫，英国没有知了，她以为是工厂的声音。她一直不敢问，她觉得万一是要军工厂呢，就不敢问。特别可笑(比尔·詹纳尔在戴乃迭去世后写的悼念文章中说：“…戴乃迭他们家成了我的第二个家。…当时有很多像我一样，从外国刚到北京不久的教师和翻译。戴乃迭接济并照顾我们，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难得的放松。”(载杨宪益主编《我有两个祖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李晶译)这段话可以作为杨焯访谈的佐证。)

还有几个年轻人，有一个人把他分到武汉教英语，刚去了几天就回来了。(那里)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他说英语的，等于发配到了一个没有人交流的(地方)。他回到北京就赖在我们家不走了，最后这个人到了日本。

那时候来来往往的，这个来了那个走了，我觉得我们家有点像——不是一个旅店也是一个——人家说“杨家黑酒店”。每天晚上都有人来。都是这些外国人。

我觉得我父母那几十年起了很大作用。虽然说起来就是来玩一玩，放松放松，但是还是帮助人家了解中国。而且我爸爸对政局和形势应该怎么理解怎么分析他永远有很多见解，说不完的话。他随时可以给你提供很多分析，你想明白什么事他就给你讲。(杨焯访谈，1999年6月25日)

杨宪益这种无拘无束迎送天下客的气派和作风，在那样一个空气肃杀、控制严密的环境下，真是一个大大的“异端”！李长之先生(杨宪益在国立编译馆的同事、北师大教授)曾经这样评论杨宪益：“宪益是杜少卿(《儒林外史》中的角色)一流的人物”，这个比喻生动有趣，对杨宪益的精神风貌捕捉的很准确。杨宪益的“英雄本色”体现于：在一个密不透风，几乎没有任何个人生存空间的社会中，他藐视“阶级斗争”的“清规戒律”，依然保持了“我行我素”和“豪迈率真”的天性。

当然，他为此又受到牵连。他的家被称做“杨家黑酒店”。对此，杨宪益仅是一笑了之。

79. 大跃进中的老黄牛

1982年，杨宪益的老友丁聪为他画了一张传神的肖像画，杨宪益为这张画题了一首五言诗：

少小欠风流，而今糟老头。
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
恃欲言无忌，贪杯孰舆俦。
磋砣惭白发，辛苦作黄牛。

这首诗高度精炼地描画了杨宪益的生平，其中“辛苦作黄牛”是他一生翻译工作的总结。而在58年的“大跃进”中，杨宪益和戴乃迭的翻译速度到了惊人的地步，他们俩夜以继日地干，创造了“翻两番”的奇迹：他在自传中说：

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我们发疯似的译书，没日没夜地苦干，翻译的速度非常快。当然，翻译的质量受到了影响。一本非常好的书——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我们十天就翻完了。我一直后悔我们没有花更多的时间来推敲，使它成为更好的译本。这就是在那个时代中国被雇佣的翻译匠的命运！(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201，雷音译)

许多人在回忆中提到了杨宪益在“大跃进”中“翻两番”的工作状况。杨宪益的同事赵学龄回忆说：

杨宪益有一个好的地方是很多运动他都不参加。人家不让他参加，没资格参加，怕他泄密。回家不能不跟老婆讲啊。这样也促成他们翻译上的成就。那时候大跃进搞三面红旗他（杨宪益）干了很多工作。别人都去大炼钢铁去了，工作都压在这些不能搞运动的人身上了。人家都在加班，晚上都在院子里大炼钢铁，他也加班，他晚上干的很晚。他也不敢早睡，坐在那里搞翻译。那个阶段他们（杨宪益和戴乃迭）翻了相当多的东西。（赵学龄口述，1999年12月4日）

杨宪益的妹妹杨敏如说：

在大跃进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参加到运动中去。一天要等于20年，苦战十昼夜，拿出多少成果。掉几斤肉都不怕。你知道我们这一个外国人（指戴乃迭），加上一个中国人（杨宪益），他们两人翻译了多少个小时？他们两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翻译了那么多东西！他们就是这样响应大跃进的。（1994年6月11日访谈）

杨宪益的组长唐笙回忆说：

58年反右以后有一个“献红心”（运动），有那么一股子风，大家都非常积极。什么东西都要“翻一番”，他们两个人的翻译也要翻一番。我说你这个是不现实的，他（杨宪益）说我一定要这么干。所以毛主席的诗词他一会儿就翻完了。这些地方他非常热情，他是真心的要做这做那。杨宪益当时是真心的热情。在那个（大跃进）以前（领导上）对他一直是有看法的，在那个之后他也没有被信任。因为很快又反右倾了。可是我觉得他并不知道他还是没有被信任。（唐笙访谈，1999年11月29日）

唐笙讲错了。杨宪益并不是不知道他不再受党的信任。他在自传中说的很清楚：自从肃反运动以后，他感觉到他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不再被当成专家，只被当作一个普通的翻译。一些党的会议也不再让他参加，他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的申请被客气地拒绝。他说：“从1955年到1972年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为止，我始终处在政治阴影之下。我不再是中国共产党可信赖的朋友了”。然而，即使不再受信任，杨宪益却依然勤奋忘我的工作，几十年如一日。杨宪益的同事喻璠琴回忆了一件事，突出显示了杨宪益和戴乃迭的高度忘我的劳动精神，她说：

在五十年代，经常会有大块的文章要翻（译）。一会儿是周扬发表什么讲演，一会儿是什么文艺政策，还有“八大”的重要文件，常常要把这些文件附进去。所以一有这种报告来工作就比较紧张，就组织大家加班。星期六星期天晚上都要加班，日夜连轴转。可是自从他们来上班以后（原来他们是不坐班的），杨宪益和戴乃迭一商量，就说了一句“这个事情我们俩来吧”，就把这事揽过去了。他一揽过去——而且他们翻的非常快——我们十几个人就不需要加班了，大家就非常轻松，顶多后期的打字校对由我们来做，而前期的翻译就不需要我们加班了。而且他们的东西质量还好，拿出来就是定稿了。……本来工作是分给我们的，他们是主动揽过去的。他们的工作态度是非常好的。老是重担（由）他们来挑。他们的工作态度几十年都是这样的。（喻璠琴访谈，1999年12月18日）

就这样，杨宪益和戴乃迭除了手头的翻译工作以外，又增添了无数次的翻译政治文件和政策讲话的负担（这样的“文件”动辄就是好几万字）。尽管他们不喜欢翻译这些与文学毫无关系的“声明”、“报告”和理论文章（读者当还记得杨宪益在南京曾拒绝过翻译毛主席著作的事），但是为了减轻同志们的负担，他们主动

地挑起了这项往往要十多人才能够完成的任务。

笔者从外文出版局拿到一份资料，记录了部分 50 年代出版的杨宪益和戴乃迭翻译的书籍（主要是古典文学），从这个不完整的书单可以看出他们两人当年的劳动“强度”：

一．古典文学：

离骚（1953 年初版）
唐代传奇（1954 年初版）
儒林外史（1954 年初版）
长生殿（1955 年初版）
古代寓言（1957 年初版）
宋明平话选（1957 年初版）
汉魏六朝小说选（1958 年初版）
关汉卿杂剧选（1958 年初版）

二．鲁迅著作：

阿 Q 正传（1953 年初版）
鲁迅短篇小说选（1954 年初版）
鲁迅选集（第一卷）（1956 年初版）
鲁迅选集（第二卷）（1957 年初版）
鲁迅选集（第三卷）（1959 年初版）
鲁迅选集（第四卷）（1961 年初版）
中国小说史略（1959 年初版）
鲁迅小说选（1960 年初版）

三．现代文学（部分）：

王贵与李香香（李季著，1951 年初版）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著，1953 年初版）
白毛女（贺敬之，丁毅著，1953 年初版）
阿诗玛（1955 年初版）
三里湾（赵树理著，1957 年初版）
李家庄的变迁（赵树理著，50 年代出版）
青春之歌（杨沫著，50 年代出版）
暴风骤雨（周立波著，50 年代出版）
风云初记（孙犁著，50 年代出版）
原动力（草明著，50 年代出版）
朱自清散文（1958 年）
下一次开船港（严文井著，1958 年）
红旗谱（梁斌著，1959 年）
百合花（茹志鹃著，1959 年）
荷花淀（孙犁著，1959 年）

四．其他

白蛇传（京剧）
打渔杀家（京剧）
柳荫记（京剧）
秦香莲（京剧）
搜书院（越剧）

十五贯（昆曲）

中印文化交流史（金克木著）

中国文学简史（冯沅君陆侃如著）

此外，在中译英的工作之外，杨宪益在 50 年代还翻译了一批西方古典戏剧作品，他直接从希腊文译出了古希腊戏剧大师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鸟》，从拉丁文译出了古罗马剧作家普劳图斯的《凶宅》，翻译了肖伯纳的《卖花女》、《凯撒与克里奥佩特拉》、和《匹克梅梁》（以上几部书除《卖花女》外在九十年代都作为经典译作重新出版，其中《鸟》列为中央戏剧学院学生的必读书）。他还翻译了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牧歌》（60 年代初他还翻译了荷马史诗《奥德修记》和法国中世纪的名著《罗兰之歌》）。据杨宪益说，这些工作只是他全部工作总量的几分之一。

有必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翻译都是不拿稿酬更没有版税的。杨宪益在《自传》中说：

很多不了解我们情况的海外朋友们以为，我们在五十年代翻译了数百万字的著作，一定挣了一大笔钱。实际上，我们翻译的所有的古典文学著作从没有拿过一分钱稿费，也不享有任何版权。唯有的一次例外是我们翻译的《红楼梦》。那是因为《中国文学》杂志从外文出版社分出来了，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我们是《中国文学》的人，《红楼梦》是为外单位干的活儿，所以《中国文学》的党书记要求外文出版社付给我们稿酬。这是惟一的一次我们在工资外拿到稿酬。（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01 页，雷音译）

就是这样，在整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上半叶，杨宪益同中国绝大多数老一辈知识分子一样，头上戴着一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却不计时间、不计报酬、以地地道道的“共产主义劳动精神”为国家服务。

80. 大跃进中微弱的质疑声

尽管自 55 年肃反以来，杨宪益目睹许多他认识或不认识的知识分子挨斗，不少优秀人才死于非命，引起他的种种疑虑；但是，他仍然相信共产党，仍然对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满怀信心。对于理解他的这种心态，历史学家顾颉刚的一段话可以作为很好的注解：

以前我们常用帝国主义者批评我们的话说‘中国四万万人民是一盘散沙。’我常想，要一盘散沙团结起来，我死也情愿，因为这是由贫弱转为富强的根本问题。哪知在短短的三年之中，竟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由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组织起来了！人民……看国家的利益高出于其自身和家庭的利益，国家的强盛方始有了真实的基础。……我受了五十多年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气愤，现在……惟有欢呼赞叹，由衷心的敬佩与爱戴；自己觉得，到这时才认识了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精神（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251 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正因为此，杨宪益在反右以后仍然积极投身于“大跃进”之中，他衷心赞成这种“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无私忘我的精神。他参加十三陵水库的修建，像小伙子一样挑担推土，以致晚上累的“连端碗喝粥的力气都没有了”；他参加人民大会堂的建设，还在每年的夏收夏种和秋收秋种时下乡劳动，接受农民的“再教育”。

1958 年，通过大规模的清洗“资产阶级右派”后，整个中国已经是高度的“舆论一律”，再也听不到公开反对意见。毛泽东把整个中国当成了他的“试验田”和“人民战争”的“战场”，用“军事共产主义”的精神来“发动群众”。那年头，千百

万人把锅、碗、门、窗砸了去搞“土法炼钢”，亿万人不睡觉去“深翻土地”；合作社变成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报纸上天天放“卫星”，一个个“奇迹”被创造出来。小麦和水稻产量像“火箭”一样飞升。最后，1958年9月1日的《人民日报》报道「徐水人民公社」小麦亩产高达12万斤！当时盛行的豪言壮语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毛泽东1958年6月17日在薄一波的《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上批示说两年超过英国是“可能的”。刘少奇在1958年7月5日跟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工人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两、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多数可以看到共产主义”（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58年10月28日，河南范县县委书记则宣布3年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报告上说共产主义的生活情景是：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裳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吉林人民出版社）

当时，从中共中央领导到基层的干部，似乎已经分不出乌托邦的“理想”和谎言的界限，“说真话”成了中国大陆最稀有的物质。

杨宪益虽然积极投入到“大跃进”中去，但是，他并没有像顾颉刚所说的那样“只可伏伏贴贴，听其陶冶成材”，而是保持着一份自己的正常思维和见解；并且，他还在一定的限度和一定范围内“顽强”地表达他的“异议”。例如，在如火如荼大跃进中，杨宪益就在小组的交心会上发表了一些在今天看来仅是普通常识、而在当时却是“反对三面红旗”的意见。杨宪益回忆说：

我一直是非常拥护共产党的，可是许多运动我都有些想法，也说过一些比较坦率的话。大跃进那个时候要求我们说看法。那个时候说粮食可以翻一番，再一鼓劲又翻一番，再一鼓劲还可以翻一番。我心里想这很愚蠢很不科学。我记得小组里要大家发表自己的看法，我当时就说了一些他们听了不高兴的话。我说我们生在一个物质的社会里面，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什么东西都有他一定的局限，不是无限的。我们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头种粮食，譬如说在五亩地上种粮食，就这五亩这么大一块，怎么可能今天得了一千斤，明天就可以是两千斤，后天就又翻一番变成四千斤，再后一天再一鼓劲就可以八千斤，我说这不可能的，不科学的。那个时候有些照片说一亩地种了多少斤粮食，种的密密麻麻的上面可以坐人，旁边用鼓风机吹的。我觉得这都是瞎胡闹。这个话我也明白的说了。他们把我的话登在大字报上，说是我对大跃进的评论。（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关于“人民公社”，杨宪益也发表过一些看法。他说：

我说人民公社说起来是一大二公，农林牧副渔什么都干，也要搞工业也要盖大楼，也要搞百货商店，也要办工厂，从前城市里头粮食蔬菜各方面供应要靠农村，农村要搞的跟北京都一样了，他们不供应城市，城市不就萎缩了吗？老的城市不就没了？这话也是作为反动话给我写到大字报上，后来对这个事他们也批判我。虽然我提了这些意见，是公开提的，可是我还得跟着一起干。大炼钢铁把铁门拿下来敲碎了，我也得跟着敲。（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杨宪益的这些话，是在拥护大跃进的大前提下提出的微弱的质疑，却被组织上作为“资产阶级分子”反对三面红旗的言论记录在案。党组织当时没有批判他，而是给他“记了一笔账”。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这些言论都成了批判他的“子弹”。

81.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就在这一时期，杨宪益又开始了一段特殊的经历：为中共安全部门做情报工作。他在《自传》中对这件事的始末说的很清楚：

1958年的某一天，反右运动的大骚乱后不久，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同志对我作了一次奇怪的访问。他说他是统战部的，但我觉得他没说实话。他来自一个秘密部门，可能是安全部或者是类似的组织。他说组织上了解我在解放前为地下党做的工作，知道我曾经从一些外国友人特别是从西方外交官那里收集过有关国民党政府的情报。他说党认为我的工作卓有成效，希望我恢复过去的关系，利用这些关系为党提供情报。……他说，他可以为我們提供一所东城的房屋以便离使馆区近一点。他的一个朋友在城东北有一所房子，这个朋友去国外了，房子空着，我们可以搬到那儿去住。我说，解放前我为地下党工作连我的妻子都不知道，因为我不想让她卷入危险之中。现在情况不同了，我必须同她商量这件事。我和乃迭商量的结果是：同意做做试试看。（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06页，雷音译）

杨宪益没有想到，他这一次的“重操旧业”与解放以前的“地下工作”有本质的不同。解放以前他冒着生命危险，是为了帮助一个处于“地下状态”的、许诺给人民“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在野党”推翻蒋介石腐败的独裁政权；而现在，他却是在为一个号称“党天下”、“无产阶级专政”的惟一执政党服务。当时的杨宪益和中国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还没有这样的认识，他对中国共产党还是一往情深的忠诚。但是，他上当了。

前面已经谈过，“党组织”早在1954年就已经开始怀疑杨宪益的历史了，为什么现在却要他做情报工作？原来用的是“将计就计”法。“组织上”想利用杨宪益这个“特嫌分子”来“钓鱼”。这样的“一箭双雕”是国际间谍史上屡见不鲜的计策。可天真的杨宪益一点也没有防备。

当杨宪益遵照“组织上”的指示，在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干劲拼命翻译以外，还花费大量时间从事“特殊”工作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组织上”却在背后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当时《中国文学》编辑部的党支部书记陈丹晨证实了这一点，他说：

杨宪益原来住在北新桥独立的一个院子里，实际上，他在那里住的时候，公安部门对他蛮注意的。他来往的什么人，都很注意。后来又觉得他住在外面不便于管理，又把他弄回来，让他住在机关后院。（陈丹晨访谈，1999年11月19日）

陈丹晨的回忆不仅证实了公安部门对他的监视，他还进一步谈到了杨宪益的“内控”使用的处境：

（杨宪益）是内部对他监控。现在叫“监控”，过去叫“控制使用”。什么叫控制使用呢？一些政治上的文件，反修文件是不叫杨宪益翻译的。文学的东西闯不了祸，文学的东西，包括古典的东西，这个让他去做。不让你涉及到那些政治性的东西。“控制使用”就表现在这些地方。然后叫你住在（机关的）东楼，实际上——当然也不是说一天到晚有人盯着你，监视你不许你有自由，那也没有。但是实际上让你相对限制在一个范围内，让你既不跟老百姓在一起，也不让他住友谊宾馆——那时候有很多专家住在友谊宾馆——让他跟社会保持一定距离。对他有一定的限制。这都是因为对他政治上有这个看法。（陈丹晨访谈，1999年11月25日）

杨宪益还蒙在鼓里。他以为身负重任，意味着自己重新得到了党的信任。他在加班加点地翻译大量有用或无用的东西的同时，还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交朋友”，进行一系列的“社交”活动；他按照组织的要求如实向“上面”汇报与外国

朋友的每一次谈话内容；那几年，他“心情愉快”地住在组织上为他提供的一个“独门独户”的院子里。在《自传》中他说：

我们很愿意住在城里一所带院子的老式平房里，这比住在西郊的宿舍套间里好的多。那房子位于北京东北角一条叫八宝坑的胡同，有一个宽敞的院子，院子里种着一些枣树和花椒树。从1958年到1960年，我们在那儿愉快地住了三年。（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06页，雷音译）

尽管杨宪益忠实地执行着他的任务，但是“上头”对他的汇报似乎不感兴趣，他们不满意他的工作，因为杨宪益没有提供“上头”需要的东西。暴风雨终于来临。组织上向他摊牌了。这次的摊牌至少使杨宪益明白了一点：他再一次受到组织的怀疑。杨宪益受到严重打击。他在几十年之后对那次的摊牌仍然记忆犹新。公元1960年的×月×日，杨宪益与上司的那一次短兵相接不仅十分有趣，而且意味深长：

他们客气地邀请我吃饭，并和我聊天。我们吃了一顿奢华的晚餐。气氛极为热诚。晚饭后，我的主人，一个青年男子——我很少见到他，但很明显，他们是那一伙的头儿——突然问我对历史人物曹操是什么看法。曹操是公元二世纪三国时期魏国的创建人。他是个能干的军阀，出色的战略家和文学家。后来中国的流行小说和戏剧都把他描绘成邪恶小人，因为他待人冷酷无情，杀害了许多人。对他这个出人意料的提问我吃了一惊，但我仍然回答说曹操是个大人物，我喜欢他的性格。因为他喜爱诗歌，女人和酒。他是个才华横溢的人。那位男子话中有话地说他料到我会喜欢曹操，因为曹操诡计多端，背信弃义。他又说：“我认为，你的性格很像他。”然后他突然转到另一个话题，他说：“杨先生，我听说你在解放前对朋友说过你很喜欢一个中国古代谚语‘狡兔三窟’，对不对？”我回答说我是说过类似的话，因

为那时生活困难，我不得不同时做好几份工作，在不同的大学教书。

“是的，”他打断了我的话。“但是这句话还有别的意思，不是吗？‘三窟’也可能是国民党，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你不是同时为这三方面工作吗？”我惊呆了。原来他们一直怀疑我是个双面间谍。假装忠于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个外国间谍，为英国某个秘密机构服务。我很愤怒。那男子冷冷说，现在是我彻底坦白的时候了。我怒冲冲地出门，他们用汽车送我回家。（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08-209页，雷音译）

第二天，上面派来一个人送来一叠纸让杨宪益写“交代”。愤怒的杨宪益只在第一页上写了十个字：“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就把这份“交代”送了回去。他决定今后再也不与这些神秘人物打任何交道了。一星期后，那个主动为杨宪益提供房子的男子又来了，他扭扭捏捏地说“认识你真高兴，不过现在房子的主人从国外回来了，我们要把房子收回去。你看什么时候搬家方便？”于是，杨宪益又搬回了外文局宿舍。

后辈人可以从这件事看出杨宪益和他的“上司”在道德风貌上的天渊之别：一方是真心忠诚，而另一方却是口是心非，心怀狡诈。这些神秘人物的虚情假意，他们的实用主义作风都令人厌恶。但是，杨宪益还是用古代中国谚语的方式向他们表白“忠诚”的“心迹”（尽管是带着愤怒的心情表白）。因为这些人“是”上级组织的代表。当时的杨宪益，是把共产党组织和“祖国”联系在一起看的。他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他的民族主义的情结使他必然要这么做。这是他与自由主义派知识分子的区别之处。

杨宪益搬回了外文局宿舍。《中国文学》的书记主任们佯装什么事也没发生，

对他依然如故。但是，此时的杨宪益心情忧郁，情绪低落。这一次他真正知道了自己的处境：他是一个受怀疑的“特嫌”分子，他的背后，正在悄悄地张开一个无形的大网，不知哪一天，这张网就会一把把他套死。

但是，这件在一般人眼里像“天”一样大的事并没有让杨宪益垮掉。他仅仅是情绪低落了一阵，不久，他又恢复了正常。更绝的是，组织上的怀疑并没有管住他的嘴巴，他的“胡说八道”的脾气依然不改。很快，他就又为他的“口无遮拦”付出了代价。此是后话。

82. 差一点被逮捕

杨宪益的这次遇险是在一次特殊的运动中。据杨宪益说，此运动是外文出版社新来的负责人罗某“发明”的，取名为“书刊检查运动”，时间在1960年10月。谈起这一次运动，杨宪益回忆说：

新来的社长是个小知识分子出身，不是老干部。这种人向来是左起来特别左的。他新官上任三把火，要向上邀功。他头一个表现就是要改造外文出版社，说过去外文出版社用的老知识分子太多了，要换一批新编辑新翻译——这都是罗俊的主意——要从复员军人里头挑一些人到我们单位，让他们学一两年英文或者法文，就让他们担任翻译。这批人后来在文革中都变成造反派，干了很多坏事。他（罗俊）的另一个主意就是书刊检查。他说过去五十年代印了大批的书，这些书在意识形态方面都有问题，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话一定很多，一定要每一本书都要重新检查，不合格的就毁掉。结果就找了一大批年轻人来检查这些书。五十年代初到五十年代后期的文学书大部分都给他们毁掉了。扔的满院子都是。有的交给库里销毁。（杨宪益访谈，2000年8月17日）

他们发现了一本解放后印刷的中国邮票集，里面有一张列宁头像的邮票因篇幅不够被切掉了一半，这被认为是一宗阴谋破坏。负责那本书的年轻的编辑立即被开除，并被送去农村劳改。（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11页）

他知道我翻译的东西最多，就找了一些年轻人专门审查我的书。每一本书都审查的很细。我记得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费了他们很大力气，花了两个月时间在那里一个字一个字地抠。但是鲁迅的书我翻的很忠实（原著），没有找出毛病来。我的书就查出了这一本《中国古典文学简史》，我删了很多，删的都是毛主席语录，这就是罪名了。这本书当时就查禁了，给毁了。（杨宪益访谈，2000年8月17日）

《中国古典文学简史》，作者是山东大学教授冯沅君、陆侃如。他们模仿《联共党史》的写法，在每一章的结尾都详细引用毛主席语录，以证明中国文学的发展和毛主席的有关论点是一致的。正像那本苏联教科书《联共党史》一样，充满了斯大林的语录。我认为这种写法很可笑，不适于外国读者接受。我和编辑商量之后，把所有的“圣旨”都砍掉了。结果那本书的篇幅还不到原来的一半。检查中，他们发现这件事时，简直目瞪口呆。新来的局长在群众大会上怒冲冲地咆哮：“杨宪益这个人怎么敢这么做？！简直是胆大妄为！翻译的工作不就是翻译吗，他为什么要插手编辑的事？”

最后，他们决定这件事的责任在编辑身上。编辑不应该同意我的意见，把毛主席的话砍掉。这位编辑的家庭出身是地主，他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并被遣送到农村。我被赦免了。但是那本书被销毁，八十年代才重印。那位编辑在文革后才回到外文局，恢复了名誉。但是，二十多年岁月已经白白过去了。他很快就退了

休。有一天，我听说他因心脏病去世了。他还比我小一岁。他是一个好人，一位称职的学者。（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11-212页，雷音译）

那位中文编辑名叫陈次园，他是继李荒芜（李被打成右派后发配到北大荒劳改了）之后和杨宪益合作的一位老知识分子。杨宪益在回忆中说他“人不错”，“学问也不错”。陈次园因为杨宪益的一个提议而遭到长达二十多年的噩运，使杨宪益内心充满负疚。

外文出版社的那次“书刊检查运动”声势浩大，共检查了408种中文书稿和326种外文书稿。检查下来，竟然发现有“问题”的书稿多达114部！（见《中国外文局大事记》，新星出版社）这一百多部有问题的书牵涉到的翻译和编辑有几十个人。这些人都作为“敌人”被外文出版社上报到“对外文委”干部处，分别作“逮捕、劳改、开除公职、下放劳动”的处理。据杨宪益的同事赵学龄回忆，那一次外文出版社对杨宪益的“处理意见”是“逮捕”！他回忆说：

那个书刊检查运动，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牵涉进去了。有的要抓，包括杨宪益。老的不用说了，很多年轻人都被怀疑。那时九评一出来，马上就要翻成外文，夜里通宵地干。有时候把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弄混了，这个就不得了，就是很严重的问题。实际上完全是无意的。他夜里头工作，太疲倦了！有的人就作为反革命抓起来了。有印马克思恩格斯邮票的像多切去了一点，就作为反革命抓了。像杨宪益，当时外文局报的是要逮捕的。最后，对外文委没有批。（赵学龄访谈，1999年12月4日）

杨宪益的另一个同事陈丹晨当时正好在对外文委干部处工作，他从侧面印证了赵学龄的回忆：

我在干部处整天没事，就叫我抄写下面报上来的登记表，一遍两遍地抄。报上来的很多表格都是要处理人家的。比方说某某是要开除的，某某是要逮捕的；张三是特务嫌疑，李四是修正主义，是国民党三青团什么的。每个人都分门别类，一个表格，有年龄，什么问题，怎么处理的意见。名单里有杨宪益。其中有两个人是逮捕，真的已经抓起来了。有一些人要送到东北密山。那些表格里有杨宪益，怎么处理他我记不起来了。（陈丹晨访谈，1999年11月19日）

杨宪益的同事喻璠琴也回忆起那次荒谬的运动：

书刊检查运动确实很可怕。他组织了一帮人，拿中文和英文对照检查。比方说中文里出现了六次毛主席，英文里才出现了两次，其他的用“He”代了。这就是一个“罪行”，你知道吗？可怕极了！如果你的意思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你在故意搞阶级破坏。不是你工作上出差错，而是你故意搞阶级破坏！我曾经听到一句话，杨宪益做了那么多事，也在被检查之列。我当时的印象他（杨宪益）错误非常之大，甚至几乎可以到逮捕的地步。（喻璠琴访谈，1999年12月18日）

这次运动，杨宪益又一次幸免于难。不知什么原因使领导上改变了原先对杨宪益“逮捕”的处理意见。否则的话，杨宪益的被捕时间要提前整整八年。但是，那位无辜的老编辑陈次园，成了这次运动的牺牲品。他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整个后半生就这么给毁了。

83. 关于“反诗”的惊人之举

杨宪益在1961年早春写了四首诗，公开支持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支持苏共二十大路线，批评中共路线，并抨击阿尔巴尼亚的霍查。这样的诗可谓地地道道的“反诗”，杨宪益冒“天下之大不韪”写了这样的诗还不算，他竟然把这四首诗

抄写出来，公开放在办公桌上，让同事们浏览。这个举动使《中国文学》的书记何路大惊失色，她吩咐一个党员把这四首诗抄录下来“存档”，并在党团员会议上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实例宣读了这些诗。到了文革，这些诗被抄录在大字报上“示众”，成为外文局文革初期的一个“政治事件”。

在详细叙述这件事前，先简单交代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农村不少地区就“普遍出现了浮肿病”（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二卷上，吉林人民出版社）。到了1959年，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弊端进一步暴露。农村开始大批人被饿死，城市的副食品供应也越来越匮乏。整个中国大地渐渐进入漫长的三年饥饿时期。1959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发动突然袭击，“揪”出了“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有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和周小天），吹响了“反右倾”的“号角”。紧接着，中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个“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

与此同时，中苏两党的分歧逐渐浮出水面。1960年4月，中共《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开始公开批判“修正主义”。7月，苏联召回在华苏联专家，中苏两国交恶。

外文出版社在1960年4月同时用英、俄、法、德、西、日文出版反修小册子《列宁主义万岁》，向世界各国发行。当时，在外文出版社工作的外国专家分成了两派，大多数人支持赫鲁晓夫的苏共二十大路线。为了表示抗议，他们纷纷离开了中国。

杨宪益的好朋友、老资格的英共党员魏灵顿和史珍妮也走了。杨宪益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看到中共和苏共翻脸，他为中共的命运担忧，尽管杨宪益根本不是中共党员。当时，杨宪益刚刚和那些“神秘同志”们闹翻不久，他的情绪很坏；内外忧患交加，使他愤懑不已。他以写诗发泄他的忧愤。杨宪益在他的《自传》中简述了他把诗抄公开的动机：

一天晚上，我很快写出了这些诗，第二天去上班时我把这些诗抄了一份带去，并把它放在办公桌上。我这么做，一半是故意的，我就是要让我的同事们看看——作为某种抗议。（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14页，雷音译）

仅仅作“抗议”就做出这样的举动，他不怕别人整他吗？笔者在采访杨宪益时，曾反复问到他为什么要“故意”把自己的“罪证”留给别人？难道他不怕被戴上“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杨宪益在回答中回顾了自己在欧洲留学时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他说他在外文报纸上看到很多揭露斯大林杀人的材料，他认为这是罪行。他的英共朋友们和欧洲各国共产党朋友们也都持相同观点。他说：

59年到60年那个时候有一些外国专家因为这个缘故就离开中国了。我很多朋友都走了。意见不同的人都走了，虽然他们在外国朋友中还是多数。所以我很气愤，要骂一骂霍查，过瘾一下子。我就骂了。那个时候九评已经发表了，我结合对九评的批判写了这四首诗。当时认为是黑诗。我就摆在桌上，我说让我们的党委书记看看，让他自己看看！他们就看了。（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7日）

这件事突出体现了杨宪益与众不同之处。读者也许可从这事联想起二十多年前的一件往事，当时的杨宪益在伦敦把《抗日报》寄给驻天津日本军司令部以示抗议。杨宪益的处事为人，往往与一般人“反其道而行之”。他从不以“利害”为第一要素，而是把“利害关系”抛到九霄云外。他在晚年有一句诗，自嘲他的一生是“恃欲轻言无一能”。“恃欲轻言”尽管是杨宪益的自贬，但如果从反面来理解，未始不是他的“言志”之词。因此，“拍案而起”就是他一生中某些关键时刻的反复表现。这一点与闻一多有相似之处。如果说他与闻一多有区别，就是他不像闻一多

那么“怒发冲冠”，而是严肃之中融合着“戏谑”。

据同事回忆，杨宪益的许多重要的政治言论，是在跟别人聊天中“随口说出来的”。陈丹晨回忆起一件事，1960年杨宪益有一次请《中国文学》编辑部的全体同事到他家吃饭（困难时期杨宪益曾多次在家款待他的同事，为他们“改善伙食”），在聊天中他又“发表”了很严重的“政治言论”，因为年代久远，陈丹晨记不清具体话了。杨宪益究竟说了些什么？笔者从杨本人那里得到了答案。那一天，杨宪益说：

当领导的人要小心，不要像斯大林那样，死了以后再让人打屁股，挨人家骂。不要像楚平王那样，死了以后还让伍子胥开棺鞭尸。（杨宪益访谈，1999年12月20日）

杨宪益说完这话后，所有人都惊呆了，不知该怎么回答。欢乐的家宴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杨宪益却若无其事。采访中杨宪益对笔者说“他们（在场的人）只会做一件事：向上汇报。我就等着他们汇报。”这是杨宪益“恃欲轻言”的又一个例子。

至于那四首“反诗”到底是什么内容，现在无从得知。杨宪益从来不留他的诗稿，随作随扔。同事们当然也不记得。希望哪一天“保卫部门”的秘密档案能公诸于世，那么，这四首反诗的庐山真面目就能大白于天下了。

84. 成了“活靶子”

前面说过，自与那些“神秘同志”闹翻以后，杨宪益的情绪低落。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被怀疑的人，他的政治身份进一步下降。如果换了别人，可能就会从此与“组织”和同事保持距离；至少不会再像以往那样坦率，对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可这不是杨宪益的性格。他的个性一贯是“一吐为快”，加之他对国家前途的关心和担忧，使他在“别人早已经不把他当自己人”时，依然一片赤胆忠心地向他进献他的“忠谏”。于是，他又说话了。他回忆说：

在我们的政治学习小组会上讨论国际形势的时候，我们讨论到柬埔寨的形势，我拥护西哈努克王子，反对红色高棉的激进路线。我说柬埔寨的大多数人民都会支持西哈努克王子。而小组里的其他人都支持波尔布特的激进路线，并希望柬埔寨马上变成共产主义国家。争论持续了两个礼拜。我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他们不能使我改变观点。（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03页，雷音译）

在进一步谈这个问题以前，先简单回顾一下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当时，“大跃进”已经失败，全中国人民都在挨饿，加之和苏联交恶，又与美国支持的台湾政权持续对峙，使中共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为了摆脱困境，中共在国内放慢了阶级斗争的步伐，在国际上则采用“统一战线”政策，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努力与亚非拉新独立的国家搞好关系。中国与柬埔寨的“中柬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签订的。但是，当时的中共在国际问题上也和美国一样，搞“双重标准”。一方面信誓旦旦地与柬埔寨“搞好关系”，另一方面却暗地支持意欲推翻柬埔寨政府的“红色高棉”。杨宪益认为这样搞是危险的，会使中国在国际上失去信誉。但是，党组织认为杨宪益“立场有错误”，他们见小组的同志们不能“驳倒”杨宪益，就把当时《北京周报》的一些理论“精英”们派来上阵。杨宪益回忆说：

先是《中国文学》我那个小单位的同志跟我辩论，都辩不过我。那个时候，西哈努克跟波尔布特已经有摩擦了，整天打仗。我说西哈努克那个人虽然是个资

产阶级，是个王子，他受的那些教育，喜欢西洋的那一套，又是个佛教徒；可是柬埔寨这样的国家还是需要这么一个人的。需要这么一个比较温和的中间派。这样的人行，波尔布特搞的那一套恐怕不行。他们说你这又是个立场问题。就批判我。又把我批判了一上午。我不服。外文局的领导就把《北京周报》的那几个后来当过局长的正统派干部派来，这些人都被认为是马列主义比较高明的，有六、七个人，叫他们来跟我辩论。也没把我辩服。那是在办公室里，小规模，没有让我站起来，就是辩论。（扬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杨宪益的表现使领导很恼火。他们认为这是他“资产阶级思想观点”的“顽强表现”，联想到杨宪益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批评，他们认为有必要开一个批判大会，“揭露”一下杨宪益的“一贯的反动立场”，要杀一杀杨宪益的“威风”。于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批判大会召开了。领导上动员了整个外文出版社的力量，有数百人参加，开了三次大会，会议持续了两天。在文革以前就用这样的规模对付杨宪益，可谓非同小可。杨宪益回忆说：

有一天，外文出版社的党委书记非常客气地对我说，他们要开一个全社大会，和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方法进行辩论，帮助我改变自己的错误观点。他们希望我理解，这是为我好，不要有抵触情绪。我同意了。于是，这个会召开了。全社的编辑、翻译和行政人员都来了。会议开了两天。人们轮流上台谴责我的反动的资产阶级观点。说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导致我在单位散布反动言论。他们让我坐在后排，听取他们的批判。许多人都被迫“自愿地”上台发言。其实，整个事件是一场预先策划的“戏”。许多人在发言中像疯了一样，喷发出各种各样的胡说八道、夸张和谎言。（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03页，雷音译）

杨宪益举了一个“批判”他的例子，从中可见批判的“水平”：

说是辩论会，结果不是辩论。先要我说一下自己的观点，然后就一个人一个人上台控诉我，批评我，那就胡来了。说‘他们家当然是反对大跃进了，他家里头养刺猬还喂牛奶’。我在院子里看见一个刺猬没人管，我把它弄到后院去给它一点水喝，就说‘他们家里头养刺猬还喂牛奶！我们那时候都饿的没饭吃，他们家还喂刺猬牛奶。’这完全是胡扯。（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为了彻底打垮杨宪益的威风，会议组织者拉来了一个根本不认识杨宪益、也从来没去过他家的保姆，让她上台控诉在旧社会如何受地主资产阶级的压迫（会议组织者原来动员杨宪益家的保姆上台控诉，被她拒绝）。当那个保姆发言时，会议组织者叫杨宪益“站起来”听她的“控诉”，仿佛杨宪益就是压迫她的“黄世仁”。看到那位妇女哭的很伤心，杨宪益竟然在一刹那忘记自己正是被控诉的对象，也“被感动”了。这件事又使人产生啼笑皆非的“荒诞感”：

那个可怜的保姆，她从来不认识我和我的家庭，不得一般性地讲她过去在地主家是怎么受虐待的。她被自己的控诉弄的很激动，又是哭又是骂。虽然我解放后从没参加过土改，我倒是相当被感动。现在，我已经处于一个被斗争的反动地主的地位了。（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04页，雷音译）

持续了两天的会议开完了。杨宪益上台简短表态，感谢同志们的“帮助”。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呢？他说：

在我的内心，我感到整个这一切都是一场愚蠢的滑稽戏。他们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因为我依然坚持我的观点。但经过这一次荒谬可笑表演之后，我决定在学习会上少发言，不再与我的同志们争论了。（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04页，雷音译）

85. “特权阶级”和“贱民”

很难想像，一个人同时既是“特权阶级”又是“贱民”。而这恰恰是杨宪益在1955年之后到1966年文革前的生存状态。这是一个奇特的悖论状态，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荒诞性。就像电影中的两极镜头——特写和大全景相对照，突显出杨宪益与普通中国知识分子境遇的不同之处。需要说明的是，“特权阶级”指的是他的经济待遇，而“贱民”，当然是指政治待遇。

解放后，中国实行“一边倒”外交，基本上与西方国家断绝了来往。原来在中国居住的西方国家的侨民在解放前夕大都离开了中国，除了少数“兄弟党”派到中国工作的外国专家以外，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上几乎没有任何西方人士。所以，像戴乃迭这样地道的英国籍的知识分子简直就成了“稀有动物”。戴乃迭的“使用价值”渐渐为当局所觉察。1954年，国家成立“外国专家局”后，戴乃迭以一个“外籍工作人员”的身份开始享受“专家”的待遇。那时，“外国专家”可以享受不少的特权。比如，他们可以和“中央首长”一样，每年夏天免费去北戴河避暑、疗养（杨宪益则以“专家家属”的身份跟着去北戴河）。他们可以到专门为外国人服务的“友谊商店”去购买市面上买不到的紧俏物品，他们的工资也大大高于同级的大学教授。于是，戴乃迭的工资一下子高过杨宪益两三倍，就这样，杨宪益的家庭提前几十年就实行了“一国两制”（指经济生活方面）。而杨宪益，也就“沾夫人的光”过着比普通中国知识分子宽裕的生活。关于他的“生活特权”，杨宪益在回忆中曾谈到，当他们住在公安部提供的“大院子”里时（那时正值三年饥荒年代），戴乃迭从“友谊商店”买了面包、点心和罐头回来，邻居们都带着又羡慕又嫉恨的眼光看着她。小孩子们跟在后面唱起了顺口溜：

“苏联老大哥，挣钱挣的多。苏联老大嫂，挣钱真不少。”（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北京百万庄）拿今天的标准看，戴乃迭当年购买的物品全是生活基本必需品，根本谈不上什么奢侈。可是在1959—1961那三年中，全中国人民都在挨饿（农村总共饿死数以千万计的老百姓），戴乃迭居然能随便买到黄油、罐头和“高级点心”，他们家自然成了“众矢之的”。这一股“仇富心理”一直埋藏到了文革时期。到了1966年的“红八月”，杨宪益曾经居住过的东城八宝坑船舫胡同居民委员会还派人到外文局，要把杨宪益“揪”回街道去批斗。外文局的领导没有同意他们的要求，使杨宪益逃过了一“劫”。杨宪益说，如果到了街道上，他有可能在恐怖的红八月里就“被街道的人打死了”。（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北京百万庄）但是，与生活上的“特权”相对照的是，杨宪益在政治身份上却越来越向下滑，最后，甚至滑到了“贱民”的边缘。所谓“贱民”，当然是一种比喻。众所周知，自从解放以后，中国大陆当局就在国民中搞起了三、六、九等的等级制。这些等级不是以种族划分，而是以“阶级”来划分的。“红五类”（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在最上层，而地、富、反、坏、右在最底层，他们是不可接触者，是被“专政”的人。凡被戴上地富反坏右帽子的人，立即会被所有的人抛弃，就连他们的骨肉至亲都会和他们“划清界限”。人们在路上看到这些人，都会躲的远远的，唯恐避之而不及。这些人自己永无出头之日不说，连他们的子女，甚至孙子孙女都会在生活的一切领域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参不了军，入不了党（团），上不了大学，提不了干。永远只能呆在最底层。杨宪益虽然在表面上还没沦落到这个地步，可实际上，离开这一步也不远了。

杨宪益变成“不可接触者”，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有一个“外国老婆”。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涉外婚姻早已不是希奇事，可是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里，

家中有个外国老婆可是个“奇事”。当时，凡是有“海外关系”的人都会受到怀疑，他们被认为是潜在的“里通外国”者而处处受歧视。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可以想见，杨宪益和戴乃迭这“一对儿”在一般人眼里是多么“另类”，而他们的家又是多么“古怪”和“危险”。仅此一条，就足以使大多数人视与杨家交往为畏途了。

除了上述原因，杨宪益的“历史嫌疑”和他的“修正主义观点”使他更成了一个“危险人物”。六十年代初，外文局的党团组织纷纷告诫当时的年轻人，不要到杨宪益家去，要与杨宪益保持一定距离。杨宪益的同事吴善祥回忆说：

领导上当时对他（杨宪益）的看法是他是一个修正主义者。我记得在一次会上，何路（雷注：《中国文学》领导人）念了一首诗，有八句，最后一句是“每依北斗望旌旗”。何路已经掌握他整首诗的内容。当时空气很紧张。领导很注意他有什么举动。对他的使用是控制使用。当时很注意海外关系嘛，而且他的老婆又是外国人，他经常往使馆里跑，所以对他的怀疑是很直接的反应。对他们夫妇两个人都很怀疑。……原来我经常到他们家里去的，后来开会，领导对我们这些年轻人说他们有什么问题，我们就不敢去了。因为我是共青团员，团小组经常灌输阶级斗争观念，对什么人应该有警惕，其他同志也说，要我注意，老杨那里不去为好。（吴善祥访谈，1999年12月29日）

在“苏共二十大”问题上，由于戴乃迭和杨宪益观点相同，她也被看作是“修正主义”。他们的同事赵学龄说：

赫鲁晓夫 20 大秘密报告以后，戴乃迭因为受英国专家史珍妮的影响，史是英共老党员，她支持苏共的观点，戴乃迭也是倾向那种观点，杨宪益也是这个观点。所以就特别引起对他的不信任。现在看起来，戴乃迭尽管一直是在中国，她毕竟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她觉得我有什么看法讲一讲，这无所谓的，很正常的事。咱们中国就一刀切，两条线，成了敌我问题了。她没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来文化大革命她（从牢里）放出来之后，她跟我说她不懂政治，她说我实际上是个家庭妇女，我并不懂政治，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她没有觉得是在搞政治。所以我觉得，一个很大的误会就是，她觉得很自然的事情，可咱们把她当了阶级敌人了。这是很可笑的事情。（赵学龄访谈，1999年12月4日）

戴乃迭的确非常不懂“政治”。她不知道人们在表面上对她的尊重和友好态度之外，背地里却另有一套；她不知道作为一个“外国人”，她永远被怀疑“有异心”。她更不能理解，她虽然拿着高工资，享受着别人不能享受到的生活待遇，实际上却是一个受歧视的人，她的子女和亲戚也因她而受到牵连。她不能理解中国的这些奇奇怪怪曲里拐弯的事情。

1958年，戴乃迭申请回国探亲，她到中国已经将近二十年了！1940年，21岁的英国妙龄女郎格莱迪丝义无反顾地跟随她的爱人杨宪益来到了战火纷飞的中国，一晃二十年过去，她成了一个中年妇女，三个孩子的母亲。可她还从来没有回过国，没有见过她久别的亲人。刚解放时，政权变更的动荡和三个稚龄的孩子使她无暇顾及探亲之事，现在孩子大了，她可以回国探望八十高龄的母亲了。可是，这个在今天看来很简单的人之常情的事在当时的“组织”眼里却成了天大的难题。她申请了好几年都不批准。领导的理由是她的工作“很重要”，单位里“离不开她”。真正的理由当然是“政治上”的。后来，他们的朋友路易·艾黎给她出主意，让她直接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周恩来发了话，外文局才突然改变态度，同意她回到英国，与阔别二十年的母亲见面。起程时，已到了1961年，她为这事整整申请了四年。那一次，戴乃迭带着12岁的小女儿杨焱回了一趟英国，总算和八十岁的母亲塞林娜见了一面。这是她解放后与母亲唯一的一次见面。1970

年，当 89 岁的塞林娜逝世时，戴乃迭已入狱两年了。塞林娜直到去世，都不知道戴乃迭究竟是死是活。

杨宪益的妹妹杨敏如曾对笔者说过一件事，她丈夫罗沛霖文革前有一次去英国出差，组织上再三叮嘱他对杨宪益和戴乃迭“保密”，免得戴乃迭要借此机会和英国方面“联系”。由此可见对戴乃迭的高度“提防”。

戴乃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一个重要例据，就是她的儿子杨焯考大学的遭遇。

杨焯（1942-1979），是杨宪益和戴乃迭唯一的儿子，是戴乃迭的心肝宝贝。他从小就聪明过人，活泼可爱。他在小学中学都是有名的“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还得过北京中生长跑比赛冠军。1960 年杨焯高中毕业该考大学了，戴乃迭希望儿子上“燕京大学”，也即解放后的“北大”（戴乃迭是这样理解搬到燕京校园的“北大”的）。她的父亲戴乐仁曾在“燕京大学”大学担任化学教授，她的部分童年就在燕大校园中渡过，因此戴乃迭对这所大学有非同一般的感情。杨焯报考了北大理科某专业，考试成绩符合录取线，却在最后一分钟被另一个分数不如他的干部子弟取代。这件事对杨焯的打击之大，足以影响他的后半生。杨焯为什么会被刷掉？杨宪益的妹妹杨敏如说：

他（杨焯）考北大，完全考上了。分数都好。他不是后门挤掉的，就是我们国家的政策，觉得这是外国人的孩子，就不能（碰）保密的东西。就给他弄到北京工业大学去了。这个给他一个很大的刺激。（杨敏如访谈，1994 年 6 月 21 日）

戴乃迭还蒙在鼓里，没有人把真正的“底”交给她。她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她多次敦促杨宪益找有关人士想办法，都无济于事。她埋怨杨宪益对儿子不关心。从这件事开始，杨宪益的家庭开始出现裂痕。从此，父母与儿子之间（特别是父亲和儿子之间）渐渐越走越远了。此是后话。

86. 戴乃迭“石破天惊”的一段话

关于戴乃迭的“不懂政治”，还有几个突出的例子，这些事例实际上反映了戴乃迭敏锐的思考能力和坦荡直率的为人。然而，也使她开罪了外文局领导，更受到政治上的怀疑。

1959 年，彭德怀“出事”以后，只在党内一定范围内传达，广大老百姓和机关一般工作人员都毫不知晓。戴乃迭从外报上看到了这个消息后，她认为，这么大的事人民应该有知情权。于是，她直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当时《中国文学》英文组组长唐笙回忆说：

59 年彭德怀出事，戴乃迭看了外电知道了这事，她写了一封信正式提出意见。她说‘彭德怀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在这儿工作，我们也是人，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那时候我们才知道彭德怀的事。我们都非常老实，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说。我的任务就是把这封信翻成中文，交给领导。这件事杨宪益夹在当中，领导就对杨宪益很不满。（唐笙访谈，1999 年 11 月 29 日）

第二件事是在 1965 年左右。当时的中国，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日甚一日，报纸上充满了歌颂“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诗篇，还登载许多亚非拉人民对毛泽东的颂歌。英文版的《中国文学》为了“突出政治”，也刊登了许多类似的诗篇。戴乃迭每每在翻译完这样的东西之后，在译稿上用英文写下这样的评语：Childish!

（幼稚！）⁽⁵⁾在当时越来越“左”的政治气氛下，戴乃迭这样的公开表态当然是犯忌的。

然而，最令人料想不到的是戴乃迭在 1966 年文革前夕做的一件事。

1966年2月，江青秉承毛泽东的指示，在林彪的支持下，召开了一个“部队文艺座谈会”。会后整理出“座谈会纪要”，交毛泽东审阅。毛在“纪要”上作了11处修改。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再次找陈伯达、张春桥对“纪要”作修改；3月14日江青再次将修改后的“纪要”呈送毛审阅。3月17日，毛泽东审阅批准了“纪要”。4月，中共中央将“纪要”批发全党。4月18日，《解放军报》社论全面公布了“纪要”内容。“纪要”宣称，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至此，该“纪要”几乎把人类创造的全部文化成果都打成了“黑线”的代表。

戴乃迭受命把“纪要”翻译出来登在《中国文学》杂志上。戴乃迭翻译完了以后，用英文写了一个“批语”交给了领导。批语的大意是：

这篇纪要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可以掘自己的祖坟，可是在中国的对外刊物上掘外国人的祖坟（指“纪要”把西方文艺都打成“资产阶级黑线”），这样的做法在对外宣传中是非常愚蠢的。

戴乃迭在1966年4月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险恶气候下，敢于如此直截了当地批判“最高领袖”批示过的“纪要”，她的行为，只能用“石破天惊”这四个字来形容！

大惊失色的《中国文学》的领导，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件事。据当时《中国文学》英文组组长熊振儒回忆，他们把这个“烫手”的批语“压下来了”。因为事情太重大，如果向上报，恐怕连他们自己都可能“吃不了兜着走”了。何况，当时何路已被定为“周扬文艺黑线上的人”，自顾不暇了。

但是，戴乃迭的同事吴善祥认为，戴乃迭的这个“现行反革命行为”和她日后的被捕有关系。

87. 山雨欲来风满楼

杨宪益在自传中对文化大革命的最终到来有两段很重要的话：

对于许多不了解中国近几十年历史的境外人士来说，“文化革命”的同义词就是“疯狂”。他们认为，只有在1960年代后半期到1970年代的前半期中国才走向了疯狂。实际上，这种疯狂早在十年前就开始了。也许是毛主席和其他的老革命被绝对权利冲昏了头；也许是毛主席感到自己年纪老了，想加快社会主义革命的步伐，以便在他死以前可以看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总之，从1955年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运动开始，到1957年的反右运动，再到1959年的大跃进运动，连续不断的开展政治运动，没有片刻的喘息。整个国家变的越来越激进。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降的越来越低。我并不是说，这四十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没有取得某些重要的成就，尤其是在工业和军事力量方面。但是，我们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呀！（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05页，雷音译）

文化大革命仅仅是这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最高潮，是整个事态达到的极点，而不是由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妄想篡权的偶然事件。尽管文化大革命以雷霆万钧之力爆发于1966年的夏天，但在一、两年之前，人们就感觉到一场可怕的暴风雨将要来临。实际上，自反右运动以来，党的趋向就是越来越左；加之十年前在1950年代中期进行的工业、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国范围的肃反运动，斗争会，大字报的兴起等等，所有的“文革”的配料都已经齐全了。整个国家，尤其是青年人，都已经培训完毕，时刻准备开始这场疯狂的试验。只待毛主席在天安门

上一声号令，就能点燃冲天的大火。（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16页，雷音译）

这两段话，深刻而形象地概括了中共在解放后几十年的历史走向。杨宪益驳斥了官方的所谓文革是“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妄图篡夺国家权力的谎言。尤其是他提出了“一代青年人被训练出来，成为这场‘大革命’的先锋和炮灰”这一历史现象，引人深思（直到今天，关于“文革”的起源和反思文革这两个命题远远没有得到彻底的揭示和总结）。

杨宪益在自传中谈到了他早就预感到自己要“出事”，一系列迹象表明，“斧子”正高悬在他的头顶，随时都会砍下来。

第一个事例是他翻译的《史记选》被封存，有关部门明确告诉他，接到“上面”通知，凡署名‘杨宪益’翻译的著作暂时都不能付印。

第二件事是他被取消了第三届全国作协大会和文代会代表资格。已经发给他的代表证被收回，没有给他任何解释。

第三件事更严重：他被取消了工作的权利。还在1965年，“上面”就通知他，停止《红楼梦》的翻译工作，也不再做任何别的翻译工作。这就是说，杨宪益连“控制使用”的资格也被取消了！杨宪益已经完全落入和“地富反坏右”相差无几的地步了！

尽管杨宪益是一个豁达的人，但是如此一步紧逼一步的针对他的警报声使他再也不能掉以轻心。在文革以前很长一段时间，杨宪益就开始过着阴云密布的日子了；如今，他更感到一阵阵的风声鹤唳，不知道哪一天就会大难临头。他把这种终日悬心的日子比喻成“每日都感到有一把斧头高悬在头顶”。他写道：

我知道，斧头就要砍下来了。但是，它还要等一等，直到1966年的夏天，毛主席一声呼唤，号召所有的红卫兵开始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天。（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17页，雷音译）

在那一段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日子里，杨宪益十分关注局势的发展。他分析每一个大批判的动向。当时，毛泽东直接推动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发起了一系列的大批判。不妨简单回顾一下文革前夕越刮越烈的“阶级斗争台风”：哲学界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论；史学界批判翦伯赞的“清官论”和“让步政策”；戏剧界批判了孟超的“李慧娘”、田汉的“谢瑶环”和夏衍的“赛金花”等戏；电影界则批判了“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逆风千里”“兵临城下”“抓壮丁”等一大批影片；最后，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由姚文元秉承毛泽东的旨意写下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座谈会”，写了座谈会“纪要”。提出文艺界建国后十五年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

3月28日和30日，毛泽东在两次与康生等人的谈话中批判彭真五人小组的《二月提纲》，还点名说“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提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号召各地“造中央的反”，“大闹天宫”。

4月16日，《北京日报》发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该批判被指责为中共北京市委“舍车保帅”的阴谋。

5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的谢胡时说：“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会见在场的有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伍修权。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文革纲领性文件“5.16通知”。

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著名的“5.18讲话”。大谈“

反革命政变”。

5月18日，就在林彪讲话的同一天，“三家村”的主要执笔人邓拓自杀。

5月23日，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自杀。邓拓和田家英是文革的第一批牺牲者。他们的自戕，预示着文革的“血雨腥风”的性质。

5月25日，在康生的操纵下，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什么？》的大字报。毛泽东看到康生送给他的“大字报”底稿后，将其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并决定向全国广播。

6月1日，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从此，爆发了震惊全世界的“文化大革命”！

尽管以上某些重大事件是后来才公布于众的，但是每一天的报纸都传来这种信息：绳索越拉越紧了！当时的杨宪益，还没有被剥夺和大家一起参加政治学习的权利。他看到《北京日报》上批判了《燕山夜话》以后，猛然想起自己在1964年曾为《北京晚报》写过一篇《说龙》的杂文，该文引用“叶公好龙”的典故，讽刺某些口头革命派。既然“三家村”和《燕山夜话》都被批成反党反社会主义，那他这篇文章也肯定“在劫难逃”。于是，他在学习中主动批判自己的这篇文章是“毒草”，并表示“欢迎同志们批判”⁽¹⁶⁾。这件事虽然不大，却很重要。它显示了杨宪益的心理变化。解放后，中国知识分子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洗脑”。由于杨宪益的“反蒋”光荣历史和他政协副秘书长的特殊地位，他没有参加这些“思想改造”的运动。故而，他的思想较少受到“改造”，保持了一个“独立思考”的头脑，使他在许多问题上得出迥异于官方的结论。但是，当“阶级斗争的强台风”越刮越猛，整个国家都在风暴前颤抖时，注定要第一个遭难的杨宪益们的心境和思维就再也不可能保持正常和平静了。“终日战战兢兢，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就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写照。在“高悬的斧头”威胁下，坚强如杨宪益者，也做出了“主动自我批判”的姿态。这个行动，反映了政治高压的可怖，也反映了他的心理开始被扭曲了的事实。

关于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杨宪益在回忆中，曾谈到了文革前的老舍。从他与老舍的一次简短相遇中，可以看出老舍“胆战心惊”的精神状态：

文革刚要开始的时候，我在理发店里头看见他（老舍）在理发。我就跟他说刚看了个苏联电影（雷注：当时内部常播放一些苏联电影以供批判），那个片子你看了吗，他说我看了。我说那个电影拍的很不错呢。他忽然就紧张起来了。他哆嗦着说恐怕思想上立场上有点问题，有点问题。我觉得他的紧跟是假装的，我说你是假装的，你要假装立场坚定，我心里想。他说的好像不是真话，胆子太小了。我们在理发店里随便聊天，有什么关系？他就不敢说。那个时候老舍就是这样的。还有就是周恩来那次在那儿讲他家里的生平变化，老舍在那里吓的不得了。一个是萧乾，一个老舍，简直像耗子看见猫似的那么紧张……后来老舍在文革中挨了一顿揍，去世了，我听了很难过，我很同情他。（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那一次，杨宪益从老舍谈起，进一步涉及到了文艺界其他老知识分子：

老舍解放前并不是怎么特别进步。人是非常聪明，的确是有才华。从前写的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写得的确好。还写过一个《猫城记》，是有点讽刺苏联、延安那样的什么人说话都是一个调子，带点讽刺极权主义的。但是呢，《猫城记》解放以后说是老舍的一个败笔。虽然西方有翻译本，可是在国内从来也不宣传也不提这本书。解放后，老舍的东西越写越糟。越写越糟的原因是共产党要他写什么宣传，他就按照那个道理来写。什么《龙须沟》啦，《方珍珠》啦，

以及更糟的就是到朝鲜前线写的那些东西了，跟巴金一样。他们那个时候写的东西都不是心里头的自己的想法。不过老舍本人当然有他可以原谅的一点，就是他真害怕。共产党来了以后他真不知道怎么样才好。真是觉得我要得罪了共产党，共产党也许就要把我打死了。他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为满族人的后代的确有这个。我看过一个他没有写完的带点自述性质的东西叫《正红旗下》，就是谈他们家里头的事情。他们那个时候很害怕汉人反对满人，杀满人。他小时候那个印象很深刻，就是汉人不能得罪；汉人的统治者就更不能得罪。他始终是有点这个样子。所以有的时候他讲的话呢有点言不由衷，解放以后写的东西有点好像不是他真正想说的话。可是我们汉族那个时候也那样子。比如说巴金，解放以后也写不出好东西了。那个时候也是吹捧。吹捧有两种，一种是害怕，还有一种是由于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对共产党的热情有点冲昏头脑，所以都是歌功颂德的一套东西。郭沫若也是那么写，巴金也是那么写，曹禺也是那么写，还有好多人都是那么写；结果都没有写出像样的作品。（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杨宪益的这个回忆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观察了老舍，揭示了解放以后，战战兢兢的作家们在失去“创作自由”之后，创作生命“集体死亡”的残酷事实。他的回忆对研究文革前夕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态和研究老舍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第六章北京时期（中）（1966-1972）

88. 当初杨宪益为什么拥护文化大革命

杨宪益在回忆中坦承：“文革初期我对共产党还是非常拥护的。我一直是非常拥护的。”当时杨宪益为什么拥护文化大革命？这是个具普遍性的重要问题。笔者不妨略作考察。

尽管自1964-1965年以来，“阶级斗争”的飓风越刮越烈，杨宪益对“一场可怕的暴风雨”的来临也早有预感；尽管几十年来，杨宪益的许多朋友都受冤屈成了“右派”或“胡风分子”，他本人也受到大大小小的批判；尽管杨宪益在文革前对中共的一系列“运动”已经有了不同的看法；但是在文革的初期，杨宪益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还是“非常拥护”的。在笔者采访过的老知识分子中，这种“杨宪益现象”并不是个别的（“两个顾准”现象的出现，也是一个例子）。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

在笔者思索这个问题时，德国社会学家汉娜·阿伦特在其著作《极权主义运动》中的两句话曾引起我的注意。一句话是：“只有暴民和精英才会被极权主义的锐气所吸引”。第二句话是：“正因为认可了功利主义的核心思想，极权主义政府的反功利主义行为、完全无视群众的利益这一点，就成了一种震荡。”我觉得，毛泽东的“锐气”和他的“反功利主义”正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包括杨宪益）对他心仪的原因（当然，对“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充满感激的民族主义的情怀是更为普遍的一个因素，此处不详述）。

自“反右”以后，毛泽东认为除掉了阻碍他大踏步向“社会主义”迈步的障碍，他的心情舒畅，说了不少充满诗意和豪情的话，真是鼓舞人心。他经常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等等，他鄙视那些“营营苟苟”、只顾“吃饱饭”和“生孩子”的人。毛泽东的这些气质和性格正是杨

宪益对他最喜欢的地方。因为它与杨宪益的内心深处的浪漫主义和诗人气息正相契合。所以，尽管杨宪益对“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的许多荒谬做法有意见，但是他高度评价运动的“精神”。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忘我投身到“共产主义劳动”中去。

从1958年起，毛泽东开始提倡恢复战争时期的“供给制”，反对“资产阶级法权”，主张消灭三大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这些带有“乌托邦”色彩思想和杨宪益的社会理想也很吻合。因为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一向重视“义利之辩”，服膺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教义。他们蔑视那些以谋利为第一要务的人。而“天下大同”则是他们对社会的最高理想。杨宪益作为一个既受过中国传统思想的熏陶又在欧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判断是超越自身利益的（中国不少知识分子也是如此），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可贵之处。

再者，毛泽东从1964年“四清”时起，就明确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问题；后来，这个问题越来越尖锐，演变为毛泽东不惜在文革中用“大民主”的方式发动群众（首先是发动青年学生）来“亲手打碎他自己创建并领导的党”（正是这一点，使毛泽东赢得了包括萨特在内的全世界左派人士的心。直到今天，一些西方历史学家和学者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仍然持某些正面的评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问题的提出，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毛的“对立统一”的哲学观使他信奉“不断革命论”，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这种哲学观指导下的产物）以外，还有一个根本原因是“对‘权位’和‘权威’的担心。毛泽东非常惧怕他死后出一个“中国的赫鲁晓夫”，也来作一个掘他“祖坟”的“秘密报告”。但在当初，毛泽东说的“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和一系列鼓舞人民的话对“人民群众”起来反对中共党内的“特权”是有直接作用的。杨宪益对这一点，在思想上非但不反对，反而很支持。即使这样做也可能使他本人失去一些“特权”（指经济收入，在政治上他早已毫无“特权”可言）。因为解放十多年来，人民群众在实际上并没有任何政治权利。而中共各级官僚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矛盾完全没有一个正常的“出气口”，积压日久，必然爆发。毛泽东提供的这种“大民主”的方式，在当时似乎正是一个类似的“出气口”。解放后杨宪益观察了十几年，他感到中共的“特权很厉害”（主要是政治特权），所以，他并不反对通过这样一个“出气口”来遏制特权（他当时以为这个方法可行的）。他认为“文革”和历次运动最大的不同是：历次运动是整下层人民和异议分子，而“文革”却是整真正的“当权派”（他的这种“误解”也反映在他的《自传》中。他对自己被第一批“揪”出来很感意外。因为他既不是党员，更不是“当权派”）。

综上所述，尽管杨宪益对他个人的命运和前途心怀不安（“组织上”怀疑他的“特嫌”问题），但他对全局的形势却并不悲观。

然而，所有的人都上了毛泽东的当。毛泽东这个权术大师在借助青年学生和造反派的力量搞倒了他的政治敌人刘少奇之后，翻过来再轮番整治“革命小将”们，十年下来，上自国家重臣下至平民百姓数以亿计的人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种以“大民主”的名义实行的“大暴政”和“大恐怖”，是杨宪益和任何善良的人都始料不及的。

89. 一石激起千层浪

据笔者综合采访人回忆的材料（杨宪益从不记日记，也没有“大事记”之类的

资料)推算,杨宪益被“揪”出来的时间是在1966年7月。这和沈从文相似,比钱钟书杨绛则早一个月。当时,尽管杨宪益对自己会有一场“大难”早有准备,但是他变成外文局第一批被“揪出来”的对象,“享受”和“当权派”一样的“待遇”,甚至比他们还要“出众”,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杨宪益在回忆中把这种现象称为“丢车保帅”。他在自传中回忆说:

……当时,整个外文局突然贴满了痛斥我的大字报。外文局大院的几栋大楼里大概有几万张我的大字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张大字报“揭发”了我写的支持赫鲁晓夫新路线的四首诗,那些诗用醒目的字体抄出并配了红色大字标题。斥责我是“反动的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的孝子贤孙”,和其他一些胡言乱语。后来,有人突然指出,我不是共产党员,不能叫“修正主义分子”,于是他们给我贴上“反革命分子”的标签。一些同情我的同事暗示说这一切都是那个女书记策划的诡计,她让群众的矛头指向我,她就可以逃脱了。因为那时候被批判的都是各级“当权派”和党的“书记”。而我这个不是当权派的人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他们把这叫做“丢车保帅”。(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20页,雷音译)

在一次与杨宪益聊天时,他更详细地谈到了这个“诡计”的来龙去脉: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以“保护自己”,《中国文学》党支部的某人向外文局有关领导“抛材料”,提供了杨宪益在1961年写的四首“反诗”。当时外文局《北京周报》负责人手下的一员“大将”将这四首“反诗”透露给了一位叫杨力行的青年人。杨力行是新西兰归国华侨,过去常去杨宪益家玩,与杨宪益很接近。领导上选用杨力行来揭发杨宪益,这一招很高明。为了表示与杨宪益“划清界线”,杨力行“反戈一击”贴出了醒目的“揭发反诗”的大字报,造成了很大轰动。在他的带动下,整个外文局都把矛头指向了杨宪益。杨宪益所有历史“旧账”都被翻了出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从办公大楼的一楼贴到四楼,还嫌地方不够,又贴到了外文局的东楼、中楼和西楼,形成了外文局文革的一个“高潮”;“震慑”了所有的“牛鬼蛇神”(杨力行后来为这事很后悔,他在杨宪益出狱以后多次哭着向杨道歉,杨宪益原谅了他,并和他继续保持了友谊)。(杨宪益访谈,1999年12月20日)

当时杨力行制造的“轰动”还不只这一件事。他还制造过一件更轰动的新闻。在一次全外文局精心策划的“批斗”杨宪益的大会上,杨力行这个“知情人”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揭发了杨宪益的一个“现行反革命”言行,就是这件事,使杨宪益成了全外文局“最坏的坏人”。杨宪益的同事喻璠琴回忆说:

有一个华侨跟他们家很熟的,叫杨力行,老上他们家的。他“蹬蹬蹬”地从凳子上踩到桌子上去揭发他(杨宪益)。他的这句话很严重的。他(杨力行)用英文说的。意思是说老头子不死天下没有太平。就是因为这一句话,杨宪益受到很严重的批判。因为当时谁要说到毛主席这个话就是反革命了。就是因为这句话,当时就给他又是挂黑牌又是搥头。黑牌好像是用红墨水写的,红墨水都流到他衬衫上了。铁丝勒的他脖子都红了。(喻璠琴访谈,1999年12月18日)

那次声势浩大的“批斗会”在外文局食堂里召开。就是在那次会上,革命群众们导演了一出“伐子都”的武戏:他们把三张吃饭的方桌摞起来,让杨宪益爬到最高层上站着,低着头听批判。当杨力行揭发了“耸人听闻”的“反革命言行”之后,全场的“革命群众”“群情激愤”,立刻“打倒”、“灭亡”的口号震天响,并马上给杨宪益挂了一个比他身体大一倍的黑牌(一块挂着粗铁丝的木头黑板),黑牌上用红墨水写着“打倒反革命分子杨宪益”几个大字。一位“阶级感情无比深厚”的女士把一杯滚烫的开水朝杨宪益脸上泼去,开水从杨宪益脸上流下来,弄模糊了黑牌上的字,红墨水流到杨宪益的绸衬衣上,成了一副色彩斑驳的“印象派绘画”。在

回忆中杨宪益说，他当时最担心的是从那么高的桌子上被“愤怒”的群众踢下来：

因为我站的地方离地面超过十英尺高，我唯一害怕的是他们会动武。怕他们发起怒来踢我或者把我从那么高的地方推下来，那我一定会摔断胳膊腿。所幸的是，这样的事没有发生。（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21页，雷音译）

笔者曾反复问杨宪益：杨力行揭发的那句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他当时究竟对毛泽东是怎么认识？这个问题非常敏感，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很“恐怖”的问题。文革虽然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但很多中国人一听到公开问这样的问题，还是避之惟恐不及。尽管他们可能在自己家人中间说说心里话（1986年夏笔者曾经在一次采访冯友兰先生时，向他提问对毛泽东的看法，其女宗璞先生在我开口录音录像之时特地前来阻止了我。当时距文革结束已经整整十年，可这个问题对中国人来说还是不能碰的）。可是，杨宪益正面回答了我（这正是杨宪益之所以是杨宪益之故）。他说类似的话是他与外国人聊天时说的，那时杨力行经常去他家，他可能也在场。他说：

我觉得共产党得了天下，毛泽东一开头做的非常好。我那时非常之钦佩。解放前夕的那次会议（雷注：1949年的七届二中全会）我觉得毛泽东做领袖作的决定都是非常之好的。到了后来，有一度毛泽东要下台，让刘少奇周恩来上来，因为他们比较起来在城市管理方面比他在行一些。他那个时候又要搞激进的共产主义，像霍查的那一套，大家吃大锅饭啦那一套，我就觉得很可惜，我就觉得要是毛泽东真下了台，要是由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管理下去的话可能更好一些。后来当然就有这个想法。平常也这么说，或者说类似的话。（杨宪益访谈，2001年5月25日）

在另一次谈起这个问题时，杨宪益则说当时他那么说，是指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如果盖棺论定的话，他在晚年对国家搞的很不好。但是，他对毛泽东的看法还是“三七开”或者是“四六开”。他对毛泽东并没有“刻骨仇恨”，而是一直尊敬他，认为他有功于中国。（杨宪益访谈，2000年1月21日）

笔者认为，这两次杨宪益的谈话都是他的真实思想。其中的矛盾正是杨宪益的思想矛盾（也是中国很多人的矛盾，不少中国人至今对毛的感情仍是又爱又恨，爱恨交加的）。

66年7月，外文局的领导（66年文革开始到67年初，是官方指派的“革委会”、也即原来的局长局党委领导外文局运动的）施用的“策反”杨力行的计策大获成功，杨力行的两次揭发使杨宪益成了外文局“第一号罪人”和第一号的“牛鬼蛇神”。他的同事唐笙说，那时《中国文学》英文组里的人都愿意写杨宪益的大字报，“人人都写他的大字报”，“搜集材料就写他”，因为他头上“辫子”最多，写他也最“保险”。另一位同事赵学龄则很谨慎地说，外文局领导“可能”有这个意思——“把矛头指向真正的‘牛鬼蛇神’，他们就可以轻松一些了。”另一个当时的“革命左派”对笔者说：“当时，《中国文学》社的群众分成两派，一派反叶君健（时任《中国文学》的主编）保何路（时任《中国文学》党领导），另一派反何保叶，可是两派的人一致认为杨宪益应该‘打倒’，他是公认的‘反革命’！”（事隔二十多年，此人说起杨宪益是“反革命”时的神情仍然“崑钉截铁”，给笔者很深的印象。）

可见在当时，杨宪益是被公认的一个“真正的牛鬼蛇神”。

文革初期，整个外文局形成了批斗杨宪益的高潮，这的确使外文局的头头们松了一口气。但是他们高兴的时间不长。不久，他们自己也一个个被斗了。

90. 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精神危机

自从杨力行揭发了杨宪益的“反革命言论”以后，外文局开始了对杨宪益的日夜轮番的批斗。大会斗，小会挖，日夜连轴转。“革命群众”们一定要“挖”出杨宪益的反毛主席的“反革命根子”来。那段时间，整个社会都发了疯，“红八月”的红色恐怖使千万人死于非命。“勒令”“打倒”“油炸”“灭亡”的喊声天天都从高音喇叭中叫出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似乎要把所有的人都淹没；在外文局，大院里天天都有人被“揪出来”，“满院子都在斗争人”，喊的喊，嚷的嚷，一片“鬼哭狼嚎”（杨宪益语）。外界的一切，排山倒海般地向杨宪益压过来，使这个从不知“害怕”为何物的人失去了重心。白天，他照样“上班”，办公室里没有一个人和他说话；晚上他回到家里，家中也没有人理他，孩子们都和他“划清了界限”。儿子杨焯甚至不再叫他爸爸，而是直呼“杨宪益”。他完完全全成了一个“弃儿”。杨宪益在自传中有一段令人落泪的话：

我感到，我突然变成了一个社会的弃儿。当我晚上回到家里，我发现乃迭和孩子们照样过着她们以往的生活，很快乐，甚至有时热情高涨。她们没有受到干扰，她们的生活和我不一样。她们也不和我说话。白天，我在办公室里，没有一个人理我，也不和我打招呼。我想，我在“红八月”里真的是害怕了。（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24页，雷音译）

这是杨宪益一生中第一次用“害怕”这个字眼。在四十年代，当他奔波在川黔路上时，他曾经经历过国民党士兵瞄准他的头就要扣动扳机的险境；抗战胜利后“复员”回南京的船上，他经历过船翻人亡的险境；他都没有害怕过。而这一次，他害怕了。

杨宪益为什么会“害怕”？笔者认为，最要害的原因就是杨力行揭发的所谓反毛泽东的“现行反革命”言行（其他的“罪行”都不在话下，如支持赫鲁晓夫的四首“黑诗”，杨宪益当初曾故意让党书记看到这些诗以示“抗议”，他毫不害怕）。当时的外文局领导得到了杨力行揭发的“防扩散材料”简直是“如获至宝”，因为这证实了他们过去对杨宪益的怀疑和批斗都是“正确”的。这一次狠狠地“斗争”杨宪益，一方面可以说明他们对毛主席的无比热爱和无比忠诚，证明他们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另一方面也“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使他们自己得到了喘息。

当时外文局和《中国文学》的“革命群众”们“众志成城、斗志昂扬”地大会追小会挖，逼迫杨宪益“交代”他的“反革命动机”，对杨宪益的精神造成了无比深刻的伤害。杨宪益曾对笔者说过，他不怕大会斗，就怕小会的“追问”，那些追问“非常之恐怖”。聂绀弩有一首写“文革”的诗，其中有两句著名的对子：“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椎心坦白难”，深刻再现了当时的情景。李慎之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许多人就是因为小会批斗“熬不过这一番折磨”才自杀的。具体到杨宪益，他说的那句话，在今天看来，只是一句“大实话”。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说，毛泽东的悲剧是“一种没有制约的权力在完全封闭的环境中无限膨胀，只有‘死而后已’”了（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载《解放文选》1210页，经济日报出版社）。而在1966年7、8月间，正是林彪宣称的“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甚嚣尘上的时候。如果杨宪益“交代”了他的真实思想，那就是承认他早在文革以前就有了“反对毛主席”的思想，那就真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了。他的这些“罪行”在当时无比恐怖的气氛下，随时随地都会遭到“杀身之祸”。

但是笔者认为，杨宪益之所以会精神失常，除了外界的高压逼迫和刺激以外，

最可怕的、真正引起他精神危机的是一正是杨力行的揭发，揭开了杨宪益自己思想深处的矛盾：一方面，杨宪益的深刻洞察力使他很早就认识到中国的多年灾难正是毛泽东（无限膨胀的权力）造成的。但另一方面，他思想深处的乌托邦理想和他接受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以及他个人对毛泽东的好感又使他认同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他的某些学说和理论（当时他也认同文化大革命）。这二者的矛盾撕裂了他的心。作为一个诚实的人，杨宪益开始怀疑他自己。他的精神失常了，他出现了“精神分裂”的现象。他的耳边，永远有一个声音跟他辩论“是革命，还是反革命？”这是一个要命的问题。那段时期，他“听”到将要发生很多恐怖的事情，使他日夜不宁。渐渐地，这种“幻听”越来越严重。杨宪益在自传中说：

当我独自一人坐在办公室里时，我感到同事们在讨论如何开我的斗争会；他们悄声地商量，怎样打我，并要把我打死。我还感到我听见他们正在议论说，审问中已经有人被打死了。实际上他们是在隔壁房间讨论，为的是不让我听见。但是我竭尽全力要听见他们说些什么，并开始了幻象。这是由于我的极度紧张和恐惧引起的幻听症的开始。

我回家后告诉乃迭，我的同事要谋害我，要她立刻送一封信给党的统战部，要他们来救我。中共中央政治局统战部部长徐冰同志是我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就认识的，解放后我还拜访过他一次。我不知道那封信是否到了他手中。后来我才意识到，他已经帮不了我了。他也在运动中被斗了。他被指控为“修正主义分子”后自杀了。（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25页，雷音译）

笔者采访杨敏如时，她谈到了杨宪益被“揪出来”后“众叛亲离”的孤独处境，和那一次为杨宪益送“求救信”的情况：

文革时，一起头就把杨宪益揪出来了。斗他。墨水洒了他一身。在外头游街。简直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了。儿子就不再叫他爸爸了，就叫他杨宪益。女儿也跟他划清界线了。都往我这儿跑。一家子都没有人理他了。

他们（造反派）威吓的很凶。说“你是特务，我们有证据”。“如果你明天还不交代，你就没命了。你就活不了了。”他很害怕。他写了一个条儿说，如果我明天不交代，他们就要我的命了。乃迭骑个车就到我家来了。她绕着弯来的。把这个条儿给我看。还不能给我母亲看见。要不得把我母亲吓死！条儿上写：“赶快去找徐冰！明天我要是不交待，他们就要杀死我。”哎呀，乃迭都哭了！乃迭从来没有一个人到我们家来的。那么慌慌张张的。我们说你回去吧，我们一定想办法。想什么办法？没办法！我就跟沛霖（杨敏如丈夫）商量。我说“党员不做了，你也得救他”。我们就打电话给统战部。统战部说徐冰你见不着了。徐冰自己都不行了。结果他（罗沛霖）想了一个主意：晚上去找陈伯达。半夜里，国务院都电灯通明，红卫兵在外头把着。他没见着陈伯达。这个信真递进去了。第二天就开会批判我哥哥。说“你还通风报信？！”（杨敏如访谈，1994年6月21日）

在杨宪益口述历史时，他补充谈到了这一段的精神失常：

那时候气氛非常之紧张。嚷的嚷，喊的喊，鬼哭狼嚎的。我那时候神经就有一点失常。患了一种毛病，幻听的毛病。我总是听到很多人在那儿骂我，很多人在那儿斗我的声音。后来我坐牢的时候，有一个人死在牢里，是我同一个房间的，也得了这个病。后来就这样死了。这是一种幻听，一种幻觉。……红八月的时候真是恐怖，在北京打死不少人。把人从家里头拖出来斗，在马路上打、踢。我就听见说踢死过好几个人。我在那个恐怖的时候就得了—种幻听。—闭上眼睛就可以看到好像有东西。幻觉是我跟别人总是在辩论，革命还是反革命。那个时候就

想不通。我有时候自言自语。在屋子里头自己讲话。好像是在跟特务辩论。特务假装是革命，我就跟他辩论。我还幻觉外文局里头出现了反革命，反革命假装是革命，在那儿暗藏有电台，用电台指挥大家的思想。然后我怎么样想办法找到电台在什么地方。……那时候脑子有点糊涂了。（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杨敏如的回忆不仅补充了一些细节，还可看出当时人们普遍的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态：

他老听见毛主席说‘我不是坏人’。说杨宪益不是坏人。我很害怕。我们那个时候晚上没人就通电话。那个时候他的电话还没去掉。沛霖就问‘你听见什么’？他说‘我听见毛主席就在隔壁屋子说话，议论我，说杨宪益不是坏人’。我们说会吗？毛主席会来保他吗？不可能吧。过了一天又问，是这么说的吗？（他说）是这么说的。……他那个时候是不行了。这是唯一的一次表示软弱了。（杨敏如访谈，1994年6月21日）

杨力行“反戈一击”的揭发对杨宪益造成的精神刺激，从以下这件事情中可以清楚地表现出来。杨宪益回忆说：

有一次，我认为我听到了一个消息，我熟识的某人被斗、被审问，后来他被打死了。我向女书记提起了这件事，我说“我为他的早逝感到难过”。那个女书记大笑起来，说我精神不正常。她说，这个同志好好的，吃中饭时你就可以在食堂里见到他。我果然见到了他。（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26页，雷音译）

这个在杨宪益的幻觉中“被折磨而死”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杨力行。

杨宪益的精神失常从1966年8月底始，到1967年年初渐渐好转，前后持续了近半年时间。在《自传》中，他“回顾”了他的疯狂状态下的“思维逻辑”，从中清晰可见他受迫害的线索，给后来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资料：

我听到的声音是那么清晰，我不相信都是我的幻觉。我想，一定是有个坏人藏在出版社的某个地方，他有一个邪恶的无线电发报机，发出的信息只有我一个人能够接收到。但是，这个信息怎么只传给我，不传给其他人呢？我对科学很无知……我想，一定是某个或某几个隐藏的坏人把某种化学物质放进了我的身体中。用这种方法，只有我可以接收这些信息，其他人却收不到。所有这些疯狂的想法似乎极端可笑，可在那时，在我半疯的状态下，这些想法似乎很有些道理。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我不是阴谋反对国家的坏蛋。所以，当我独自一人的时候，我就跟隐藏的敌人辩论，或想把他找出来。到了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乃迭和孩子们睡觉去了。我会大声对隐藏的敌人说话，要想揭穿他。有一次，乃迭还没睡着，我大声说话时被她听见了。她认为我在说疯话。事实上，那时我真的是快要发疯了。（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27页，雷音译）

正如杨宪益所言，文革中有无数的人被迫害成了或多或少的“神经病”。但像杨宪益这样完全康复，并且用清晰的语言“再现”发病时状况的人却很少。

91. 是什么使杨宪益的精神分裂症不治自愈？

杨宪益对他的“幻听症”不治而愈是这么说的：

也许是因为我的心智仍保有某些健全的成分——我对自己仍怀有信心；也许是在这一阶段的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性的歇斯底里症有所减弱，对我的政治迫害减少了，我的情绪有所放松；到了1967年年初，我不再受幻听症的折磨，我的精神也逐渐正常了。（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27页，雷音译）

据笔者观察，杨宪益的精神病患的痊愈，除了他所说的理由以外，还有一个

重要原因。那就是：这得益于杨宪益性格的诙谐和幽默。我认为，千万不能小看这一性格上的因素。无数事实表明，同样的迫害，在不同性格的人身上的反应会大相迥异。在笔者访问杨宪益时，谈到当年他被斗“坐喷气式飞机”的状况，杨宪益的戏谑常常使人发笑：

那时候三天一小斗，两天一大斗。反正整天就是斗吧。斗我倒是不怕，（笔者反问：斗您您不怕？）斗我不怕。有几次是跟一批小领导一块儿斗。坐喷气式，我觉得挺好玩，挺滑稽的。让大家（杨边说边做当时的样子）都站在一排一排的，说‘蹶起来！’，就蹶起来，‘再低一点！’就再低一点。说‘再低一点’，就再低一点（他的头几乎要碰到地上，手向后高高举起），我反正是也不在乎。我走路也能走。我腿也挺好，没事。就这个样子（弯腰大大超过九十度）然后我就放松了，不去想他了。我想别的事去了。有的人因为他很紧张，越紧张越难受。有人呆不到半个小时就不行了，就跪下了。大家就一阵哄笑。我呢，一点事没有。（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即使描写那次恐怖的食堂批斗会，杨宪益的笔触也时时流露出某种幽默：

一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翻译或是看稿，楼下来电话说，有人在楼下等我。我下楼来，几个年青人把我领到了食堂。他们放了三张吃饭方桌，一个擦一个。他们帮我爬上了桌子——还挺客气的。然后，一群人就聚在周围批斗我。（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21页，雷音译）

至于那次的汽车游斗，由于是和一大堆人在一起，杨宪益谈起来好像是在说别人的事：

我记得那一段时间里外文局的青年造反派们决定，要把所有受批斗的人搞一次游街，我也在内。我们共有两卡车人，再加上超过12人的造反派。我们站在没篷的卡车上，在西城的街道上行驶。卡车时时要停下来，一些年青的造反派就高喊口号，并把他们准备的传单撒给围观的群众。这些传单上写着我们的姓名和其他情况，如我们在外文局的职务和罪行等等。街上的围观者表情冷淡，仅仅有点儿好奇，几乎没有人加入呼口号或辱骂的行列。仅有几个小孩在哄笑。街上的行人那些日子里对游街见的太多了，很多单位都游过街。当我们到达和外文局有联系的单位，像广播电台和新华社时，他们就叫我们下车，在院子里排好队，然后一个个介绍我们，并批判我们，这些狂热者高呼“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等口号。游街持续了一上午。也倒没有什么特别令人不快之处。除了一件事以外：那天很冷，我忘了穿大衣，回家时，我冻的直发抖。（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22-223页，雷音译）

杨宪益告诉笔者，那次游斗，给每个人都准备了一顶一米高的纸帽子，上面写着“反革命分子x x x”等字样。快要出发时，传来周恩来的指示：不准做侮辱人格的举动。所以造反派临时决定把高帽“放在车上”，而不是“戴在头上”游街。

对这次“游街示众”，杨宪益产生的联想也很滑稽。他说造反派一路上“哗哗”地撒传单，“就像撒纸钱一样”。我猜想，他当时甚至有想笑的感觉。只是没敢笑出来。

至于运动初期外文局第一次在局内游斗两个“当权派”的局面，杨宪益的描写就更滑稽了：这件事在一个下午突然发生了。我们听到了锣鼓声和人们的高呼声。接着我们看到一帮造反派推搡着一个杂志的两个部门领导人在外文局院子里游街。两个人头上都戴着纸糊的高帽。然后，他们被推到他们办公室开斗争会。那情景就像解放前及解放初遍及全国的土改运动一样。到处都贴满了大字报。很显然，这两个部门领导的主要罪行是他们喜欢吃好的食品。于是，大字报栏上全是

有关他们过去吃的美味的饭食。好像外文局突然变成了一个饭馆。到处都是用大字写的菜单。（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20页，雷音译）

因为是第一次的“造反行动”，所以杨宪益的印象格外深刻。他说，那两个被游斗的领导是《人民中国》的康大川和李哲民。他们二人头戴纸做的高帽，一人手里敲一个锣，一边走一边嘴里高喊着“我是反革命，我是反革命”。而他们的“罪名状”上写的却是“红烧狮子头”、“醋溜黄花鱼”等十多项菜谱，你看这个“反革命”的“罪行”滑稽不滑稽？！

我想，“自嘲”和“嘲讽”的能力是杨宪益的“解毒剂”，正是这种能力使他渡过了最艰难的时刻，使他的神智逐渐恢复正常，看清了事物的本来面目，并且使他越来越具备某种“抗毒的本领”。

无独有偶，杨宪益的例子使我想起了另一个人，他就是“三家村”之一的廖沫沙。在“三家村”的三个人中，只有他逃脱了死亡，活着看到新时期的来临。他之所以能够如此，除了别的原因以外，性格的诙谐自嘲是很重要的内因。在1967年，吴晗和他（当时邓拓已自杀）挨斗最激烈的时候，他居然有心思写开玩笑的打油诗！这真是一个奇迹！以下就是廖沫沙为纪念他与吴晗的“同台之谊”（同台挨斗争）写的诗（作于1967年）：

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于今爱折腰；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

当然，并不是每个受迫害的人都能像杨宪益和廖沫沙这样“苦中作乐”。很多人经不住折磨而自戕，很多人被逼的发了疯。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杨宪益唯一的爱子杨烨身上。这是后话。

92. 父与子

文革开始后（具体时间似不在66年抄家高潮之中，而在1967年夏秋，当时杨宪益已经作为“牛鬼蛇神”被强制劳动了），杨宪益被抄家了。抄家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的儿子杨烨。杨宪益在回忆往事时，并没有主动谈起这件事。当笔者问他时，他只是寥寥数语地说：…后来文革了，杨烨那时候已经有点神经，他要极左，回来要破四旧，要砸这个砸那个。我说要砸就砸吧。后来还是张春福（当时《中国文学》的左派一笔者）跑来说乃迭还是个外国专家，把东西都砸了，把照片唱片都毁了也不合适，弄的她不愉快不合适。他出来调停，阻止了杨烨。（2001年2月27日访谈）

关于杨烨带领北工大《东方红兵团》红卫兵回家“破四旧”的事，笔者第一次是从杨宪益的朋友邹霆处听说的。邹霆说，杨烨在行动前专门做了调查，为了避开母亲戴乃迭，他特地挑选乃迭去友谊宾馆游泳的日子行动。杨宪益的回忆和邹霆的说法有些不同，他说杨烨没有带领北工大的红卫兵来抄家，而是自己一个人回来破四旧的。他说：

他（杨烨）没有带着红卫兵，是他自己一个人跑到一回家来，要把我们的唱片什么东西都拿走，都给弄坏。我们告诉了《中国文学》方面，他们就派了一个同志跟杨烨商量说，你妈妈是外国专家，你爸爸的东西把它撕了毁了的话不要紧，但牵涉到外籍专家，现在外籍人都不要动，你还是不要撕这些东西。结果就砸了几件小东西，大部分他还要烧还要砸的，就没有让他砸。（杨宪益访谈，1996年6月3日）

尽管破四旧的目的没有完全达到，但杨烨的主要目的还是达到了——他用实际行动公开地和父亲杨宪益划清了界限。

父辈和儿子辈的矛盾和冲突，似乎是人类很古老的命题。两千四百多年前的古希腊戏剧《俄狄浦斯王》写的就是父与子之间命运和意志的冲突。在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名著《父与子》中，儿子辈的代表人物巴扎洛夫对父执辈的无情批判和坚决背弃的态度，在当时的俄国引起了社会上和文学界经久不息的争论。巴扎洛夫被认为是“第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人物。然而，俄狄浦斯的弑父，是无意为之。他只是不知不觉之中执行了神的意志；而巴扎洛夫，一个俄国十九世纪的激进革命派，他对父执辈的激烈抨击和嘲笑，也只是表明自己决心要走和父执辈相反的道路；他们的行为，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演出的一幕幕无数个惨剧比起来，真的要算小巫见大巫了。在人类历史上，发生如此大范围、大规模地当众批斗甚至殴打自己的落难的父母双亲；有如此众多的年青人公开与自己的家庭决绝，甚至亲自带队抄家毁园的现象，可为世界第一。由于它对人心的创伤太深太巨，对人类最后的一块栖息地—家庭的破坏太深太大，所以事隔几十年，除了少数当事人的回忆（在有限的文章中，陈凯歌和甘铁生的回忆和杨沫儿子老鬼的小说《血色黄昏》直接面对了这个问题）之外，少有深刻的反思文章出现。人们不禁要问：当时的中国年轻人是怎么了？他们怎么会对自己的亲生父母这么残忍？他们的心难道不是肉长的吗？

杨烨的那次回家破四旧，他与父亲杨宪益的关系，都要放在这样的背景中来考察。

杨宪益和杨烨这一对父子的关系，比起上一辈杨宪益与徐燕若的母子关系来，有极大的差别。在徐燕若的时代，尽管她因为出身贫寒和侍妾的身分受到杨家人的歧视，使她与自己的亲生儿子地位悬殊；尽管她和儿子杨宪益这一代之间也有代沟；但是，她与杨宪益的母子关系，基本上没有脱离母慈子孝的中国文化传统。但到了杨烨这一代，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这个时代，唱的歌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和《东方红》；流行的口头禅是“亲不亲，阶级分”。孩子们从上小学开始受到的“阶级教育”就是：“我们是党的孩子，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听毛主席的话，跟着共产党走，一辈子干革命”这句话曾经是每一个幼小的心灵牢记不忘的教导；孩子们和青少年被教导要“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要仇恨地主富农资本家，要仇恨“胡风反革命集团”及一切“反革命分子”，要仇恨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要打倒美帝苏修和一切反动派；最后，一直发展到文革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毛泽东那句著名的“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的语录使“爱”这个人类最具超越性的情感也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一切超越阶级和党派的价值观念都受到了彻底的批判。“自由、平等、博爱”和“人道主义”都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遮羞布，要彻底把它们“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正义与非正义、真理与谬误、美好与邪恶”都被规范在“阶级和党派”的条条框框之中，使人除了“阶级”的眼光以外没有别的眼光，除了“阶级”的立场之外没有别的立场。这样的教育是一种毒化的教育，它使青年人的精神荒漠化、粗鄙化，它培养出整整一代冷酷无情的“以革命为己任”的“接班人”。在这一代青少年开始懂事时，他们知道的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分清敌我”（毛主席语录的第一条就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依照这个“阶级分析法”，“红五类”子弟是“自家人”，是当然的“革命接班人”；那些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少年要想“革命”（这时“革命”的含意与前辈们当年冒生命危险参加的革命已经有本质的不同。现在“革命”这个词实质上是“大好前途”的同义词，只有像遇罗克、张志新这样的“反革命”才需要冒生命的危险）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背叛父母，与家庭彻底“划清界线”，以求得到革

命阵营的容纳。在这样的教育下，“告密、出卖朋友、落井下石、打小报告”之风在“站稳革命立场”的外衣掩盖下大行其道。

1949年解放时，杨焯刚7岁，正是小学一年级的年龄；他成长在这样的时代，全身心地接受了这样的教育。杨焯，这个从小聪明活泼的男孩，变成了一个时时事事以“阶级斗争”眼光看待事物的“革命左派”。杨敏如和戴乃迭的姐姐希尔达曾经对笔者讲了几件事，说明了杨焯待人接物的高度的“阶级警惕性”：1962年，戴乃迭的姐姐希尔达万里迢迢从英国来北京探望妹妹一家（在那个年代，这件事真是稀奇！），正在努力争取入团的大学新生杨焯对姨妈却十分冷淡。他高度警惕地与这位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亲戚保持距离。另一个例子是，文革中，杨焯为了和父亲“划清界限”，曾经亲自到姑妈杨敏如家“调查”父亲杨宪益的“历史问题”。

杨宪益是一个粗心的父亲。他一心扑在自己的事情中，完全听任三个孩子“自由成长”。对于杨焯的精神世界，他很少过问，很少了解。但是他对杨焯受到的“革命教育”并不反对。因为从立场上，他是同情并支持革命的，他自己也投身到这个革命中去。在理论上，他接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这种历史观用通俗的话说，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人类自原始公社制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学说。前面说过，杨宪益不反对用暴力推翻蒋介石的旧政权（无论是出于他的诗人性格还是出于他对蒋介石政权的厌恶）；在六十年代“阶级路线”大行于世的日子里，杨宪益曾经对自己出身于“官僚资产阶级”家庭感到羞愧和抱歉（杨宪益从不相信宗教“忏悔”，这是他唯一表示对“穷苦大众”抱歉的事），所以，当儿子的前途（入团，上大学）因为他的“阶级出身”受到影响时，他内心有一种愧疚。但这件事是“获罪于天，无可祷也”，他是“无可奈何”的。戴乃迭曾经为儿子没上成“北京大学”埋怨杨宪益，认为他对儿子“不关心”。她不知道这是杨宪益最感“气短”之事，是他的一块心病（戴乃迭更没想到，儿子杨焯之所以没上成名牌大学，其主要原因不在杨宪益，而在她这个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英籍母亲）。因此，杨宪益对儿子杨焯在文革中公开造他的反，公开与他划清界线持谅解的态度（中国绝大多数父母对子女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背叛最终都采取了理解和宽宏大量的态度）。当时的杨宪益，对“革命”依然抱着痴心拥护的态度，他没有注意到，儿子杨焯受到的教育，在打着“革命”的旗号下，却“复辟”了等级社会的老一套，只不过是把过去的阶级关系掉了一个个儿：过去的“下层”变成了现在的“上层”，过去的“被压迫阶级”成了现在的“压迫阶级”。儿子杨焯其实是在“革命教育”的体制下承受着“出身不好”的压迫（这种压迫在杨宪益和戴乃迭被捕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种压迫对于像杨焯这样一个天性十分敏感、自尊而又害羞内向的青年人的伤害之大，是粗心的杨宪益体会不到的（何况他自己也要穷于应付越来越险恶的政治环境）。因此，杨焯在文革中公开“跳出来”造父亲的反的变态反应，其实正是在这种教育体制长期熏陶下、一旦文革的“非常”时代到来时的最合乎逻辑的反应（文革后的许多回忆文章只谈到了“红卫兵”对社会造成的破坏，却少有对红卫兵现象的出现作深层剖析；至多有文章谈到毛泽东这尊“神”与红卫兵之间的关系；但很少有人清算到几十年来制造出成千上万个“红卫兵”的这条“深入人心”的教育路线）。

其实，所谓的“大义灭亲”的行为，不自文革起；远自建国初期的土改运动就开始出现了。后来的十多年，在中共发动的大小七、八次的运动中，每揪出一批“分子”，就出现一批与“分子们”划清界线的妻子（丈夫）和儿女；其中最严重的是“反右”运动，那次运动导致无数个家庭破裂。中共在“阶级路线”上的宣传是：

“家庭出身无法选择，但个人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和“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那些“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们唯有相信这些宣传，才能使他们看到自己前途的一线希望。于是，他们用“划清界线”和“大义灭亲”来“表现自己”了。到了文革，由于揪出来的人太多，所以这样的“表现”也就层出不穷，格外引人注目。

说起教育，可以对比一下杨宪益和杨烨父子两代人在青年时代遭遇到的截然不同的受教育环境。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杨宪益的中学时代，五四运动的余风未尽，当时的中国文化界基本上还有一个比较宽松自由的大环境（尽管有关当局对思想自由和出版自由也有所控制），无论是革命派保皇派、左派右派中间派，无论是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或者国家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青年学子都可以遍览他们的书籍。真是读书无禁区。那时，杨宪益这个中国天津的普通中学生，竟然可以直接从海外订购欧美国家的原版书籍，这种情况在1949年以后听起来似乎是天方夜谭。1934年杨宪益到了欧洲后，他更是看到了思想文化界真正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现状。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欧洲诞生和存活，正是拜当时欧洲的这个“资产阶级思想自由化”的大环境之赐。当时的杨宪益在这样的环境下，和其他中国留学生一样，对“主义”的选择是经过比较鉴别后独立思考的结果。因此，当时的年青人，无论是选择什么样的“主义”，都能够“身体力行”，付诸实践。

而杨烨这一代“新中国”成长的孩子们和父辈成长的环境简直有天渊之别（不是指物质条件，而是指文化氛围）！在国门紧闭，信息不通的“竹幕”后面，他们只能接受“废黜百家、独尊马列”的一家之言。“眼光闭塞，知识贫乏”是这一代人“先天”的缺陷。在他们成长的日子里，人文知识被局限在极其狭窄的框框里；当时，连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思多夫》这样的书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坏书，他们还有什么书可以读？！无怪乎在他们的脑子里，“英雄”只是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赵一曼，还有一个苏联的保尔·柯察金（尽管他们的英雄气概的确值得佩服），六十年代的英雄是雷锋；而“坏人”则是黄世仁、穆仁智和南霸天。

英国思想家伯林在一篇文章中对比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赫尔岑、屠格涅夫和六十年代的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两代知识分子时说：虽然四十年代的赫尔岑、屠格涅夫同样痛恨沙皇专制统治和农奴制，但是他们与六十年代的一班青年革命分子还是有“极深且巨”的区别。赫尔岑厌恶和恐惧六十年代俄国青年雅各宾分子的“好勇斗狠，狂野粗暴”的反人文作风。认为他们“无所忌惮，而强悍刻忍；满腔蛮味的义愤，但对文明与自由亦含敌意”（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128页，译林出版社）。我想，把伯林的这个分析用来对比中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青年人和他们的父辈，情况也“庶几近之”。只是，中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红卫兵比起上一世纪的俄国青年同道们来，人文修养和知识水平又要差一大截。

然而，尽管红卫兵“残酷粗鲁，睥睨一切”，是一群“横冲直撞而不道歉”的人，尽管他们因接受斯巴达式的禁欲教育而显得无情寡仁，干了很多坏事；但是这一代人的本质——在一个狭隘而纯正的层次上（伯林语）——却是无私忘我的。他们目标远大，不计私利，崇尚艰苦朴素，鄙视物质享乐，为了理想而奋斗，勇于自我牺牲。然而，历史使他们在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的时候（红卫兵多数当时只有十七、八岁到二十出头）就不幸成为毛泽东政治斗争（政治实验？）的工具（他们狂热心仪青年毛泽东“粪土当年万户侯”和“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气魄和情怀），

后来又被毛泽东抛弃，成了真正的牺牲品。正如邵燕祥先生所说，现在“红卫兵”（和造反派）成了今天几乎“人人可以唾骂而听不到还口”的“四散了的群体”（见李辉编著：《残缺的窗栏板》，海天出版社）。由于红卫兵在极短的时间内大起大落，许多外国的观察家都感到大惑不解。他们奇怪的是：这些一夜之间冒出来的成百上千万的“红卫兵”，怎么突然就消失的一干二净了呢？

杨焯是这些红卫兵中的一分子。时代的大环境决定了他们悲剧性的命运。

当年选择拥护革命的杨宪益，会想到有一天“革命”这把双刃剑如此深的伤害自己的亲生儿子吗？

93. 清洁工和运煤工

从1967年到1968年被捕入狱，杨宪益在单位的工作是打扫厕所和运煤、拣煤渣。他回忆说：

有一段时间他们派我打扫厕所。外文局的公共厕所过去一直很脏，臭气熏天。我干的很出色：（用小刀）刮去了便池中残留的粪便污垢，然后用水冲洗得干干净净。我干了一段日子以后，他们表扬了我的勤勉认真。《中国文学》的厕所成了整个外文局最干净的一个厕所。（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27页，雷音译）

干了半年厕所清洁工后，杨宪益被分配到食堂当运煤工：

打扫厕所所有半年多，然后就是去运煤。运煤比打扫厕所辛苦一些。我们有个食堂，食堂旁边有煤堆，我运煤到食堂去烧，烧完煤以后剩下了很多炉渣，又要把能用的煤渣拣出来，然后再装车再运到炉子那儿去。这个又搞了半年多。（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杨宪益在回首这些往事时语气平静，毫无“受到迫害”的“义愤填膺”感。谈起因自己工作出色受到造反派表扬时，还流露出一丝得意：

我们那个外文局的公共厕所从来是有名的脏的不得了，臭的不得了，结果我弄的很干净。他们大家都夸我。后来他们又让叶君健去打扫厕所，他们就骂他。说你看你跟杨宪益比，杨宪益打扫的时候厕所多干净，你打扫得那么糟糕。（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5日）

笔者感到，生活现象的复杂和荒诞性又一次显露了出来；在这里，主观和客观又一次出现了某种错位：这些所谓最“低下”的体力劳动明明是“革命群众”对杨宪益的一种“惩罚”，杨宪益却十分乐意去干。他感到，与前一阵大会斗小会批的日子比起来，劳动的日子真是不错。他在这些劳动中得到了宝贵的身心调养和喘息。

值得注意的是戴乃迭对杨宪益“劳动改造”的态度。邹霆在回忆中说：

那时候戴乃迭对毛主席太崇拜了。她觉得毛泽东简直是创世纪的这么一个大政治家。她是一百个相信，独立思考的程度不大。而宪益，她的丈夫，头脑里有另外一套东西。他们俩交流不是太多。……起码杨宪益当牛鬼蛇神，被专政，刷厕所，掏炉灰的时候，乃迭（对他）并不是太同情。我觉得她是出于幼稚和天真，崇拜中国这么一个历史性的的大人物，觉得他（毛）做的都对。起码觉得他的尝试是对的，对世界革命有意义有贡献。她觉得毛泽东真是了不起，是亘古一人，马恩列斯都没做到，而他要来这么一个反修，她非常佩服。…乃迭自己也跟我说过，说杨宪益应该去劳动劳动。她说他一个大少爷，在英国的时候他花钱像一个贵族王子那样。他不知道生活艰苦。她说他应该去劳动。…她说这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他（杨宪益）

什么都不会做，为什么他不应该去做一点体力劳动？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他一辈子都不会做体力劳动。（邹霆访谈，1996年1月16日）

邹霆的回忆为我们深入了解当时戴乃迭的思想状况以及她和杨宪益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作为一个英国传教士的女儿，戴乃迭对毛泽东推行的“改造人性”的事业极为钦佩（尽管她十分讨厌狂妄无知的江青）。“改造人性”是人类的一个梦想，世界上所有最伟大的宗教都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而毛泽东却在中国大张旗鼓地进行了这一项试验；他要把“自私”的个人改造成“大公无私”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要使“六亿神州尽舜尧”；他要消灭三大差别，使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者同享平等，他进行的这项工程可谓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工程了！

从戴乃迭对丈夫参加劳动（她未分辨“自觉劳动”和“强迫劳动”的区别）的态度，可以看出她为人的正直耿介；她的态度带有典型的西方人的性格特征：她不认为自己的丈夫可以成为这项工程的一个例外（她自己也曾积极参加外文局组织的“支农劳动”），正如她也不认为自己的儿子可以例外一样。杨敏如回忆说，当她儿子杨烨面临大学毕业分配（时值68年上半年，她尚未被捕），北京工业大学有关部门曾征求过这位外国专家对儿子去向的意见，戴乃迭表态说：他是个中国人，就应该按照中国的要求办。结果杨烨被分到湖北一个乡镇，正是在那里，他受到了致命的迫害。

虽然日后的现实击碎了戴乃迭的梦想（也击碎了无数虔诚忠厚的中国人的梦想），彻底摧毁了她的生活和健康。然而，我们能因为这试验的失败而嘲笑他们对这一理想的向往，嘲笑人类历史上的这一创举（尽管这一创举的实行过程有着太多的黑暗和血腥）吗？我想，这恐怕正是直到今天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仍然是全世界的学者研究的对象和课题的根本原因。

和戴乃迭的单纯执着相比，杨宪益思想的色彩要丰富的多。他虽然也向往人类的“大同世界”，对“共产主义理想”和毛泽东搞的乌托邦试验也抱有幻想；但是，他与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总不是一回事。其中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他不肯让渡自己的“个人自由”（不管他自己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尽管在中国的大一统政治制度下，个人自由的空间越来越狭小，他仍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地顽固地表现他的“自由主义作风”。他的“颓废”（戴乃迭对他的批评），他的“纨绔子弟作风”，他的“不遵守党的纪律”，他的“口无遮拦”等等都出自这个根本原因。由于杨宪益和戴乃迭二人精神上的差异，在杨宪益被“揪”出来的那段日子里，他和她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和孩子们更无法交流；那段日子里，杨宪益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话，他处于深深的寂寞之中。即使在自己家中，他也是孤独的。

然而，杨宪益的思想的另外一面，力量也十分强大，即他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向往，对马克思宣扬的使人类社会“一劳永逸”地“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的“终极目标”的热烈追求。他认为，既然实现这个目标的任务已经“历史性”地落在了共产党的身上，因此，杨宪益就全力靠拢“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这也是杨宪益在粉碎四人帮后入党的根本原因）。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愿意付出自己的全部知识、智慧和力量（这个对杨宪益来说并不难），也愿意服从党的“铁的纪律”（这个对他来说比较困难），并尽他的可能努力地这么做了。杨敏如回忆了1967年春节的一件事，这件事足以证明杨宪益即使在已经被“打倒”的境况中，仍然不忘记党的“内外有别”和“保密”的纪律：

我母亲住在我家里，以往过年照例要把我哥哥我嫂子接到我们家来吃一顿饭。照例如此。那么，文化大革命时，他们还没到监狱里，难道就不请他们了吗？我这又犯愁了。你不请，跟他划清界线，那我哥哥我嫂子怎么想呢？我说那就还

是请吧。我那老头子很左，他就告诉我‘你千万不要说老舍死了’。我说‘我知道’。人是很奇怪的。我已经知道不能讲‘老舍死了’的话，我还不行。那天几个人吃饭时——心里比平时都不痛快——我不知道嘴里怎么回事，脱口说‘老舍死了’。奇怪极了，说好了叫我别说，我还是说了。乃迭问：‘是吗！？怎么死的？’我哥哥立刻就讲‘乃迭你可不许说，你绝对不能说！’原来他早就知道了，他没讲，我给说出来了。（杨敏如访谈，1994年6月21日）

杨宪益虽被打成了“牛鬼蛇神”，虽然被发配去“劳动改造”，但是他仍然不自外于“革命队伍”，对“革命”仍然一往情深。然而革命的“洪流”对杨宪益却没那么“有情”。杨宪益回忆了一件他刻骨铭心的事：67、68年间，外文局旧的工作组被调走，调进来一批军代表。革命群众纷纷贴大字报表示欢迎新来的军代表，《中国文学》的人也写了一张大字报，办公室的同事们都在大字报上签了名，当杨宪益也想签上自己的名字时，他被当众拒绝了。那一次，杨宪益哭了（读者当还记得杨宪益是很少流泪的）。他在心灵上受到的伤害，远远超过了无数次的大会小会的批斗。

杨宪益在回忆中还谈到他当时被人“随意支使”和嘲弄的情况。有一次大扫除，一个年轻的造反派命令杨宪益擦玻璃，杨宪益立即爬上窗台把所有的玻璃都擦了一遍，正待杨宪益刚要跳下窗台，那人喝道：“怎么只擦里面？玻璃外面也要擦！”年过半百且从不参加体育运动的杨宪益只得战战兢兢站到了三楼办公室的窗外（五十年代建造的外文局办公楼的楼层比现在的楼房高的多）。一位同事见状大声喊：“杨宪益，下来！你摔下去谁负责？”这才使他免去了一次危险。杨宪益说，那一次“多亏这位好心的同事，否则我真有摔下去的危险”。

在那一段日子里，除了“老反党分子”邹霆时时来看他以外，杨宪益几乎与外界断绝了一切往来。这时的杨宪益与邹霆成了“地位平等”的人。

94. 被捕

1968年4月27日晚上十一时左右，杨宪益在外文局大楼办公室被捕。紧接着，戴乃迭在家中被捕。这个日子是当时参与“行动”的一个当事人回忆的。他说，那天恰逢一位同事结婚，参加完婚礼后，保卫处处长张仁杰对他说：“今天晚上留下来，有任务”。行动前他们和公安局的人商量如何动手，最后决定把杨宪益叫到办公室“抓”，乃迭就在家里抓。

详述这个问题之前，先简要回顾一下当时的背景。这时的“文革”形势，经过毛泽东首肯的“上海一月革命”，全国都发生了向各省、市政权的“夺权”行动，并纷纷仿效上海的样板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以取代过去的省委省人委。“革命”一经从思想批判变为赤裸裸的“夺权”，那么，争夺“权力”、“地位”的争斗就在所难免了。文斗变成了武斗，全国性大规模的武斗此起彼伏且愈演愈烈。与此同时，毛泽东决心要打倒刘少奇：围攻中南海的行动如火如荼，百万人的批刘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中央文革的“揪叛徒”的“一号专案组”紧密活动，为“砸死”刘少奇的叛徒罪名加紧搜集“证据”。康生江青王力戚本禹等中央文革成员开始鼓吹批判“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全国的形势越来越乱。

与此同时，文革对中国外交路线的影响日益严重起来，极左派以“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和“发源地”自居，他们要“输出革命”，要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世界三分之二”的被压迫人民。因此，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日趋紧张，外交纠纷不断。1967年8月，发生了红卫兵火烧英国驻京办事处的严重事件。中英

关系骤紧。一时，中国几乎跟所有国家（苏、美、英等大国和周边邻国）都处于紧张状态之中（越南除外）。

1968年3月12日，新华社报道，兰州公安局“破获”一起“英国间谍案”。《人民日报》于同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决打击敌特间谍分子，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江青在此前后发表了一个讲话，大意说在我国工作的很多外国人，表面上对中国友好，还以专家身份为我们工作，实际上长期从事间谍活动。有些人，解放前就来到了中国，潜伏的时间有几十年。这个讲话以后，大规模抓捕外国人的行动开始了。杨宪益在回忆中说：

68年年初，江青就说过这个话。她说不要相信在这儿给我们工作的外国人。外国人中间有不少是特务，而且有些是潜伏很久的，解放前就到中国来了，假装给我们工作，实际上是特务。她这个话一说，就开始抓外国特务了。68年就开始了。68年初抓了一个学校的几个美国人去坐牢。在我们这儿先是抓了一个爱泼斯坦。因为爱泼斯坦是一个活跃分子。他要成立国际造反协会，闹的很厉害。李敦白也闹的很厉害，他在电台。这些闹的最厉害的外国人那时候是最革命的，结果就认为最可疑，就把他们全给抓走了。爱泼斯坦就住在我们隔壁楼上，一天早上听说前一天夜里他跟他夫人都给抓走了。我当时觉得跟我自己没什么关系。因为虽然乃迭也是外国人，可是乃迭平常对政治不关心，也没有张牙舞爪地闹。所以抓走了爱泼斯坦我觉得跟我们大概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到了五一节前，忽然大家就好像对我有点敬而远之了，躲开了。我也闹不清楚是怎么回事。那天晚上我拿了一瓶白酒——那时候因为整天闹运动闹的挺烦的，我常常晚上跟乃迭喝点酒。她喝了一点酒就去睡觉了。到了差不多十一点了，我想我也该睡了，正想睡觉去，外面有人敲门，我心里想又是来找我问材料了。那个时候已经不问关于我的材料，也不斗我了。就是要我揭发别人的问题——前一阵他们就是晚上来找我的。我一看就是那位管战斗队的一个同志跟我们一个搞行政的同志。他朝这儿点点头，要我跟他走。我想平常他问我问题就是在隔壁，结果他一直带我到办公室大楼去了。我想也许是外面人来外调了，怎么夜里还来外调。我穿了一双拖鞋，那拖鞋比这个（指他当时穿的鞋）还大两号，踢里踏拉的，我也没换皮鞋就跟着走了。我们上了三楼。屋子里趋黑的。就点了一个台灯。一屋子密密麻麻的一大堆人。我心想这是干什么？我一进去就看见还有解放军，很多解放军把我围在那儿。先是由两个人把我两个膀子拉住，怕我挣扎。然后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杨宪益。你多大岁数？我就答多大岁数。什么地方人？问完了以后他就说现在奉北京市军管会的命令将你逮捕。然后要我签字同意搜查我的房间。要我自己签名。我就签了。签完了以后他看我也没有什么反抗的意思，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就又犹豫了半天。他们都非常紧张。我旁边的解放军比我紧张的多。完事以后他们说算了吧，把我带走了。哦——我刚才忘了说，他们一说奉谁的命令将你逮捕就——咔嚓——给我戴了手铐。我当时还研究了一下，是那种活手铐，越动越紧的那种。到了楼下，工友看到我还挺惊讶的，看我半夜从楼上下来，戴了个手铐，还穿双拖鞋，踢里踏拉的下来了。结果，来不及换鞋子，就把我带走了。

到了外头有个吉普车，（上车后）就要我低头，后面有人把我头摁下来，被摁到他们大腿上，我就睡了，可是还看的到外边的亮光，看的到从哪边走。忽然一阵子亮光，我说这是过了西单了，又往西南角走，到了自新路，地名就叫半步桥，有个大铁门，电动的，自动就开了。我们进去，大门就关了。

监狱在自新路白纸坊，在陶然亭那边，从前鲁迅书里写着叫第一模范监狱。（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在杨宪益被抓以前，出了一件事：杨宪益的家被四个女造反派霸占了。她们占用了杨宪益的客厅，把杨宪益夫妇挤到卧室里。邹霆回忆到这件事时，把它与杨宪益的被捕联系在一起：

三个外文局的造反派，出身好的、根红苗正的女造反派霸占了他的客厅。他的东西没全搬出来，那个橡皮树花盆书架什么的都在里头，就把他的书桌呀抽烟喝酒的东西搬出来了，挤到一个卧室里。（被捕前）最后一次喝酒就在他的卧室里。我坐床上他坐在一个硬木箱子上喝酒。完了我说你送我一下，他出来了几分钟。我说这三个女孩子霸占了你的客厅，你小心一点。可能是埋了什么东西。这不是一般的事，你要警惕。咱们都是搞过地下工作的，应该有嗅觉。这是搞火力侦察的，可能留了什么东西。宪益说不至于吧。他这个人稀哩马唬的。（邹霆访谈，1995年12月28日）

蹊跷的是，那三个女造反派在杨家只住了几天，又搬了出去。这件事究竟是不是公安局的“火力侦察”，至今仍然是个谜。

戴乃迭是从睡梦中被惊醒的。对她的搜查大大严于杨宪益。她甚至被脱光了衣服进行检查，这是对最“危险”敌人的做法。杨宪益在《自传》中说：

乃迭在我被捕后的同一夜里被捕。几个女人甚至脱光了她所有的衣服进行彻底搜身。而对我根本没有搜查。我想，他们认为她是一个十分狡猾阴险的外国间谍，一定随身藏着密电码或者什么特殊的仪器。她被判单独监禁，比我严厉的多。

（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237，雷音译）

笔者从那个参与“抓捕行动”者处得知，这次杨宪益和戴乃迭被捕的“直接原因”是戴乃迭把文革小报寄往国外，被有关部门“发现”，怀疑她是外国间谍。邹霆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

杨宪益告诉我，戴乃迭用打字机打了一封信，把毛泽东内部发表的诗，还可能有几句所谓最高指示，没对外（发表）的，寄到伦敦的进步朋友那里。这个信被扣了。戴乃迭那时候太崇拜毛主席了。她的主观愿望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可（这边）扣她泄密。（邹霆访谈，1995年12月28日）

现在看来，当时逮捕杨宪益夫妇的最过硬的“罪证”就是戴乃迭的这封信。就这样，仅凭一封“泄密”信件，仅凭“怀疑”就使杨宪益和戴乃迭双双坐了四年牢。

杨宪益和戴乃迭被带走之后，公安部门紧接着对他们的家进行了彻底的搜查。他们把熟睡中的杨宪益的两个女儿叫醒，让她们作为搜查的见证人。搜查完（什么“罪证”也没查到）之后，公安局把杨宪益的房子封了起来，只留一间房给他的两个女儿住。从此，杨宪益一家五口散作五处，杨宪益和戴乃迭被分别关押，三个孩子各自到了湖北、河北和东北，到“广阔天地”中去“锻炼”了。杨焯分配到湖北鄂城一个农机厂后，受到严重政治迫害，最终导致他神经分裂。此是后话。

95. 半步桥边卧醉囚

黄苗子先生有一首诗《咏酒呈宪益》，诗中的两句“十年浩劫风流甚，半步桥边卧醉囚”，捕捉到了当年杨宪益被捕入狱时的精神面貌（尽管有艺术夸张的成分）。

杨宪益入狱的时间是1968年4月27日深夜，履行完入狱手续后他被带到一间挤满了犯人的牢房。十二平米的房间，两排通铺上的犯人像沙丁鱼似的一个挨着一个。杨宪益勉强挤进一条缝隙中倒头就睡着了，他睡的很香，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快七点。他醒后，同狱一个上年纪的犯人与他有以下的对话：

“嗨，为什么把你抓来了？”“我也不知道。”“我们想那么晚了，你又满身酒气，你一定是喝多了，在街上惹了麻烦，所以他们抓了你。”“没那回事。我是在家被抓的。”那人不说话了。忽然，他充满向往地说：“你的酒气好闻极了，一定是好酒！我好多年没喝酒了。那酒多少钱一两？”我对他说我不是按两买的。我买的是整瓶，忘了是多少钱了。他问我：“你喝完了吗？”我告诉他还剩三分之一没喝完，他叹息着说：“不知道他们放你的时候这酒还在不在？”四年后，当我被释放回家，我在壁炉台上发现了那个酒瓶，瓶中仍存留有当年没喝完的酒。不过我没有喝它，我把它给了一个年轻的同事。（摘自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32-233页，雷音译）

这个故事流传的很广。笔者在没认识杨宪益之前就在王佐良先生的学生那儿听到过这件事。我想，很多知识分子之所以对这个故事感兴趣（如前所述，黄苗子先生还专门为此事赋诗），正是他们从这件事中看出杨宪益“与众不同”的“特色”。试想一个人平白无故地半夜被从家中骗出，然后大张旗鼓声色俱厉地当众逮捕，立刻戴着手铐扭送监狱，他居然没事儿似的倒头就呼呼大睡，睡梦中散发出阵阵诱人的酒香，使同狱的犯人垂涎欲滴，犯人们望着这个“醉老头儿”，不知他是何方神仙。怪不得那个老犯人认为他是因喝酒闹事被关。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他居然是一个“阴险奸诈的外国间谍”。

然而，这只是事物的一面。杨宪益当然有忧虑和愁苦。他说他最不放心的就是妻子乃迭（他还不知道乃迭也像他一样被捕）和两个女儿。他向看守长讲述了他的担心：

我说，乃迭十分容易受惊。她发现我被捕，可能会神经崩溃，或者自杀。而我的两个女儿，一个即将大学毕业，一个中学毕业，她们俩怎么办呢？看守长微笑着说乃迭很好，她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至于我的女儿，我的罪行与她们无关。所以他们会得到很好的照顾。（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36页，雷音译）

看守长的话使杨宪益放心许多。不知是否有意，看守长在说到戴乃迭时还漏了一句：“她很好，跟你一样”。这使杨宪益确信戴乃迭也被捕了。他没有想到，妻子受到的是比他严厉的多的“单独监禁”的“待遇”，而三个孩子因受父母的牵连，过着身无分文（主要是两个女儿，儿子杨焯在分配工作后有了工资），生活无着且遭人歧视的生活。杨宪益在自传中说：

如果我在监狱里知道了这一切，我会忧心的多。可那时我什么都不知道。因为，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仍然是太相信党了。在这种欺骗的话语下，我的担心大大地消释了。（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37页，雷音译）

从此，杨宪益开始了四年的囚徒生活。关于他的生活环境，杨宪益是这样回忆的：

我的牢房是集体的，跟很多人在一起。那天（入狱日）晚上有26个人，很挤。房间跟我在现在的房间（指百万庄宿舍——笔者）差不多大。两个炕，通炕（通铺），人多，不能横着睡，都是竖着睡。就跟沙丁鱼一样一个挨一个。那天晚上很挤，后来人走了一部分，没有那么挤了。中间有一个铁桶，可以小便。有的时候有犯人忽然拉稀了，没办法上厕所了（监狱里除规定上午每人每次十分钟不到的大便时间以外，不许上厕所——笔者），结果就拉在铁桶里面，弄得屋子挺臭，大家都反对。不过那是偶然的情况。

吃饭是一顿两个窝窝头，有时有一碗菜汤。一天两顿饭。上午一顿是十点，下午一顿差不多是五点。没有早饭。我两个窝窝头吃不完，只吃一个半，剩下那半个给别的犯人吃。有的人饭量大，两个窝窝头不够，觉得饿。我倒是没觉得饿。

菜汤没有油。有时候给我们加一点猪油，病猪熬的油。虽然是病猪，反正熬过了吃了也没事。饭钱很便宜，一个月的饭钱才四块钱。那个时候没要我们自己掏饭钱。我们是犯人，要枪毙的。后来把我放了以后，又要我出饭钱。那是后来的事。

犯人跟犯人之间不许讲话，不许告诉自己的案情。可是实际上我们还是偷偷地讲话。

我们每天的生活就是上午九点多钟开始读报纸，有时候背语录。报纸就是一份《人民日报》，别的书不许带。后来才让我们读老三篇，背老三篇，背的不好的要挨批评。我从来背的都很熟，没什么问题。

大便是每天早上一次。大家集体叫出去，大家排着队，到一个蹲坑的厕所，大家蹲坑大便。只许十分钟。有的人大便干燥就很伤脑筋。十分钟完了之后就给轰回来，集体走回来。早上起来之后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洗脸，时间不到一刻钟。洗脸的地方倒是有自来水。我们匆匆忙忙地洗。有的时候还要赶着洗洗袜子衬衫什么的，那就很紧张了。一刻钟以后又被带回来。别的时候就在牢房里头关着。

每个月有两次，叫放风——有时候他（看守）忘了，忘了就一次都没有——放风就是把你们集体的叫出去，到外面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到一个也是关起来的四面有墙的那么一个地方，上面没有顶，可以有点阳光。在那里头集体地转，转个一圈两圈，然后再把你们叫回去。放风大概一次十分钟左右。（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关于提审，杨宪益回忆说：

每个人根据他的案情不同叫出去提审。开头的时候挺严格，还夜审，好像挺紧张似的。夜里，十二点，把你叫起来，叫你出去。还有带枪的人，枪上带着刺刀，押送你走。好像要押着去枪毙的样子。为的是吓唬你一下子。提审都是一套老公式。一开头对我是很严格的。说杨先生你不要隐瞒什么，你的事是铁板子钉钉的，都是实打实的，隐瞒也没有用。你老老实实交待吧。你不交待的话，明后天早上我们就要公审，公审完了我们就拖出去枪毙了。你还是老实交待好。交待了可以不枪毙。……刚一开头的时候他问我你知道犯了什么罪？我说我不知道犯了什么罪。他说你想隐瞒是没用的。你的材料有一房子那么高，都是你的材料。我们都调查清楚了，你还是老老实实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就是那一套玩意。

第二天早上起来给我一搭子纸，让我写材料。我也不知道写什么，只好把过去认识的人，朋友和亲戚的名字都写下来，我跟他们是什么关系。中国人我大概交待了一百五十个人，外国人我写了一百个人。我写了一大堆材料给他。他看这个什么都不重要。他说你这是故意隐瞒。你再不老实我们就把你提去公审。我们刚刚毙了一个遇罗克。就是天天闹那一套。

开头的时候半夜里提审过两三次。后来一般都在下午的时候多。在林彪出事以前比较严厉，好像是动不动就快提走了，给枪毙了。林彪出事以后比较缓和了一些。后来看起来不像要给拉出去枪毙的样子了。（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笔者在采访中曾问杨宪益这样一个问题：审讯者说的要“公审”要“枪毙”的话，你当时认为仅仅是威吓还是有可能真的实现？你怕死吗？杨宪益是这样回答的：

我觉得有可能实现的。因为那时不断地传讯，每一次都很凶很凶。总是警告我说一两天又要搞公审了。那时候是搞过好多次公审，每次公审都枪毙几个人。

不过我当时也不大在乎。因为我好像是怕疼，受刑我是害怕的。可是要是死的话我一点也不——从来我对这事不怎么关心。要真是拖出去枪毙，毙了就毙了。就算了。（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黄苗子先生在一篇谈杨宪益的文章中说：“昔金圣叹有言：‘杀头，快事也，圣叹于无意中得之，不亦妙哉！’个中境界，宪益有焉。”黄苗子不愧是杨宪益的朋友，他对杨宪益精神世界的把握有独到之处。

96. 在监狱这个社会大学校中

四年囚犯生活在杨宪益一生中是个独特的阶段。尽管对自己被捕感到意外，但杨宪益很自然地完成了从“公民”到“囚犯”的转变。因为他这个公民早已沦为“贱民”，他被“揪出”人民队伍已近两年。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他是人们随时可以唾骂、批斗、侮辱和嘲弄的对象。对一个“牛鬼蛇神”来说，当时的社会环境不啻为一个巨大的监狱。从大监狱来到小监狱，对杨宪益似乎并没有太大困难。人对苦难的耐受力似乎是无限的。

经过两年多的频繁提审、威吓和讯问，从71年下半年起，狱方对杨宪益的提审越来越松，后来就干脆不管他了。杨宪益的精神压力明显减轻。他也从一个“新号”成了“老号”。四年中，他换过很多囚室，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他回忆了一些狱中的人和事：

我坐牢听到的名人不多。有一个是跟我同一个牢房的。我进去他刚给提留出去，就是遇罗克。遇罗克是前几天刚公审，公审完把他拉出去枪毙了。他是一直到最后不承认错。一直强犟到底。不过这个人我没见到面。还有一个人也没见到面，不过我在的时候他也在，就是聂绀弩。聂绀弩这老头子还很倔，让他在牢房里头，他总爱自己一个人跑。结果就给他腿上戴了死刑犯的大铐子，让他走不了路。结果他还要跑。一跑摔了一交，把脑袋给摔破了，流了好多血。这是他们（同狱犯）跟我讲的。还有一个是那时候有名的和尚。名字我想不起来了。是北大的一个学生。因为失恋出了家。也是当时北京的一个名人。后来那个人也放了。

里头有一个是刘铁云的孙子，叫刘厚怙，是一个知识分子。他也倒霉，给抓进去了。关了两年。这个刘厚怙也挺滑稽的一个人，他原来也是一个少爷，虽然刘铁云没有什么钱留给他，也还算是个少爷出身吧。刚解放的时候他上了当。他们家在天津有点铺子什么的，有点商业。他听了一次刘少奇的报告。刘少奇说大家放心，我们现在是几个阶级共同专政。有民主党派，有共同纲领。我们是按照共同纲领办事的。中国现在还很穷。我们资本主义还要搞几年。做买卖的我们还要扶持，还要发展。是那么说的。所以他以为——他说看起来还可以做买卖。可到了后来就成了资本家。后来资本家又完了。后来又把他抓进去坐牢。他没什么大问题。挺好的一个年轻人。学问也不错。现在这个人去世了。他以前住在白云观里头，当道人。他做过道教协会的副会长。

我们那儿住的人有两种情况，有的人关了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像我那样后来就放了。有的是关一阵以后就拉出去。事后才知道，拉出去就枪毙了。（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当笔者问杨宪益“拉出去枪毙的人有没有公审”时，杨宪益说：

都有公审。不过公审都是形式主义的。走一个形式。等于说，就是拉到那儿开一次斗争会。大家在一起喊喊口号，然后就枪毙了。枪毙人都在酒仙桥那儿。酒仙桥桥底下是刑场。把人带去，一般的死刑犯都戴着铐子，然后从背后用脚一

踢，一踢就站不住了，就跪倒了。一跪倒，后面的人就拿手枪在你后脑勺上一枪就完了。完事以后还要跟家属一来收尸的一还要跟他要子弹费。四毛钱还是多少钱。家属还得给子弹费。没人收的呢，就拿一个芦席一包，或者是埋了，或者是烧了。（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据杨宪益说，以上情况是一个被“陪绑”押往刑场的犯人亲口告诉他的。

在众多难友中，杨宪益对一个原志愿军战士的印象特别深。这个前志愿军士兵竟然为了爱情不惜偷渡国境，他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有一天我搬到一个新牢房，一个很小的牢房，只有四个人。我跟一个年轻人躺在一块儿，熟了，我就问他为什么进来。他给我讲了一段故事，很有传奇味道。他参加过抗美援朝，在抗美援朝中间跟北朝鲜的一位姑娘发生恋爱了。就有感情了。抗美援朝结束他回来了。回来了以后还算是有功的人，到了北京给他分配了一个挺好的工作，就是北京整形医院里当会计，管钱。他在管钱时也偷偷摸摸地私用过公款两三百块钱。数目不大。可是以后他跟他爱人关系不怎么融洽，总想在北朝鲜的那位姑娘。他忽然烦了，要到北朝鲜去，不做中国人了。他想到北朝鲜去找那位姑娘结婚。他因为当过兵，游泳挺好。他说鸭绿江我也很熟，什么地方可以浮过去我都知道。结果他就浮过去了，偷渡上岸了。上岸后给北朝鲜方面的守卫抓到了。他去以前，中国跟北朝鲜正有一度关系紧张。北朝鲜是跟苏联站在一边的。所以他想，我到北朝鲜去就骂中国共产党怎么怎么不好，这样不正好合他们的口味了吗？他身上带了一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他自己跟我讲他把小红书从口袋里拿出来，往地上一扔，还拿脚踩了几脚，表示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痛恨。人家也没什么表示就把他关起来。过了几天把他装在一个邮包里给寄回（东北）来了。他不知道，就在他骂毛主席的时候，正好周恩来又跟北朝鲜的关系弥补好了。正是请北朝鲜的人回到北京来的时候，情况又变化了。北朝鲜跟我们又是战友了。结果就把他邮寄回来了。他当然又是偷渡又是反革命。可是因为他过去是抗美援朝的军人，所以审问了他以后对他还客客气气，把他从东北运到北京来，就住在我们那个牢房里。头一天我还问他：你觉得将来会对你怎么样？他说我这事没什么了不起的，大家对我挺客气，在东北吃的也不错。我挪用过两三百块钱公款，也交代了。顶多不过是让我退赔两三百块钱吧。第二天早上起来，一大早，叫他卷铺盖，他高高兴兴地跟我们说再见，走了。过了一天，我听说他拖出去枪毙了。（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杨宪益说，在监狱里跟别的犯人关系处的好坏对狱中生活影响非常大。万一跟别的犯人搞不好，就会受很多罪。他提到一个老天主教徒的遭遇：

有一个老天主教徒，到那儿每天唱祷告，唱圣母玛利亚，在被窝里头跪着唱。大家就欺负他。用被窝把他蒙起来揍他。看监狱的人对他态度也不好，常常把他提留出去问。交代的他们不满意，他们就用凉水滋他，冻的他要死。他挨过好几次揍。还有两个犯人后来浑身浮肿死掉了。可是我没受什么罪。（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杨宪益尽管没有遭受过那位天主教徒那样的皮肉之苦，但是他也屡屡被一些同狱的小流氓欺负。笔者曾经采访当年和他同一牢房的外文局造反派邢军（邢军这个外文局有名的“革命造反派”和杨宪益这个“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先后沦为“阶下囚”，被关在同一间牢房中，是文革中的典型现象。类似的荒诞剧曾在全国范围内一演再演，引人深思），邢军提供了宝贵的材料，使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杨宪益在狱中生活状态，他说：

我是71年年底到72年年初和他（杨宪益）在一起的。我71年5、6月份抓

进去的。先把我关在秦城监狱，一看我级别不够，又把我转到北京看守所去了。和他关在一起。我一进去就认出他，他没认出我。那时一个房间关十来个人。我一进去就说“哦唷，他妈的这老头怎么和我关在一起？！”后来过了两天——我坐（班房）在和他隔一个人——我说老杨你不认识我？他说不认识，你是七机部的？我说我是外文局的。他一听“啊”了一声。我说我叫邢军。他说这个名字很熟。那时候文化大革命，都知道我。他说“你们怎么会进来的？你们是毛主席红旗下长大的人，怎么会……”我说文化大革命乱套了，外文局体系的冤假错案，你可千万别相信。……就这么聊到一起了。

老头挺幽默。我说你是怎么进来的？他说我和我爱人喝了一瓶酒，喝的醉醺醺的把我抓起来。第二天我还问“这是什么地方？”他们说“监狱，老头儿！”，“一进门就闻到你满身酒味儿，你不是酗酒闹事的吧？”这都是他和我聊的。

我说听说你是里通外国给抓起来。你怎么里通外国了？他说你想我老婆是外国人，这本身就是里通外国么。哦——是这么个“里通外国哇”！挺逗。

我说你过去享受的太好了，现在吃窝窝头习惯吗？他说这个窝窝头也挺好吃的，越嚼越香吃出奶油蛋糕味儿来了。他这个话说的很含蓄，带有讽刺。共产党的监狱好像吃的很好，其实是吃这玩意儿！我说你爱人在下面（当时杨宪益已知道戴乃迭也被关在同一所监狱里）不还是喝着牛奶吃面包啊（当时外国犯人的伙食比中国人好），你在这儿，咱俩只能吃窝头啦。他说什么？“她鼻子比我大，眼睛比我绿，所以有区别”。老头很幽默。

那时，在里面的我认为大部分都是好人，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冤案。可监狱里面也有坏人，地痞流氓一类的，欺负他。叫他“老反革命，给我洗衣服！”让他给他洗衣服。我说老杨你凭什么给他洗衣服？你能洗他为什么不能洗？洗背心洗裤衩的。杨宪益不会洗衣服。人家洗衣服是搓的，他洗衣服怎么洗？像敲锣鑼，咣咣（用两手比划）这么敲的。我说老杨你这么洗衣服？他（压低嗓子用气音）说“不要惹他不要惹他”。我也年轻，我是部队下来的，我怕什么？我爱打抱不平，又和他一个单位。我（对那人）说你以后别欺负老头，他可有学问了。“他妈的你怎么知道？”我说你他妈的！你敢动我一下？老子马上打死你！那个人一看怵了。那里面谁横谁厉害你知道吗？不讲理的，谁横，谁能打就厉害。我看不惯了，就说跟他们干！刚进去，你怵了他就欺负你呀(4)。（邢军访谈，2000年3月18日）

由于邢军的保护，以及杨宪益有“学问”，使狱友们渐渐对杨宪益越来越佩服。说起学问，邢军举了一个例子：

那时候学毛主席诗词，有一句诗“帝子乘风下翠微”，有些人不懂什么叫帝子乘风下翠微？我说这事你们要问老杨了。因为毛主席诗词就是他翻译的。老杨就说在湖南什么地方有座山，“帝子”是第几个皇帝……大家一听，说的合情合理。有的小流氓就对他很尊重。说老头儿不简单呀。我说你看，是不是有学问？你们他妈的还老欺负他。后来对他就很佩服。个别人还叫他杨老。他说千万别这样叫，这里边不能这样称呼。（邢军访谈，2000年3月18日）

狱友们最佩服杨宪益的是，他居然在毫无信息的情况下，“预测”到林彪出事。杨宪益在回忆中多次谈到此事，并为自己的“先见之明”深感自豪：

那时候我们只能看《人民日报》，别的东西不给我们看。外面的消息我们又不知道。我就从《人民日报》的字里行间看外面的情况。我看到先是批判陈伯达，最后黄永胜也不见了。71年，那一年忽然沉默的很，林彪的名字也不见了。到了国庆，这一年的十月一日特别的不同。我注意到西哈努克来的致敬电。西哈努

克跟我们是最熟的。他平常写的是毛主席，然后是林副主席，然后是别人。他这回忽然改了，不提林副主席了。光提毛主席，然后就是周总理，跟以往不一样。另外就是过去林彪每次十月一日他都要登天安门，都要嚷一阵子。声音就跟我们过去在英国听的希特勒一样。有点歇斯底里，嗓子挺哑的在那儿嚷。这一年他也不露面了。我心里想，看起来林彪也完蛋了。我们每个人手头都有一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前面有一个再版前言。平常我们每天都要背诵再版前言的。那时候背的很熟，现在想不起来了。不晓得为什么我就觉得挺开心的。我就把我那本小红书上的再版前言给撕掉了。正好那时候有一个年轻的打砸抢分子给关进来了。那个人偷偷跟我说：听说林彪出事了。我说不知道。大家说不会吧，林副主席怎么会出事呢？后来果不其然，一天下午忽然查监的人很严肃的“啪”进来了。那时离十一已经过了几个月了。说你们把红小书全交出来。我们就都交出来了。他就一本一本的翻。翻了一本，就放在一边拿走了。又翻一本，又拿走了。我的那一本呢，一翻他愣了，好像没有再版前言；又翻，翻了几次。他也不说话，想了想也不说什么就“啪”地扔给我了。大家就纳闷了。说怎么我们的红宝书全给没收了，你的那本不给没收？我没说什么，就笑笑。我说再过几天你们就明白了。后来又过了几天，证实林彪出事了。所以这个事我有先见之明。我很得意，非常之得意。一直到今天想起这个事还挺得意。别的年青犯人都挺佩服我：诸葛亮！坐牢期间最得意的大概就是这么一件事。（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从此，杨宪益的难友们对他无比佩服。杨宪益在回忆中说起他教他们唱苏格兰歌曲《罗蒙湖》、《友谊地久天长》，背中国古诗。他把白居易的《长恨歌》一句一句地教给他们。年轻的“打砸抢分子”们如饥似渴地跟着学，从头到尾跟着背。牢房里洋溢着动人的学习气氛。杨宪益还提到一个工人对他的友谊：

有一个年青犯人，还给我缝了一个艺术品。牢房里不许用针线，不许有任何尖的东西。他从地板上抠木头缝儿，抠了点尖的木头片儿，做了一个木头针。他用手绢给我缝艺术品，缝了一幅松树。他做了几个月做成功的，很好的一个艺术品。不过就是很脏了。我出来以后阿姨不知道，她给我扔了。挺可惜。不然的话可以留个纪念了。（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笔者在采访中问杨宪益：在坐牢时，您对自己的前途命运是怎么想的？有没有什么预测？有没有害怕？杨宪益回答说：

我怎么样也枪毙不了一除了一开头的时候很难说，那时候谁都难说怎么样。不过到林彪去世了以后，情况就缓和的多。知道怎么样也判不了死罪。有犯人问我：将来把你放出去你估计会怎么样？你还能喝酒吃肉吗？我说到时候看给我多少钱？要是给我的工资是二、三十块钱以里，我就不喝酒不抽烟；要是三、四十块钱左右我也许不吃肉了，还可以抽一支烟；要是再多一点我就又抽烟又吃肉又喝酒。（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这是狱中的杨宪益对自己“前程”的“最高憧憬”。无独有偶，季羨林先生在口述历史时曾对笔者说，他在牛棚中也曾展望过自己的“前程”，他的“最高奢望”是到农村做一个农民，终老此生。

97. 陷身囹圄死生轻

“陷身囹圄死生轻”是杨宪益在戴乃迭去世后写的悼亡诗中的一句。全诗是：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这首沉痛的诗高度浓缩了杨宪益和戴乃迭坎坷多难的一生。其中“陷身囹圄死生轻”正是杨宪益监狱生活的深刻写照。也是许多同狱难友的命运。杨宪益多次回忆，在入狱的前两年，他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拖出去枪毙”，每时每刻都感到死亡的威胁。他看到同狱的难友中，告别时还高高兴兴，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结局不是释放，而是刑场。杨宪益痛感作为一个犯人的“命运不可测”和“生命无常”。尽管杨宪益对生死看的很淡，但是，这种“厄运随时可能降临”的“无限期的等待”对人的精神的折磨却是巨大的。这种无形的折磨在杨宪益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杨宪益在回忆中谈到，他即使被释放时也怀着忐忑的心，不知道让他“收拾行李”是好兆还是恶兆：

72年5.1节前夕——我的日子很有意思，有许多都跟八月节有关系，有许多跟五一有关系，这个又是赶到五一前夕——忽然叫我收拾行李。收拾行李不等于是好事。有时候收拾行李就拉出去枪毙了。或者是换到别的监狱。他反正事先不告诉你。我经过的犯人很多，我看到好多犯人收拾行李出去了，出去了人就没有了。有的人听说是放了，有的人就枪毙了，都有。

杨宪益之所以心情忐忑，是因为在这次通知“收拾行李”之前的两个星期，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这件事使所有的难友都为杨宪益的命运担忧，一种不祥之感笼罩着小小的囚室：

有一天，看守突然叫我出去。他把我带进一个大房间，让我坐在椅子上，然后把一块写有我的名字的硬纸板系在我脖子上。之后，他打开了所有的灯。一个摄影师进来给我拍了照。然后我被送回了牢房。我把这事告诉狱友以后，他们神色沉重，有的人甚至流露出悲哀的神情。他们说看起来我马上就要宣判了，不然他们不会像那样给犯人照相。我也认为这是不祥之兆。（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47页，雷音译）

这次的照相，的确非同寻常：被剃着光头的杨宪益胸前挂着写有“杨宪益”三个字的大牌子，拍下了标准的“犯人像”。摄影师除了拍正面像外，还给他拍了侧面像。这一切活像被判死刑的犯人临刑前的留影。对于这件事，杨宪益的反应是：

但是，我根本就不在乎。因为我已经坐了那么多年牢，不再为将要发生什么事而烦心劳神了。（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47页）

这是典型的杨宪益式的态度。许多记者和朋友都说杨宪益为人“潇洒、散淡”，岂不知，他的潇洒和散淡的性格，除了遗传于父、祖辈的血脉之外，还来源于牢狱的冶炼。“身陷囹圄死生轻”，当生死大权操在强权手中时，命如蝼蚁的小民怎么对应？他不“潇洒”又能如何？！

98. 戴乃迭在狱中

当1994年笔者采访杨宪益和戴乃迭时，戴乃迭已经患病，很少说话了。关于她的狱中生活，笔者还是从她的姐姐希尔达（Hilda Brown）女士那里了解到点滴情况。以下是2002年10月20日希尔达的讲述（希尔达说的是英语，笔者只记录大意）：

格莱迪丝（戴乃迭的本名）在1974年第二次回国的时候告诉我，她刚被抓进监狱的时候，住的很差。伙食也很差。窗子是破的，冷风灌进来。又冷又饿。过了几个月，伙食才开始好转。她不太愿意说起监狱的事。因为监狱那一段是不

愉快的回忆。监狱太差了。

由于她没有做任何错事，所以当提审员问她的时候，她神色自若。与审判员的“大敌当前”有天渊之别。提审员问她：你没有什么说的吗？格莱迪丝这个“特务”却答非所问的说“我想知道我的孩子怎么样了？”提审员说“他们有人照顾”。这个回答虽然是谎言，但是非常重要。正是这一句话，着实安慰了格莱迪丝，使她得以安心渡过四年的铁窗生涯（当乃迭出狱后听说她和杨宪益的被捕株连了所有亲戚，两个女儿流落农村无人照顾时，她顿时哭了。她说如果她在监狱里知道此事，她真活不了了——笔者）。

希尔达还讲了戴乃迭在狱中与看守斗争，争取较人道的监禁条件的事：

当时（六十年代末）美国黑人反种族歧视的斗争很红火。提审员对格莱迪丝说你看美国对待黑人多不好，可我们对你很好。格莱迪丝立刻反驳他说“可是黑人在监狱里还能每天出去放风，我却不能出去”。经过她的争取，格莱迪丝才开始能够出去放风了。

她在监狱里靠背诵中英文诗歌打发日子。爱清洁的她用牙刷把监狱的墙刷的干干净净，以此来活动筋骨，消磨时光。

监狱里不能看任何书籍，只能读马恩列毛的书。格莱迪丝就通读了一遍《资本论》，还写了很多读书笔记。（可惜的是，这些笔记都没有留下来）

据当时同在半步桥看守所坐牢的郁风回忆，每次看守送饭给各监室的女犯人时，她总听到隔壁牢房里传来“谢谢”的声音。后来她证实，这正是戴乃迭。戴乃迭身陷囹圄之中，仍然保持着一种自尊，维持着做人的基本礼节，使郁风感慨颇深。

整整四年的单独监禁，使戴乃迭出狱后得了自言自语的后遗症。丈夫和女儿都发现，她经常一个人在房间里自言自语。这种现象过了一两年才消失。

99. 来自英国的请愿书

戴乃迭的母亲塞林娜收到她最后一封家信是 1968 年 4 月写的。从此以后，戴乃迭就渺无音信了。87 岁高龄的塞林娜忧心如焚，她多次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女儿的下落，都毫无着落。思之再三，塞林娜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述说一个母亲对女儿突然失踪的担忧，请毛泽东主席能够亲自过问一下此事。这封信是用中文写的（塞林娜在中国住了三十年），措词“非常机智和得体”（希尔达访谈，2002 年 10 月 21 日，北京小金丝胡同）。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直到塞林娜在 1970 年 8 月以 89 岁的高龄离开人世时，她没有戴乃迭的任何消息，甚至不知道戴乃迭是不是还活着。塞林娜去世后，戴乃迭的姐姐希尔达担起了寻找和营救妹妹的担子。起先，她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大意说“我认为您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请您转告我妹妹，我们的母亲去世了。”机智的希尔达试图用这种方式达到双重目的：既通报了母亲的死讯，又得到乃迭的下落。希尔达在采访中说：“我那封信纯粹是私人信件。因为我认为中国人懂得，如果一个母亲去世了，她的孩子应该知道这个消息。这个信不是什么政治事件，所以我认为他们能接受它。”但是，这个信也石沉大海。

希尔达意识到单靠个人力量的无济于事，她开始向社会呼吁。从 1970 年下半年开始，她通过所在地区的议员在议会中催促英国外交部门通过外交途径营救戴乃迭。她还在英国的汉学界和宗教界广泛活动，征集呼吁释放戴乃迭的请愿书。请愿活动很快在英国各地开展起来。在戴乃迭的中学同学瑚德女士的帮助下，请

愿书被寄往英国各个教区（戴乃迭的父母都是伦敦教会的传教士），有成千上万的人在请愿书上签名。最后，这封请愿书上签下了两万个英国百姓的名字。以下是这封请愿书的原文：

给周恩来总理的请愿书支持格莱迪丝（泰勒），杨女士

我们——以下所有签名的人，要求被单独监禁在中国三年之久的英国公民格莱迪丝（泰勒）杨能够与她在英国的亲戚通信。

在英国外交部、她的家庭、她姐姐和弟弟所在区的下院议员约翰·苟斯特（JohnGorst）先生和马克·伍德纳特（MarkWoodnut）先生多次努力探询有关格莱迪丝的下落之后，最近我们从官方得知她“活着，情况很好”，我们欢迎这个消息。不过我们仍然急切地希望她的亲戚能和她重新建立联系。

签名人家庭地址职业（此信资料由希尔达·布朗女士提供，雷音译）

这封签有两万多个名字的大型请愿书由下院议员约翰·苟斯特和希尔达在媒体报道下通过公开仪式正式转交给驻伦敦的中国大使馆。

第二封信是由牛津大学东方学院发出的给周恩来的请愿书。这封请愿书由23名英国学术界著名汉学家签名。这23名学者来自英国各大学中文系。以下是请愿书全文：

亲爱的周总理：

作为英国的中国化学者——我们一直希望看到英中两个国家关系的改善——我们所有的人都深感受惠于格莱迪丝·杨把中国文学翻译成英文的工作。她的翻译对扩大鲁迅著作和其他现代中国作家作品在我国的影响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她几年前在英国电台的广播极大地帮助了英国人民对现代中国生活的理解。

我们高兴地从官方渠道得知“格莱迪丝·杨还活着，她很好”；但是，鉴于她的家庭和朋友们已经近三年没有与她联系，我们仍对她的现状和未来系念于心。因此，我们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允许她重新和她的家庭写信，她将会为改善我们两国的关系起到作用。

我们都与格莱迪丝相识。我们一直认为她是中国的好朋友，她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您的忠实的（以下是签名）

1971年4月23日（此信资料提供者：希尔达·布朗女士，雷音译）

这封信是直接寄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提到的“广播”是戴乃迭1961年第一次回国时受英国BBC电台邀请，在该电台的一个“Woman' Hour”节目里定期报道中国的妇女儿童的生活、教育状况的事。她的报道使很多英国人减轻了对中国的畏惧和猜疑，拉近了中英两国人民的距离，消除了两国人民之间在心理上隔阂。她是中国最好的“民间大使”。采访中，希尔达反复谈到这一点。她说：

她是一个中国最好的使者。因为当时与她见面的朋友们或其他人发现她是一个那么年富力强、富有自尊感的人，如果这样的人说中国的好话，那么中国想必也是一个好地方。她对人们理解中国起了不小的作用。……因为她不像一个崇尚暴力的“革命者”，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人们感到可以相信她的话。所以她是很好的中国的代言人，她是相互理解的一座桥梁。……她不只是在1961年发表广播讲话，此后她定期——可能是半年一期——从中国寄录音带到BBC，谈中国妇女儿童的现状。许多人都听了她的广播，对她讲的非常感兴趣。可是寄录音带时麻烦很多。因为中国政府每次都要检查录音带的内容是否OK才放行，这种状况很悲哀。其实，Woman' Hour是BBC的一个全球节目，全世界各国都有人给它报道当地妇女儿童的状况，格莱迪丝只不过是一个从中国发报道的

人。因为她会说英语。（希尔达访谈，2002年10月21日，北京小金丝胡同）

100. 获释：“现在放你是对的，当初关你也是对的”

1972年4月，当杨宪益被通知“收拾行李”到狱方办公室时，他听到释放他的官员说“你的拘留期结束了”。这句话使他大吃一惊。四年前，他明明是当着单位众人的面被宣布依法“逮捕”的，怎么突然改口了？在杨宪益的自传和口述回忆中，谈到这一点时他的愤懑溢于言表：

有一天，他们让我收拾行李跟他们走。我走进一个办公室。一个官员对我说你的“拘留”结束了。四年前，当我进监狱的时候，他们当众宣布逮捕我，而且我被戴了手铐。不过现在他们显然是改变了决定，把逮捕改称为“拘留”了！（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47页，雷音译）

更滑稽的是，杨宪益被关押了四年，这四年的伙食费居然要让他自己出：

他们说以前不是逮捕，我们没有逮捕你。我们一直是拘留。乃迭也是叫“拘留”。我出来以后这四年的工资全退了。乃迭不给。一个钱也没有退。退了我四年的工资，可是说你在里头的伙食费要扣。所以我等于住了四年旅馆。还得交伙食费。好在伙食费不多。那时候一个月才四块钱，扣的不多。（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至于杨宪益的问题的“结论”和关押他的原因，官员当然也是理由十足：

那位官员说，他们为了弄清我的问题费了很大的努力。他们跑了21个省市，调查每一个细节。现在他们可以说，我的问题已经查清楚了，我是清白的。所以我可以回到原单位，恢复工作了。

“但是，正如毛主席说的‘人无完人’。你为党做过好事，但也做过坏事。一个人总是一分为二的嘛。我们希望你将来继续做好事，不做坏事。”（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47页，雷音译）

于是，带着这个“一分为二”的尾巴，杨宪益出狱了。几年之后，杨宪益才知道他被捕的真正原因：一个原英国大使馆的中国雇员、司机熊某，因为解放前曾为英国使馆服务而作为“历史反革命”被关押，在受尽折磨之后他承认自己是“英国间谍”，他说“如果我是反革命，杨宪益也是反革命。杨宪益整天都跟伊文思在一起”。凭他这一句话，杨宪益成了“嫌疑犯”，被“内控”多年，进而在文革逮捕高潮中正式被捕。

释放杨宪益时，狱方官员退还了当初抄查杨宪益的家时没收的物品：一本北师大印刷的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一本奥维德的《爱的艺术》和一本杨烨的笔记本。这就是四年前大批公安人员兴师动众深夜抄家的全部“罪证”！

第七章北京时期（下）（1972-1988）

101. 回到了残破的家

1972年“五一”前夕，杨宪益坐着外文局《中国文学》党支部书记派来接他的汽车离开了半步桥看守所回到了他位于机关大院里的宿舍。这个“家”已经“人去房空”整整四年，杨宪益重新与它见面时，它显得满目疮痍。在英文自传中，

杨宪益描写了“回家”的所见所感：他（支部书记）打开了我的房门——这房门仍被两条白色纸条封着。房间被封了四年，一切都是原样。唯一的不同是，他们把所有的家俱和书籍都堆放在一间屋子里，简直是一团糟。我一进屋，几只受惊的耗子从衣柜和书橱里窜了出来。很久以来，牠们就把棉衣和地毯咬成小碎片，做成了舒服的窝。我突然回来使牠们很愤怒。在监狱时，我已经两年没有收到家里送的换洗衣服，看起来就像个稻草人一样，衣衫褴褛，破败不堪。怪不得这些老鼠被我吓的四处乱窜。我留在家里的绝大部分衣服都被蛀虫和老鼠咬破了，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件勉强可以见得了人的夹克衫换上。壁炉架上，那瓶在我被捕之夜喝剩三分之一的白酒依然伫立着。旁边，那个顶部种着仙人掌的死人头盖骨也还在，仙人掌已经死了。我记得，在我进监狱之前，我在机关院子里拣到了这个头盖骨。为了消遣，我在里面种了一棵小仙人掌。仙人掌已经长到一英尺高了，因为长期缺水而死。它一定是为了寻找阳光和水苦苦挣扎了很久。它依然挺立着，当我用手触摸它时，它立刻化为了灰烬。（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49-250 页，雷音译）

接着，杨宪益写到他在阔别四年之后第一次“自由外出”的观感：

我试着把屋子略微搞干净一点，天已渐渐黑下来，我决定出去吃晚饭。党支部书记给我留了点钱，所以我决定先上饭馆吃饭，然后去买些新衣服，使自己看起来像样一些。我拿起一顶帽子扣在头上以遮住我的光头，出门找饭馆。我记得苏联展览馆离的不远，那儿有个饭馆，供应便宜的半西式的饭菜，我去了那儿。我点了一份菜，有一小片牛肉，外加土豆片。只花了一块五角钱，还不到半美元。我还要了一瓶啤酒。在监狱时，我总是想望吃高级的美味佳肴，现在出了监狱，我反倒突然失去了胃口，没有食欲了。我正在吃饭时，一个青年男子走过来，坐在我的桌旁。他是一个维吾尔族人，来自中国的中亚省份新疆。他开始给我讲述他亲眼目睹的在内地的暴行，并诅咒中国共产党。我感到他对一个陌生人讲这些实在是太鲁莽了，我制止了他，给了他一些善意的建议，警告他公开讲话不要太随便。我还脱下帽子，给他看我的光头，告诉他我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然后我向他告别，回了家。（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250，雷音译）

上述文字非常重要。它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民情，还清楚表达了杨宪益内心的变化。他再也不是那个“放言无忌”的杨宪益了！

102. 劫后重逢

第二天，杨宪益去上班。同事们对他表示了欢迎，就像欢迎一个出差四年刚回来的同事。人们闭口不提“坐牢”二字，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这当然是在文革政治高压下中国人典型的处事方式。但是，此时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在经历了惊心动魄的“9. 13”事件以后——内心已经有了大变化，他们开始置疑“文革”了。杨宪益的“无罪释放”不仅使很多同事认识到逮捕他的荒谬，更有人进一步开始怀疑文革以来（甚至更长时间内）对他做的一切是否正确。因此，当领导上动员大家帮助杨宪益清扫房间时，不少同事都积极参加，似乎这样做可以减轻他们内心的歉意。杨宪益过去的小组长唐笙在回忆中谈到了她的感受：

我一直知道领导上对他（杨宪益）政治上不信任，所以跟他的关系一直就有些距离。……应该说我跟杨宪益戴乃迭有很多共同的东西：我也喜欢文学，我们俩的背景也一样，他是牛津我是剑桥；可是我那时候非常要求进步，这一要求进步就麻烦了，什么都得听领导的话，所以总是跟我自己内心有很大的矛盾。我跟

杨宪益的关系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好起来呢？他们两个人被抓起来关了四年，我觉得他们很委屈。可是我自己到了文化大革命后也不受信任了，成了被“招降纳叛”的头一个。到了那时，我就跟他一样，也变成挨打的了。跟他站在一块儿了。到他放出来的时候，领导上又说话了“你们去帮他收拾屋子”，因为觉得错了，做错了。我很高兴。杨宪益这个人态度非常好。我们去帮他，他已经坐了四年牢，还挺不好意思的“哎呀唐笙你怎么也来帮忙啊！你不要擦了，那么多人，你就别干了。”…从那以后，我跟杨宪益的关系就很好了。我就甩掉了好几个包袱，甩掉了组长的包袱。……可是（过去）作为他的行政领导，作为他的组长，我们的关系并不好。（唐笙访谈，1999年11月29日）

唐笙的话，代表了许多同事对杨宪益的认识过程。

出狱后，杨宪益到妹妹杨敏如家去看望母亲。徐燕若见到阔别四年的儿子，不禁老泪纵横，妹妹也陪着掉泪；杨宪益却“笑嘻嘻的”，尽量做出轻松的样子来安慰老母。他绝口不提在监狱里的事，“一切向前看”，似乎新生活就要开始了。

但是，事情远非如此。杨宪益虽然是活着出狱了，但是他还留了个“尾巴”。四年的监狱，除了搞清他不是“英国间谍”以外，其他的“问题”一律照旧。“反动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三面红旗”等等帽子还戴在他头上；何况戴乃迭这个“英国人”永远也变不了“中国人”。只要戴乃迭的黄头发蓝眼睛变不成黑头发黑眼睛，戴乃迭就永远是“外人”，她的丈夫杨宪益也就永远不可能是“自己人”。这一点，连杨宪益的老母亲徐燕若心里都清楚。杨敏如在回忆中提到一件事：杨宪益戴乃迭被释放之前，公安部的“专案组”找家属谈话，特地向杨宪益的老母关照提防家中的“外国人”的问题：

专案组的人来跟我母亲说：“他们不久就没问题，就要出来了。不过老太太你懂不懂什么叫‘中外有别’呀？你儿媳妇是外国人，你就不能什么话都跟她说呀。”我母亲说“我懂我懂”。连我母亲都接受这个教训。（杨敏如访谈，1994年6月21日）

心有余悸的亲戚们下意识地与杨宪益“保持一定距离”。杨敏如谈到了一件事：由于害怕，她当时都“没敢”去帮助杨宪益收拾“堆积如山”的家具和满屋子的灰尘。

几天后，戴乃迭出狱。杨宪益遵照领导的吩咐，专门买了鲜花、巧克力迎接她。他还给自己买了香烟和中国白兰地，庆祝他们的出狱。关于他和戴乃迭久别重逢的细节，杨宪益在各种回忆中都没有详谈，倒是戴乃迭在一篇回忆中写道：

1972年5月，我知道宪益已经被释放，一周之后，两个同事来带我回家。宪益已经整理好了房间。在我的桌子上，我看到一瓶白兰地。我说：“好久不见，没想到你还没有改变过去的颓废毛病。”宪益说：“支部书记指示这样做的。”（摘自李辉：《杨宪益与戴乃迭：一同走过》，大象出版社）

戴乃迭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听三个孩子的下落。在妹妹杨敏如家，戴乃迭惊讶地得知，她和丈夫的被捕使她在所有亲人都遭到了牵连和厄运。尽管戴乃迭在中国已经居住了三十多年（从1940年算起），但她对“一人获罪，株连九族”的有中国特色的深厚传统仍然所知甚少。在她这个英格兰人的头脑里，怎么也想象不出她的被捕会使身为共产党员的大姐夫一家子也成了“准囚犯”，她七十多岁的婆母立即被罚每天去扫大街；更想不到她和宪益的入狱使她的孩子们顿时失去了任何生活来源，靠变卖家什过活（外文局在他们入狱的四年间没有给她的孩子一分钱生活费）。她十分相信监狱长向她保证过的话：她的孩子“有人照顾”，当她得知情况并非如此时，她哭了。她说要是在监狱中就知道这些，她肯

定是活不下去的，她撑不到今天。所幸的是，她了解到，孩子们虽然吃了苦，但还安然无恙。

她和杨宪益还来得及用日后的努力来弥补过去“欠”孩子们的一切。

他们的新生活就要开始了。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出狱”并不意味着苦难的结束。他们将要面临另一种苦难。而且，这苦难将伴随他们整个的后半生。

103. 杨宪益的变化

从外表上看，狱中出来的杨宪益除了脸庞有些苍白虚胖以外，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是，朋友和同事却观察到，他变了。整整一千四百六十天身心失去自由的关押和每天 24 小时全天候的监视（更不用说逼供、恐吓和死亡的威胁），在他心里印下了深深的烙印。过去那个放言无忌毫不在乎的杨宪益不见了，他成了一个“顺从听话”的“良民”。细心的友人甚至注意到他的眼神、举止的变化。在杨宪益出狱第二天就去看他的邹霆描述了刚出狱的杨宪益给他的印象：

出来开门的杨宪益着实让我吃了一惊。这还不是因为杨宪益在狱中被推光的“秃头”，而是他的脸色、皮肤和尚未恢复正常的眼神。这一年，杨宪益还只有 57 岁，但一千五百多个日日夜夜是在铁窗大墙之内度过的，粗劣的囚粮牢饭以及不见阳光的日常生活，加之一度存在着“逼、供、信”以及死亡的威胁，对于妻儿的刻骨思念，使一个一向乐观、一贯以“老庄之道”的眼光看待事务的杨宪益，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晦气和霉气。（邹霆：《永远的求索》，325 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身体出了监狱，但是精神仍然被禁锢，这就是当时杨宪益的状况。他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改变不了“囚徒”的习惯。他的同事熊振儒提起一件事，令人震惊和深思：

四年牢坐了以后，对他（杨宪益）影响很深很大的。杨宪益出来以后，一听到说“杨宪益”，他就“是”一蹦地就跳起来了。在牢里的那一套啊！就是管教人说“杨宪益”，他“是！”就站起来了，就发颤。监牢那一套有四年时间，习惯了那一套。一提杨宪益，跟他一说话，“蹦”就站起来了。就跟牢里犯人一样。我们看了以后很难受，一个老知识分子怎么这个样子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半年多才（恢复）过来。…那时，他人好像有种发呆的样子。坐牢时间长，有点发呆了。（熊振儒访谈，1999 年 12 月 26 日）

其实，杨宪益的变化，不自坐牢起。自从 1966 年 7 月他被“揪”出来以后；自从他被“揭发”有“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言论”和其他“三反言行”，被打成“牛鬼蛇神”后，他就开始变了。读者当还记得，这个过去从不言怕的人在自传中第一次公开承认：在“红八月”里他“真的害怕”了。他怕什么？笔者在前面分析过，他是害怕“被开除出革命队伍”，害怕成为“革命熔炉的弃儿”。正因为他当时认可文化大革命，拥护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所以他内心深处会有撕裂，会有大的矛盾冲突，他才会一度精神分裂。后来，是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的修养和他幽默达观的性格帮他渡过了精神危机。然而，此时的杨宪益已经变了，他渐渐地习惯了他的“新身份”：作为一个“牛鬼蛇神”，他成了一个“非人”；每一个“革命造反派”都可以命令他，侮辱他，对他呼来喝去。

1968 年 4 月下旬，他被“当众逮捕”，进一步标志着他已被公开“清除”出“群众队伍”；随之四年的牢狱之灾，他面临随时会被“拖出去枪毙”的命运，他的生命早已毫无尊严可言。正如他在自传中所写：

上头的人告诉看守：所有这些犯人都是地球上的渣滓；看守们对我们极度蔑视，好像我们都是些低等动物。（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41页）

毫不奇怪，杨宪益从这样的境地猛然重新回到“人间”，一下子会改变不了囚徒的习惯。然而，难以改变的，不仅是囚徒的习惯，更是囚徒的心理。

杨宪益在口述历史时，曾经提到他蹲过的监狱。那座楼被称为“八卦楼”（也有犯人叫它“八角楼”、“王八楼”），这座楼酷似法国思想家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到的“全景敞视圆形监狱”：

陶然亭白纸坊旁边的监狱从前叫第一模范监狱。很坚固。里面有一个八角楼。说是八个角的。特别建筑的一个楼。楼里头分着很多牢房。八角楼中间有个楼梯可以上到顶上，可以站在上面放哨。如果有犯人逃跑的话，上面可以用机关枪扫射。是防备非常之牢固的一个地方。（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这种极为严厉的囚禁和监视，不仅禁锢了人的身体，也囚禁了人的心灵。正如福柯所说，在这样的居高临下无所不在的“监视目光”的压力下，久而久之，“每一个同志都变成了监视者”。再进一步，每一个人都会逐渐地自觉变成自己的监视者，“自己变成了自己的狱卒”，实行“自我监禁”。这种自我监禁正是权力统治的“最高级表现”。

杨宪益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自觉或不自觉地处于这样的“自我监禁”的状况下。这是杨宪益最大的变化。

“圆形敞视监狱”是英国思想家边沁（1748-1832）在18世纪末发明的。几个世纪以来，在西方各国，不仅所有的监狱改造计划都以“圆形监狱”为蓝图，而且，这种圆形监狱的概念后来广泛推广到了学校、兵营、医院和工厂，统治者建立了人事档案，建立了奖惩制度，监禁逐渐趋于普遍化和日常化。因此，福柯称它的发明者边沁为“警察社会的猎犬”，把他的发明称为“人类心灵史的重大事件”。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每一个同志都变成监视者”的最极端、最疯狂的时期。杨宪益在这个时期的心理变化和他的“自我监禁”，可以在他的英文《自传》中找到例子。当时，林彪虽然倒台了，但江青和她的党羽依然大权在握。他们发起了“批林批孔批周公”、批黑画、批邓等一系列运动。对于他们的倒行逆施，杨宪益再也没有公开表示过反对，他对这一切抱“冷眼旁观、玩世不恭”的态度；甚至还参加了批邓的“大游行”：

江青倒台以前，她和她的党羽发起了批邓运动。他们要求所有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都上街举行反邓示威游行。他们要我也去。我没有拒绝。那个时候我早已变得相当虚伪，不再发表任何不受欢迎的评论了。那次的所谓“群众游行”完全是一场惨败。街上的群众明显地没有任何热情，文化革命初期的那种疯狂的歇斯底里已经消失殆尽了。

江青还策划举行了一个黑画展，批判某些中国画家的画。她认为这些作品颓废和反共。一个老画家画了一个太阳，太阳的颜色有点粉红，被认为是攻击了毛主席。另一个青年画家黄永玉——我五十年代就熟识的朋友，我们翻译民间长诗《阿诗玛》时他为该书画了几幅美丽的插图——画了一幅猫头鹰，猫头鹰的一只眼睛是闭着的。这被指控是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有偏见，因此也是反共的。每个像我这样的政府工作人员都要去参观“黑画展”，接受“再教育”。…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莫名其妙的胡说八道，但我还是很顺从地去看画展。我已经学乖了，知道任何异议都是毫无用处的。（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54页，雷音译）

2001年11月，文革中曾参加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梁效”的北大教授周一良逝世以后，他的儿子写文章追忆父亲的一生，沉痛地揭露了一个基本事实：1949

年以后，知识分子要想在中国大陆坚持独立人格是“无异求死”，这真是一语中的！

其实，聪明的人很早就看破了这一点。先知先觉如储安平者更是早在 1949 年以前就预言：在国民党统治之下，“自由”是个多与少的问题，而在共产党统治下，“自由”将是有和无的问题。几十年来，“胡风分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各种各样的“反动知识分子们”都以他们的命运一而再、再而三地证实了这一点。因此在中国，“说真话”是最稀有的社会现象。一般人说起话来总是“唯上唯官”，就连普通老百姓都懂得“关键时刻不能说真话”；而杨宪益在过去却往往不明白这个道理，他在这个问题上长期以来显得十分愚钝。

可如今，“不谙世事”的杨宪益也终于在“批斗、监狱、死刑的威胁和无处不在的监视”的“威力”下明白了这一点。他也开始说违心的话，办违心的事了。

104. 满目疮痍外文局

坐了四年牢，杨宪益回到了原单位外文局。他惊讶地发现，在他坐牢的几年里，外文局的运动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战火越烧越旺。“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未完，紧接着又来了“清查 5. 16 分子”的“批、查、打”运动。外文局大院仿佛变成了反复厮杀的战场。截止到杨宪益被释放的 1972 年，大战的硝烟仍未散尽，留下一片死伤狼藉。在 1968-1973 年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两千多人的外文局，被揪斗和被关进“专政队”的居然高达 220 人（还不包括几十名被捕、被拘留及其他“现行反革命分子”），占全局总人数的 10. 74%！（均见《中国外文局大事记》，新星出版社）此外，这次运动中，除了这批公开被审查的二百多人之外，还有 196 人是“背靠背审查”的（均见《中国外文局大事记》，新星出版社）。两者相加，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审查的人数就是四百多人！而在另一个所谓“批判极左思潮、清查 5. 16 分子”的运动中，被“隔离审查”、“办学习班”及被点名批判的又有 270 余人（均见《中国外文局大事记》，新星出版社）。两次运动加起来，被审查被冲击及被专政的人数就将近外文局总人数的一半！一个单位有如此庞大的人数被“整肃”，即使与其他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相比，也算得上是“重灾区”了。

事隔数年，四人帮打倒，新时期到来。外文局领导小组对那场人人自危的“清队”运动做了结论。该结论说：

经过几年来的复查工作证明，外文局在清队中受审查的同志没有走资派、没有叛徒、没有特务、没有里通外国分子，没有一个阶级敌人。凡是在清队中被错误地揪斗、点名或关进专政机关、专政队的同志一律给予平反。对于在清队中死亡的同志要公开给予平反昭雪。（摘自《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

至于所谓的“清查 5. 16 运动”，外文局领导小组在 1979 年的《平反决定》中指出“外文局没有一个‘5. 16’分子，更不存在所谓‘5. 16’反革命集团，外文局的清查‘5. 16’，完全是一个假案。”虽然做出了彻底平反的决定，然而那些在运动中死于非命的人却永远回不来了。据统计，外文局在文革六年（1966-1971）中“自杀身亡”的人数是 23 人（据《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是“清队”高潮的 1969 年。仅仅在那一年，就有 8 位知识分子寻了短见。其中就有杨宪益在回忆中特地提到的《中国建设》总编室主任方应珣和《中国建设》副总编陈麟瑞。这两位文人，一个是获美国哈佛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学贯中西的老一辈知识分子；一个是年富力强、正日益成为《中国建设》的顶梁柱的业务尖子；这两个年龄相差二十岁的两代知识分子在同一年同一场运动中被逼

而死，至今令人唏嘘不已。

方应旸（1925-1969），江苏灌云县人，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1952年，中、英文俱佳的方应旸从上海调来北京参与《中国建设》草创工作。近二十年来，他历任设计组组长、编辑组组长，最后成为《中国建设》总编室主任。方应旸是有名的干才。《中国建设》几十年的成就离不开他的杰出贡献。1968年11月初，他以莫须有的“历史问题”被“隔离审查”。在残酷恐怖的政治高压下，他在两个月的时间内被迫写了九十多份“检查交代”，仍然不能达到专案组的要求。专案组逼他承认自己是“美帝特务”，威胁他：如不“老实交代”就“抓到公安局”去。在身心即将崩溃之际，方应旸提出与妻子见一面，也被专案组拒绝。1969年1月10日凌晨，陷于绝望之中的方应旸跳楼自杀。年仅43岁。他去世时，三个孩子中最大的才5岁，最小的才5个月！

就在方应旸去世当天，他的妻子来外文局上班时（方应旸的妻子王培珍也在《中国建设》杂志社工作），专案组派人把她拦在传达室，当场叫她拿出《毛主席语录》，命她念“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反革命一边，他就是反革命派”这一条语录。紧接着，外文局军宣队和造反派当着方应旸的遗孀和闻讯赶来的弟弟的面开起了“批斗”特务、历史反革命分子“方应旸”的大会（方应旸已死，只能缺席批斗），会上高喊“方应旸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的口号（王培珍访谈，2000年5月30日，北京）。当笔者于2000年采访王培珍女士时，她和患病的大儿子方霖挤住在狭小的两居室单元宿舍里。三十多年来，她一个人含辛茹苦带大了她和方应旸的三个儿子。如今，已到人生黄昏岁月的她只能活在对方应旸的无边无际的怀念中。

陈麟瑞（1905-1969），笔名石华父，浙江杭州人。192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3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学位。1933年回国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主任。此后他的一生，都在编辑和教学生涯中渡过，是个典型的“书斋型”知识分子。陈麟瑞生前最后的职务是《中国建设》杂志社的副总编。他的朋友杨绛先生在一篇怀念他的文章中说他是一个“最随和、最宽容的一位朋友”。就是这么一个最老实的文化人，在文革中遭了厄运。他也在“清队”中被“揪出”，遭到“抄家”和“关牛棚”。但是，和别的被“冲击”的人相比，陈麟瑞的遭遇并不是最惨的，他没有被毒打，关了几天以后还被“释放”回家。所以他的自杀颇使人意外。岂不知，正是这个老实巴交的人，心中有最固执的念头。他坚守着“士可杀不可辱”的底线，在即将开他的批判大会的前一夜，喝滴滴畏农药自杀（柳无非访谈，2000年4月30日，北京）。他终于“劈开生死路，退出是非门”了（他的好友杨绛悼念他的词）。

当笔者于2000年4月去访问陈麟瑞年过九旬的遗孀柳无非（她是我国著名诗人柳亚子的女儿）女士时，才得知，陈麟瑞先生还是个卓有成就的剧作家。孤岛时期和沦陷期的上海剧坛曾成功地演出过他写的多部剧作。这样一个学贯中西，多才多艺的老实文化人，成了千万个文革牺牲者中的一个。

除了方应旸和陈麟瑞，外文局另外那二十一个无辜屈死者的姓名、生平和被迫而死的经过，因种种原因，笔者没有细考。希望有心人会做这件事。使他们的死（和所有无辜者的死）能成为历史的一面镜子，永远警示后人。

105. 孩子们回家

杨宪益在狱中每当回想往事时，就会想起他的三个孩子。他时时感到几十年来一心扑在他自己的事情上，忽视了三个可爱的孩子；出狱后，杨宪益陆续了解

到他和戴乃迭的被捕给所有亲人带来的灾难：他七十多岁的老母亲被罚天天扫马路，他的三个孩子成了无家可归的“狗崽子”，发配到了天南海北；就连他的两个妹妹和妹夫也立即作为“特嫌”被“隔离审查”了八个月至两年。他感到自己连累了亲人们，特别是对不起自己的三个孩子，他决心弥补这一切，他要让他们回家。

杨宪益通过努力，陆续把两个女儿和儿子从河北沧州、东北吉林和湖北鄂城调了回来。但是，杨宪益在很久以后才意识到，把“人”调回来容易，可要把“心”重新拢在一起就不容易了。“文革”已经毁坏了他们的家庭，有些东西已经失去，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当杨宪益和戴乃迭在1968年被“北京市军管会”当众“逮捕”时，杨宪益的三个孩子和他所有的亲人（恐怕除了他的母亲之外）都或多或少地相信了“政府”的话（在1968年，林彪还没有“出事”，党和领袖的威信还很高）：既然政府和公安部门敢于公开把杨宪益和戴乃迭抓了起来，肯定是掌握了他们确凿的“间谍活动”的证据。在“党、革命、人民”和自己“有罪”的父母之间，他们当然要站在“党和人民”一边，与自己的父母“划清界限”。但是，他们的这番痛苦的挣扎换来的却是更深的痛苦。因为他们发现，不管他们怎样表示要“忠于党忠于毛主席”，“跟着党干革命”，他们仍然脱不了“间谍子女”的恶名，他们身上的污点永远洗不掉，他们永远被人看不起，永远遭人歧视。杨宪益的小女儿、当时19岁的高中生杨炽在回忆中谈到，当时即使是插队落户也要按家庭出身分三六九等。她只能去“最差”的地方：

那时候家庭出身好的可以干这个干那个，可以去当兵，可以到内蒙兵团、到陕西去插队。陕西是极穷的地方，还得出身好才能够格。完了以后是山西，山西就差一点了。然后就是在北京招工的，一般是工人子弟。还有云南，到云南兵团也得过的去的家庭才能去。最后剩下的一帮是家庭出身极坏的，什么都不够格。加上学校里的一帮小偷流氓，还剩下二百多人。后来吉林来北京招人，学校动员大家报名，报了二百二十人，都是没有别的出路的。但是后来要迁户口，大家就都不去了。最后迁户口的就是二十二个人。我就是一个人。我们都是绝望了，在北京没饭吃，就插队走了。（杨炽访谈，1999年6月25日）

杨炽说，她当时的生存之道就是“在夹缝中求生”、“尽量别让人家注意到我”。她回忆了一件事，从中可以看出她是怎样在提心吊胆之中生活：

我是69年4月份下（农村）去的。头一年冬天就回北京（过年）了。东北冬天没有什么活儿干，一般知识青年都要回北京的。我们集体户22个人一同回北京。头一晚上我是住在一块儿插队的同学家里。第二天早上我就到了百万庄，我五姑（杨敏如）住在那儿。我没敢进她家门。我就到（她家）对面的一个楼。我心想，我要爬到楼梯上面去，楼梯上面有窗户，他们家住三楼。我想我可能看到他们家里边的情况：是不是人都在？是不是还住在那儿？是不是没事的样子？但是我们两人没联系。我看完了以后就到河北沧州找我姐姐去了。（杨炽访谈，1999年6月25日）

杨炽的这一番描述像是某个“反特”电影中的画面。她在北京已经举目无亲，惟一的亲戚家她又不想去，怕被怀疑成“黑串联”。因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普通的亲人见面甚至写信都可能变成“阶级斗争新动向”而酿成大祸。杨敏如的回忆证明了这一点：

他们一被捕，我们两人立刻就都是“特嫌”了。他（罗沛霖）就回不来了。我很快地也隔离了。家都完了。我母亲立刻就扫街了。作为特嫌写交代。你知道我多难写吗？就是他们进监狱以前的十天，每天有什么来往都得写。一段一段地写。

今天什么时候见到乃迭的？你们都说了什么话？你为什么送她一个被子？他们难道没有棉被吗？你送的棉被里有什么东西？把棉被都撕了，查里头有什么东西。那简直就像特务来了一样！…那时杨荧（杨宪益的大女儿）住在百万庄（外文局宿舍），不能到我家来。给我写了个条儿：“我们都很好。……外面有个小狗，我们现在玩那个小狗。”他们（审查人员）就觉得“外边有狗”！跟《红灯记》一样！这一下就要了我的命了！（杨敏如访谈，1994年6月25日）

今天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年轻人，看到上面的叙述会以为是笑话。可这不是天方夜谭，而是实实在在的真相。

经过几年的“六亲不认”的日子之后，突然传来父母被“释放”回家的消息，杨宪益的儿女们反而有些将信将疑。这些年来（从1966年起），他们耳里听到的尽是父母（尤其是父亲）的“反党、叛国”的“罪行”，怎么一下子他们就“没事”了？

杨宪益的妹妹杨敏如在回忆中谈到当时杨宪益的三个孩子面对自己家庭的“大起大落”无所适从的迷茫心情：

当时总理向他们道歉，叫所有专家的孩子都从外地回来。可怜哪，所有的孩子都不到家里去，都到我这儿来：“五姑，我们怎么办？”我说“回家！已经没有问题了，你们还不回家？”（领导上）叫你们回来的。”他们觉得他们是敌人嘛，要不要划清界限？”（杨敏如访谈，1994年6月21日）

杨宪益的小女儿杨焯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

当然，我们开始回来觉着有点别扭。因为——虽然我也没有到哪儿去揭发过他们，或者跟他们表示什么划清界限，但是这么多年来就是这个事实。可是现在又好了，他们又没事了……反正有点别扭。（杨焯访谈，1999年6月25日）

孩子们回来以后，杨宪益和戴乃迭忙着操心他们的工作、学习和被耽误了的婚姻大事。杨宪益在回忆中说，从1972年出狱到整个70年代末，他和戴乃迭把主要精力都花在孩子们身上了。他们操办了两个女儿的婚事，又想尽办法让两个女儿去美国留学。杨宪益想用这一切来弥补文化大革命对他的孩子们青春的耽误。

但是，杨宪益很快就发现，有些事情是无法弥补的。他们的儿子杨焯，由于受到的创伤太深，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且病况日益加重，难以复原。他们的家庭为此遭到了很大破坏。

106. 杨焯的遭遇和“发疯”

关于杨焯，笔者在《父与子》一节中已经写过。但是鉴于他对杨宪益和戴乃迭（尤其是戴乃迭）的后半生影响太大，他的遭遇又具有典型性，故再专门写一写他。

笔者采访杨宪益时，他曾简短地评价儿子说：“他是个极左派”。对比杨焯当年的所作所为，杨宪益这么称呼他似乎并不为过。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杨宪益对儿子的这个评价就失之于简单了。

杨焯之所以会“极左”，除了当时的社会大环境的制约和影响、除了他自己要挣脱家庭的阴影，争取个人的前途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他真诚地相信了当时的宣传，相信最高领袖毛泽东说的每一句话。他自认为“建立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就是要与过去的一切“决裂”，与自己的家庭“决裂”，与一切旧的意识形态实行根本的“决裂”（这都是当时时髦的宣传）。他相信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彻底埋葬旧世界”的“史无前例”的伟大的革命和创举，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革

命中去。正因为此，他参加文革，不是被迫，不是半心半意或虚情假意，而是真心诚意的。据他的五姑杨敏如回忆，文革一开始，杨焯甚至自己出钱买了一个油印机，自费印刷宣传文革和红卫兵运动的材料。这个举动和他父亲杨宪益当年自费购买油印机宣传抗日几乎是一模一样，都是出自爱国青年的一腔热血。

但是，红卫兵的极盛期很短。很快，红卫兵就被“工人造反派”和“军宣队”取代，并立即从“革命动力”转变为“革命对象”了。1966年底至1967年年初，杨焯和其他“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一行数人受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委托到南京调查两派（即所谓“好派”、“屁派”）群众组织，向“党中央”汇报。此举后来成为一项“挑动武斗”的“罪行”（杨苡访谈，1999年5月25日，南京）。随着周荣鑫被江青点名而倒台，杨焯也背上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军乱军”、“5.16分子”等一大堆罪名。他在大学里成了“审查对象”，无数次被批斗审查，精神已经受到了刺激。1968年，在父母双双被捕后，杨焯又背着审查对象的恶名分配到湖北鄂城一家县农机厂。在那里，他受到变本加厉的迫害。他的档案里本来就有“5.16嫌疑”的尾巴，加上父母的“间谍罪行”，杨焯立刻也成了一个被怀疑的人。可笑又可怖的是，在鄂城这个闭塞落后的小县城里，杨焯的“外国人”的长相居然成了他的大累赘（在北京这个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他走到哪儿都会被人认出来，走到哪儿都有人对他指指戳戳。他觉得，他的西方人的容貌出卖了他，使他再也逃脱不了“外国间谍”的阴影。政治高压加上文化封闭落后的双重压迫，残酷的现实和他的信仰形成巨大的反差，杨焯有些支持不住了。对他比较了解的五姑杨敏如在回忆中谈到了杨焯在鄂城的一些情况：

我不知道外头人心有多险恶！他（杨焯）的脸又像外国人一样。他到了鄂城就没有好日子了。他们（当地人）就说“噫——来了一个外国人！”……他爸爸妈妈一进监狱，那就是特务了。不是特务能进监狱吗？所以他就变成特务的孩子了。有人自己偷听敌台，就嫁祸于他，说“我没有听，是杨焯听的”。大家觉得说的很合理：杨焯像个外国人，他一定是偷听敌台的。……他受的审查很厉害。把他的钟表都拆了，把他的被子都拆了，防止有特务活动。他受了很多罪。没有人同情他，没有人跟他说话。（杨敏如访谈，1994年6月25日）

为了落实杨焯的“罪行”，鄂城县农机厂的专案人员甚至不远千里跑到北疆杨焯插队的嘎什根公社来“外调”。杨焯在回忆中谈起一件她至今感到遗憾和后悔的往事：

我哥哥可能最后有一件事比较怪我。……他刚到湖北的时候，他让我把他的书给他寄去一些。我就把能够找到的他的书都给寄去了。可能有一箱子书吧。结果里边有一本东西，是他上中学的时候搞国防体育活动练发报的小册子——那时候有一阵子全国都在搞国防体育活动，包括跳伞，骑摩托车和旗语，还用摩尔丝密码练发报。他那时候跳过伞，还练过很长时间发报，那个码记的很熟的。我们小孩在家里也练密码玩儿——结果在我给他寄的书里面有一个小册子是这个摩尔密码。书到了以后，人家就查他的东西。就认为这是特务活动。这（本书）就是一个根据。他有点怪我为什么给他寄这么一个东西？！（杨焯访谈，1999年6月25日）

一本中学生搞军体活动用的工具书竟成了特务活动的“罪证”！专案人员根据这件“物证”，大大加强了对杨焯的逼供和迫害。多年的审查批斗，严重损坏了杨焯的身心健康。他渐渐患上了某种“迫害综合症”。原本活泼开朗的杨焯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变的郁郁寡合，时时处处都怀疑有人要害他。杨焯在回忆中提到，早在1971年，失散多年的三姐妹到老二杨焯插队的河北沧州见面时，杨焯

走在街上神色总是不对头，他总觉得到处有人盯着他，到处都有人给他使坏。杨敏如在回忆中也举了几个典型例子：

我和他（杨焯）聊天，我说你觉得他们都怀疑你，他们怎么怀疑你，给我举个例子看。他说有一回我寄信，邮票贴倒了，我没注意。“贴倒了是很不对的。可是我改不过来了。”还有一次他去修电线，要爬高，旁边有标语。底下的师傅就说“杨焯，你把旁边的那个都撕掉，要不然你怎么做活儿？”他就撕了。撕完了他才发现，撕掉的正是“毛泽东”三个字！他觉得‘这个人是在陷害我’。（杨敏如访谈，1994年6月25日）

从杨焯举的这两个例子来看，他的担心决不是多余的。当时的中国，因为一张领袖头像的邮票贴反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或者因为无意中撕掉了毛泽东语录而被关进监狱的事例多的举不胜举（前面已谈及，六十年代初外文局一个干部不慎把印有列宁头像的邮票多切去了一点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这种社会环境正如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所说的：“人类必然会疯颠到这种地步，即不疯颠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颠”。在全社会都处在“另一种形式的疯颠”之中的时候，往往神经正常的人也会被逼疯（杨宪益及无数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的遭遇即是雄辩的例子）。因此，杨焯的所谓“多疑症”完全是周遭环境逼出来的，是一种“时代病”。正如福柯在《疯颠与文明》一书中所说：“疯颠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颠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颠的历史。”就中国的情况来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统治下，动辄得咎的中国人，或多或少或轻或重都会出现类似的“神经病”。

可是，杨焯与众不同，他不像别人，凡事能够实行“中庸之道”，适可而止，且能跟随潮流而变化；杨焯在骨子里是一个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人，对他想不通的问题他要追究到底。这一点和他的小妹妹杨焯区别就很大（杨焯曾对笔者说过，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在家庭遭难时她往往会把最可怕的现实问题“排除”掉，不去细想。这种性格使她在灾难面前受到的伤害不像她哥哥那么大）。当初，杨焯公然和父亲划清界限，并“挺身而出”抄了自己的家，就出于这种“顶真”的性格；现在，他又顶真地追究起一系列问题来。他要弄明白，为什么他有了一个外国籍的母亲，考大学时就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为什么他生了一张外国人的脸，就会被怀疑是间谍？为什么他这么真心拥护热爱毛主席、共产党，反而处处受到猜忌和排挤？为什么他这个共青团员在工厂里不能发挥所长？为什么他的发明创造得不到赏识（回北京后，杨焯写了一篇数学方面的论文，他的五姑父——国家级电子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罗沛霖对论文评价很高，认为其中有新发现，显露了杨焯的科研潜质和学术水准。但当时的政治气候不行，学术研究还完全提不到日程上来，身为电子工业部科技司副司长的五姑父也无能为力。可杨焯误会了五姑父的意思，以为是他“政治上不可靠”，才不用他的发明。这对杨焯又是一个打击）？

杨焯以与众不同的方式进行这种追究，他以某种“病态”的方式揭示现实的荒诞，与现实对抗。杨敏如举了几个例子：

有一天，杨焯忽然到我家里来了。我说你干嘛来了？有事吗？“没事，我家里头来了外国人。”我说那有什么关系？……他在电视里看见接见外宾，就说“把这个关掉”。他觉得不能跟外国人联系，可怜极了！他到我这儿看书，就只借鲁迅、马克思主义的书。要有别的，就说“五姑你怎么能看这种书？你怎么能看这种书？”……他不是一下子就疯了的，反正有点怪。这时候也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也有个姑娘很喜欢他，我们就跟他提，他说“五姑你了解她吗？你了解

她家里吗？了解她思想吗？不了解怎么谈？”还是这毛病。（杨敏如访谈，1994年6月25日）

杨焯在恋爱问题上的执拗不是他的异想天开，完全是现实在他头脑中的反应。当时中国人的恋爱和婚姻，完全受制于“阶级斗争”的条条框框。择偶的首要标准是“政治条件”如何。杨焯在这个问题上的乖癖表现，毋宁是一种“以毒攻毒”的方式，来对抗不合理的现实。

杨焯与现实对抗的最极端表现莫过于他突然宣布自己是英国人了。在连续失眠多天以后，某一天早上杨焯突然开始说英语，再也不说汉语了（他从小一直说汉语，父母从未教他说过英语）。这一举动使所有的亲人震惊。据杨敏如回忆，杨焯这一变化的“灵感”来自于美国专家韩丁的女儿卡玛。她在来看望杨焯（他们从小就认识）的时候的一番话打开了杨焯的思路。她说（大意）国籍是一个人身份的标记，没什么了不起的。如果她愿意，她可以入中国籍，也可以入美国籍。杨焯也有这个自由。因为他母亲是英国籍。这一番话对杨焯有醍醐灌顶的作用，使杨焯一下子顿悟到终于找到了他一切问题的关键：因为他有一半“外国人”的血液，所以他在这个既排外又高度政治化的国家永远不会被当作“自己人”；既然他的血统不能改变，他只能改变国籍，才能改变自己“永远是外人”的命运。经过连续多天彻夜不眠的思想斗争之后，不屈不挠的杨焯终于做出了成为“英国人”的决定。而且，倔强的杨焯“一不做，二不休”，他不仅从此只说英语，不说汉语，而且从此不吃中餐只吃西餐了。他这一惊人的举动对全家震动极大，加剧了家庭的矛盾：母亲和奶奶整天惊惶不安，魂不守舍；而父与子之间，逐渐形成了几乎不可弥合的分裂。

107. 父与子（二）

杨宪益和杨焯这一对父子，表面上区别很大：杨宪益处处落拓不羁，满不在乎；杨焯却细腻含蓄，有点神经质。但在骨子里，父子二人却十分相像：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男子汉的硬气，决不服软，决不轻易放弃。杨焯在回忆中曾谈到童年的一件往事，可以作为上述看法的一个注解。当时她四、五岁，哥哥杨焯带着她和一帮孩子们爬到外文局楼顶上玩，惊动了大人们。他们找出这次行动的“罪魁祸首”杨焯，向杨宪益告了状。从来不打孩子的杨宪益居然动手打了小女儿几巴掌。小杨焯为了躲避惩罚，整整一夜没回家睡觉。他宁可露宿野外，也不向父亲的“强权”低头。那一年，杨焯十二岁。

这一次，倔强的杨焯做出石破天惊的决定，搅得全家不得安宁。他在家中不说汉语，断绝了和家人的交流，只有惶惶然的妈妈戴乃迭和儿子对话。杨宪益对杨焯的“怪癖行为”十分生气，他不能容忍儿子从“极左”跳到了“极右”，更不能容忍儿子要做英国人！他大发脾气，骂儿子是“混蛋”，父子关系日益紧张。杨敏如在回忆中分析了杨宪益当时的思想轨迹：

你看杨宪益这个人，他儿子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成了外国人的时候，他就比他极左的时候还恨他。他能容忍极左，因为他也有极左思想。他不能容忍一个人成了外国人了，最不能容忍了。你就知道他住在友谊宾馆（1994年6月杨宪益搬到友谊宾馆去住）多别扭了。他不要当外国人！（杨敏如访谈，1994年6月21日）

杨焯的回忆中也谈到了父亲和哥哥的矛盾：

（起先）我爸爸觉着他思想上（有问题），实际上他很快表现的不是思想问

题而是精神上有毛病。但是我爸爸很长时间都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他觉得——他按中国人传统的想法，觉得精神病是一种弱点，好像人格上的缺陷——你怎么能够这样？！所以家里边就不是很愉快。……我爸爸认为‘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有很大的精神压力，我也有过幻听幻觉现象，但是我没有崩溃，你怎么会这样’？！（杨焯访谈，1999年6月25日）

杨敏如、杨焯的分析和回忆揭示了父亲和儿子之间巨大的心理隔阂和误解。杨宪益不理解儿子的痛苦，也没有试图去接近和理解他的内心。两个性格刚毅的男人之间发生了激烈深刻的碰撞（这种碰撞不表现在外表，而是在内心深处）。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当世界处于极度荒谬之时，真理往往是通过“疯癫”的中介来揭示的。疯癫与艺术作品共同诞生，迫使世界对自己提出质疑。通过这种与艺术作品共始终的疯癫，世界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有罪者。

杨焯虽然不是艺术家，但他所有的疯癫行为都是针对世界的不合理而来。而且，惟其“疯癫”，才有惊世骇俗的力度。可惜的是，杨宪益没有这样想；作为父亲，他没有尽量与儿子的“非理性”行为进行沟通。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与世俗的认识没有什么两样。当然，从世俗的角度来看，杨焯的这种“病态的反抗”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人能够理解和容忍的限度（直到现在，人们说起这事时，即使最善意的说法也只是以“他有病”来解释一切）。

父亲的反对和家人的不理解使杨焯更加孤独，他越来越躲避人群，最后，他干脆以自闭来对抗。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洗脸，不换衣服，不吃饭，不见人。他表现得越来越“疯”了。然而，杨焯并没有停止“成为英国人”的奋斗。在经过多方努力之后，他采取了最大胆、也是最危险的行动——闯英国驻华大使馆。他多次失败，但是他绝不气馁，而是再接再厉。有一次他拿着母亲的护照居然骗过了卫兵，成功地闯进了大使馆。当然，他最终被“送”了出来，并被公安局拘留。

杨焯的行为使杨宪益和戴乃迭焦头烂额，无计可施；连外文局领导也为此而大伤脑筋。最后，周恩来亲自过问此事。他做出了决定：同意杨焯到英国去。戴乃迭在征得姐姐希尔达同意后，请了假，匆匆忙忙地送杨焯去了伦敦。时间在1975年底。

杨敏如回忆了杨焯临走的一些细节：

最让我难过的是，他走了，把他的书都烧了，都不要了。他也懂得不会回来了。他就留着他的团员证、毛主席像，一点儿东西，他把它包起来。好像他觉得这一段生活已经过去了，我还很珍惜，还都保留着。所以这孩子可怜极了！什么错都没有！要是差一点的孩子，出来以后骂骂咧咧的‘共产党真可恶’什么的，都不会得这种病！（1994年6月25日）

到最后，杨焯和父亲的关系近乎破裂。他不承认自己是杨宪益的儿子（他承认戴乃迭是他的母亲）。他认了一个英国干爹，此人是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友人菲力克斯·格林；杨焯给自己起了个英国名字：大卫·格林（DavidGreene），用的是干爹的姓。他到死都用着这个名字。至今，他的墓碑上刻的仍是：DavidGreene(1942-1979)。

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它造成的伤痛毁坏了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后半生，并影响了杨家几代人的生活。

108. 恢复工作—继续翻译《红楼梦》

尽管儿女家事花费了杨宪益、戴乃迭大部分精力，但是他们仍然尽可能地投

入到工作中去。第一件事就是尽快恢复《红楼梦》的翻译。可是，多年过去了，原来的工作稿还找得着吗？

四年前的突然被捕打断了戴乃迭的工作。她的书桌上铺满了工作稿纸。幸亏一位有心人把她的稿纸整理好，收藏了起来，当杨宪益、戴乃迭恢复工作后，这位好心人拿出了保存完好的《红楼梦》全部翻译初稿和前半部翻译二稿，使戴乃迭喜出望外。笔者采访了这位好心的同事熊振儒，他说：

他们翻了一年多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杨宪益是翻译初稿，已经全部翻完了。戴乃迭是润色，才一半就被抓起来了，是五十回还是六十回。所有的东西都摊在桌子上，就直接逮捕了。我想，他们成了反革命，这个书不是反革命；这个稿子不能成反革命。我就把他的稿子清理清理，翻好了的，改好的，没改的，我一章一章从第一回到一百回都给他分的好好的，用报纸包好放在柜子里，放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保存着。最后谁也不知道。当时我要是不管的话，就散掉了。他们以后也没有力量再翻了。几十万字的东西呀！一直到他们放出来恢复了工作以后我给他们找出来了。“啊！还在这儿啊？！”高兴的不得了。我当时算是做了一点有益的工作。我知道文化大革命是瞎搞，不会长的。不管他是反革命也好，他的工作是有益的。我是这么想的。（熊振儒访谈，1999年12月26日）

根据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分工，杨宪益负责初稿，戴乃迭负责二稿的修改润色。两人的配合十分默契。戴乃迭的二稿花的时间往往比杨宪益多三倍。她不仅要看杨宪益的初稿，还要对照中文原书，有疑问处则和杨宪益商量切磋，反复推敲。杨宪益的初稿在文革前完成了一百十回，还差最后十回；出狱后大部分工作是戴乃迭的“二稿”了。戴乃迭是一个“工作狂”，她一贯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严谨和基督徒的献身精神对待她的每一份工作，四年的监狱并没有磨损她的工作意志，相反，她对工作更加拼命了。她用工作来医疗文革带来的伤痛，用工作来忘却家中的不幸。（在儿子患病和去世前后，她疯狂地译书，独自一人翻译了十部长篇文学著作和几十个中、短篇小说，使同事和亲属既敬佩又难过。）

《红楼梦》全稿在1976年翻完。1978年，外文出版社出版了《红楼梦》英文版第一卷。1979年和1980年分别出版第二卷、第三卷。英译《红楼梦》三卷本的出版给杨宪益和戴乃迭带来极大声誉，他们的社会地位陡增。此是后话。

需要补充的是，给杨宪益和戴乃迭带来巨大声誉的《红楼梦》，并不是他们喜爱的古典著作。杨宪益甚至说他“看不下去”。他对小说中不厌其烦地描写宴请、食谱等细节感到不耐烦。而戴乃迭则对贾宝玉的行为逻辑不理解：“既然他那么爱林妹妹，为什么他不带着她逃跑去寻找幸福呢？”当时他们翻译这部古典名著完全是“服从组织的安排”，作为“任务”来完成的。以杨宪益的个性和欣赏标准来看，《西游记》和《水浒》更对他的胃口。可恰恰是他们（尤其是杨宪益）最不喜欢的作品使他们曝得大名（戴乃迭在1980年发表过《一个西方人对「红楼梦」的看法》，文章中提及西方人理解《红楼梦》的诸多难点，其中就有她自己的体会。戴乃迭此文转载于杨宪益主编的《我有两个祖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中。）。历史又开了一次玩笑。

109. 神奇之年-解冻

杨宪益在自传中称1976年为“神奇之年”，说的不错。那一年中发生的事情足以影响以后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那年一开头（1月8日）就是周恩来去世。“栋梁夭折，大厦将倾”，全国人民在悲痛之余更有一种惶恐不安；这种心情很快

化为了反抗的行动：4月5日，天安门上演了抗议的活剧，“4.5运动”从此载入史册；7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逝世；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死亡人数超过35万，整个唐山城化为了灰烬；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华国锋和叶剑英、汪东兴联手逮捕了“四人帮”。四人帮的垮台距毛泽东逝世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令所有中国人都感到惊奇。从此，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毛泽东的逝世是所有变化中最巨大的变化。他的死使大多数中国人如梦初醒：原来“万寿无疆”的伟大领袖也是个凡人，他也会生病也会死。他的死结束了一个时代，为四人帮的倒台铺平了道路。

四人帮的垮台使全中国亿万人民欢欣鼓舞。全国各地纷纷举行庆祝游行，人们敲锣打鼓，扭起了久违了的秧歌，人人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欢笑，家家户户举办家宴庆祝这一特大喜事。这种心情，似乎只有当年“打倒蒋介石，翻身得解放”的年代可以相比。杨宪益也参加了庆祝游行。他与全国大多数人一样，感到了“第二次解放”的狂喜。

然而，“解放”的道路并不平坦，近三十年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逮捕几个人容易，在政治上打倒一批人，调换一批人也容易，但要彻底清理几十年极权主义政权造成的祸害，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难的是人的思想变化。长期的政治高压和思想禁锢造成了全民性的人格萎缩和思维退化，这种状况使思想解放的道路举步维艰。画家廖冰兄的一幅漫画活灵活现地表达了这一主题：画中人被硬生生地塞到了一个坛子里，他在里面蜷缩成了一小团，惊恐的目光看着前方，浑身瑟瑟发抖。四凶覆灭，坛子碎成两半，但坛中人已全身肌肉萎缩，骨头酥软，无法站立起来了。画家写了如下文字表示他作画的心态：四凶覆灭后写此自嘲并嘲与我相类者。此画具典型意义，代表了很多人的心态。杨宪益专为此画题了一首诗：

一朝解放反生愁，久惯牢房怕自由。

顾虑重重难提笔，大家求放我求收。

这首诗是有感而发。其中的“久惯牢房怕自由”一句，有杨宪益自己的真实体会（“心有余悸”是社会普遍现象。就连杨宪益的上级、老革命刘尊棋也未能“幸免”。笔者从一篇文章中看到，刘尊棋在“改正”后一次谈起他的遭遇时，突然“眼睛很迅速地往身后边搜索了一下”，在刹那间露出惶恐的神色，令在场者唏嘘不已。

对于当时中国人思想禁锢的情况，苏格兰女专家白霞有切身的体会。她1977年来华，在《中国文学》杂志社工作。作为见证人，她目睹了变化的全过程（1977-1987年白霞在华工作，正好是思想解放的十年）。她对笔者叙述了她刚到外文局的处境。作为一个初到中国的外国人，她的观察尖锐而细致：

1977年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和今天比较起来，任何事务都受到批判。政治就是一切。

你和谁说话？他说了些什么？甚至你穿什么衣服都和政治连在一起。如果一个中国姑娘把她的头发卷起来，这就是一个“事件”。她与众不同，她要干什么？她有什么目的？！你做的任何事情都被监视，被分析。刚结束的文化大革命是个非常复杂困难的时期。那时人们之间的关系有许多问题。人们身处对立的政治派别，互相憎恨。这里有谋杀者和被谋杀者。华国锋派调查组调查了两年，没有查清楚谋杀事件。大约三十人死于非命，没有结论（外文局现在的结论是：在文革中死去的几十个人均系“自杀”，不存在“谋杀”。但相当一部分人私下里至今对这个“结论”持怀疑态度。这件事成了永久之谜。其实，正如作家萧乾在回忆录《未

带地图的旅人》中所说：“在暴力之下，自杀与他杀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笔者）。那个时期对中国人是困难的，对外国人来说也是困难的。你说 77 年已经不困难了，可它的确是困难时期。……有些外国专家是从监狱里放出来的，有些没关监狱的。有的外国专家，只说党想让他们说的话，有的话就是些废话。党想让他们这样，他们就“Yes, Yes”，党想要那样，他们又“Yes, Yes”，那是很愚蠢的。没有（自己的）思想。只有很少的专家你可以信任，可能只有二、三个人可以信任。因为他们（多数人）可能会向领导汇报我说的话。这是 77 年的事。到了 87 年，没有人会在乎你向领导汇报什么。而在 77 年，人人都担心这种事情——你会不会是个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分子或者别的什么分子？所以那是非常难熬的日子。（白霞访谈，2000 年 2 月 21 日）

白霞的回忆揭示了一个事实：连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都要处处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中国人的处境如何就不难想像了。那一时期，杨宪益写了一首有名的诗，描画出当时许多人“乍暖还寒”，担忧“变天”的心情：

兴来纵酒发狂言，历尽风霜锷未残。
大跃进中宜翘尾，桃花源里可耕田？
老夫不怕重回狱，诸子何忧再变天。
好乘东风策群力，匪帮余孽要全歼。

杨宪益给这首诗起名“狂言”，很说明问题。这是一首“言志”的诗，尽管杨宪益在当时仍需要靠“纵酒兴来”才发得出“老夫不怕重回狱”这种狂言的，但毕竟，他已经挺直了腰杆。他由一个“牛鬼”重新成为了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110. 噩耗

1979 年 1 月上旬某一天，正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久，英国驻华使馆给戴乃迭打来电话说“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话还没说完，戴乃迭立刻预感到是儿子出事了。她迫不急待地问“是不是关于我儿子的消息？”对方回答“是。”接着，使馆的人简要地告知戴乃迭，她的儿子杨烨在圣诞节期间在英国的寓所自杀了。死的方式十分惨烈：他锁上房门，然后亲手点燃了汽油，自焚而亡。时间是 1979 年 1 月 6 日。

对于儿子的死，杨宪益在自传中只写了几句话：

我们儿子的死是我们最为惨痛的损失。尤其对于乃迭打击更大。自从那次事变后，她的健康迅速地恶化了。（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52 页）

噩耗传来以后的第二天，杨宪益照样去上班，甚至连戴乃迭也去班上坐了半天。同事们小心翼翼，绝口不提这个话题。从此，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这件事在杨家成了一个“禁忌”。1979 年 9 月（离杨烨去世才半年多），杨宪益和戴乃迭去英国探亲访问，他们见了戴乃迭的姐姐希尔达（杨烨正是在她家自焚的），也绝口不提杨烨的事。然而，在这种异常的冷静和克制的背后，却是永远无法疗治的锥心的伤痛。事实证明，这伤痛对于戴乃迭来说是一种“无期徒刑”，只有生命的结束才能终止它的折磨。

2002 年 10 月 21 日，在杨烨去世 23 年以后，笔者采访了来北京探亲的戴乃迭的姐姐希尔达（那时，戴乃迭也已去世三年了），希尔达谈到了她的外甥杨烨。她说：

他是个那么文雅的男孩，非常有礼貌。他显得头脑清晰，知道自己要干什么。非常聪明。但他不会表达感情，不能与人打交道。他也不想与人打交道。

初见面时，他显得那么年青，像一个十多岁的少年人。简直不敢相信他已经三十出头了。他很害羞，有些神经质，很少吃东西，人越来越瘦。我感到他是个十分敏感的男孩子。但他无疑是个有抱负的青年。他的房间里堆放着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德文书籍，他还复印了他喜爱的英文诗集。

很明显，他来到英国是想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他想使自己成为一个“新人”。他想忘掉过去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他要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因此，他也不想接触他在英国的家人。开头，我们是在一起吃饭，但是他说他不想这样在一起吃饭，也不愿意接受我给他的钱。他说他会自己照顾自己。他还说，他不想遇见任何认识他和知道他过去的人。他想开始新的生活。他对我说，他想进学校学习。我想，他认为有了在英国接受正规教育的学历，又通过正式考试，就可以拥有全新的生活了。（希尔达访谈，2002年10月21日）

杨焯为什么不愿意与人打交道？希尔达用她的理解解答了这个问题。她说：

他不能跟人好好相处。我曾建议他去打打篮球，参加一些与人交往的活动。他还真的去了一次。但是很不高兴地回来了。因为——他们问他“你是哪里人？”而他不想告诉他们他是从哪儿来的。他不想谈起他的过去。

天真的杨焯没有想到，“过去”是不能一甩就掉的；而全新的生活更不容易马上就开始。事实上，过去的噩梦无时不在折磨着他。希尔达说，他到了英国以后，仍然十分害怕给“抓回”中国去；甚至一见到中国人，他就吓的发抖。有一次，白霞和她的朋友邀杨焯外出游玩，他很开心，过了一个少有的愉快的假日。后来，他们去到一家咖啡店，店里有一对中国夫妇在喝咖啡，杨焯一见到这两个中国人，立刻脸色大变，愉快的心情荡然无存。糟糕的是，杨焯既想与过去一刀两断，他的护照却仍是中国的护照，护照上的名字仍是他想忘掉的“杨焯”二字。每年一次的换护照，总要又一次提醒他想起过去的一切。他身在英国，用的是英国名字，身份却仍然是中国人（英国政府规定必须在英国住满5年后方可申请加入英国国籍）。但是，杨焯既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又不是英国人。他夹在两种政治制度、两种文化和截然不同的两个国家中间；他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临死前的几个月，杨焯显得格外正常。每次希尔达为他清理好房间后，他往往会留一个小纸条儿，纸条上写着：希尔达，谢谢你！这使希尔达感到很安慰。那时已是1978年，毛泽东逝世已经两年，四人帮也早已打倒。杨焯并没有忘记故国，他的目光一直注视着这一切。希尔达回忆到一个惊人的细节，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思想状况：

在他的房间，有一张毛主席像。那是一张小小的像片，上面戳满了洞。看到这张像我吃了一惊！因为这反映了他真实的思想状况。他曾经是毛的那么忠实的战士——你们叫什么来着？哦——叫“红卫兵”。可是，毛却把这些年青的红卫兵打翻在地！

这张毛主席像正是杨焯从北京带到伦敦的，他一直珍藏着。走到哪儿都摆在他的桌上。如今，上面却戳满了洞。这张戳满了洞的毛泽东的肖像象征着他破碎了的理想。这个异乎寻常的举动揭示了杨焯内心翻腾的风暴。

杨焯死的很冷静。计划很周密。他事先准备了汽油。趁着姨妈希尔达将要外出之前行动。这样，家中有人，不至于把整栋房屋都烧毁。整个过程只有二十分钟，消防队就到了。而他——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死的那么刚烈，正如他的为人。

杨焯是死在新旧交替，方死方生之坎上；他的死似乎成了一个象征。许多年来，人们避免谈论他的死，这是中国人一向的忌讳。久而久之，杨焯的名字似乎

在人们的记忆中淡化了。只有一个人无时无刻地想念他；而且，时间越久，对他的思念越强烈越沉重——这个人就是杨烨的母亲戴乃迭。戴乃迭跟儿子之间似乎有一种特殊的联系；在三个孩子中，她最珍爱、期望最高的就是长子杨烨；杨烨的死是戴乃迭心中永远的痛。从此，她的生活永远没有了阳光。

杨烨是值得纪念的。他用他的死，发出了对政治迫害和种族歧视双重压迫的永久的无言的抗议。

111. 思想解放的年代-《中国文学》的繁荣期和《熊猫丛书》

1979 年是大转折的一年。那一年几乎是“平反”年。先是给在文革中制造的形形色色的“反党集团”、“叛徒集团”、“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平反；后来，平反的范围超出了文革，延伸到了文革以前的“十七年”。其中影响最深远的纠错是为全国 55 万“右派分子”“改正”及为“地富分子”摘帽。1980 年，中共中央又批转了公安部等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的报告。紧接着，难忘的 20 世纪 80 年代来到了。这个年代值得在中国现代史上大书特书：全社会高张“思想解放”的大旗，人们怀着“久违”了的心情如饥似渴地拥抱着各种各样迟来的“主义”和“思潮”，整个知识界思想活跃、精神昂扬。那时的人们，虽然在物质上普遍还很贫穷，但精神世界充实；人们关心政治，关心国家的未来，热心地研究探讨近现代中国和西方各国的思想潮流，对前途充满信心。那真是一个“思想无禁区”，“读书无禁区”的时代。人们在报刊杂志上谈论各种“主义”，甚至对马克思主义也开始进行批评和探讨；人们从清算文革到对解放以来的各种“运动”进行清算和反思，真有摧枯拉朽、无往不胜之势。尽管有 1981 年的批《苦恋》（1981 年 4 月 20 日《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1983 年 10 月开始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 1987 年 1 月的“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这次运动最严重。该运动中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被开除党籍，总书记胡耀邦下台），但并没有遏止蓬蓬勃勃的思想解放的势头和“改革开放”的总趋势。

作为一个过来人，杨宪益把八十年代初期的思想解放和世纪初的五四运动相比（周扬于 1979 年 5 月 7 日发表的《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有此类比）。中国在封闭了三十年后的突然解冻，杨宪益在《自传》中将此比喻为“时光倒转了半个世纪”：

在文革结束之后的 1980 年代初期，形势日益好转。我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全心全意地支持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新路线。在中国，出现了自三十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强烈的民主、自由的思想潮流。好像开始了第二次的五四运动。

我饶有兴趣的发现，许多西方书籍突然在八十年代的年青人中间流行起来，就像三十年代我在天津当学生时的情形一样。人们又一次阅读和讨论弗洛伊德、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弗雷泽的《金枝》、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爱略特、普鲁斯特的意识流小说和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作品，讨论虚无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等等；这种情况使我感到好像回到了半个世纪以前我的青年时代一样，似乎我的生活又要重新来过，历史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西方思想隔离了半个世纪，因此新一代人对之如饥似渴，觉得这些西方思想观念都是新观念。但是，新一代已经成熟，不再那么天真幼稚。他们不再像我们年轻时候信仰毛主席那样盲目地信仰某一位政治领袖了。（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74-275 页，雷音译）

当时中国知识界昂扬振奋的精神面貌可以从白霞的回忆中生动地体现出来。她从和杨宪益与戴乃迭的友谊中了解了中国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外国人，她见证了这一个短暂而难忘的年代：

我通过格莱迪丝和宪益一到他们家里——我遇见了許多人。这些人都有许多人生故事，文化大革命的故事和以前的故事。所以我受到了教育。通过格莱迪丝和宪益和他们的朋友——他介绍了一些老朋友给我，像黄永玉、梅溪、丁聪等等——从这些作家、画家、演员们等各方面的人那里，我明白什么是“政治”，懂得了复杂的事，知道了在政治运动中发生的事情。没有多少外国人有机会从这么多人那儿听到这些。这是非常特殊的教育。这不仅是一比“听新鲜事儿”内涵更丰富。是一种学习，学习了解中国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深度教育，很直接，非常有深度！如果没有格莱迪丝和宪益，我只能了解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中国。

.....

这是一代优秀的人。这一代人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最优秀的。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饱经坎坷，但不屈服（强权），保持他人格的完整。我认识一个作家，他1958年打成右派，到新疆整整20年，1978年才回北京；受了那么多苦，仍很坚强。我在77年来中国的时候他们满怀希望。别对我说1977年的他们是娇气的、过份讲究细节的人，他们是希望改革的人！这正是宪益能够开始《熊猫丛书》的原因。

思想解放的过程，可以从《中国文学》的变化中看出来。这种变化正好和杨宪益开始担任《中国文学》的主编（1979年起先是副主编，80年代上半叶担任主编）联系起来。白霞的回忆描画了这个变化：

当我1977年为《中国文学》杂志工作的时候，大多数的文章、小说和诗歌都是垃圾，没有任何价值。我不理解怎么水平会那么差？非常差！就像是宣传小册子。文章里到处都是用黑体字印的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怎么说怎么说。这就是当时的《中国文学》。1979年以后，事情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把文章重新写过，能够为《中国文学》做些真正的事了。

《中国文学》还有一个变化，它不再只是出版“政治上保险”的作家的作品，有些“麻烦”的作品也出版了。比如在1979年我们出版了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这个作品在天津和北京引起了争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小说。它引起了人们的思索和谈论。这是很奇妙的事情。这正是我们应该发表的东西。人们说“哇，这可是篇好东西！”

当然，这些变化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大环境是“反左”，作为“主编”的杨宪益，正是在“反左”的潮流中才能发挥他的作用。英国专家白霞在回忆中专门谈到了杨宪益作为“主编”的作用：

.....（过去）问题在于，《中国文学》的编辑没有一个会说英语，他们怎么能使一个杂志适合英语世界的口味呢？他们的思维是中国人的，不懂得外国人的思维。他们挑选的文章我们觉得很愚蠢。开始时，宪益会去说，这个不好，不要做。他们就采纳宪益的意见，放弃那篇文章。慢慢地，《中国文学》开始像一个正常的杂志了。变化是迅速的。到了1980年，宪益成了杂志的主编，他把这个杂志从一个很差的无人读的杂志变的有趣起来。编辑实际上非常重要，他必须既懂中国又懂西方。如果你对西方文化传统完全不理解，对这个杂志就完全无能为力。而宪益有这方面的知识。他去过很多国家，在国外学习过，视野很宽广，再回过头来搞杂志就会有新思维。这是很有价值的。比那些从未去过外国连外语都不懂的人要好的多。因为这个杂志不是为中国人而是为外国人读的。

他（宪益）搞了一个《熊猫丛书》，这个丛书走上了国际（市场）。人们都愿意读它，人们都征订《熊猫丛书》，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我亲眼目睹了这个变化。杂志同仁的人际关系也改变了，原因是人们都喜欢宪益。他有很高的（业务）水平。

《熊猫丛书》是杨宪益在新时期中做出的贡献。从策划到编辑都是他亲力亲为。他从闻名世界的《企鹅丛书》得到启发，开发了这个项目，获得巨大的成功。其中的《边城》（沈从文著）、《聊斋志异选》、《新凤霞回忆录》、《三部古典小说节选》、《中国当代女作家作品选》、《老北京的故事》、《秋天里的春天及其他》（巴金著）、《芙蓉镇》（古华著）等都成了外销热卖书。正如白霞所说的，中国的外文版文学书籍从过去的免费“推销”到外国人竞相来“订购”，这真是“一个巨大的变化”。《熊猫丛书》的出版和热销为外文局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然而，《熊猫丛书》的成功只有短短几年。随着杨宪益的辞职，《熊猫丛书》的编辑方针失去了主心骨，书越出越差。最后由热销品变成了“滞销品”。此是后话。

112. 地位变化的背后

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杨宪益个人的命运发生了戏剧化的变化。首先，是公安部派官员亲自上门向杨宪益和戴乃迭表示道歉；紧接着，他在单位的地位大变；原来对他态度冷冰冰的党支部书记现在把他当作“依靠对象”；杨宪益由一个受雇佣的普通翻译（从刘尊琪 1955 年被打倒以后杨宪益就从专家降为普通翻译）变成了《中国文学》的副主编，后来又升为主编；三卷《红楼梦》英译本的出版更使杨宪益声名大振；一时间，他和戴乃迭成了报纸、电台、电视台竞相报道的热门人物，成了全国知名人士，他被冠以“著名翻译家、红学家、中国百科全书的编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高级研究员”等等一大堆头衔；他家经常高朋满座，许多艺术家、画家、作家和各路“名人”都到他家聚会；一些当红作家都主动结交他们夫妇，希望通过他们的翻译把自己的作品“打到世界上去”。

除了在单位里开各种各样的会议以外，他还到外地去参加各种“研究会”、“讨论会”；后来（1985 年），他成了全国政协委员，每年都去全国各地参观访问，受到各地政府部门高规格的接待；此外，从 1979 年开始（他 1940 年回国，整整三十九年没有出过国），他每年都有机会出国。除多次回到母校英国伦敦牛津大学以外，他去过卢森堡、法国、爱尔兰、西班牙、荷兰、瑞士、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

在杨宪益的一生中，这是他的第二次“高峰期”（第一次高峰期从 1949 年至 1955 年）。然而，和第一次“高峰期”一样，这次的时间也很短，仅仅四、五年的时间。到了他写回忆录的 1990 年，当一切都“尘埃落定”的时候，杨宪益对于自己那段日子的“走红运”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他在自传中写道：

在当代中国，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社会现象：评价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根据他（她）的学术水准或艺术造诣的高低，而是根据他（她）的政治或社会地位。如果他政治上受到迫害，他就成了一个社会弃儿，成了一无是处的人；可一旦他免去了罪人之身，恢复了名誉，他就会被冠以各种各样的荣誉和头衔，他就被认为是完美无缺的人。我的荣辱升降的经历就证实了这一点。（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61 页，雷音译）

当时的杨宪益，处于与中共的第二个“蜜月期”之中。然而，正如一位学者所

说的“……为了实现经济建设的新承诺，也需要重视知识文化和重用知识分子。于是，便形成了重新‘正位’的特权阶级与知识阶层在邓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撮合下的短暂蜜月。但在这个貌合神离的「婚姻」中，知识分子只是拉磨的驴，特权阶级仍是磨坊的主⑨。”杨宪益尽管当了几年《中国文学》的主编，对《中国文学》面貌的改观起了不少作用；特别是开发了《熊猫丛书》，为新时期的中国对外宣传事业“立了新功”；但是，他从来都没有真正掌握过《中国文学》的命脉，他“只是一个拉磨的驴”。笔者采访杨宪益时，曾向他提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才当了三年的主编，他就一再提出辞职？杨宪益的回答使我了解了事情的真相：

《中国文学》的主编从来都是挂名的。一开头是茅盾做主编，就是挂一个名。也不上班也不管。我是惟一的还算管了两三年事的主编。当时我有一个助手殷书训，何路是书记，我们三个人在那儿管事情。后来何路身体垮了，又来一个董良翬当书记。殷书训是比较老的党员，还有一个将军的夫人，是延安来的，党员，真正管事情都得通过他们。……这几个人都是老党员，把我一个新党员夹在里边。虽然说是叫做“主编”，实际上事情决定还得要跟他们商量。他们同意了才能办。

我惟一做过的一件事就是把《熊猫丛书》弄出来了。《熊猫丛书》是我的主意，但还要经过当时的书记的同意。还是何路同意一答应了我，我们才办了《熊猫丛书》。我就是办了这件事，别的事都不经过我管。业务方面有殷书训，人事方面有董良翬，主要是这几个人作决定。我觉得在那儿有点多余了，没什么意思。

（杨宪益访谈，2001年5月8日，小金丝胡同）

这就是事实的真相。尽管杨宪益从解放前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同一条战壕的战友”；尽管他拥护中共在新时期的改革开放的方针；尽管他后来入了党；但是和其他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从来都没有成为党真正信任的人。他与党关系最好的时期，也只是利用他的“一技之长”而已，他只是一个接受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人，是一个被给予优惠待遇的人。而享受这种待遇是有条件的，其条件就是“听话”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一旦他违反了这条“纪律”，他的一切待遇都会被取消。

作为一个对历史研究有素的学者，杨宪益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对中国知识分子与当权者的关系做了一番深刻的梳理。他在《自传》中说：

封建中国通常把中国人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种类，知识分子名列不一。因为知识分子掌管考试系统，并且是文职官员。而考试系统和文职人员实质上是国家政治结构的基础。商人受到歧视所以名列第四。解放后，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政权，刚开头党把人民分为三种：工、农、兵。完全忽视了知识分子和商人。这是因为在延安老革命根据地知识分子很少，商业活动也很少。工人被置于农民之上，是源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因素。尽管在经济落后的中国西北地区，革命队伍中工人的数量极少。后来，当权者把人民分为五个主要种类：工、农、商、学、兵。这个顺序很有含义。共产党从不承认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在新中国知识分子永远是政治的附属品。正因为此，解放后政府很不重视教育和文化。在政治路线越来越“左”的趋势下，政府重新把人民分成了“工农兵”三种，完全忽视了知识分子和商人的存在。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的经济实际上已经崩溃，当权者才开始醒悟到商业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在新总理赵紫阳预导下，商业变成了最重要的东西，连文化也被当作了商品。（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71——272页，雷音译）

杨宪益在上述文字中，不仅揭示了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毫无地位的现状，又含蓄地

批评“新时期”中“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全民经商”的大潮中，连文化也沦为商品的可悲事实。

1 1 3. 入党

1980年杨宪益在“新时期”到来之时，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1985年3月他被批准入党。对于杨宪益的入党，许多认识他的人都感到诧异。大家众说纷纭。他的老友邹霆在《永远的求索》一书中说他是“奉命”入党的；另一个老友冯亦代则批评他入党是“多此一举”；他过去的老上级兼朋友严文井评论说，他积极要求入党有“功利主义”的因素，入了党就可以升官，“后来果然做了几天主编”；而一个《中国文学》的“左派”同事则干脆说他是一个“资产阶级”，是被“一股风刮进党里来的”，“这股风是不正确的”。笔者采访杨宪益时，曾问到他的入党问题。杨宪益回顾了他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渊源：

我的情况跟许多人不完全一样。许多人解放前跟共产党没什么关系。我是解放以前就读过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读过一些经典著作。也支持过西班牙内战。所以我还是跟着左的一方走的。所以跟有的知识分子不完全一样。有的人解放前对这一切都不关心，光是有一种民主思想，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还是完完全全地跟共产党走的。我1948年就申请过入党，孙祥麟（当时跟杨宪益“接头”的中共地下党员）已经答应做我的入党介绍人。后来没办手续。

但是解放以后的几次运动，主要是从反右以后我觉得有些失望。我知道许多人都是好人，反右时划了右派，都给弄死了。有的是神经失常了。有的自杀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对共产党运动的做法有点怀疑。从肃反、反右开始，一直到反右倾到大跃进，我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没有把共产党完全否定。在文革期间也是。你比如说我也讽刺过毛泽东“开国应兴文字狱，坑儒方显大王威”（这是杨宪益在狱中的两句诗）。但这是气话。我对整个党跟个别人还是要分开的。我对党还是相当相信的。

……我从相信共产党到不相信共产党，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四人帮垮台了以后，我觉得党又走上上坡路了，邓小平一上台，我还是拥护的。我那时候对党还是抱着希望的。一直到后来，我看到党实在是腐烂的不像样子了，就失望了。对共产党最失望的是向老百姓开枪。算是到头了。（杨宪益访谈，1996年5月20日，友谊宾馆）

对于杨宪益在文革以后的“入党”，他的上述自白是最权威的解释。

杨宪益的妹夫，中国工程院院士罗沛霖先生对这个问题说的更直截。他说：许多人的印象中杨宪益是被“拉进党内”的。他们不晓得他（杨宪益）自始至终对党的倾向。我们都只能寄希望于共产党。共产党提出的理想是非常远大的。而且确实是在为这样一个远大的目的而斗争的。（罗沛霖访谈，1994年6月20日）

的确，无论是“右派”阵营，或者是“左派”阵营，都有人认为杨宪益是被“拉入”党的。似乎杨宪益这个“好好先生”是却不过党“团结知识分子”的面子，才入了党。这种认识与实际情况有相当的距离。事实是，杨宪益终生都服膺马克思主义学说（晚年稍有变化），反对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他晚年对中共一大批高、中层官僚蜕变为“权、钱勾结”的贪污腐败分子和“人民的压迫者”充满义愤正是出于他对信仰的忠诚。正因为此，杨宪益深深敬仰那些为了理想而献出一生的早期共产党员。四人帮打倒之后，全国人民对中国的前途都满怀希望，

杨宪益也不例外。他在那个时候申请入党，完全合乎他当时的思想逻辑。可是，当中国共产党高举的社会主义旗帜蜕变为经济上的特权腐败和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特别是当中共居然向手无寸铁的人民开枪时，杨宪益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反对派一边。

杨宪益的入党，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外，他与中共的历史渊源也是他始终把中共当成“自己人”的重要原因。中国人在人情来往上很讲究“交情”。杨宪益一直认为自己和中国共产党是“老交情”。因为他在中共还未掌握全国政权时就冒着生命危险支持过中共。他与中共是“患难之交”，他特别珍惜这一点。岂知中共掌权之后，“一阔脸就变”，明里暗里整了他几十年。他在解放后与中共的关系，使我想起唐德刚先生说胡适的一段话。唐德刚在议论晚年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惨景时说：胡适把“哥大”当成北大，可是“哥大”没有把胡适当胡适啊！这段痛心的话恰好能比喻杨宪益和中共几十年的关系。

对干杨宪益几十年来始终追随中国共产党这一点，他的朋友英国人詹纳尔（Bill Jenner, 上世纪六十年代曾在中国工作过多年）颇有微词。他从西方文化崇尚人的独立人格的角度，当面批评杨宪益“双手向共产党投降”，而且是“主动投降”。

为什么中国许多留过学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大知识分子都跟杨宪益一样或先或后都“主动地双手向共产党投降”了？笔者从韦君宜先生的《思痛录》得到了答案。这个答案就是：他们相信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使中国站起来”。这是多数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愿意跟随中国共产党的“第一秘诀”。笔者曾亲耳听到梁从诫先生（梁启超之孙、梁思成之子）谈起晚年的金岳霖先生，金先生在文革以后提起共产党和毛泽东时仍说（大意）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要永远地感激他。为什么感激毛泽东？就是因为他使两百多年来走下坡路的中国终于在全世界面前站起来了。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结”使中国大多数老一辈知识分子们在共产党统治下即使个人命运受厄也仍然愿意跟着共产党走。

尽管金岳霖比杨宪益年长二十岁，但是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思想感情是共通的。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吴宓。他在中共接管大陆政权前夕已经预感到自己的前途“黯然无光”，他将会“抑郁以终”。但他却做好了思想准备“只要祖国前途光芒万丈”，自己“纵使肝脑涂地，也愿涂于祖国土地上”。即使死，也愿“死于自己同胞之手”。（张紫葛：《心香泪洒祭吴宓》广州出版社）

笔者感到，老一辈知识分子之所以跟着共产党走，除了民族主义情结之外，还有一个思想根源：他们都接受了黑格尔式的历史理性主义。这种历史理性主义认为“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毛泽东曾用诗人的语言把这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描述为“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苍桑”。在这个“苍桑正道”面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多少人死于非命而无从讨个“公道”。理想主义的杨宪益对这一点至少是认识不够的。

学者张志扬在谈到知识分子反思历史这个问题时说：“知识分子如果有什么不幸，其中也有他们自身的认同与合谋。也就是说，这种‘创伤记忆’不可避免地也是‘同谋记忆’。”他认为，文革以后的“思想解放”中，知识分子在反省历史中，“始终没有反省到知识分子的知识之真理性与权力性这一创伤记忆的同谋自咎上。”因此知识分子“只能继续在自欺和推诿中过虚假的生活。”（张志扬：《一个偶在论者的觅踪》，上海三联书店）张志扬的批评尽管尖锐刺耳，但是自有他深刻的道理（韦君宜的《思痛录》是一本自觉地既记录“创伤记忆”又记录“同谋记忆”的书，显得格外有价值）。杨宪益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员，他的

知识结构当然也脱离不了“修、齐、治、平”的大一统影响。他对某些问题的“后知后觉”似乎也与此有关。

但是，杨宪益与人不同的是，他在接受“革命大道理”的同时，始终保留着自己的“自由小天地”。他从不接受“存天理灭人欲”、“吾日三省吾身”和“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一套。“洗脑”对他的影响也比其他人小的多。因此，即使在杨宪益与中共的第二次“蜜月”（第一次“蜜月”是1949——1954年）时，仍然时不时地表现出他与某些中共高层官僚在作风上的极大差异。突出的例子是1981年他参加王炳南为团长的中国对外友协访问团出访欧洲。他的身份是王炳南的翻译。可是，他这个翻译“不守本分”。他不像别的翻译只是小心翼翼一字不差地翻出团长的原话，而是常常忍不住要发表自己的观点（尽管他发表的观点没有不“与中央保持一致”）。这种“僭越”行为引起王炳南的不快和其他人的不满。杨宪益回忆说：

一天晚上，记者要来采访王炳南。王炳南说先把提的问题写下来，我研究一下，第二天再答复你。他们当时同意第二天采访王炳南。不过在头一天晚上，他们觉得我的英语说的很流利，跟他们没距离。他们说你给我也谈谈吧。把我拉过去谈了一阵子。我没有“出格”。谈中国的新文艺，当然说好话罗。从鲁迅到丁玲，说好话。他们还问一个问题：中国人为什么要支持波尔布特？我就按照国家的口吻给辩护了一下子，是根据我自己的想法说的。我说听说波尔布特杀了多少人，在战争中间杀了人，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这个事情很难说。还有人说斯大林也杀了不少犹太人，杀了很多匈牙利人，我说你相信哪一个？我说我们还是支持西哈努克的……外国记者来采访我，我没有征求大家意见，就这么稀里糊涂跟外国人说了一顿。外国人还挺满意。他们就为这个给我打了小报告。（杨宪益访谈，2001年9月6日）

杨宪益对代表团某些人的萎缩呆板、凡事都看领导眼色的作风很不满。他反其道而行之，用自己的洒脱、热情和真诚冲淡了死气沉沉的气氛，为代表团出访的成功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在自传中特地举了一个例子：

我们离开爱尔兰以前，主人代表为代表团安排了一个晚会，晚会上，一位专业歌唱家演唱了那支令人难忘的非常动人的民歌《丹尼男孩》。然后，他们请代表团唱一支中国歌。代表团团长建议我们唱大家都会唱的爱国歌曲《五星红旗高高飘扬》。我们走上台，演唱了那首歌。观众们有礼貌地鼓掌，掌声不太热烈。我们毕竟都不是专业歌手，所以观众的反应很勉强。我想，让晚会就这么结束，真是太丢脸了。于是我站起来说，我也想唱这支爱尔兰民歌《丹尼男孩》，不过我记不起歌词了。他们立刻给了我一份带歌词的谱子。那时，我已经有了点醉意，就尽情地高声唱了起来。我的演唱获得完全的成功，观众们报以长时间雷鸣般的掌声。他们都站了起来和我一起合唱，直到演唱结束。一些女士甚至感动得流出了眼泪。我这样说可能会给读者一个错觉，以为我有一个美妙的嗓音，实际情况满不是那么回事。我只是紧紧抓住了晚会的根本精神：充满友谊，充满欢乐，并且选对了歌曲。事后，主人把那篇歌谱送给了我，我至今仍留作纪念。临别时，他们还到飞机场送我一大瓶爱尔兰威士忌酒。尽管代表团对西欧访问获得了成功，我对这次的成功贡献多多，但是我回到北京后，《中国文学》的党支部书记告诉我，她收到对外友协一份报告，报告上说尽管我在代表团总体表现是好的，但他们仍然认为，作为一个官员，我在国外某些场合的表现太自由主义了。（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66——267页，雷音译）

杨宪益的朋友冯亦代在采访中曾对笔者说过一句话：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

但绝不接受专制的东西。这是杨宪益“圈子”里的人的共同观点。即使杨宪益已经申请入党，他也不准备放弃自己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十年文革中，他曾经失去过上述两种人类最宝贵的自由，现在失而复得，他格外珍惜），更不会为了做官，变成一个谨小慎微的君子。

那次对外友协的小报告造成的后果是“组织上”把杨宪益的入党时间推迟了三年（出国以前，杨宪益入党问题已经在党小组会上获得通过）。直到1985年他才被正式批准入党。那时，他已经从《中国文学》的主编位置上退为“顾问”近两年了。

1 1 4. 新时期的动荡

历史的前进是曲折的。这句话在新时期的几次大动荡中得到了应验。

当初四人帮被打倒，举国欢腾，形成了全国空前的团结，形势一片大好。然而，大好形势掩盖不了国家早已存在的深刻的矛盾。正如英国的“中国事务专家”格雷厄姆·哈钦斯所说：“共产党只是把中国从它自己制造的一场危机中挽救出来，在它统治时期，它没有取得一个能干的，奉行改革的非共产主义政党可能会取得的成就。”这是相当一部分中国的有识之士早已认识到的事实。而且，人们的认识要深刻的多。人们已经认识到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很多方面其实与法西斯专政并无二致。早在文革之中，中国一批最早的思想者就开始思考“为什么一个曾经充满革命理想的政权会蜕变为赤裸裸的法西斯政权？”在这些思想者中包括一批中共的老党员。顾准就是其中一位佼佼者。1935年入党的顾准在1973年就写下了这样铿锵有力的话：“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顾准文集》424页，贵州人民出版社）文革结束后，更多人进入了这一“思想者”的行列。他们不接受“一切归罪于四人帮”的说法，而是把目光追溯到四人帮之所以能够横行十年的根本原因上来。这种追溯导致了遍及全国的思想解放的高潮。知识界和文艺界是这一潮流的先锋。然而，中共党内极少数掌权者不喜欢这个思想解放的潮流，他们习惯了“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老路子，习惯了在“思想领域”实行“全面专政”，他们惧怕人人都有独立思想的局面，更惧怕老百姓起来争取自己的民主权利。他们可以在经济上放宽，给人民施一些恩惠，但在思想政治和舆论宣传上却收紧口子，严密防范。只要有人对他们的政治权力有任何的批评，或者发表和他们的想法稍稍不一致的言论，就被视为异端，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的做法仍然是老一套：扣“反党”“反马克思主义”（后来归纳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帽子，并发动了一次又一次不叫“运动”的运动，给社会的稳定和进步造成了极大的隐患。

杨宪益虽然不是顾准型的思想家，但他对新时期中国社会的矛盾的分析有独特的视角。由于熟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杨宪益把中共党内的“极左派”和“斯大林主义”联系起来，使人看到两者的渊源关系，他的这一联想发人深省。此外，他对中国社会及党内两派矛盾的实质的分析，也能给读者特别的启示。他在自传中说：

中国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正期着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迈进，赵紫阳把这称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实，这只是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而已。新的资本主义的增长在革命阶层内部产生了新的矛盾，产生了一个新的官僚资本主义，这个官

僚资本主义危及那些老特权阶级的生存。这个特权阶级还是老一辈共产党高官的老思想，认为他们这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老革命是工人阶级的精华，生来就是国家的主人。这就是俄国斯大林主义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同样道理，中国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战士就成了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尽管他们对斯大林本人持不信任态度。开放的政策带来了经济改革，也带来了西方的要求民主和人权的思想。而中国共产党内的头脑僵化的老人把这种要求称作“资产阶级自由化”。于是，新与旧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72页，雷音译）

上面这段话十分重要。在这里可以看出，杨宪益既对“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即中共高层某些头脑僵化的保守派持反对态度，也对新的“官僚资产阶级”保持高度的警惕。“与人民站在一起”是他的基本立足点。这段话是理解杨宪益政治观点的一把钥匙。

无独有偶，那位“中国事务专家”格雷厄姆·哈钦斯对中国社会矛盾的分析与杨宪益不约而同。他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在英国《每日电讯报》上发表文章说：“中国已经变成一个官僚资本主义社会，这是过去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提出的指责。国家和经济力量集中在千百万党政干部手中，他们以光怪陆离的企业家技巧利用他们的权力在不完善的产品和市场上大显神通。”

需要指出的是，杨宪益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并没有全盘否定，相反，他是赞成中国在现阶段发展资本主义的。他反对的是那些以“光怪陆离的手段”大肆侵吞国家财产的众多“党政干部”。

中共高层对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采取“捂盖子”的决策掩盖不了国内积蓄已久的矛盾。而干部的腐败也决非今日始。因为“绝对的权力”正是“绝对的腐败”的根本来源。早在文革结束后的七十年代末，老百姓就对大批官复原职的“当权派”以“十倍的努力”捞回十年文革的“损失”的做法深表不满。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理（这是当时干部的口头禅）使许多干部利用“在任”时大肆为自己及其子女、亲属捞好处。由于人民的不满没有渠道宣泄（文革后民众同样没有言论、出版、游行和集会自由），这种干部特权的趋势非但得不到遏制，反而越演越烈，最后变为在经济大潮中赤裸裸的贪污和金钱政治，使党风政风日益败坏。共产党的威信降到了谷底。然而，邓小平及其盟友却认识不到或不想认识这一点。他们以为只要“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并保证生活水平提高”，就会“很快找到建立权威的新基础。”他们非但不鼓励党内外人士对暴露弊端的政治体制进行批评和辩论，相反，却用过去同样的方法——逮捕关押，来对付触犯他们政治权威的民主人士。西单民主墙的被推倒和魏京生等人被捕判刑开了文革后首次用专政的手段对付政治异议人士的先例。

然而，推倒了西单民主墙并不能扑灭人们心中追求政治民主和真正公民权利的火焰。知识界和艺术界人士用各种“合法”的手段推动思想解放的浪潮，呼吁体制内的政治改革。然而，党内僵化派连温和善意的意见也听不进。1980年的“赵丹遗言”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中国最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赵丹去世以前（10月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时任主编的杨宪益在英文版《中国文学》上转载了这篇文章），温和地批评了党对文艺的领导。这篇文章不长，摘引如下：

《人民日报》正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预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看到“改善”、“搞活”的标题，颇喜，看到“编者按”中“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须改善，通过改善来达到加强，在这方面我们是坚定不移的”，又忧心忡忡了。我不知道“编者按”中“我们”的范围有多广。我只知道，我们有些艺术家——

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的艺术家，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因为，积历次政治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干涉，直至“全面专政”，记忆犹新，犹有特殊的感受。以后可别那样“加强”了。

我认为，加强或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是指党对文艺政策的把握和落实，具体地说，就是党如何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

至于对具体文艺创作，党究竟要不要领导？党到底怎么领导？

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丁都管，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激发我们警觉吗？！

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成了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党的话才写的？党叫写啥才写啥？那么，马克思又是谁叫他写的？生活、斗争——历史的进程，产生一定的文化、造就一个时代的艺术家、理论家，“各领风骚数百年”。从文艺的风骨——哲学来说，并不是哪个党、哪个派、哪级组织、哪个支部管得了的。非要管得那么具体，就是自找麻烦，吃力不讨好，就是祸害文艺。

这样一篇情真意切，出自肺腑的“忠谏”，被党的最高领导斥为“有原则错误”，是“赵丹临死前放了一个臭屁”。消息传来，引起文艺界和知识界的震动。紧接着，1981年4月20日《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拉开了以批判电影《苦恋》为代表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序幕。最终，这场“运动”，以《太阳与人》（根据《苦恋》剧本拍摄的电影）被“枪毙”、白桦（《苦恋》的作者）向中共中央宣传部作了一份检讨而结束。1983年10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发表了主题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的讲话，发起了以批判周扬“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文章为起因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直到1987年1月的又一次“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这场运动导致党的总书记胡耀邦下台。一次又一次的运动是对改革开放的一次次的“反动”，它严重打击了人民的改革热情，也打击了党内有志改革的“民主派”，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

其实，被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受到批判的党内民主派（和绝大多数被视为异端的中国知识分子）并不是要“拆台”，而是要为中共“补台”。由于中共“十年文革”造成的全民性的灾难，人民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信仰早已经下降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信仰危机”成了“全民现象”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不少外国观察家犀利地指出，中国已经成为“意识形态和伦理”的“真空”地带。在这种情况下，党内某些开明人士和理论界试图从内部革新党的理论，挖掘马克思主义“人的哲学”部分，用阐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学说来提高或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权威地位，这种努力可谓用心良苦（周扬1983年在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念会上的报告就是典型的例子）！可是，党内一些头脑僵化的掌权者连这种学术上的探讨都无法容忍，他们拿周扬开刀，用阶级斗争的逻辑把周扬打成“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精神污染”的代表，深受刺激的周扬从此一病不起。这种“杀一儆百”的愚蠢做法不仅阻断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更新的努力，也又一次破坏了新时期党的形象，使党丢了脸。更严重的是，党的某些高官的这种“愚民”、“愚党”的政策，使中共本来就 very 低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水平又下滑到新的低谷，信仰危机更加严重。这种遍及全国全党的信仰危机正是日后社会上严重的拜金主义的渊源之一。而拜金主义导致社会风气日益败坏。

作为一个正在积极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和新党员，杨宪益正是通过这一次次大大小小的“整肃”运动越来越认清一个事实：实际掌权的某些党内“元老派”与人民的距离越来越远了。访谈中杨宪益谈到了他当时对胡耀邦下台的看法：

入党以后，我也参加小组会，一直都挺积极的。胡耀邦解放以后（指胡在文革后的“干部解放”——笔者）给知识分子很多人平反，我对他的印象是非常好的。当然，那个时候也说他有时候说话手舞足蹈，喜欢说话说的有点过头，这个话我们开玩笑时也说过，可是我觉得党那个时候还是很好，胡耀邦这个领导同志还是很不错的。到了85年左右让我做了政协委员，那个时候我的政治地位好像挺好的，我一切都愉快。可是后来，小道消息说胡耀邦给党内的左派排斥了，后来被邓小平给撤职了，那个事情我们都很气愤。我们不是反对共产党，不过是觉得现在共产党一切都是邓小平一个人说了算，邓小平又不是总书记，不经过什么法律程序就能够把党的总书记——党的总书记应该是最高的，结果说要撤职就给他撤了。我们觉得很不以以为然。（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7日，.百万庄）

在英文《自传》中，杨宪益对党内的矛盾和斗争谈的更加彻底：

到了1980年代中期，邓小平开始向保守派那一边倾斜，邓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总理为首的中共改革派出现了裂痕。而邓有军队作后盾，很轻易就打败了他们两人，胡耀邦被撤职。这当然是不符合宪法的。大部分人对胡耀邦下台感到难过。因为胡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一个好人。文化大革命以后，胡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而在1980年代的后半期，过份强调商业利润和经济过热开始显现出问题。党内的腐败和裙带关系日益严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通货膨胀和失业成了社会的严重问题。人们开始发出对党不满的声音。1989年初，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的保守派批评他经济改革失败以后因心脏病逝世。而大多数人民都认为真正的问题是经济改革之后没有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大量中共老一辈领导干部贪污腐败，中国共产党必须彻底清理自己才能在“训政”时期保住它的领导地位。（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73页，雷音译）

杨宪益用清晰的语言分析了国内的矛盾，指出党内顽固分子与人民群众和广大基层党员的巨大分歧，揭示出中国如果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将付诸东流。这一切都埋下了日后席卷全国的爱国民主运动的根子，说明“八九民运”的爆发有它内在的必然性，也说明了在“八九民运”中有如此之多的中共党员参加的原因。

第八章晚年的辉煌和凄凉（1989——）

115. 杨宪益为什么不参加‘呼吁人权的公开信’的签名？

1989年元旦刚过，中国天体物理学家、著名异议人士方励之在1月6日给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建议在国庆四十周年到来之际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以及所有类似的政治犯”。

2月13日，由诗人北岛发起，知识界和文化界三十三人签名的《致人大常委会及中共中央的公开信》呼应方励之的“大赦”建议，提出“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

“将会创造一个有利于改革的和谐气氛”，也“符合当今世界日益尊重人权的普遍潮流”。三十三人的签名者中，有冰心、吴组湘、邵燕祥、李泽厚、苏绍智、肖乾、吴祖光、张洁、宗璞、严文井、汤一介、金观涛、王若水、北岛、陈军等。这三十三名签名者，绝大多数是中国文化界各领域的知名人士，其中吴祖光、邵燕祥、肖乾和严文井还是他很熟的朋友。可是，杨宪益却没有在这份公开信上签上他的名字（当时有关人士曾上门征集过杨宪益的签名），这是为什么？杨宪益在访谈中说：

那个时候有些人——是站在民主方面的知识分子，像方励之什么的，那个时候要人权，要这个要那个。我开头的时候——八八年到八九年那个期间，我没有正式发表或参加什么宣言。方励之的宣言找人签名，有些北大的老师、学生参加过，我当时没有参加。没有参加的原因就是说——我的观点是我认为中国说不上人权的问题。中国根本本来就没有人权。所以现在也还说不上人权，至于说方励之我觉得（他）有一点太想照搬美国的一套。美国的民主美国的人权什么的，我觉得跟中国并不太符合。所以开头方励之跟他夫人在北大找人签名这个那个，我都没有参加。但是对学生的反贪污反腐败这个游行我是拥护的。（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31日，百万庄）

杨宪益的大妹杨敏如在访谈时也谈到杨宪益和方励之等激进西化派民主人士的差别，鉴于他对中国近代一百多年受外国列强侵略的刻骨铭心的记忆和对中国政治现状的认识，杨宪益对一切照搬外国模式的政治制度的观点和诉求以及民族虚无主义的现点持警惕和疏离的态度。另外，据笔者观察，杨宪益早年（1934年）留学途经美国一个月，对美国的贫富差异之大有深刻印象。他不喜欢美国的“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的现象。他心仪欧洲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思想潮流，后来对欧洲的“福利国家”抱有好感。这也是他对美国式“民主自由”保持一定距离的原因之一。

关于这次的“签名事件”，杨宪益特地写了一首诗，笔者抄录下来，读者可以对照了解他的心态：

惊闻大赦临天下，何用菲名附末端。
教授如今成饿殍，豪商多半靠高官。
窗前修竹欣新绿，门外青松愁岁寒。
饮酒莫谈家国事，懒随佳士说人权。

（一九八九年三月初）

杨宪益在他的英文《自传》中，对这个问题谈的更清楚。他写道：

当邓小平在1983年（应是1979年——笔者）镇压北京西单民主墙并把少数持异议者投入监狱时，我还为邓小平辩护。我觉得这些墙上的大字报使人联想起文革的大字报，那些（文革）大字报既幼稚又令人厌恶。尽管我很同情这些被关进监狱的持异议者，认为对他们的惩罚过于严厉了。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在其他知识分子发起的“请愿书”上签名，我仍然寄希望于邓的改革路线。

但是到了1980年代末，形势已经明朗化，党内的保守势力占了上风，没有政治改革的单纯经济改革也出现了危机。我开始感到人们应该起来支持党内的健康力量，与党内竭力阻碍政治改革的少数垂死腐败的保守派作斗争。这也是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的共同看法。人们对这种情况感到不满。他们要求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以根除党内高层的重用亲戚的裙带关系和腐败。人们并不想推翻中国共产党在政府中的领导。人人都知道这一事实：目前没有其他政党可以替代中共在中国的位置。（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75页，雷音译）

杨宪益的上述自白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态。又一次说明“八九民运”之所以发生的社会基础。

然而，虽然形势已经如此“明朗化”了，杨宪益仍没有在“呼吁释放魏京生”的公开信上签名，其原因，除了上面已经说过的之外，还有一个潜在因素是：他担心如果真的来个“大赦”，会把四人帮也“赦”出来（当时江青还在世）。所以，他在那首诗的头一句用了“惊闻大赦临天下”这样的词。

1 1 6. 杨宪益以什么方式支持学生运动？

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他的猝死居然成了一场人民运动的导火线，这是中共党内僵化派所意料不到的。大学生和各界群众纷纷自发地张贴挽联和悼诗，哀悼这位前任总书记。此时，人们想起他是因为反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而被迫辞职，更把他的死与他两年前的“非正常下台”，联系起来。反应最强烈的是最敏感的大学生。他们从校园到天安门广场，使悼念活动变成一场要求政治改革的和平请愿运动。对于大学生的行动，杨宪益也用一首诗表示了他的态度：

惊闻大地起风雷，痛悼胡公逝不回。
谁道书生无志气，须知大学出人材。
特权垄断都该死，万马齐喑剧可哀。
五四精神今再见，会看群力扫阴霾。

杨宪益旗帜鲜明地把以悼念胡耀邦为先机的“八九民运”和“五四精神”联系起来，而《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则把这场群众自发的爱国民主运动定性为“一场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学生的勇气和爱国热情使诗人气质的杨宪益大受感动，学生们冲破了他深恶痛绝的“万马齐喑”的“一言堂”的政治局面，为人民喊出了“要求政治改革”和“反腐败”的心声。这一切使杨宪益精神为之一振。他虽然没有到天安门广场去看望过绝食的学生们，但他以自己的方式给学生以实际的支持。他给学生捐过几次款，还亲自带着几大瓶水站在甘家口商场门口，让游行路过的学生们把水带给天安门的绝食学生。他还积极参加了多次呼吁政府倾听学生呼声以挽救僵局的“公开信”。在这一切之外，杨宪益对“八九民运”最大的贡献是——他以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形式让全世界人民听到了中国人民的声音。在他的《自传》中，杨宪益回顾了“八九民运”的起因、过程并详细地谈到了他接受多家外国电视台采访的“动机”：

我记得在1989年5月中旬，报上宣布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要来中国访问。这标志着中苏两国结束了自1960年代初期以来的隔阂。大多数中国人——包括我自己——都欢迎这件事。尤其知识分子对这事持欢迎态度，因为我们大家都欢迎苏联的改革和戈尔巴乔夫的新路线。一些党内的死硬派对戈尔巴乔夫的新路线半信半疑，认为这是对斯大林主义的背叛。但即使这种人也不得不承认中苏和好是一件好事。总之，这件事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件重大国际事件，一些国际传媒都热切地观察着事态的发展。5月中旬某一天，我忽然接到加拿大电视台一个电话，说他们电视台驻北京的记者想采访我。他们说通过朋友知道我是一个对中苏关系感兴趣的分子，并支持中苏重修友好关系，他们想听我谈谈这次戈氏的来访。对他们的要求我不感到意外，因为过去几年以来有多起外国记者要求采访

我，特别是英国广播公司多次要求我谈论有关中国文化方面的事态。我总是接受他们的采访，我感到这样做是一个中国公民的职责。

但是这一次，大多数中国人真正关注的是中国政坛的变化和胡耀邦的免职。从89年年初以来，北京的大学生就开始要求政治改革，并进行了示威游行（此处杨的回忆有误，89年学潮是由于胡耀邦逝世才引发的，89年年初并没有游行——笔者），胡耀邦的去世和随之而来的哀悼活动使事态进一步发展了。当加拿大电视台记者来到外文局问我有关戈尔巴乔夫来访的问题时，我回答说：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对中苏两国恢复友好关系当然感到高兴，但是眼下，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国内的事态。大学生们终于摆脱了政治上的冷漠，要求进行政治改革。运动的势头正在高涨。这件事比戈尔巴乔夫的来访对中国的未来意义更加重大。采访我的那位外国记者没有进一步追问这个问题，但是几个星期后，他们又一次打来电话说，他们对上一次的访问感到非常满意，采访播出后在加拿大反应良好。我是否能再次接受他们对学生运动的采访？我表示同意。那一次，我们专门讨论了“八九学运”的问题。当时已是5月下旬，游行示威的规模越来越大。每天早上，学生们从各个学院和大学步行到北京市中心天安门广场，他们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更多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要求彻底清除腐败和党内高层的裙带关系，并要求抑制特权阶级。他们还要求撤消某些不够格的官员的职务，包括新任命的总理李鹏，因为他拒绝和学生领袖进行对话。

学生并没有要求推翻共产党。游行完全是和平进行的，但是政府拒绝与学生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对话。邓小平开始威胁人民，把军事戒严强加在人民头上，并从各地调来了军队。北京的老百姓被激怒了，并且开始投身于支持学生的和平示威游行。普通市民开始来到天安门广场。和平示威的人数从最初的几百人上升到几千人，又增加到几万人，最后，游行的人数接近了一百万。然而，即使有如此大规模的游行，社会秩序仍然很好，交通没有破坏，商店照样开门营业。人民的情绪好像过节一样欢乐。

最终，学生没有从政府那里得到满意的答复，开始了在天安门广场的绝食行动。这激起北京市人民更大的愤怒，人人都想为天安门广场上因绝食而面临死亡威胁的学生做点儿什么。可北京市政府的态度仍然毫不动摇，他们甚至企图停止学生的供水。许多北京市民把一瓶瓶的食用水带往天安门广场。我自己从来没有去过广场，但我也拿了几大瓶饮用水跑到外文局附近的街角，把水交给游行的学生带往广场。许多商店店主和小贩自愿地为广场的游行群众提供食品。

所有北京人的同情都倾向学生这一边。我自己从没去过广场，尽管我单位的大多数年轻同事们都举着红旗、喊着口号参加了游行。政府对待爱国学生的顽固态度使我怒火中烧，但我感到无能为力，不知道用什么途径帮助学生们。我仅仅通过一个朋友向学生们捐了数目不大的钱款，作为我对这次民运所需费用的贡献。但是我感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的贡献实在是太少了。我还在四、五月份向政府的“请愿书”上签了我的名字，这些“请愿书”是通过各种组织向上反映的——其中有政协、文联、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等——要求政府倾听人民的呼声，继续政治改革，扩大出版自由等。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然而，加拿大电视台对我的采访使我产生了一个想法：至少我能够通过外国电视台和外国报纸记者的采访向世界人民发言，告诉他们中国的真实情况。因此，我做出决定：我要尽我的一切努力，接受尽可能多的外国传媒机构和记者的采访。（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77——280页，雷音译）

由于长期的封闭政策以及语言上的隔阂，普通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交流一直存在着

重重阻碍。海外几乎听不见普通中国老百姓真正的心声(中国人在一些公开场合的采访中往往说些官话、套话)。杨宪益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勇敢地挺身而出,向众多国际传媒说出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里话。他成了解放四十年来为数极少的(如果不是惟一的话)“民间发言人”,成了中国普通老百姓真正的代表!在1989年5月中、下旬,杨宪益频频接受了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电视台和路透社、英国广播公司广播电台和香港记者的多次采访,把他的声音传遍了全世界。

杨宪益向外国记者说了些什么?他在访谈中说:

(六四)以前已经有许多外国记者采访过我,问我的看法,我就跟他们说这件事非常好,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贪污,党已经有点变质了,人民自发地起来反一下子非常好。跟五四一样,跟巴黎公社的情况一样。我当时是很积极的。同时我当时已经谴责过邓小平扬言说不怕人民群众闹事,他可以派四个师来镇压就完了。我对这个事情是非常反对的。我跟外国记者都说过这个话。(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30日)

在他的英文《自传》中,杨宪益谈到这个问题时,曾经举了与美国记者谈话的例子:

在北京的一个美国电视台打电话给我,要求对我做一个采访,我去到不远处的香格里拉饭店,做了另一次采访。我把1989年的运动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巴黎公社运动相比,当时我信心十足,欢欣鼓舞。我说,把胡耀邦从总书记的位置上撤职是不符合宪法的。我还说那次的权力更替实质上是一次法西斯政变,是党内少数死硬派策划的。他们反对进行政治改革。我预言,即使他们暂时把群众的游行镇压下去,他们阻挡社会进步的企图也是注定要失败的。(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80页,雷音译)

即使在1989年5月民运处于高潮之时,像杨宪益这样毫无顾忌地向外国媒体公开说出自己与官方相反的政治观点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因为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共有一手厉害的“秋后算账”的手段。许多人就是因为对过去的“秋后算账”记忆犹新才屡屡欲言又止,不敢说出真正的心里话。杨宪益的行为使许多人既佩服又惭愧。因为他们虽然完全同意杨宪益的观点,但是却不敢仿效他的榜样。

关于自己的“勇气”,杨宪益在《自传》中是这样说的:

有人听到了我的讲话,他们十分激动。我的一些知识分子朋友们事后打电话给我,十分称赞我敢于为学生讲话的勇气,他们说他们和我的观点完全一样,但是没有勇气说出来。我不知道我究竟有多大的“勇气”,不过我感到,在那个时候必须有人出来为学生的勇敢无畏的行动说话。如果我保持沉默,什么也不说,我会感到羞愧的。(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81页,雷音译)

笔者记得,杨宪益在回忆到1940年他大学毕业后面临两种选择:是回国还是去美国哈佛大学深造?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国。他在谈到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时说:

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正在“九一八”和抗日战争那个时候,非得要回中国来给中国做一点事情。我不能够躲到一边去,(如果)我那样子会觉得惭愧的。(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30日,百万庄)

对两个不同的时代、不同事物的选择的“原因”,杨宪益用了同一个词——惭愧(或曰“羞愧”),杨宪益把“八九民运”和抗日战争相比,用的是同一个角度——爱国。这是他之所以高度评价广大人民群众在“八九民运”中争取人民民主权利

的勇气和关心国家命运和前途的热情。他认为这是一种宝贵的“民族正气”。如果在这个时刻，面对这一股至大至刚的“民族良知”视而不见，或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无异于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中躲到异国他乡追求个人的安逸和前途。

当然，对于个人来说，另一种选择也完全无可厚非，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杨宪益的选择也纯属他的自由，因为“羞愧”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感觉。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况下才会有“羞愧”的感受。不言而喻的是，有的人一辈子都不会有“羞愧”感。

1 1 7. 青年朋友侯德健

之所以专门辟一小节写侯德健，是因为他在“六四”关键时刻担任了重要角色，而杨宪益与他的“角色”发生了关系。侯德健曾经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代表作“龙的传人”响彻了大江南北。作为台湾流行歌手，他在八十年代选择到大陆定居，大陆当局曾大肆宣传他的爱国举动。杨宪益把他的“龙的传人”翻译成英文刊登在英语版《中国文学》上，以此为契机，他们成了忘年之交。侯德健为人天真豪爽，杨宪益说他“也是个少爷”，一老一少两个“少爷”，玩儿的很投缘。

6月1日晚上，侯德健带着他的朋友刘晓波突然造访杨宪益，说他们要到天安门绝食。当时，由于政府中的顽固派的得势和学生的策略错误，学运面临低潮，但一些激进派学生领袖仍然决定坚持固守天安门广场不撤离。形势越来越紧张。市民们为了保护学生，天天出来游行呼吁，设置路障，并对解放军做了大量劝说工作，希望他们不要进城戒严，不要做“亲痛仇快”的事。但邓小平执意戒严，危机一触即发。关注形势发展的杨宪益心中着急。他为这次民主运动的前景担心，为学生的命运担心。他以为，学生应该改变策略，以打破僵局。因此对刘晓波和侯德健以知识分子的名义发起新一轮绝食的行动持不同意见。他在《自传》中说：1989年5月底，学生运动处于最高潮时，已经计划去澳大利亚的侯德健突然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支持学生的绝食行动。那一段时间他和一个名叫刘晓波的大学副教授非常要好。刘晓波这人有点儿无政府主义，是个狂热的理想主义者。刘刚从欧洲回国，侯德健当时定全在他的影响之下。侯曾经征求过我的意见，我不同意这个想法。因为我以前见过这位年轻的刘教授，觉得他为人不切实际、且极为狂热。我还感到，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已经达到了它的目的，民众已被唤起。因此这种形式不应该无限期地延续下去。但是一些头脑发热的人如刘晓波者与我的想法不一样。不过，我也没有十分坚决地劝阻侯德健，因为他的动机还是爱国的。（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83页，雷音译）

正因为杨宪益认为侯德健和刘晓波的动机是“爱国”，所以，当他们于5月1日来到杨宪益家向他求助时，杨宪益仍然毫不犹豫地帮助他们。杨宪益在《自传》中说：

6月1日晚上，侯来到我家，把刘晓波教授也带来了。侯要我翻译由刘晓波起草的绝食宣言，他们准备在天安门广场向外国记者散发。我看了这篇宣言，发现它充斥了急促而含义不清的语言。我对他们说，宣言太长，需要大砍。只需要说明要求更多的新闻报道的自由就够了。他们同意了。于是我把翻译的“宣言”压缩到半张纸，交给了他们。第二天晚上，侯和他的朋友们开始了他们在广场的“三天绝食”，这是6月2日。到了3日的晚上，镇压就开始了。（杨宪益：《白虎星

照命》283页，雷音译)

历史事件就是这么充满了悖论：正是侯德健、刘晓波、周舵和高新这四位对政府做出最激烈抗议的行动、从而把天安门广场的“静坐”掀起“新高潮”的知识分子，用他们在“最危险的时刻没有逃避”的实际表现，赢得了对广场学生的发言权，使他们成为在关键时刻拯救学生生命的关键人物。6月4日凌晨三时三十分，这四位知识分子的代表，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说服学生在“清场”的最后关头和平撤出，并挺身而出，与“大军压境”的清场军队进行谈判，为学生的和平撤退铺平了道路。他们为保护几千名学生的生命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历史永远会记住他们的功绩。(陈小雅：《天安门之变》390——397页，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封从德：《天安门之争》188——196页，香港明镜出版社)

118. 著名的BBC六四广播讲话

1989年6月4日清晨5时，杨宪益的家门被一个失魂落魄的青年人撞开，正是这个人第一个向杨宪益报告了他亲眼目睹的惨剧。此人名叫杨立行，是个新西兰华侨。他的父亲杨XX老先生是个有名的爱国华侨，全国政协委员，为了支持祖国建设，他把两个儿子(杨立行是老大)都派回国内，分配到外文局工作。读者当还记得，正是这个杨立行在文革初期曾当众揭发过杨宪益的“反对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言论”，使杨宪益的批斗会骤然升级。文革后期，杨立行曾回新西兰数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使杨立行再度萌发回国效力的念头，于是，已入了新西兰籍的杨立行再一次来到中国。这一次，他作为“外国专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文革使杨立行大彻大悟，他非常后悔对杨宪益做过的事情，曾多次当面痛哭着向杨宪益道歉。杨宪益从来就没有记恨过他，他们重又成了好朋友，并时有往来。6月4日清晨，杨立行的模样使杨宪益吃了一惊，他在《自传》中写道：

他的神色狂乱而悲伤，面色苍白，衣服、头发散乱，极度的悲哀和恐怖使他的精神已近乎歇斯底里，说话断断续续、语无伦次。我给他倒了一杯咖啡使他镇静下来。这个年轻人文化大革命以后重新回到中国，以为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那天早上，他在愤怒之中不停地自言自语说“政府怎么可能?!他们怎么会……屠杀自己的人民?!”似乎仍不相信已发生的事情，他告诉我，那天晚上他进城去看广场的学生，还没到天安门广场，屠杀就开始了，他看见有人中弹，倒在马路边；他还亲眼看见一个女学生被近距离的子弹轰穿了眼睛。……(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85页，雷音译)

政府的公告说北京在6月3日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所以解放军开枪是为了“平息暴乱”，“恢复首都秩序”。对于这一谎言，杨宪益在《自传》中是这样批驳的：6月3日晚上和6月4日凌晨的“天安门屠杀”发生以后，政府为了掩盖他们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声称整个北京都发生了暴乱，“暴徒殴打解放军战士，放火烧毁公共汽车和电车，引起巨大破坏。因此，军队不得不开进城恢复秩序。而实际上，直到6月3日北京仍然处于平静、甚至于节日般的气氛之中。尽管有谣传说镇压快要临近了，但是北京市民们做梦也想不到他们自己的政府竟然会如此对付他们!大约在半夜，当我们听到通往市中心的主要街道上传来隐隐约约的枪声时，还有人以为是中国人在喜庆时刻燃放的炮仗声。然而我们终于得知——他们竟然真的开枪杀死了试图阻止军队前进的市民和学生!那一夜，北京没有一个人

能够睡一个踏实觉。黎明时分，枪声渐渐平息，仅有零星枪响从市区各个方向传来。接着，各种各样的人都来报告：许多人在长安街上被枪杀了；士兵们在大街上巡逻，并随意向胆敢冒险上街的人们开枪射击。有的士兵甚至向居民家的窗户开枪，因为窗户里有人向外张望。一些无辜的人——包括儿童——就这么在自己家里被杀害了。（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84页，雷音译）

杨立行的控诉和许多见证人的叙述给杨宪益极大的刺激。和杨立行一样，正因为对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共产党抱有深深的信任和希望，杨宪益才会对中共犯下“杀戮手无寸铁的人民”的罪行感到加倍的愤恨。在杨宪益的一生中，很少出现情感无法控制的时刻，可是，6月4日上午，当听完杨立行的叙述后，杨宪益的心胸溢满了无法排解的悲愤和狂怒。正在这时，远隔千里的伦敦打来了长途电话，对方是英国BBC广播公司的记者，问杨宪益对“六四事件”的看法，于是，杨宪益对着话筒倾诉了他的满腔义愤。后来，BBC反复播放6月4日对杨宪益的采访录音，使这篇广播讲话流传很广，成为著名的来自中国民间的“抗议檄文”。杨宪益的BBC广播讲话不长，总共只有两分钟时间，原文（大意）如下：

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可耻的事！这样的血腥屠杀过去的任何反动政府都没有干过，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都没有杀过那么多的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甚至连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北京的时候也没有干过这种事！很多人都亲眼目睹了这场杀戮。见证人看到一个7岁的小女孩在人民大会堂外被枪杀；还看见女学生的眼睛被子弹打穿；有的人被打掉一半脸；学生并非在抵抗，他们只是手挽手地企图挡住军队的推进，但是士兵就用机枪胡乱扫射，学生走开的时候，军队还从后面追着向他们开枪。

这些解放军是邓小平和杨尚昆的个人军队，这些人和人民解放军没有什么关系，这些军人也是一些无辜的人。责任应由为首的邓小平、杨尚昆和李鹏来担负。他们犯下的罪行，将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恶劣的犯罪行为，永载中国的史册。

（记者：你显然是在批评政府，这样公开的批评政府对你个人是否有危险？）杨回答：我所说的并非批评，而是对罪犯的一种谴责。法西斯分子杀人不眨眼，屠杀了许多人，他们可以将我也加在杀害的名单之上，但是他们不能够杀光我们所有的人。

我不知道事态将会怎样发展，但是，他们不可能摧毁整个国家。

（根据录音和1989年6月5日香港《大公报》的报道）

录音播放以后，许多人通过收音机听到了杨宪益的声音。那时，正是政府大肆“秋后算帐”的时候，整个社会处于一片万马齐喑之中，杨宪益的讲话就像黑暗中的一盏灯，照亮了许多人的心。也正是在这个时刻，“杨宪益”这三个字，被印在了许多中国人的心中。

对于讲话播出后的反应，杨宪益在《自传》中写道：

几天后，我从朋友们那里得知，他们通过BBC的广播听到了我的讲话，声音响亮而清晰。许多人甚至把讲话录音复制了下来。我的广播讲话流传很广，反响强烈。我感到很高兴。（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86—287页，雷音译）

上述自白又一次证明，杨宪益的为人准则是听凭“天性”而不是听凭“利害关系”。他尽管并不想充当英雄，但由于行事方式是“恃欲轻言”（这是他对自我的评价）而不是“瞻前顾后”，所以，他往往在无意之中做出一般人做不出的举动来。

119. 避祸出走

“六四”后，当政府完全控制了北京的局势，各省、市、自治区也纷纷表态“与中央保持一致”以后，中共最高当局开始腾出手来毫不手软地对付民运人士了。六月十二日，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布第十四号通告，当天，公安部向全国公安系统发出“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分子的通告”，通缉、搜捕民运人士的范围由北京扩展到全国。六月十二日，公安部向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厅转发了搜捕方励之、李淑娴的通缉令；六月十三日，公安部转发了北京市公安局搜捕高自联在逃分子的通缉令，共通缉王丹、吾尔开希、刘刚、柴玲等二十一人；六月十四日，公安部转发北京市公安局搜捕工自联在逃分子的通缉令；六月二十四日，公安部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发出搜捕严家其、包遵信、陈一谏、万润南、苏晓康、王军涛、远志明的通缉令。据北京市公安局的材料统计，到六月十日，已抓获“反革命暴徒”和“动乱分子”468人，到六月三十日，被捕人数已达到1103人（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一时间，北京监狱人满为患，全国政治空气一片肃杀。

在这种恐怖气氛之中，亲人们都为杨宪益的安全担心，特别是戴乃迭更是忧心如焚。文革之中她和杨宪益双双入狱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灾难，伤痛隐埋在她心底，她再也承受不起第二次打击了！杨敏如在访谈中说：

我嫂子不能做事了，就是“六四”闹的。“六四”她太紧张了！她觉得如果我哥哥要是再进监狱，恐怕就不能活了，不会再活了。因为那么大岁数了！她着急，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后来没有事了，（又）开除党籍，她嘴上不说，可心里也埋怨他，觉得哎呀，惹这么大的祸，他什么都好，就是这个说话不小心惹了祸。你想夫妻两人的关系，她能不替他着急吗？！（杨敏如访谈，1994年6月11日）

“祸从口出”在中国决不是一句空话。当时一个叫肖斌的人就因为在“六四”发生后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谴责屠杀平民而被判了十年徒刑。中央电视台曾专门播出肖斌被判刑的新闻，达到“以儆效尤”的目的。在这种形势下，BBC一天播放三遍杨宪益的讲话简直就是对戒严当局的严重挑衅。因此，杨宪益的行为在有些人眼里简直就是“发疯”！难怪亲人们要为他担心。因为那一年（1989），杨宪益已经整整七十五岁了！

杨宪益在《自传》中，谈到他“出走”的原因时说：

惹了麻烦就跑与我的个性不太相符。但是，国内和海外许多人都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我的愤怒谴责，我的朋友和亲戚们担心政府会报复我，他们都为我的安全悬心，在屠杀过后的最初几天，许多公开支持过学生并谴责政府的人士遭到逮捕，被送进了监狱。有人说，被捕的人大多遭到毒打，有的人甚至被打死。各种各样的传言都有，分不清是真的还是言过其实。但许多人确实在那一段时间失踪了，一些人可能是躲起来了，另一些人是被捕或被杀死了。整整一个多星期北京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北京变成了一座“鬼城”。（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87页，雷音译）

笔者从最近出版的《中国六四真相》中得知，戒严部队指挥部六月十日的一份报告中称：“为了消除广大指战员对北京市民的怨气和对立情绪，引导大家澄清模糊认识，把极少数暴徒与广大北京市民严格区别开来，端正对人民群众的态度，要求广大指战员把仇恨集中到一小撮歹徒和暴乱分子身上，捣黑窝，惩暴徒，以实际行动完成戒严任务。”“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凡被戒严部队，武警部队战

士抓获的一些人士绝大多数都遭受了皮肉之苦。”上述材料证实了杨宪益所说的“传言”之不虚。

关于“出走”的详情，杨宪益的《自传》写的挺详细：

一天傍晚，我和乃迭正与邻居、一位美国专家聊天时，我的一个老朋友——他也在外文局工作，在另一个小单位——突然让他的保姆送来一张条子。纸条上写：他从可靠消息得知，秘密警察要来抓我，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夜里。那时候我们听说抓人都是在夜里十点钟之后，这样就不会引起骚乱。他说我应该躲一躲，说在（甘家口）街角有人接我，他让我立刻离开家，不要带任何行李，以免引起外文局怀疑。我把乃迭叫到起居室外，对她悄悄转述了纸条的内容。我让她别担心，我几天就会回来。我告诉她会有人告诉她我的去向的。然后，我就出门了。在街角我遇见了那位朋友的儿子。天要黑了，下起了小雨。一些老头儿在路边谈论时事。我朋友的儿子让我坐在他自行车的后座，带我到了他家。他们腾出一间屋子让我住，告诫我千万别外出。他们周到地招待我住了两晚，并告诉我外边的消息。那些日子里，半夜仍有零星枪声。一天晚上，戒严部队搜查附近的一个农民旅店，有人被抓，有人被打死。他们认为，我在那一带住下去不安全，我必须离开北京，或者去其它城市，或者设法搞一个假护照离开中国。我对他们说，我决不离开中国，当然也不需要什么假护照。他们坚持说我眼下决不能回家。于是我说，我可以去看望我的女儿杨焱，她在东北长春，刚生了小孩。他们都表示同意。我的朋友为我买了张火车票，并安排了一个年轻人护送我，他们甚至建议我戴上墨镜和帽子乔装一下。那次的旅行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我既没戴帽子也没戴墨镜。那段时期火车乘警要检查旅客的证件。我向他们出示写有我的名字并有我的照片的“政协委员”证，他们查看了证件，什么事也没发生。我和女儿、女婿在一起住了三个晚上，然后决定回家。（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87—289页，雷音译）

关于杨宪益的“出走”，邹霆（他就是那个帮助杨宪益“出走”的“老朋友”）的回忆和杨宪益有一点出入。邹霆没有提要抓走杨宪益的“可靠消息”，而是谈到由于形势恶化导致杨宪益情绪的变化，并介绍了当时的紧张气氛：

我听了他（杨宪益）的广播以后去看他，第一次他的情绪不受影响。他说我说了就说了。第二次——大概是七号还是八号晚上——这时他已经情绪非常低。那时是戒严时期，很多人写投诉信或者打匿名电话，举报谁参加“暴乱”，拉出去就打，或者甚至就处决了。那时外文局是个无政府状态，都瘫痪了。外文局被认为几乎每个社都犯错误。我们社（中国建设）也是书记带着出去（游行）。外文局那时候门口也没有人管，三个门出入都随便。戒严部队正住在那里。如果有一个好事的，鲁莽的中级军官完全可以把他的抓起来。他自己在院里也跟我说，也不需要他们浪费一颗子弹，如果他们抓了我，打一顿不就完了？我这岁数还经得起打吗？……宪益就觉得他坐在家里是随时等待一种厄运出现。我记得跟你讲过，我每次到他那儿去聊天，他也不送我，这么熟的朋友还送什么？那天他送我到院子里，还跟我握握手。我说我明天再来看你，那天黑的特别早，不到六点就黑了。乌云密布，下毛毛雨，他说好像有所预感的那样，你明天来看我，也许我就不在了。我说假如是这样的话，你也不要多想了。我跟你想想办法，何必在这种气氛下等待一种不幸出现呢？回到家里，我把儿子找来，开了个家庭紧急会议。我说把杨伯伯接出来如何？他们都同意。我说这样，第一站接到你那儿，因为我这个院子是外文局的，这儿很多人认识老头儿，不大好办。你那儿是另外一种宿舍。我儿子同意，当然李路（邹霆夫人一笔者注）也很支持。我们就让一个安徽

阿姨送一个条儿，这个安徽阿姨很好。我还交代她，你进去的时候看看背后有人没有，出来的时候也看看。完了以后不要直接回来。在外面最少绕一个钟点再回来。那小孙真好，办的很地道。那个条儿上我写，你七点半完全黑的时候，到十字路口，什么都不要带，甘家口商场旁边，会有个年轻人，你认识的，他站在那儿等你。宪益就去了。我儿子把他扶上自行车，没有几步路，走新疆街拐过来，到了他家里。我很快去看他，预备了一个地铺，两层垫子，给他酒啊烟都拿好。我说从明天起，我每天早晨下午都来一次。因为不能告诉乃迭，乃迭只知道是我把他弄走了。但是去何处？什么时候回来？都不知道。乃迭的确也糊里糊涂，只知道找个安全的地方躲一躲。后来因为抓王丹的事，刚好在紫玉饭店嘛，我儿子住的那一片听说要清查户口，这个当然宪益也惊动了，我就赶紧去了。我说怎么办呢？我还有一个学生，工人，业余作家，很好的，愿意去的话，也好，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离开了。最后他说去东北，杨炽在长春。我得找人送他呀，兵慌马乱的，大兵到处随时检查人。找了一个共患过难的朋友，他很仗义。他弄了个车，到了北京站，我说你现在身上有任何证件没有，他说带了个政协委员的证，我说那行。他也没带钱，身上只有几十块钱，我给了那个朋友三百块钱，我还给他找了顶别的帽子，换了个上衣。我说你走，我打电话给我的大儿子，他在沈阳工业大学。我说你明天接什么车，因为他认识送他的年轻人。我说如果你看一切都好，就通知长春，因为长春不知道啊。

他一共——在外文局看来是“失踪”九天，在我儿子那里二个晚上，第四天走的，剩下路上差不多一天，五天，第九天就回来了。这当中，外文局有个局长叫林戊荪吧，老林打电话给乃迭说，你通知宪益同志，无论他在哪里都让他回来，因为我们向上面请示了，保证他的安全。这样子就回来了。乃迭好像打电话问了我一下，我说既然林局长说了，你觉得可以就通知吧。（邹霆访谈，1996年1月10日）

关于杨宪益到长春的情况，他的女儿杨炽在采访中说：

来长春之前，有一个很奇怪的电话，是邹霆的电话，说老太太病了，要转一个医院，这个电话之前我跟我妈妈通过电话，所以我知道我妈妈没有病重，没有住院，他说你就别问了，几点到火车站去接就是了。我就觉得很可笑，像秘密工作者似的。他们要我爸爸戴一个黑眼镜，我爸爸也觉得很可笑。（雷问：你爸爸戴了没有？）下火车以后就没有戴。有一个人送他，那时全国都在清查，我们的意思是恐怕他还是得藏一藏。所以他基本在我们屋里没怎么出去，就这么呆着，人家也没发现他来。后来他说这么呆着还不如蹲监狱呢，跟监狱一样。最后他坚持要回北京，我们想也是，我们派一个学生把他送回来了。（杨炽访谈，1999年6月25日）

杨宪益“失踪”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开了，许多外国记者打来电话，或者上门了解情况，英国使馆也来电话询问杨宪益的下落。戴乃迭独自一人在家，整天担惊受怕度日如年，电话的骚扰和不期而至的记者加重了她的烦恼，她的精神状况很不好。杨敏如回忆说：

她太紧张了，整天头晕。英国使馆叫她坐飞机回去，她不回去。怎么办呢？她儿子死了，女儿又不在。我没有车子，就和沛霖两个人轮流去看她，因为我觉得这个外国人，再没有统战工作，我也没有办法了。……她太紧张了，甚至有英国记者来，她把她们骂出去了，她说“你们还要听什么新闻？听杨宪益已经被捕了？或者死了？！”（杨敏如访谈，1994年6月11日）

自从儿子死后，戴乃迭的健康状况就急剧下降，六四又进一步毁坏了戴乃迭

的身体。六四过后不久，一场大病突来，戴乃迭失去了记忆。从此，她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六四通缉令和大搜捕使一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逃亡国外，成为有家不能归的“流亡者”。杨宪益感到，比起他们来，自己的命运要好的多。1994年6月，杨宪益离开居住了三十年的百万庄外文局宿舍，迁居友谊宾馆后写了一组诗。笔者仅录以下两首，从中可以读出他的心情。在终日的郁郁寡欢之中，杨宪益却竭力说服自己要随遇而安：

无端野鸟入金笼，终日栖栖斗室中。
只好闭门装隐士，何须下海耍英雄。
千年古国贫愚弱，一代新邦假大空。
老子犹堪绝荒漠，京城亦可化胡戎。
辞去肮脏百万庄，暂居宾馆觅清凉。
投林倦鸟随枝歇，漏网游鱼见穴藏。
岂敢择邻师孟母，只能拼命作三郎。
亲朋疏远音书隔，犹胜逃亡去异乡。

诗的最后一点出了“要害”：尽管有百般的不适，总比“流亡他乡”要强啊！杨宪益的这种自我安慰，使人看到了他含泪的笑。

120. 要求给予纪律处分

一回到外文局宿舍，杨宪益就写了一份请求给予“纪律处分”的报告，交给《中国文学》的党组织负责人。杨宪益在《自传》中说：

我一回北京，就向《中国文学》的党书记写了一份报告，说明我在“天安门事件”以前及“事变”刚发生时我对外国电台和电视台以及记者的谈话，谈话内容是我对事件的感受。我做这些事情，事先没有得到党的允许，这违反了党的纪律。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请求给予纪律处分。我没有说“对不起”，也没有说对所做过的事情“感到后悔”，我把我的电视讲话的内容告诉了党书记，还谈到我与哪些外国电视台有过联系。党书记什么话也没说，问我那些记者叫什么名字？我说我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了。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乃迭把他们的名片全都扔掉了。党书记当时表态说，我向党坦白我做过的事情是好的，她会这份报告交给文化部党组，让他们考虑对我怎么处理。这事过后，他们没有传唤过我，也没有像往常那样在会上批评我。我猜测，党知道我所做的事情后，感到又震惊又为难。因为在他们心目中，自从我加入共产党以后，一直是一个典型的“好党员”。他们不想开除我，也不想送我进监狱。因为如果这样做，会引起一大堆不必要的“反面影响”。（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89—290页，雷音译）

承认事实但不表示“后悔”，承认“违反纪律”，但不承认“错误”，这是杨宪益的“底线”。此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杨宪益在强大的压力下，坚守住这一道德底线，显示出“烈火见真金”的英推本色。

121. 英若诚三顾茅庐

“六四”过后，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大搞清查，凡是去过天安门广场的都要向组织“说清楚”，要在思想上“转弯子”，承认“错误”。很多参加过各种“请愿

书”签名的知识分子都写了“检讨”。如北大教授汤一介在“清查”中检讨了两次都没通过，到第三次才过关。另一位北大老教授张岱年也被迫向上面写了“检讨”。张岱年只是参与了“支持学运”的签名，“错误”比杨宪益犯的小。而杨宪益的广播讲话传遍了全世界，影响巨大。“上级领导”当然希望杨宪益也写一个“检讨”，最好是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一篇文章，承认“上当受骗”，并谴责“反革命暴乱”，就能顺利“过关”。为了说服杨宪益，文化部（外文局的上级单位）决定派一个领导干部做杨宪益的“思想工作”。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英若诚自告奋勇，他亲自上门三次，希望杨宪益转弯子，但最终却无功而返。关于英若诚其人，以及他的“三顾茅庐”，杨宪益在《自传》是这样说的：

夏末初秋，正当政府极力歪曲事实、要人民相信“镇压是必须的”时候，文化部党组派了一个副部长来看我。他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在他还没当副部长时我就认识他多年了。他入党也才几年，跟我的党龄差不多，他是一个天资很高的人，非常聪明，艺术造诣很高，他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一位好演员。他来我家时很坦率地说，是党叫他来和我“讨论”一些问题，希望我能改变想法。我们自由聊天，毫无禁忌。因为我们都是文化人，彼此十分了解。我们谈到马克思主义，谈到了列宁和斯大林，还谈到托洛斯基、布哈林、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他从不与我争论有关“天安门事件”的“真相”，也从不发陈词滥调。我使他确信，我对社会主义仍然怀有信念，但我信仰的不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也不是后来的“毛式社会主义”。他说他同意我的看法。那段时间他来我家三次，大约每月一次（雷注：在访谈时杨宪益说英是半个月来一次）。乃迭没有参加我们的交谈，因为他不是以老朋友的身份而来，是党派他来的。我们的交谈类似某种“党的会议”，乃迭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因此她不参加，但是，她在里屋可以听见我们的谈话，她对我们的谈话方式和内容感到奇怪。她说我们像在打“太极拳”，却从不触及要害议题。我们的最后一次会谈使英若诚认识到他说服不了我，我也不可能改变想法。因此他说：我已经来过三次，古人说“三顾茅庐”，我已经是三顾茅庐了。……听他这么说后，我笑着回答说：把我比作诸葛亮那是太过奖了，我可不敢当，你还是把我比作“七擒孟获”吧。那样的话，你还得再来四次，他听了大笑，然后离开了我家。（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90——291页，雷音译）

英若诚与杨宪益的“三次会谈”真是“意味深长”，其中包含了丰富的中国文化的“密码”。无论是访问者还是被访者，都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根基和很高的智商，双方都明白英若诚的来访和谈话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真正的目的在“话外”。他上门三次，已经是“给足了面子”，此中的道理无须点破，只要心领神会就行了。杨宪益明知组织的意图，却来个将计就计，英若诚不提“检讨”二字，他也装糊涂，只顾和英若诚云山雾罩地大谈特谈“国际共运”，难怪戴乃迭对英若诚与杨宪益的“三次会谈”感到迷惑。作为西方人，她既不理解为什么英若诚不直截了当地触及“要害”或“晓以利害”，也不理解为什么杨宪益不点破这一层纸，而要和英不着边际地谈天说地。她对这种中国太极拳式的政治行为方式感到大为迷惑。她不懂得，英若诚的表现，是中国式的老于事故，而杨宪益，则可谓外圆内方。

英若诚十分卖力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但他的“工作方法”使党内的“镇压派”十分不满。《中国文学》的那位“左派”就曾“抱怨”说：“我们认为英若诚的谈话方式‘不太合适’。英若诚也是个搞业务的人，他不懂得组织处理的一套。”那位左派认为正确的做法是“应该让杨宪益‘彻底交代’他的‘攻击言论’”才

对。

1 2 2. 从要求退党到开除党籍

1989年9月7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在部分单位进行党员重新登记工作的意见》，《意见》中说，“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在部分单位进行党员重新登记工作，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重新登记的范围是：一.中央和省、自治区、市辖机关的党员；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认定的发生动乱的大中城市的机关和大专院校的党员；三.在发生动乱的大中城市中，市委认定的有清查、清理任务的单位的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145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

按照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意见》所列的范围，几乎全国所有大、中城市的机关、学校（特别是大学）都紧锣密鼓地开展了一场“清党”运动。政府公开号召公民互相揭发在“六四”期间的表现，举报参与支持学生的游行或公开发表同情学生言论的人。一时间，全国上下人人过关。正是这一场“运动”促使杨宪益决定退党。他在《自传》中写道：

将年年底时，形势稍微平静了一点儿，党突然宣布它的决定：所有党员必须重新登记，同时每人要写一份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表现的总结进行自我批评。既然我不承认自己有任何过错，况且，我仍然谴责那些应对这起悲剧事件负责的掌权者，我决定，我不参加这个“党员重新登记”。因此，我写了一个纸条给党书记说，我的认识仍然和以前相同，所以我要求退党。党书记对我说，他们认为我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如果我悔改的话，他们可以考虑从宽处理我。可既然我这样决定，那他们就不得不召开会议将我开除出党。于是，这个党内会议召开了，支部全体成员到会，总共只有十二人。出席者中有一半人认为我的所作所为应该受到批评。他们并没有试图说服我说“派军队镇压是正当的”，也没有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他们只是批评我说，作为一个党员不应该反对党的决定，特别是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引起了那么大的国际影响，违反了党的纪律，他们还批评我，不应该把党和北洋军阀以及残暴的日本侵略者相比，参加会议的另一半党员保持沉默。接着他们开始表决：同意开除我的人举手。经过短暂的犹豫后，所有的人都举了手。然后，他们要求我发言表态是坚持自己的观点还是表示悔悟。我只是简短地表示我服从他们的决定，会议就结束了。（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92页，雷音译）

关于杨宪益的退党和被开除党籍，需要补充一个重要情节：笔者从一位知情者处得知，正当这场“清党”运动在积极酝酿之时，一封举报杨宪益的检举信寄到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举报者是浙江余杭的一个知识分子，他收听到杨宪益的英语“六四”广播讲话后，化名“王德”给中纪委写了检举信。中纪委收到这封信后，批复了四个字“彻底调查”，将信转给了外文局。于是，《中国文学》社派了两个人去余杭调查，整整调查了三十天，没有查到名叫“王德”的人。一个月后，余杭市公安局查到了此人的真实身份，并拿到他录下的杨宪益的“六四”讲话录音，录音带被立刻送到北京。在“清党”之前，《中国文学》社的党书记和有关人员曾反复收听录音带，将杨宪益的讲话内容记录翻译下来，为“清党运动”的“组织处理”做准备。从上述情节可以看出，组织上早已为“清理”杨宪益做好了准备，“罪证”已拿到，“炮弹”也已准备好。没想到杨宪益“先发制人”，一封退党报告打乱了他们的阵脚，使他们既尴尬又狼狈。为了挽回面子，组织上

只能行使“开除党籍”的权力了。

被开除党籍之后，杨宪益写了一首诗，以表达心志，并抒发郁结的情怀：
母老妻衰畏远行，劫灰飞尽古今平。
莫言天意怜幽草，幸喜人间重晚晴。
有酒有烟吾愿足，无官无党一身轻。
是非论定他年事，臣脑如何早似冰。

杨宪益拒绝写检查而退党的消息像风一样快地传开了，在知识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他的所作所为使世人看到了一个真正卓尔不群的人。许多人打电话给杨宪益，在电话中表达他们不能在公开场合说的话。有人写信给杨敏如说“令兄风骨，令人钦敬”。九十多岁的钟敬文老人说“他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子！他是为我们说话，为我们受苦啊！”季羨林先生不只一次由衷地对笔者说“杨先生骨头硬”。当然，也有人对杨宪益的行为很不理解，一个与杨宪益共事多年的人曾经对笔者说过这样的话：

任何一个政权，如果威胁到他的统治的话，就应该镇压。封建时代是这样，国民党也是这样，哪有人说要他下台了他还不动的？！你说他残暴也好，他就应该这样。他不会说‘那我改过’，没有这样的（统治者）。所以我觉得（镇压）很正常。他们（杨宪益们）是过分了。说是镇压群众，他们的观点是不对的，我觉得是应该镇压。统治阶级给人家弄到头上来了还坐在那儿不动手，不可能的。我觉得出现这种情况（指开枪镇压）是正常的。历代都是这样，你觉得对也好，不对也好，事实就是这样。

老杨之所以不可理解——他是个当官的。如果是下面的人，我觉得很自然，但你是主编，《中国文学》是他说了算呐，那你还这样，所以我觉得不可理解。这位同事是老实人，说的也是老实话。只是，他无意中把共产党的政权等同于封建帝王和国民党，不是正好证明了杨宪益“六四”讲话的真理性吗？

如果说，杨宪益在“六四”当天中午的广播讲话还有一时的狂怒的因素的话，那么，他的退党则更增加了理性的因素。事隔十年之后，当笔者在2000年5月某一天问起杨宪益“当英若诚三顾茅庐，希望你不要跟中共最后决裂时，难道你没有过思想斗争吗？”杨宪益回答说：

我的心态很简单。要是共产党现在都很好，我也不是不愿做官，可我没有很大的官瘾，不想为这个做缺德的事。我原来念了点马列主义，对这个理想我是同情的，我是愿意的。因为那个原因我才愿意参加共产党，不是为了做官才参加共产党。

我说过话（雷注：“六四”广播讲话）后，我的很多朋友都在那儿叫好。越叫好我觉得越不能再做党员了。再做党员成什么玩意儿啦？我不能两边都做好人。两边都给我叫好啊？你说镇压学生的人也叫好，反对镇压的人也叫好，那成什么玩意儿啦？！（杨宪益访谈，2000年5月11日）

在另一次谈话中，笔者问杨宪益：为了一时的痛快，他就被开除了党籍，难道他没考虑过实际利害吗？他又一次肯定地说：

我不能两边都做好人，（如果那样的话）那就变成啥啦？！只能在一边。我对党——也就是说，党籍对我关系不大，小事。两个衡量轻重的话，我当然是这样（选择）！大家都赞成我，那我就更不理你了，就是这样。这是一个衡量轻重的问题。（杨宪益访谈，2001年6月26日）

杨宪益在说“大家都给我叫好，那我就更不理你了”时，流露出一丝调皮和得意的神色，使笔者联想到眼前的白发老翁还是六十多年前把署名的抗日文章寄

给天津日军司令部的那个调皮捣蛋的“纨绔子弟”。

当然，在杨宪益表面上的“不严肃”的背后，是他的“大事不糊涂”。杨宪益对事物“轻重”的衡量的确与众不同。他把“分清是非”和“气节”这样“虚”的东西（精神因素）看的很重。与此相反的是，他从不知道自己每月工资的确切数字，也不在乎“钱财”、“级别”、“住房待遇”这样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1994年6月，他从外文局搬到友谊宾馆，原来的两大套六间房缩成了一套三间房，房子还是以戴乃迭这个外籍专家的名义分的，杨宪益苦干了半个世纪，最后竟连一间房也没有了。亲戚朋友劝他向领导提出在外文局大院里保留一套房，就说他要两边住。他不干，他说：“我怎么能说瞎话？既然我不住，何必跟人家要房子？”此外，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他的工资长期低于比他资历浅、水平差的某些同事（笔者在1996年5月的一次聊天中才知道，杨宪益的工资“最近刚刚升到九百多块”），作为全国第一流的做出过最大贡献的翻译家，他至今没有获得过“国家级专家津贴”，《中国文学》社鉴于杨宪益在翻译界的地位和他做出的贡献，曾两次向上申报给予他“政府专家津贴”，可上级单位文化部党组和对外文委都批驳了回来，最后的答复是：“政府津贴不能给反对政府的人”。对此，他只是付之一笑。1993年11月，杨宪益写了一首题为《自勉》的诗：

每见是非当表态，偶遭得失莫关心。

百年恩怨须臾尽，作个堂堂正正人。

这首诗既是杨宪益的自勉，也是他实际为人的写照。

1 2 3. “小鞋”种种和戴乃迭的病

尘埃落定之后，杨宪益恢复了往昔的生活。除了不再缴纳党费不再过“组织生活”以外，他的生活一切照旧，同事们对他和往常一样。然而在表面的平静下，杨宪益仍然感到了不同。“上边”在一些事情上明显在刁难他，杨宪益说是给他“穿小鞋”。

“穿小鞋”是中国的特有名词，外国人不懂得其中的奥妙。他们不了解在这个纯粹的“生活用语”中却包含了特有的政治生活的含义。杨宪益在回忆中举了一些给他“穿小鞋”的例子：

……唯一吃亏的就是有的地方好像是有点给我小鞋穿了。比如说又过了半年多，香港邀请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去，要发我一个翻译奖，一共四万港币吧。结果这边就为难了，怕我到香港去，一去就跑了或者走在外面说什么话。后来在——这已经到了90年了，从三月份开始申请吧，结果一直拖，拖了三、四个月，不批下来。先是说要文化部（批），文化部也踢皮球，文化部说你这个事情——你是政协委员，文化部不能批，得要全国政协批，再往全国政协踢。反正总而言之，从来也没有说不许我出国，可是结果就给我拖黄了。

还有一件事，就是你比如说外文出版局大家评谁是有特殊贡献的知识分子，多拿一百块钱什么的，结果党的意思说是不给我，这是小事，现在又有提高工资，我也没提高，这都没有什么，这都是小事。（1994年5月26日访谈）

从杨宪益的叙述来看，“上边”给杨宪益穿的是“玻璃小鞋”。这种小鞋比一般的小鞋要隐蔽，外表上看不见，实际上却挤脚的厉害。因为领导上没有理由不同意杨宪益和戴乃迭去香港领受一个他们完全有资格得到的翻译奖，因此采取了虚伪的“拖延”和“踢皮球”战术。表面上同意向上报批，实际上早就决定不让去了。最后由于上级领导的刁难，杨宪益和戴乃迭没有去成香港，也没有得到那

个奖项。本来，杨宪益是从来不在乎得不得奖的，但是，经过“六四”的这一番折腾，戴乃迭的精神和身体都备受折磨，早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她十分需要换一换环境，舒展一下身心。而此次香港之行是一次绝佳的机会。她焦急地等待领导的批准，可是领导一拖再拖，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她终于等不及了：1990年6月，戴乃迭突然生了一场大病，她失去了记忆，住进了医院。从此，她彻底丧失了读和写的能力。

124. 戴乃迭为什么没有写完她的自传？

1990年3月，杨宪益应一位意大利朋友的要求开始用英文写自传。他花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近二十万字的后来命名为《白虎星照命》的自传。约略与此同时，戴乃迭也开始写自传。可是，这份宝贵的自传只写到1947年就嘎然而止，一场突如其来大病使她中断了写作。出院后，戴乃迭再也没有重新提笔。这份自传成了永远的残篇。杨宪益对此的解释是：监狱的回忆和儿子的死使她不堪回首，所以她中断了自传的写作。这个解释虽然大体上与事实相符，但显得粗糙模糊，语焉不详。2001年7月，笔者第一次从李辉著的《杨宪益与戴乃迭：一同走过》一书中看到戴乃迭《自传》开头的話：“母亲当年警告我说：‘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肯定会后悔的，要是你有了孩子，他们会自杀的。’没有想到母亲的话‘一语便成谶’！”看到这样沉痛的语言，我直觉到戴乃迭的内心似乎另有隐痛。直到2002年10月，当戴乃迭已经逝世三年后，笔者采访了来京探亲的戴乃迭的姐姐希尔达，希尔达的叙述似乎解开了我心中的谜。原来，当初戴乃迭为了与杨宪益订婚，与母亲塞林娜发生的冲突比我的想象要严重的多。塞林娜性格坚强，处事果断。她一生中见过许多失败的跨国婚姻，因此坚决反对女儿嫁给一个中国人。为了阻挠女儿，她不惜说出如此恶毒的预言。戴乃迭对此耿耿于怀，她把这句话记了一辈子。她下定决心，要让自己的婚姻成功，使母亲的预言落空。希尔达在访谈中说：

我感到，她（戴乃迭）下定决心要使这个婚姻成功，因为我母亲认为这个婚姻不会成功。英国亲友对格莱迪丝（戴乃迭的英文名字）要去中国都很担心，开头是因为中日的战争环境而担心，后来更为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而担心。格莱迪丝的一位英语教师——格莱迪丝是她最好的学生之一——简直不相信她能够在共产主义的社会里存活下来，因为在她心目中，格莱迪丝是一个要求保持自己的自由思想和独立见解的人，因此人们都为她担心。我想，她不会承认自己曾为此而奋力挣扎过，但是事实证明，她的确为了自己能有一个幸福的婚姻而奋斗过。但是，真正的悲剧还是发生了——她失去了她的儿子！这件事使她痛感自己人生的失败。……

我试图使她相信，这一切都不是她的过错，过错在于社会，而现在中国已经有了改变。她不应该再责备自己了。我想，她一直在责备自己（当初的抉择）——这是我的感觉。她（的一生）没有证明她自己的做法是对的。而要她开诚布公地承认这一点却非常难。（希尔达访谈，2002年10月21日）

听了希尔达这一番话，我猛然悟到这才是戴乃迭心中最大的隐痛，也是她最终没有完成自传的根本原因。更要命的是，母亲四十年前的预言居然应验了。戴乃迭为了使母亲的预言落空、为了使这个跨国婚姻成功奋斗了一辈子，最后还是给母亲说中了！她唯一的儿子自杀，她的大女儿杨荧对发生的一切感到伤心欲绝，情愿到美国当公民也不愿再回到中国。晚年戴乃迭的家庭四分五裂。母亲塞林娜

胜利了，她失败了。这种人生的失败感使她的精神世界濒于崩溃。

戴乃迭为什么会这么执拗、这么“认死理”？这还得从她的性格说起。希尔达的叙述使笔者了解到她的与众不同之处：

她永远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对别人的主动奉献或建议她能立刻得出“喜欢或者不喜欢”的结论，而我却不能。她的思维很敏捷，当她年纪很小时就读过很多书，人们总是惊讶于她懂得那么多。她十几岁时就读唐诗，当然是用英文读。唐诗仅仅走她所发现的众多中国事物中的一种。在学校里她有很好的朋友，但是，她与别人总是有一些距离，有一点孤独感。她不喜欢与姑娘们在一起叽叽呱呱，姑娘们对她也敬而远之。她的思绪经常投注于一些严肃的事情。在家中，我们三个兄弟，我是他们的小妈妈，可是格莱迪丝对这一套不感兴趣，她总是喜欢一个人出去，边走边想她的问题，她喜欢沉思，她很早就为离开家庭的小窝独立展翅飞翔做好了准备。比我要早的多。我们姐妹俩性格的差异很大。她像我父亲，当她干某件事时，她会对周围发生的一切听而不闻，对别人在干什么也不闻不问，完全专注于这件事情，而我却总是要意识到别人的存在。

每当圣诞节以后，我们得给每个送我们礼物的人写信表示感谢，她轻而易举就完成了，做的非常快，而我却要为如何措辞伤脑筋。她总是能够敏捷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希尔达访谈，2002年10月21日）

希尔达的上述回忆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心高气傲、特立独行的少女，她聪明好学、性格倔强、知识广博、处事敏捷果断、凡事有自己独立的思想 and 见解。这样的一个姑娘，当她在婚姻问题上与同样坚强果敢的母亲意见不一、发生冲突时，这两代女人之间的冲突就一定是十分激烈了。尽管母亲发出恶言，但戴乃迭毫不犹豫地走自己的路，她坚信自己的选择。也许，她心中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让时间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和母亲的错误。所以，她几十年来竭尽全力维护自己的婚姻和家庭，每逢写家信，她都是报喜不报忧，使母亲感到她在中国一切都好。1968年春，当塞林娜收到女儿从文革时期战火纷飞的中国写来的最后一封来信时，听到的仍是“一切都好”的信息。可是一个月不到，戴乃迭夫妇就双双被捕，塞林娜从此失去了与女儿的任何联系，一直到1970年，塞林娜以89岁的高龄逝世，她也不知道女儿究竟是死是活。戴乃迭因为母亲塞林娜离开人世时没有能见到她最后一面，一直感到愧疚和深深的遗憾；而当心爱的儿子因为命运的无情打击而孤苦无告地走上自杀这条绝路时，她回想起了母亲四十年前斩钉截铁的预言。这时，她才感到了母亲的先见之明！戴乃迭对生活的信念轰然倒塌了！这是对戴乃迭的最致命的一击！她开始回想起丈夫的种种不是之处，责备丈夫不关心儿子，她更加责备自己没有尽母亲之责，当一切都后悔莫及时，她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怀疑自己的一生。当无法解释这一切时，她用酒来消除自己心灵的痛苦。杨宪益在回忆中曾经简略地谈到过这个问题。当笔者向杨宪益提问：“你与乃迭之间有什么矛盾”时，杨宪益回答说：

那个期间（指发现儿子杨烨精神出现异常后——笔者）我跟乃迭有一小矛盾，往往都是她认为我不够关心，她自己着急，她觉得我做的不够，后来杨烨死了以后她很伤心，喝酒喝的太多。那个期间我们有些不愉快的日子，我不让她喝，她拼命的还要喝。喝的有时候趴在地下起不来。我有时候也有点发火，那一段有些矛盾。另外一个——她没提过，可是恐怕她有一点——就是何路后来又重视我了，要介绍我入党，让我做主编。那个期间乃迭也许觉得我在编辑部里边呆的时间太多了，对她不够关心，尤其儿子又去了，她觉得我对这一切都不够关心。她没有公开说，情绪上有。喝酒喝的太多。（杨宪益访谈，2001年2月27

日，四环路宿舍)

杨宪益的叙述揭示了他和戴乃迭关系的另一面，从中看出他们晚年生活的惨痛和无奈。其中，对待苦难的不同的态度显示了西方人戴乃迭的“深刻”和中国人杨宪益的“肤浅”，戴乃迭对苦难“退根究底”，苦苦思索，而杨宪益更多的表现为随遇而安。然而，戴乃迭的思索解答不了她对生活的疑问，她究竟错在什么地方？！她不应该不听母亲的劝告，不顾一切地嫁到中国来？如果是这样，她的青春、她的爱情不也是一场错误？如果不是这样，今天家破人亡的后果又是怎么造成的呢？！每次思索到这儿，她的耳边就响起母亲当年的预言，似乎这句咒语使她“命定”要经受丧子的痛苦和折磨。自从儿子死后，戴乃迭的心就裂成了两半，一半还留在人间，另一半却随着儿子的亡灵飘向不可知的远方。戴乃迭想用酒使自己忘却痛苦，酒醒之后却更加苦涩。我甚至感觉，戴乃迭是用酗酒来惩罚自己，用酗酒来破坏自己的健康并用毁坏自己的健康来惩罚丈夫杨宪益，似乎这样能偿还她对儿子的愧疚之情。

作为丈夫和父亲，杨宪益确有可非议之处，作为父亲，在儿子最需要时，他的态度生硬冷淡，没有给儿子应有的理解和温暖，直到儿子去世，父子之间的鸿沟也没有消除；作为丈夫，他在妻子最痛苦的时候，没有给予她足够的关爱和体贴。在那一段时间里，杨宪益把大量时间花在办公室里，似乎在躲避单独与乃迭二人相对的处境。因为每当夫妻二人默然相对时，他无法解答妻子无言的诘问，更无法挽回发生了的一切。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在丧子之痛中煎熬，眼睁睁地看着妻子一天天走向衰竭。如果说，戴乃迭最大的痛苦是儿子的死，那么，杨宪益的最大痛苦就是妻子的离他而去。这是个很长的过程。从1990年戴乃迭大病一场丧失记忆之时起，到1999年的永别，前后延续了十年。杨宪益眼见着妻子的神志一天一天一点一点地与他远离。他默默忍受着这一长期徒刑。杨宪益，这个从来不相信命运的人，似乎也对命运低下了头。

然而，杨宪益也有向命运抗争的时刻。在妻子神志还清醒的时候，杨宪益曾经用过各种办法，努力挽回戴乃迭对生活的信心，以打消她对生活的怀疑和幻灭感。1994年，当杨宪益向笔者进行口述历史时（戴乃迭也参加旁听，偶尔插一、两句话），他曾再三充满感情地说：“我在牛津最值得说的是认识了戴乃迭——我的爱人。”笔者起先不太明白为什么杨宪益把认识戴乃迭作为他在牛津“最值得说的一件事”。当笔者对杨戴二人的认识越来越深入，特别是当我了解到戴乃迭和杨宪益的差异和“矛盾”时，我才理解为什么杨宪益要这么说。杨宪益之所以如此说法，除了一般人们的认识“戴乃迭不仅是他的爱人、妻子、他三个孩子的母亲，也是他工作上最好的伙伴”之外，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他是在不断地向戴乃迭发出“我们的一生是值得的、不后悔的”信号，以挽回戴乃迭对生活的信心啊！！我感到，杨宪益的举动就像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中向溺水的爱人扔下了救命的绳索，使她不至遭到灭顶之灾。如果说，戴乃迭直到生命的最后，精神世界仍没有完全坍塌的话，是靠了她和杨宪益共同拥有的一切、靠了杨宪益对生活的信念，靠了他坚强的支撑而站住的。1996年，当笔者再一次问戴乃迭：“当初为什么选中了杨宪益作为终生伴侣”时，大病以后的戴乃迭用清晰的汉语回答：“因为他聪明，可靠。是一个靠得住的人”。笔者体会戴乃迭说的“靠得住”的含义，除了杨宪益在爱情上的忠诚，还有更深的内涵：正是杨宪益在一生中无数次大风大浪中的坚定和乐观，给了戴乃迭支撑下去的力量，是他们两人珠联璧合的劳动创造的可传世的精神产品带来的世界性的影响，给了她站立起来的自信。只要有了杨宪益，戴乃迭就感到安全、放心。短短的“靠得住”这三个字，

是杨宪益和戴乃迭互相以生命相许的写照！到了晚年，尽管戴乃迭的健康已受到了致命的损害，但是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中，杨宪益拒绝了一切社交活动，寸步不离地看护着她，使她得到无限的宽慰。1999年11月17日，戴乃迭怀着“我不后悔”的心态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59年前，21岁的英国姑娘格莱迪丝，玛格丽特·泰勒(戴乃迭)以惊世骇俗的勇气和她的未婚夫杨宪益一起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在他们共同生活的59年中，他们与中国普通老百姓共同经历了抗战、内战的艰难日子，又以无私忘我的精神为新生的共和国服务了几十年；无休止的“阶级斗争”的政治环境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文化心态的双重压迫使她这个“外国人”长期受到政治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她遭受过四年牢狱的无妄之灾；她的家庭离散、爱子自杀；她受到了超乎常人的苦难和打击，她的精神一度濒于崩溃。然而，她最终没有垮掉。她和她的爱人杨宪益以他们事业上和生活上的完美结合创造了一个中西文化亲密无间水乳交融的独特范例。几十年来，他们珠联璧合的合作使他们双双获得了“译界秦斗”的美誉，他们不仅创造了翻译史上的奇迹，也创造了人生的奇迹，如今，他们的一生成成了一个传奇。

125. 人生回顾和世纪末思考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内知识界掀起了一股反思、总结个人的人生道路，总结即将结束的二十世纪的经验和教训的热潮。笔者在一次与杨宪益交谈中，提到钱理群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说起他的老师王瑶：作为政治评论家的王瑶干扰了作为学问家王瑶的学术成就。笔者问杨宪益：“拿您和钱钟书相比，钱钟书好像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埋头搞他的学问。可您和他不一样，因此在学问上有损失。你后不后悔”？我的问题引起了杨宪益下面的一番话：

每个人的天分不一样，才能也不一样，我的才能不是很高，不是了不起的大天才。所以成就也就有限的很。可是要比较起来，如果我要是“闭户不闻天下事”，只是读书的话，我想我可以做到跟钱钟书一样，我可以做的到。至于写小说——我没有试验过写小说，我不敢说我一定能够达到老舍的标准或者沈从文的标准，我不敢说。不过每个人都不一样。我总觉得我自己是——就是这个时代造成你就变成这样的一个人。在我这个时代，一上来就碰到了一个抗日战争。作中国人怎么能不爱国呢？怎么能对抗日战争没有感觉呢？一定要投身进去。我不能够耍枪杆子，只能帮着摇旗呐喊，摇旗呐喊也要费时间，所以我浪费了一定的时间。解放战争的时候我也是想参加，我也只能作一个地下民主党派做了一点事，也浪费了一些看书的时间或者写东西的时间。不过我也不后悔这个事。

我觉得一个人没有什么值得后悔的，反正自己是凭着良心应该走那条路。至于说现在共产党不行了，全世界的共产党全不灵了，列宁斯大林做的事情后来人觉得有点过头了，要想立刻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头能够建设成功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国家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当时也是真相信了马克思主义，我也迷信过毛泽东，也迷信过列宁，所以这个事情自然的就走上这么一条路子。我觉得也没什么值得后悔的。

我觉得一个人——毛泽东说过这句有道理的话——他说人要有理想，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反正一个人活着做人就是要有点精神有点理想。既然有理想，那

就是看着什么对，就做吧。我就做了，为了这个浪费了时间，这个话就（看他）自己怎么样选择了。要是你说不要浪费时间，我正研究这方面的学问，不要管那个事，也是一条路子，或者说国内这么乱糟糟，我到外面去可以学问做的好一点，或者过的更舒服一点，也是一条道路。每个人各有志吧。对我自己来说，我认为我的选择没什么后悔的。（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30日，百万庄宿舍）

那次在回顾人生时杨宪益又谈到了晚年退党之事，他说：

解放以后经过了这么多运动，倒不是因为是自己倒了霉就对共产党失望，而是看到共产党当政了以后做的这许多事情，越看（越觉得）共产党只是就想家天下，就想永远是训政训下去，不预备把人民带上真正的民主宪政的道路。那我就失望了，到了“六四”的时候我就要求退党了。所以这个也是有他的必然性的。一个人自然是凭着自己的良心自己的看法来做。既然决定那么做了就没什么可后悔的，不要考虑得失怎么样。（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30日，北京百万庄）接着，笔者与他谈起了中国的政治前途和文化重建的问题。说起中国的政治前途，杨宪益以肯定口吻说中国一定要结束人治，走上真正的宪政道路，给笔者留下特殊印象的是，他把孙中山创建的中华民国作为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起点，以实现孙中山的政治理想为中国政治文明的必经之路，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杨宪益认为，国共两党却都把“训政”时期无限拖长（蒋经国晚年在台湾开放了党禁报禁，使台湾先于大陆实现宪政，尽管台湾的民主制度还很不成熟——笔者），实际上还是想当皇帝的思想。他说：

人类历史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然后是到现在的这个社会，是有一个过程的。人总是不断要进步的。要是在很早的时期，还是原始社会的时候就要求大家讲民主讲宪法，那当然是做不到的事情，就像今天说我们大家都要天下为公，都变成共产主义，也是做不到的事情。但是需要把人民引导到哪一方面？当领导的人应该带着人民往哪一方面走？过去孙中山的理想是很对的。他说我们要推翻满清帝国，要革命，非用武力不可。革命完了以后，一开头总要有一个严厉的管制时期，要有一个军政时期。但是军政时期不能长，一定是很短很短的，一、两年之内就要始末。以后就赶快进入一个训政时期，训政时期绝对是不能长的，至少一代人中间这个时期就应该过去，不应该是我做领导，光说是带领人民对进，但实际上采取一种愚民政策，永远让老百姓拿你当老子看待。那个样子的话实际上你就是家天下，就是还想继续当皇帝。1994年5月30日）

中华民国到现在经过了八十多年还是在一个摸索的过程。一上来是北洋军阀时期，然后是北伐，中间又插了一个当政的国民党跟当政的共产党两方面的内战，又插了一个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就是日本打进来的阶段。我就是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所以可以算三朝元老吧。从孙中山开始，就说我们要推翻过去的独裁统治，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但碰到的当权的政党，不管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都是想把着权不放，也不教育人民走向法制道路。他们没上台以前都是说的很好听，但是上台了以后都是期望国民党万岁或者是共产党万岁，说老百姓可以当家作主实际上是一句空话，执政的政党如果真正有理想，是有真理想还是假的救国理想，就要看他有没有下定决心自己说出来我当政多少年为止，我在训政时期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人民富足起来，把人民教育好，解决人民的贫穷和愚昧的问题。然后自己不要把着权不放。这个事情国民党恐怕没做到，今天共产党我看也没有能做到。

要真正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取消一切特权，把春秋时候的“刑不上大夫”的这种说法推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是少数人享有特权就永远不可能做到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贪污腐化的问题首先是从党内开始的，真正消灭贪污腐化，就要取消特权，如果说部长以上就没事，只是个别的撤职，可是不能够交给最高法院来判决，做了多少事情还是隐瞒的，那就等于是空话。所以共产党如果不取消他的特权，不说出来我训政训到那一年为止，不说一个一定的期限，这个话就等于是假话。我这个感觉原来还不是那么清楚，到了八九年“六四”以后我就更明确了。

（1994年6月2日）

我们现在要做到的是——或者是一个党或者是几个政党联合——我觉得问题不在于是一党专政还是多党专政，但是执政的政党一定要有这个决心，就是我绝不恋栈，我决不是永远呆到千秋万世，我只是希望经过多少年以后把人民训练好了就开始一个民主选举，这是必然要走的一条路，还有就是不能够永远的继承下去，不能一代一代的继承下去。决不能搞终身制，不能强调继承法。我下台了以后我的儿子当政，儿子死了以后我的孙子当政。这个东西一定要给他一个限期才行。我不是搞政治的，我看的也很简单，反正是一个理想吧。一种理想就是相信个人，个人至高无上，非常之聪明，只要是有他或者是他的子孙来当政，这个国家就可以管的好。这是相信人治的一种看法。相信法制就是任何人到了一定的时间一定要下台。下台了再另外选举，民主选举是必然要走的一条路子。（杨宪益访谈，1994年6月2日，百万庄宿舍）

当笔者与杨宪益谈起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时，杨宪益，这个老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他的回答颇使笔者感到意外：

我的看法很简单：谈文化重建问题不如谈政治改革问题。因为没有政治改革的话谈不上文化重建。我认为像梁漱溟先生也好，冯友兰先生也好，或者是吴宓先生也好，哪一位如果说是关了门出了什么灵丹妙药就可以把文化重建——几分是儒家，几分是西方思想——就能解决文化重建的问题，我认为是一种幻想。我觉得只要是有一个开明的政治，自然的文化就会重建。至于说旧的东西保留多少，吸取多少，外面的东西拿进来多少，这个问题到时候就会解决。（1994年6月2日）

杨宪益还有一个观点。他认为，尽管社会革命不是一个好办法，因为破坏性大，但是到万不得已时，革命也是不可缺少的。他的这个观点在九十年代一片“保守主义回潮”的知识界中显得很不得调。无独有偶，笔者最近看到台湾学者钱永祥的话：“思想的突破往往要靠社会上大规模变动的刺激。在西方，196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前期，似乎是一个变动的时代。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第三世界运动，对于战后西方的主流价值现和主流国家意识形态构成挑战。西方要在1970年代之后，才开启了一个新的局面。（《在纵欲与虚无之上》——崔卫平访钱永祥）我想，今天中国大陆人权状况的逐步改善，以及中共加大惩治贪污腐败的力度和推进政治文明的初步举措，都与“六四”民运对中共的冲击有关，至少，二者之间是有联系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六四”死难者的血没有白流。

有一次谈话谈到了曾在中国工作的美国专家韩丁。众所周知他是毛泽东的忠实拥护者，是一个“铁杆左派”，但杨宪益却说他和韩丁是一样的人。对于笔者的不解，杨宪益说了这样一番话：

要是把一个人用什么主义或是自由主义者或者是什么左派右派（来分），都不容易说的清楚。我在念高中的时候陶行知给我们讲了一课，我就记得他讲的两句话。他一上来就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一个人总要有个理想。这个理想要么是为己，要么是为人。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有做什么都得要为别人，

为人民。这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比如说为自己，就是为赚钱，买房子，还是要做官，甚至于做皇帝。这都是为己。为己呢是一种人，为人呢就是为人民服务。早期的共产党是有一些理想主义的人，想为人民服务的。世界上都是有两种人，有的人一辈子忙忙碌碌就是为自己，多赚点钱，多赚点财产，或者是做大官；一种是为别人服务。我是从小有为人民服务的角度，这是我的理想的开始。早期的革命的人，包括共产党在早期的人，都是有理想的，我就是相信这种理想。理想怎么样为人民服务呢？就是为人民争取自由平等，就是法国革命时候的观点。我一直是这样的观点。共产党早期我认识的、佩服的人也都是也都是这样的观点，韩丁的思想也是这样，这都是理想主义者。（杨宪益访谈，2001年5月25日）

为人还是为己，这是杨宪益看人、特别是看“官人”的标准。用杨宪益这样的“火眼金睛”来衡量，一下子就可以看透那些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大肆为个人和妻女捞好处的人的嘴脸。不管他自称是改革派还是开放派。

126. 愤怒出诗人

轰轰烈烈而富有理想的八十年代以“六四”惨案为结束，代之以经济大潮汹涌而来的九十年代。中国人在一个早上突然发现，反对专制主义的任务尚未完成，官僚资本主义又向人们张开了血盆大口。中国人同时身受专制的政治制度和权贵市场经济的双重压迫，喘不过气来。与此同时，各种现代思潮纷纷进入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呈现出“多元并举”的现象，似乎顾准前辈的预言提前实现了。但这种“多元主义”的“盛况”仅是学术界的自说自话，与老百姓毫无关系，老百姓也不关心。比起八十年代曾经热闹非凡的“文化热”来，九十年代的人更关心的是一个“钱”字。政治的高压使人们对现实政治采取了冷漠麻木的态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路线更使全国上下理直气壮地“一切向钱看”。一时间社会风气大变，理想主义思潮遭到贬损，犬儒主义和实用主义大盛。人们领悟到“关心国家的前途不如关心个人的前途”。媒体的宣传口号是“谁发财谁光荣”，超前消费成为时尚，“节俭”、“清贫”成了可耻的代名词。社会上兴起了“笑贫不笑娼”之风，拜金主义卷土重来，而“信仰、理想、价值判断”这些词离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远。

由于整体社会风气改变，腐败现象从国家党政干部蔓延到整个社会，媒体的有偿新闻时有所闻，受贿之风甚至侵蚀到清高的学术界、出版界和教育界，“学术腐败”成了人们的谈资。至于掌握着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各级党政“一把手”，从上到下，无人监督，权钱交易越演越烈，“一把手”腐败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这一切使杨宪益感到深深的失望和愤懑。他已是年届耄耋的老翁，廉颇老矣，但他内心的正义之火仍在燃烧，满腔的报国之心也丝毫未减，但他无处释放对社会现状的忧虑，只能把一切义愤和忧思诉堵于诗歌。因此到了晚年，他的诗有很大一部分是忧世愤俗的讽世诗。笔者试举以下几例，读者可以看出八十老翁杨宪益仍是当年那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只是他的“刀”不是剑，而是诗歌：

其一：怀苗子郁风

世事而今尽倒颠，羨君海外获桃源。
迎来亚运强充胖，一见华侨便要钱。
人血馒头难续命，狗皮膏药岂延年。

会看三峡功成日，一片江洋浪接天。（1992年）

（邵燕祥兄有妙对云：“狗皮膏药能医病？人血馒头不解馋。”不敢掠美。

其二：无题

回到京城又半年，大街小巷炒银元。
身无长物皮包骨，情有别钟酒与烟。
没有靠山难下海，行将就木快升天。
玉楼正缺承包匠，早去能拿回扣钱。（1993年）

其三：银行

惊闻今日整银行，兔死狐奔亦可伤。
自古有权方有势，从来擒贼不擒王。
贪财终作丧家犬，获利甘当替罪羊。
恨不生为太子党，早携巨款去留洋。（1993年7月）

其四：青海

青海千村付浊流，官家只管盖高楼。
江山今日归屠狗，冠带当朝笑沐猴。
举世尽从愁里老，此生合在醉中休。
儿童不识民心苦，却道天凉好个秋。（1993年9月）

（青海有水库决堤）

其五：有感

居然死水起微澜，赔尽长城体未安。
自古贪污皆大款，而今调控靠宏观。
早知肉腐虫先在，谁道唇亡齿更寒。
总是自家妻女事，雷声虽猛早收关。（1993年10月）

其六：卖书号

出版繁荣印刷忙，秘闻艳史色琳琅。
公家自有防风洞，垃圾今成百宝箱。
干部无聊卖书号，官僚只管盖图章。
苍天已死黄天立，何必多余说扫黄。（1993年秋）

其七：作家

作家闹的一团糟，你炒废都我炒骚。
不怕强人三板斧，只愁暗算一金鏢。
秦琼财尽辞骠马，杨志穷疯市宝刀。
幸喜文章标百万，当今企业重英豪。（1993年11月）

（《废都》《骚土》皆以当代《金瓶梅》自我标榜。）

这些诗火气很大，一点也不“潇洒”，也不“散淡”（20世纪80年代作家谌容写了以杨宪益为原型的小说《散淡的人》），倒是像一把把出鞘的剑，刺向专制统治者贪官污吏和社会上的丑恶现象。性格温和与世无争的“酒仙”杨宪益，骨子里是一个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人。到了八十岁，他还是这样。

除了讽世诗，杨宪益还写了一些抒发家国身世、人生百年沧桑的诗，给人沉重和沉痛之感。以下是一首代表作：

无题

蹉跎岁月近黄昏，恃欲轻言无一能。
呐喊早成强弩末，离群犹念故人恩。
残驱难见山河故，大厦将倾狐兔奔。

起应晚年余涕泪，天涯尚有未招魂。（1993年8月）

注：过去所熟识的党员如南京陈同生、杨永直、北京徐冰、冯雪峰等皆一时俊彦，多不得好死。起应，周扬原名，周晚年谈及往事，每涕泪纵横，悲不自胜。

戴乃迭去世后，杨宪益搬出了友谊宾馆，先是一人独居在外文局西郊五路居宿舍，后又几经转折，迁居什刹海小金丝胡同小女儿杨焱家。老来孤独的飘零之感使他写下了这首诗：

迁居什刹海

来时仓促别匆匆，五路郊居一梦中。

宾馆去春辞旧宅，小楼昨夜又东风。

独身宛转随娇女，丧偶飘零似断蓬。

莫道巷深难觅迹，人间何处不相逢。（2000年）

“丧偶飘零似断蓬”，读来真有落泪之感。然而，杨宪益最后却用一句“人间何处不相逢”结束该诗。86岁的杨宪益仍然用一颗热诚企盼的心欢迎远道来访的亲友们。正是这种百折不回的坚强和乐观，成就了“中国士大夫”加“大丈夫”杨宪益。

127. 诗人的另一面

完成了上述章节后，对杨宪益的叙述本来已经可以暂告一段落了。但总感到还缺了点什么。直到最近，笔者看到了哈维尔以下一段话后，我才明白缺少的是什么。这段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一个人的脸庞因为这个人所面临的问题的严肃而变得越来越严肃，那么他就会很快变得僵硬和成为他自己的雕像。那么一个雕像是不能起草一份历史文件和胜任任何人类使命的！”……“一件人类行为变得真正重要，来自于灵魂深处对世间每件事情的短暂性和转瞬即逝的深刻自觉。”

“一个人在完成某种历史角色和做出这角色所需要的牺牲时，却不能和它们以及和自身保持恰当的距离，那是几乎不可能实现其目标的。”（崔卫平：《积极生活》215——21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经过了十年文革理想幻灭的中国人，已经领教够了“僵硬的雕像”那张刻板的面孔。所以即使是“自己的雕像”，他们也不会喜欢。于是，我决定加写一节，因为笔者眼中的“杨宪益”的确面临着“非常严肃的问题”。笔者生怕由于他面临问题的严肃而使他在世人面前只展现其“严肃”、“正确”的一面，从而变成了“他自己的雕像”，而没有什么比一个刻板的“雕像”离杨宪益的精神实质更远的了。

说起杨宪益的情神实质，笔者想起1994年4月初次到杨宪益家采访时看到他给自己预写的四句“挽联”，语云：“少时了了，大未必佳；中年昏昏，老而无耻（齿）。”下面还有几句说明：“此是近来自书挽联乃近百年过渡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大抵如是，此也时运使然不足为怪也。故陶潜云：‘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当时只觉得这几句话特好玩，看了使人忍俊不禁，直到近来再一次看到它们时，才悟到这几句自我嘲笑式的偈语的重要性和它包含的全部信息：杨宪益在对外部世界进行批判或嘲笑的同时，也时时在嘲笑他自己，他“对自己人性的荒谬和微不足道有一个健康的意识”（哈维尔语）；他在与外部世界保持距离的同时也和自身保持了“恰当的距离”。与杨宪益交往越久，就越觉得他的这一特性之可贵。尽管杨充益也受到“名留青史”的诱惑，写过“老来留个好名声”这样的句子，但总的来说，他对自己生前身后的声名看的比较淡，“将自己看得很淡”，他对待自己也和对待外部世界一样，存在着“某种距离感”。这一点鲜明地体现

在他对于外界如何评论自己所持的“满不在乎”的态度上，也屡屡在他的古典律诗中流露出来。最突出的例子是1994年3月他获香港大学颁发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后写的一首名曰《自嘲》的诗，全诗如下：

南游四日太匆匆，港大佳仪似梦中。
相鼠有皮真闹剧，沐猴而冠好威风。
西天圣母心肠善，菲岛夫人意态雄。
回国正逢迎奥运，惟忧欢喜一场空。

照理说，根据杨宪益一生的学术成就和他对中国社会进步所做的一切，他获奖当之无愧。况且，能够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一生为穷苦人服务的修女特瑞莎一起获奖，也的确是一种特殊的荣耀，然而杨宪益却从中感到了某种荒谬，居然写出“相鼠有皮真闹剧”，“沐猴而冠好威风”这样的句子，把自己大大嘲弄了一番。

还有一个例子：1990年初，在“六四”的“劫灰飞尽”之后，杨宪益写了一首同样题为《自嘲》的七言绝句，全诗如下：

清谈夷甫终无用，击鼓祢衡未必佳。
羞似窗前水仙草，只能长叶不开花。

正如杨宪益的朋友邵燕祥先生所说，这首诗除了自嘲之外，也包括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批评，“凝结了忧患时事和历史经验的思考”。这是杨宪益在痛定思痛之后，正视自己的真实处境，感到了“自身的完全无力”而发出的无奈而痛苦的自嘲。

读者当还记得，有一次国家安全部的官员讯问杨宪益对曹操的看法，杨宪益回答说“我喜欢他的性格”，原因是曹操“喜欢诗、女人和酒”。我认为这个评语也可以理解为杨宪益的夫子自道。与中国一般的传统知识分子不同的是杨宪益并不回避“食、色”这两项“人之大欲”。他往往在诗中以戏谑的笔触涉及这个领域。笔者仅举一例，诗的题目是《戏答谢严文井兄送蛤蚧酒》：

早知蛤蚧壮元阳，妻老敦伦事久忘。
偶见红颜犹崛起，自惭白发尚能狂。
久经考验金刚体，何用催情玉女方。
圣世而今斤异化，莫谈污染守纲常。

少时读清人笔记谓某理学家每作日记必书某夜与夫人敦伦几次，某新诗人常言新诗界的第几次崛起，故戏用此词，并非如此色迷心窍也。

久经考验者，酒精考验也。

在杨宪益的诗中，这种戏谑自嘲的笔触比比皆是，其中著名的对子“久无金屋藏娇念，幸有银翘解毒丸”被友人黄苗子称“这样精彩的名句，除了学识天分，还得加上酒精，才能泡得出来”。

杨宪益对“世事人情”的透彻洞悉，不仅表现在他用那犀利的笔触揭露贪官污吏和极权主义的“讽世诗”上，更表现在他对自己的揶揄自嘲中。“好汉最长窝里斗，老夫怕吃眼前亏”，是另一个著名的对子。在这首题名为《全国第五次文代会》的七律中，杨宪益用最简炼的诗句勾画出文代会中争名夺利的丑恶内幕，并把自己也揶揄了一番。（全诗如下：周郎霸业已成灰，沈老肖翁去不回。好汉最长窝里斗，老夫怕吃眼前亏。十年风雨摧乔木，一统江山剩党魁。告别文联少开会，闲来无事且干杯。）另外两个著名的例子，是题为《冬鼃》和《冬蚊》的两首诗：

冬蚊

经冬蚊子尚嗡嗡，不识时宜笑小虫。

非是讨厌多讲话，只缘一动便招风。

冬鼈

冬鼈不动不鸣呼，免触霉头体自舒。

唯恐被人当废物，一朝扫进化灰炉。

在这两首诗中，杨宪益用拟人化的手法，把中国知识分子动辄得咎的尴尬处境和进退失据的矛盾心态描画得惟妙惟肖，其中当然有他自己的影子，是他历经亲身体会而发出的“沉痛伤心的笑谑”。

正因为杨宪益正视自己真实处境的无能为力和尴尬，才看得清“所有人的痛苦”并建立起对他们的同情和怜悯。杨宪益的“讽世”永远和他的“自嘲”相辅相成，正如他的朋友邵燕祥所说：“杨宪益用潇洒的自嘲取得了讽世的资格”。因此，杨宪益不是那种“自以为掌握了别人还没有得到的真理”，“于是便拥有比别人更多的发言权和支配权”的人。恰恰相反，从杨宪益的身上永远看不到那种“唯我最革命”的独断气息，他永远不会板着“一贯正确”的面孔来教训人。

与杨宪益交往，使人如沐春风。他从不炫，有容人之量。同事们说他“开得起玩笑”。到了望九之年，他仍不失其天真烂漫，对于一切美好的事物，他永远怀抱一颗热烈开放的心去拥抱它。

不算尾声

2003年下半年，杨宪益患了一次脑血栓，他的右手握不了东西，行走也不那么方便了。从此，在医生的劝告下，他戒了酒。这个终生“情有别钟酒与烟”的人，告别了喝了一辈子的烈性白酒。如今，只有心爱的香烟陪伴这个九十岁的老人了。

尽管杨宪益受到小女儿一家的呵护和照顾，但无法疗治他孤寂的心情。自从乃迭去世后，他时时有“丧偶飘零似断蓬”之感，更加以老友一个个相继离世，“青春作伴多成鬼”，使杨宪益倍感寂寞。“故人星散绝云霄，入梦焉能慰寂寥”，他只能在梦中与故人相见了。

近几年来，国内常有“为六四平反”的呼吁。（笔者近来在网上看到蒋彦永医生给全国人大和政协及国务院总理的信，恳切提出应给“六四”平反，应对“六四”无辜的死难者有一个认真负责的交代。认为这是顺应民心的大好事，不会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然而百姓的呼声如石沉大海，得不到当局的回应。杨宪益感到深深的失望，“残躯难见山河改”——是他伤感无奈的心情的写照。然而“是非论定他年事”，他相信终有一天是非会大白于天下的。

杨宪益集翻译家、中西交通史、文化史学者和中国古典诗人于一身，他是“学贯中西”的活生生的例证。到了21世纪的今天，像他这样能够打通中西学问的人即使不是硕果仅存，也早已经是凤毛麟角了。可惜，自民国元年以后中国的中、小学取消了中国古典的读经课，1949年之后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极端做法，从根本上断绝了中国文化的传承。中国传统的文化经典成了少数学者书斋里的“尘封样品”，与中国人的生活完全隔绝。杨宪益可能是最后的集“士大夫”“与“洋博士”和“革命者”于一身的知识分子了。今后，这样的人可能会永远消失了。

甲申年五月于北京雨田堂